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中文叢書系列 60

中共史論

第三冊

郭華倫 著

中共史論

第三冊

郭華倫 著

中共史論 第三冊

目次

第廿三章 遵義會議	一
一、流竄準備	一
二、突圍西竄	一
三、遵義會議	一三
四、改組中央	一八
五、徘徊黔北	二〇
六、蘇區瓦解	二三
七、深山潛伏	二六
八、神化毛酋	二九
九、禍延死者	三三
附錄·(一)多餘的話	四〇
(二)瞿秋白訪問記	四六

第廿四章 兩個中央……………四九

一、張國燾率部西竄……………四九

二、紅一、四方面軍會合……………五四

三、兩河口會議……………五六

四、共黨和共軍的分裂……………六一

五、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六五

六、中共的「八一宣言」……………六八

七、張國燾毛澤東分裂的分析……………七三

八、統一戰線的本質……………七六

附 錄：(一)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八〇

(二)爲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摘錄)……………八三

第廿五章 統一戰線……………八七

一、陝北共黨內部的鬥爭……………八七

二、徐海東部流竄陝北……………九〇

三、高崗的不滿論調……………九三

四、恢復黨政機構……………九七

五、陳紹禹再論統一戰線·····	一〇四
六、中共中央十二月決議·····	一〇八
七、共軍竄擾晉西·····	一一三
八、所謂民主共和國問題·····	一一六
九、高崗被殺的禍根·····	一一八
十、「長征」與流寇問題·····	一二二
十一、統一戰線的眞義·····	一二四
附 錄：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	一三一
第廿六章 共軍的流竄與會合·····	一三七
一、張國燾率部南下·····	一三七
二、紅四方面軍竄擾西康·····	一四一
三、賀龍部長途流竄·····	一四三
四、張浩調解兩個中央糾紛·····	一四六
五、紅一、二、四方面軍會合·····	一四八
六、西路軍全軍覆沒·····	一五二
七、共黨共軍決定分散游擊·····	一五六

八、張國燾失敗之分析·····	一五八
附 錄：關於綏遠抗戰的通電·····	一六三
第廿七章 中共輸誠前後·····	一六五
一、西安事變經過·····	一六五
二、西安事變與中共·····	一六八
三、中共中央遷入延安·····	一七一
四、鬥爭張國燾與暴動·····	一七五
五、中共輸誠的商洽·····	一八二
六、中共蘇區黨代表大會·····	一八六
七、關於劉少奇的問題·····	一九三
附 錄：(一)對西安事變通電·····	二〇一
(二)中共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	二〇二
(三)毛派所公佈之劉少奇叛徒集團名單·····	二〇三
(四)關於自首自新決定的通知·····	二一二
第廿八章 洛川會議·····	二一五
一、共軍之改編·····	二一五

二、毛澤東的演講·····	一一三
三、所謂十大救國綱領·····	一一五
四、洛川會議的爭論·····	一二九
五、共赴國難宣言·····	一三四
附錄：(一)關於抗戰中地方工作的原則指示·····	一四一
(二)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	一四三
(三)中共赴國難宣言·····	一四四
第廿九章 陳紹禹與毛澤東之矛盾和鬥爭·····	一四七
一、陳紹禹飛返延安·····	一四七
二、毛澤東低頭屈服·····	一五〇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一五四
四、中共中央對時局宣言·····	一五九
五、中共展開全面活動·····	一六三
六、新四軍之招募與編組·····	一六七
附錄：(一)陳紹禹：「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	一七八
(二)中央政治局對於南方各游擊區工作的決議·····	二八一

(三)關於準備召集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	二八二
(四)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	二八三
第三十章 陳獨秀與張國燾事件	二八七
一、中共圖再度加入國民黨	二八七
二、中共決定大量發展黨員	二九三
三、抗戰建國綱領與中共	二九六
四、陳獨秀與托派的問題	三〇一
五、張國燾脫離中共	三〇九
附 錄：(一)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書	三一六
(二)中共中央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定	三一八
(三)張國燾告國人書並與中共同人商榷抗戰建國諸問題	三一九
(四)粉碎張國燾反革命活動報告大綱	三二五
第卅一章 六中全會	三三一
一、國民參政會與中共	三三一
二、中共參加政府問題	三三六
三、「國民黨有光明前途」	三四三

四、「長期合作」問題	三四七
五、六中全會決議	三五二
六、所謂「王明路線」	三五六
七、毛澤東的統戰陰謀	三六〇
八、毛曾的代罪羔羊	三六三
九、黨的總路線之爭論	三六七
附 錄：(一)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決議	三七一
(二)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	三七九
(三)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	三八〇
(四)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	三八三
(五)致蔣委員長電	三八五
(六)毛澤東呈蔣委員長函	三八六
第卅二章 武漢撤守後之中共	三八九
一、張君勳規勸毛澤東	三八九
二、中共中央之新部署	三九三
三、周恩來東南之行	三九九

四、平江事件始末·····	四〇二
五、抗戰兩週年紀念與中共·····	四一—
附 錄：(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國民黨 蔣總裁暨五中全會電·····	四一七
(二)國社黨張君勱致毛澤東一封公開信·····	四一八
(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爲抗戰兩週年紀念對時局宣言·····	四二〇
第卅三章 陝甘寧邊區·····	四二五
一、邊區割據根源·····	四二五
二、邊區共黨歷史·····	四二九
三、邊區政府的演變·····	四三三
四、邊區共黨大會·····	四三五
五、邊區參議會·····	四四一
六、邊區政府與三三制·····	四四七
七、邊區的擴張與糾紛·····	四五三
八、邊區栽種鴉片真相·····	四五七
附 錄：(一)關於審查黨的成份的決議·····	四六四
(二)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的經驗教訓·····	四六六
(三)「淮太西」縣煙土稅徵收與管理暫行辦法·····	四七〇

中共史論 第三冊

第二十三章 遵義會議

一、流竄準備

一九三四年五月間，中共於「廣昌大會戰」失敗後，即作突圍流竄的準備。七月間，共軍先遣隊之東進與紅六軍團的西竄，一面在分散國軍兵力，配合驛前作戰，一面在開闢道路，便利突圍流竄。在蘇區內部則進行緊急擴大紅軍和糧食突擊，充實共軍實力和糧秣裝備；兵工廠和被服廠也日夜趕造彈藥和軍服。九月間。復以參戰爲名，動員民伕五千人，以爲搬遷運輸輜重之用。十月初，共軍換發軍服和裝備，準備行動。至此，共黨和共軍之撤離「中央蘇區」已成定局。中共前期黨史書刊「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下冊亦作如下記述：

「中國紅軍新的策略決定後，便開始長征的準備工作，這表現在擴充紅軍上，自五月間至九月間，組織十萬人的紅軍，同時兵工廠被服廠數千工人趕製彈藥服裝，還有深入動員；九月間『紅色中華』報上刊載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長洛甫同志的文章，說明了紅軍長征的意義與重要。」（註一）

但據陳然先生說，洛甫（張聞天）的文章並沒有論及突圍與「長征」，當時共黨和共軍突圍流竄的

一切準備，都在秘密狀態下默默進行。關於共軍突圍後，蘇區後方之領導配備，爲適應分散游擊、獨立作戰原則，中共中央曾作如下部署：

一、以項英爲中共中央、僞府中央、僞軍委之全權代表（按：項英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僞府副主席，前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留守蘇區，指揮中央蘇區（包括江西、閩西、閩贛邊、閩浙贛、湘贛、湘鄂贛邊等蘇區）黨政軍之一切事宜。其任務一爲牽制國軍之追擊，以利主力紅軍突圍，一爲領導與堅持游擊戰爭，以保存地方武力和幹部。

二、設立蘇區中央分局，以項英爲分局書記，賀昌、阮嘯仙、陳毅、曾山爲分局委員。領導蘇區黨的組織與工作。

三、成立「中央蘇區」軍區，指揮各軍區之軍事行動與游擊戰爭。以陳毅爲司令員（按：陳毅原任江西軍區司令員），項英兼任政治委員，賀昌任政治部主任，并以紅二十四師爲拱衛「中央蘇區」的主力部隊。

四、其他各地方軍區，以各地之獨立團、獨立營或地方游擊隊爲基幹，進行游擊活動，并發動羣衆就地堅持鬥爭，開展廣泛的羣衆游擊戰爭，以保衛蘇區，保衛根據地。

五、爲適應主力紅軍突圍後之變化，應即加強各地方軍區之領導，除電各地方軍區外，隣近軍區之人事重新調配爲：

○江西軍區：司令員李賜凡，政治委員會曾山（兼江西省委書記）。

○贛南軍區：司令員蔡會文，政治委員阮嘯仙（兼粵贛邊省委書記），政治部主任劉伯堅。

六、預計將來局勢之可能變化，爲精簡機構，必要時應設地區軍政委員會，歸併和統一軍區、省府、羣衆團體之領導。

七、所有留守蘇區之幹部及派往各蘇區或返白區工作的幹部，其工作與行動，由項英負責處理（按：其中包括高級幹部瞿秋白、陳潭秋、何叔衡、梁柏台、鄧子恢、張績之等）。

據陳然先生說，共軍突圍之前，關於中央一級機關人員之處理與編組亦曾作原則性的決定。其中包括中共中央、少共中央、僞府各部會及直屬機關、僞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各單位、全國總工會、少年先鋒隊總隊部、中央黨校、蘇維埃大學以及各工廠、醫院等等：

一、各機關工作人員，其原籍在蘇區者，儘可能留守蘇區，堅持鬥爭，其能返白區工作的，亦儘可能派返白區，從事祕密工作。

二、所有隨軍行動之各機關工作人員，除另派工作者外，依軍事組織，編成「中央縱隊」，隨軍行動。

三、中央機關工作同志，其能担任軍中政治工作或地方工作的，儘量派往各軍團政治部（宣傳部或地方工作部）隨軍從事實際工作。

四、挑選精練幹部，組織五個中央地方工作團，派至各軍團，隨軍負責沿途之地方羣衆工作。因此，在突圍前，共黨爲適應行軍和作戰，把所有機關組織與人員均作軍事編組，成爲一個戰鬥體

。其最高領導機關爲中共中央及中共中央軍委，但其公開系統則爲僞府中革軍委。當時之編組與人員配備如次：

中革軍委（公開的最高指揮機關）：

主席

朱德

副主席

周恩來 王稼蓄（帶傷隨軍行動）

總司令

朱德

總參謀長

劉伯承

總政治部主任

李富春代理（主任王稼蓄負傷）

中央縱隊（由中央各機關人員組成）：

司令員

周恩來兼

政治委員

羅邁（李維漢）

參謀長

張雲逸

保衛局長

鄧發

幹部團（由公略、彭楊兩軍校及紅軍大學學員編成）：

團長

陳賡

政委

宋任窮

參謀長

畢士梯

上幹隊長

蕭勁光

(紅軍大學學員編爲上級幹部隊，簡稱上幹隊)

國家政治保衛團(即政治保衛局之部隊)：

團長

姚喆

政委

張南生

軍委警衛營(原中革軍委之警衛部隊)。

第一軍團：

軍團長

林彪

政治委員

聶榮臻

參謀長

左權

政治部主任

羅榮桓

中央地方工作團主任

吳亮平

保衛局特派員

羅瑞卿

第三軍團：

軍團長

彭德懷

政治委員

楊尙昆

參謀長

鄧 萍（鄧於遵義被擊斃後由葉劍英接任）

政治部主任

葉劍英

袁國平（遵義會議後由劉少奇接任）

中央地方工作團主任

劉少奇

保衛局特派員

郭 潛（按：即提供作者資料之陳然）

第五軍團：

張純清

軍團長

董振堂

政治委員

蔡樹藩

參謀長

陳伯鈞

政治部主任

李卓然

中央地方工作團主任

鄧振詢

第八軍團：

軍團長

周 昆

政治委員

何克全（八軍團併編後，何調總政治部接潘漢年任宣傳部長）

參謀長

鍾偉劍

政治部主任

劉少奇（八軍團解散後劉調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

中央地方工作團主任

劉曉（後調一軍團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長）

第九軍團：

軍團長

羅炳輝

政治委員

何長工

參謀長

張宗遜

政治部主任

王首道

中央地方工作團主任

馮雪峰

當時中共中央負責人秦邦憲、張聞天、陳雲等，偽蘇維埃中央政府人員毛澤東、林伯渠、徐特立等，少先總隊部王盛榮以及中央黨校校長董必武等人，均納入中央縱隊，隨軍行動。

後勤單位和輜重如兵工廠（僅搬運修械部門）、印刷廠、造幣廠、大型電台等連同後勤工作人員約二千餘人亦編入中央縱隊行動，另有五千民伕馬伕負責此類輜重之運輸工作。

中共中央各單位與地方各部門工作人員，約有七千餘人，分別編入部隊與中央縱隊，從事軍中政治工作、地方工作或隨中央縱隊行動。

總計紅軍戰鬥部隊總兵力爲七萬人，工作人員九千餘人，民伕、馬伕伍千餘人，全部人員共爲八萬

五千人，對外號稱十萬。這就是共黨和共軍於反五次圍剿失敗後，突圍流竄的全部資本（註二）、

中共前期黨史書刊「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下冊曾作如下記述：

「到了九月底，國民黨軍隊，一變以前緩進的計劃，以東北兩路重兵猛攻贛南蘇區。在這局勢下，當時就決定了突圍西進的計劃和步驟：①派定留守部隊，……對這些留守部隊，一方面給他們不少的槍枝（約有一萬五千枝），一方面指定項英同志為領導人，堅持與敵人作鬥爭，來保護人民的利益和牽制敵人配合主力西進。②將製造敵的機器、大炮、剩餘的子彈、糧食以及不便帶走的利器，不是消燬，就是埋藏於深山僻壤之間。③電令賀龍、蕭克同志所率二、六軍團牽制湖南、四川國民黨及其他軍閥的部隊；又令徐向前四方面軍在川北遙應。準備就緒，接着兩萬五千里的長征便開始了，所以長征是有計劃的，決不是被迫無計劃的亂竄逃亡。」（註三）

二、突圍西竄

當五次圍剿的國軍於一九三四年十月六日攻克石城，十一日佔領興國後，共軍乃秘密以紅二十四師及江西、福建之獨立團和地方部隊分別接替石城、興國及寧化以南的防線，把紅軍主力一、三、五、八、九軍團集結長汀、瑞金、雩都一線，準備突圍。

十月中旬，即十月十四至十八日，紅軍主力和中央縱隊（包括中革軍委）全部秘密南移，向防衛薄弱之粵軍（即五次圍剿的南路軍）封鎖線猛撲，先以一軍團伴攻信豐之北的王母渡，吸引南路軍北調，

然後於十月廿一日，由三軍團攻佔信豐之南的古陂，突破粵軍封鎖線，渡過信江，經南康、大庾間之新城、池江、青龍等處渡過章水，向湘南前進。

十一月三日，紅軍佔領集龍圩、熱水墟，突破汝城（湘南）、仁化（粵北）間的封鎖線，佔領城口（仁化之北），直趨粵漢鐵路。十三日，紅一軍團佔領白石渡，紅三軍團攻陷宜章，衝過粵漢鐵路。十六日克臨武，十九日陷嘉禾、藍山，二十一日經天堂墟進迫寧遠，二十三日陷道縣，渡過瀟水，向湘江疾進。

十一月二十五日，共軍經永安關進入廣西之文市，二十六日在全州與興安之間的界首架設浮橋，急渡湘水，至三十日，共軍及其中央縱隊經五晝夜的行進，已全部渡過湘江。

共軍渡過湘江後，進入廣西邊境苗民居住之山區，越過老山界（即越城嶺）向西北前進，有入湘西與賀龍部會合之勢，十二月十日，共軍前鋒攻佔湘西之通道縣，旋又折返貴州，於十四日佔領黎平，十八日渡清水江，二十一日佔劍河，二十二日入台江，二十五日陷鎮遠，二十九日入施秉、黃平，并分佔餘慶、甕安、猴場，進抵烏江。

一九三五年一月三日，共軍於餘慶等縣之新渡、江界河、孫家渡、梁家渡老渡口、岩門老渡口、迴龍司各處搶渡烏江，一月五日攻佔遵義，七日入湄潭、綏陽、鳳岡，十日佔領桐梓。共軍於佔領黔北之遵義、桐梓後，暫時結束其近三個月連續行軍的逃竄生活，開始休息和整補（註四）。

共軍突圍西竄途中，大都以其主力一、三軍團作前鋒，五軍團爲後衛，八、九軍團作翼側掩護，龐

大的中央縱隊，則在全軍護衛下行進。由於共黨採取搬家式的逃竄，五千民伕運送着笨重的機器廠盤等輜重，行動遲緩，給國軍以堵擊、截擊、追擊的良好機會。國家政治保衛團政委張南生，曾經描述當時的情形說：

「中央縱隊也確實太不戰鬥化了，每逢行軍，從頭到尾有數十里長。特別是我團一營負責警衛的中央縱隊二梯隊，大批民伕搬運著從蘇區帶出來的笨重的造槍械、印書報的機器和各種物資，有些機器的底盤就要十來個年青力壯的小伙子抬。每遇爬山涉水，通過險崖隘路，一個鐘頭走不出半里地，而周圍却經常是槍砲聲和敵機轟炸聲，急得戰士們直跺腳……可是現在，却攜帶這樣笨重的輜重，連續行軍，連續突破敵人的封鎖線，使担任掩護的主力部隊，付出了巨大的代價。」（註五）

當時任紅軍總參謀長的劉伯承，事後也作如下的追述：「長征開始，由於左傾路線在軍事行動中的逃跑主義錯誤，繼續使紅軍受到重大損失。當時中央紅軍五軍團，自離開中央蘇區起，長期成爲掩護全軍的後衛，保護著騾馬、輜重，沿粵桂湘邊境向西轉移。全軍十萬人馬在山中羊腸小道行進，擁擠不堪，常常是一夜只翻一個山坳，非常疲勞。而敵人走的是大道，速度很快，我們怎麼也擺脫不掉追敵。」（註六）

雖然紅軍的前鋒部隊，以優勢兵力，足以衝破層層封鎖線，但由於行軍的遲緩，擺脫國軍的追擊和截擊，因而在贛粵邊、湘粵邊以及湘南直至湘江一線，國共兩軍均有多次的激戰，尤其渡過湘江時，全州、灌陽一戰，紅軍傷亡慘重，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一文中指出：

「面臨敵人重兵，左傾路線的領導更是一籌莫展，只是命令部隊硬攻硬打，企圖奪路突圍，把希望寄托在與二、六軍團會合上。在廣西全縣以南，湘江東岸激戰達一星期，竟使用大軍作甬道式的兩側掩護，雖然突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渡過湘江，却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人員折損過半。」（註七）

據參加紅軍西竄的陳然先生說：從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至一九三五元月上旬，由贛南至黔北，共黨和共軍的所謂「長征」，實際上是三個月的連續行軍，無異是狼奔豕突的逃竄，因而在不分晝夜的行軍途中，部隊的掉隊、逃亡、傷病人員急遽增加，沿途作戰受傷人員，除幹部外，均棄置於老百姓家中，遂造成驚人的減員現象。且因長期日夜行軍，饑寒交迫，疲憊不堪，不少士兵以手榴彈或步槍自殺（以槍口對準喉頭，用腳趾搬機自殺），部隊士氣，普遍低落消沉。所以進入廣西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爲了扭轉士氣，發出了指示，號召全黨全軍堅決作戰，衝破最後一道封鎖線。渡過湘江，上西延山脈時，以博古名義（時任中央總書記）發出激勵士氣的文告，盛讚紅軍在湘江作戰之英勇，稱譽打破敵人攔擊，克服高山急水阻擋吾人前進之無敵勇氣，要求全黨全軍再度鼓起勇氣，勝利越過西延山脈。

共軍之越過西延山脈及佔領湘西通道縣，其目的係依照共黨中央原定計劃，入湘西與賀龍、蕭克部會合，其時，紅二方面軍也發動攻勢，策應西竄的「中央紅軍」。據袁任遠（紅六軍團政治部主任）的回憶錄說：「爲著箝制敵人，使紅一方面軍順利北上，以任弼時、賀龍同志爲首的紅二方面軍，遂由酉陽入龍山、永順，下桑植、大庸；一九三五年又進到慈利、石門、桃源、澧縣、常德。此時，……：紅二方面軍亦迅速擴大到兩倍以上，又重新以龍山、永順、桑植、大庸、鶴峯等縣爲基礎，建立湘鄂川黔

省委，以任弼時同志爲書記；又建立臨時性的政權革命委員會，以賀龍同志爲主席。」（註八）

所稱紅二方面軍，卽賀龍之二軍團（政委關向應，約五千人，前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書記夏曦此時已病死）與蕭克之六軍團（政委任弼時，僅殘存一千人）合編而成，賀龍任總指揮，任弼時任政治委員。當時趁國軍調離湘西追擊紅一方面軍機會，大肆攻城掠地，擴充部隊，由六千人擴大到萬餘人，并爲配合紅一方面軍之西竄，積極發動攻勢，於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旬，攻陷桃源，包圍常德，迫使國軍不能不從追擊部隊中抽調兩師兵力馳返沅陵，協剿紅二方面軍（註九）。

此時，國軍爲阻止紅一方面軍竄入湘西與紅二方面軍會合，乃置重兵於湘西之武岡、城步、綏寧、靖縣、會同一線堵擊，另以廣西部隊向西延、龍勝追擊。當西竄共軍佔領湘西之通道時，面臨國軍之優勢兵力堵擊，自知無法突破國軍的防堵，衝入湘西，乃放棄強入湘西企圖，轉而西進貴州，於十二月十四日佔領黎平。所以劉伯承說：

「如果我們不放棄原來的企圖，就必須與五、六倍的敵人決戰。但部隊的戰鬥力又空前減弱，要是仍舊採用正面直頂的笨戰法，和優勢的敵人打硬仗，顯然就有覆沒的危險。……：所剩三萬多紅軍的前途只有毀滅。」（註一〇）

共軍在途中損失過半，沿途把許多笨重的修械廠、印刷廠、造幣廠等機器以及各種輜重丟光了，連與共產國際聯絡的大型電台也毀棄了，從此足有一年時間與共產國際失掉了聯絡。到達黎平時，全部人員由八萬五千人銳減至三萬五千人，戰鬥部隊僅存三萬人，部隊疲憊不堪，戰力空前削弱，如果不是碰

上腐敗的貴州地方部隊，連共軍的生存也成了問題。

共軍到達黎平後，中共中央政治局於十二月十五日召開了一次臨時會議，研討當前的戰略方針。會中，有的仍主張沿六軍團舊路，入黔東轉湘西，與紅二方面軍會合。有的主張北上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更有主張入雲南建立根據地的。最後還是決定到敵人力量最薄弱的黔北休息整補，到時如情況許可，即在黔北建立新根據地，否則亦可東入湘西與二方面軍會合，或北渡金沙江與四方面軍會合，再不然亦可西進雲南活動。在這一決策下，共軍乃渡過烏江，進佔黔北，取得了暫時的喘息和整補。（註一）

三、遵義會議

紅一方面軍於一九三五年一月五日佔領遵義後，中共中央於一月六日至八日在遵義舊城召開了為期三天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到會人員及秘書工作人員（包括翻譯人員）共二十餘人，其中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有秦邦憲、張聞天、周恩來、陳雲、朱德、王稼鰲、何克全，中央委員有毛澤東、劉少奇、羅邁、彭德懷、候補中委及指定參加會議人員有李富春、楊尚昆、王首道、劉伯承、林彪、聶榮臻、鄧發等人，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也列席了會議。

會議由秦邦憲主持，會議主題原為討論當前形勢與紅軍今後行動方向，但在周恩來的軍事報告以後，却引起了劇烈的爭辯，首先由彭德懷發難，批評西進途中搬家逃跑，行動遲緩，招致紅軍重大損失的

錯誤。繼而毛澤東指摘反五次圍剿所採取的分兵把口、短促突擊、單純防禦戰略戰術的錯誤，斷送了中央蘇區，迫使紅軍不能不作戰略轉移而遭受了嚴重的損失。接著劉少奇批評四中全會以來，白區工作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導致白區職工運動乃至黨的組織的瓦解，認為四中全會以來及五中全會以後，在白區和蘇區黨的政治路線是否正確，要求作全面檢討和改正。於是在會議中便展開了兩天的激烈爭論。

在辯論中，李德始終不承認他的短促突擊戰術的錯誤，他認為反五次圍剿的失敗，在於敵人力量大以及軍事幹部誤解短促突擊和執行新戰術偏差所致。有人批評他不瞭解中國情形，他譏諷地反唇責問道：過去陳獨秀、李立三是不是也說過國際代表不懂中國情形呀？既然說我不明瞭中國情形，爲什麼你們不告訴我？

陳雲爲其所主持的白區工作辯護，認為在國民黨嚴厲的「白色恐怖」下，白區的羣衆工作與黨的工作遭受損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因此而把四中全會以來，尤其在「九一八」事變之後，黨在白區所發動的反日鬥爭與義勇軍運動以及黨員幹部的犧牲奮鬥，指爲冒險主義或盲動主義，那是對黨員幹部和全黨的侮辱。

秦邦憲爲其所主持的中共中央總路線的正確激烈辯護，并以四中全會以來共產國際的歷次指示爲根據駁斥劉少奇的攻擊。他聲稱：四中全會以來，在國際的幫助下，克服了右派分裂黨的危機，保持了黨的團結和統一，粉碎了國民黨一、二、三、四次圍剿，建立了廣大的蘇區根據地，成立了蘇維埃共和國，組織了三十萬鐵的紅軍，實行了蘇區的土地革命，發動了廣泛的反帝運動與民族革命戰爭，難道這些

都是左傾冒險主義？難道因爲未能粉碎五次圍剿便可抹煞全黨的奮鬥和功績？這和托陳取消派、羅章龍右派對蘇區紅軍、對我黨的污蔑又有什麼不同呢？

在辯論中，最聰明的是周恩來，他在爭辯後期，情勢對他不利時，很快便檢討錯誤，承認自己在反五次圍剿及西進途中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劉伯承也改變了他一貫反對毛澤東的態度，在辯論中，轉而支持毛澤東的意見。

在爭論中，幾經折衝，還是張聞天從中調解，張力言今天黨內團結的重要，應摒除意氣之爭，他認爲四中全會以來及五中全會以後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但在反五次圍剿及西進期間，軍事路線是錯誤的。這一錯誤應由黨的主要負責人、黨軍委主席和國際軍事顧問同負其責。這樣，張聞天的意見便成爲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結論。（註一二）

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三天，通過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決議的副題爲「檢討博古、周恩來、李德同志軍事路線的錯誤」，全文甚長，據陳然先生說，當時曾油印成小冊子，發給軍團一級幹部研究討論，其要點如下：

（一）政治局擴大會指出：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國民黨的賣國及其阻撓紅軍北上抗日，中國淪爲殖民地的危機日益加深，中國走上殖民地道路抑蘇維埃道路的鬥爭更爲尖銳，國民黨的五次圍剿及其對我軍的追擊攔截，即爲這一鬥爭的具體表現。

（二）政治局擴大會認爲：我黨自四中全會以來，在國際的幫助下，從反右派反各種偏向鬥爭中，克

服了分裂黨的危機，反對了各種機會主義的傾向，保持了黨的統一和團結，在實際工作中執行了國際路線，使全黨走向布爾塞維克化的道路。

(三)四年來，全黨在中央政治局的領導下，在白區，衝破了國民黨法西斯的白色恐怖，打退了國民黨對工廠對文化的圍剿，堅持了反日反帝鬥爭，建立了下層反帝統一戰線的基礎。在蘇區，解決了土地問題，建立了蘇維埃中央政府，創造了三十萬鐵的紅軍，粉碎了敵人的各次圍剿，尤其蘇區黨的組織和工作，在參戰動員，擴大紅軍，糧食突擊等運動中，都表現了布爾塞維克黨的無比的強大和力量。凡此一切，正說明四年來，在國際的指導下，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

(四)然而，擴大會議嚴重的指斥：在中央正確的政治路線之下，我黨在中央蘇區反五次圍剿過程中，軍事路線犯了嚴重的錯誤，即採用了單純防禦（消極防禦）的錯誤路線。雖然在反五次圍剿過程中，對擴大紅軍、建設紅軍曾有卓越的成就，紅軍在作戰中曾給敵人重大的損傷，表現了驚人的英勇；可是在錯誤的單純防禦的戰略戰術下，無法粉碎敵人的圍剿，使我黨我軍不能不撤離中央蘇區，作戰略上的大轉移，喪失了中央蘇區。

(五)由於中國革命發展不平衡，蘇維埃根據地分散在若干地區，敵人乃以優勢兵力不斷圍剿蘇區紅軍；因此紅軍反圍剿的作戰，一般是處於防禦地位和內線作戰的態勢。爲了粉碎圍剿，必須採取攻勢防禦（積極防禦）的作戰方針，把整體的防禦轉入局部的進攻，把內線作戰轉爲外線作戰，始能扭轉戰局。在反五次圍剿過程中，把「不讓敵人蹂躪一寸蘇區」的政治口號，當作戰略指導方針，就使我軍處於

保守被動，落入單純防禦的錯誤泥坑。

(六)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表現爲：既不敢放棄若干蘇區，以誘敵深入，擊破一方，又不敢從內線轉向外線，在無堡壘地區消滅敵人，打破圍剿；於是只好處處設防，全線抵禦，六路分兵，「禦敵於國門之外」。結果兵力分散，防禦薄弱，正便利敵人步步推進，分進合擊，蘇區因而日益縮小，最後不能不放棄蘇區，作戰路上的大轉移。

(七)打破堡壘主義的作戰方針，必須發揮我軍運動戰的特長，要大踏步後退（誘敵深入）或大踏步前進（衝過堡壘封鎖線）以調動敵人，然後集中兵力，在無堡壘地帶或敵人薄弱之處加以猛擊。可是，單純防禦的錯誤方針，既不願後退，又不敢前進，而是以堡壘對堡壘，以陣地對陣地，以「短促突擊」和敵人拼消耗，結果，不僅無法打破圍剿，而且使我軍受到嚴重的損傷。

(八)單純防禦路線的錯誤，還表現於和敵人進行無勝利把握的決戰。組織廣昌會戰是錯誤的，結果紅軍遭受重大挫敗。廣昌戰後，既作突圍準備，就應保存有生力量，不應在石城以北再度組織會戰，其結果，同樣使我軍再次受到損傷。

(九)在撤離中央蘇區突圍西進過程中，以保守軍事祕密爲藉口，取消了深入的政治動員，壓抑了我軍士氣的發揚。同時笨重的輜重和龐大的後方機關，拖累了我軍的行動，使紅軍成爲掩護部隊，沿途挨打，損傷慘重。這種消極的搬家式的轉移，實際是逃跑主義，爲單純防禦錯誤路線發展的必然結果。

(十)政治局擴大會議相信，在檢討與糾正了單純防禦及逃跑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以後，我黨我軍必

能發揚運動戰的優良傳統，爲完成當前艱鉅任務而鬥爭。（註一三）

四、改組中央

政治局擴大會議第三天，除通過決議外，同時改組了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并對若干問題作出決定

- （1）免除秦邦憲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改由張聞天繼任。
- （2）撤除周恩來的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改由毛澤東接任。
- （3）補選毛澤東爲政治局委員及政治局常委（即接替項英之政治局常委缺額）。
- （4）調秦邦憲爲總政治部主任，羅邁爲總政治部組織部長，何克全爲總政治部宣傳部長。
- （5）派陳雲赴俄，向共產國際報告撤離中央蘇區與西進情況及此次會議決議決定與改組中央情形并請求批准。

（6）派潘漢年赴白區，以香港、上海爲中心，聯絡與整頓白區黨的組織和工作。

（7）準備向北發展，相機在川南北渡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電知張國燾及紅四方面軍配合行動

（8）立即就地擴大紅軍，整編隊伍，撤消師級單位，精簡機構，下放幹部，加強團級指揮能力，充實連隊戰鬥力。

(9) 傳達會議決議，進行政治動員，提高士氣，肅清悲觀情緒。(註一四)

遵義會議的最大特點，據陳然先生說，那就是共黨和共軍幹部不滿情緒在會議中的爆發，此種不滿情緒的形成，基於第一，在西竄途中，以保密爲由，沒有傳達行軍的意義與目的，致幹部茫無所知，不悉將往何處，因而疑念叢生，失去信心。第二，輜重過多，機關過大，阻礙行軍和作戰，沿途挨打，損傷慘重，因而怨聲四起，不滿情緒更形高漲。彭德懷在會議中的批評攻擊，便是這種不滿的反映。彭德懷在反五次圍剿作戰中，本爲「短促突擊」的支持者，在會議中一變而爲攻擊錯誤軍事路線的先鋒，其原因在此。(彭德懷不滿中共中央之另一原因爲二蘇大會時，彭之中革軍委副主席落選)毛澤東乃利用這種不滿與當時困難處境，爭取多數的支持，打倒了秦邦憲的領導地位。其中，軍事幹部的攻擊以及張聞天之中立與調和，起了決定作用。

毛澤東從遵義會議起開始翻身，但羽毛未豐，而且共產國際對中共黨內國際派之支持爲毛之大忌，故在改組中共中央時，仍以國際派之張聞天代替秦邦憲出任總書記，同時這種未經中央全會之改組，不算合法；爲取得共產國際之諒解與批准，乃派陳雲留置鴨溪(遵義西南)，化裝商人赴港轉莫斯科報告。

遵義會議決議副題，指明錯誤軍事路線負責人爲博古、周恩來、李德三人，其中博古爲總書記，對軍事錯誤負領導責任，李德爲軍事顧問，對軍事錯誤負設計策劃之責，惟有周恩來係實際軍事指揮者，對軍事錯誤負主要責任。緣因周恩來於一九三二年，以蘇區中央局書記兼紅軍總政委資格，指揮反四次

圍剿作戰。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中央六屆五中全會，接替項英出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同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又當選中革軍委副主席，前後一年的反五次圍剿戰爭，同樣爲周恩來所指揮。紅軍西竄途中，周恩來又負責軍事指揮的全權。據陳然先生說：在西竄途中，周恩來澈夜不眠，等待軍委二局（局長曾希聖）把偵察、控制或破譯國軍的電訊情報送達并研判後，再下達次日之行軍序列或作戰命令，每日清晨及上午，周恩來總是睡在担架上行軍，以恢復疲勞。另外，毛澤東因體弱多病，且有深夜工作習慣，西竄途中，亦常乘担架行軍，但在遵義會議之前，毛在失意期間，一切無權過問，常於深夜，掛起地圖，細看軍行方向，時而繃眉搖頭，時而長吁短歎，對西竄深表不滿，因而在遵義會議上，乃大肆反擊。

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出任中央軍委主席，但毛不懂軍事，除對大的戰略原則決策及軍事方針的決定外，無能實際指揮作戰，因此，遵義會議之後，仍不能不借重周恩來，周仍以僞府中革軍委副主席名義繼續指揮軍事。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則成爲前線懍悍的戰將，在危難關頭，往往是由他率領幹部團前往解決戰鬥或渡過難關，渡烏江、金沙江，過大渡河，越苗侗彝族地區，都是由他一手策劃與解決的。

五、徘徊黔北

根據遵義會議的決定，共軍實行精簡與輕裝，笨重輜重，一律丟棄；部隊重加整編，八軍團殘部及保衛團等編入主力兵團，取消師部，幹部下放，充實連隊戰鬥力；同時在遵義、桐梓一線，號召居民參

加紅軍，前後約有三千人入伍；再經十餘天的休息整頓，共軍士氣逐漸提高，而其機動性則大大增強起來了。

按照遵義會議的決策，共軍於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開始向西北移動，打算入川南，在瀘州、宜賓一線渡過金沙江，與川北之紅四方面軍配合行動。一月十五、十六日共軍佔領仁懷、茅台，二十三日在土城與國軍激戰，二十四日攻佔土城，渡過赤水河，旋循古蘭、敘永、古宋、興文道向西急進，二月一日復南竄至滇北之威信、鎮雄中間地區并佔領扎西（卽威信）。經過情形，蕭華（時任一軍團政治部組織部長）寫道：

「一九三五年春天，紅軍第一方面軍的企圖是經黔北入川，從宜賓過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我軍行至黔西北赤水河畔的土城，與堵擊我軍的四川軍閥，進行了一次激烈的戰鬥。這一仗沒有打好，部隊傷亡較大，而當頭堵擊紅軍的敵人還保持著相當強大的力量。他們地形熟悉，以逸待勞，調集大批兵力集中於川黔邊境，并在長江沿岸構築了嚴密的封鎖線。紅軍的背後，薛岳所部的周渾元、吳奇偉兩縱隊又一直追來，使紅軍在烏江與赤水河之間陷於腹背受敵的境地。戰略迴旋地區也縮小了。當時要按既定方針突破川軍的堵擊入川是很困難的。」（註一五）

共軍在川滇邊境既無法北渡，乃又被迫回竄黔北，於二月二十六日再陷桐梓，二十八日攻佔遵義，決定在黔北重建根據地，不再流竄。惟延至三月十五日又向仁懷、茅台方面西進。至三月二十八日再回師鴨溪、沙土；偷渡烏江。二十九日進抵息烽附近，旋東向毛栗舖、馬場，再折返南竄。四月九日於貴

陽、龍里間穿越公路。十日陷廣順，旋佔紫雲，十六日渡過北盤江陷貞豐，十九日佔興仁，二十三日經豬場西渡黃泥河直入雲南。經過情形，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一文中，曾作如是之追述：

「我軍在遵義一帶幾次尋戰，敵却小心防守。三月，我軍便自遵義西進，佔仁懷、茅台三渡赤水河，再入川南。敵人料我將北渡長江，大爲恐慌，連忙在川黔滇三省邊界大修碉堡，企圖封鎖圍殲我軍。但我軍却突然由川南折回貴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隊牽制敵人外，其餘急行軍通過楓香壩，南渡烏江，直逼貴陽，并且分兵一部東擊襲安、黃平。……於是我軍以一軍團包圍貴陽東南的龍里城，虛張聲勢，迷惑敵人，……一過公路，摔開了敵人，部隊就像插上了翅膀，放開大步，一天就走一百二十里。途中，連克定番（今惠水）、廣順、興義等縣城，并渡過了北盤江。」（註一六）

共軍之所以能在貴州自由馳騁，一面固由於共軍精簡輕裝後，行動迅捷，國軍追擊不及，一面則因黔境兵力薄弱、政治腐敗所使然，「剿匪戰史」曾作如下記述：

「朱毛匪軍，自西竄入黔，於二十三年十二月十四日進陷黎平以後，如龍入海，既無堅固工事阻止流竄，復無勁練部隊挫其兇鋒，蓋因我追剿國軍，遠在湘、黔邊境，而黔省方面，又以我政府頻年致力於安內攘外工作，鞭長莫及，以致政治腐化，煙毒遍地，軍事方面雖號稱五個師、三個獨立旅，然各將領互相爭雄，形成軍閥割據，……實際上各自爲政，互不相容，對於部隊訓練及民衆編組基礎甚差，益且員額不足，裝備低窳，乃至戰力異常薄弱……。」（註一七）

在此情況下，共軍乃能在貴州橫衝直闖，如入無人之境，設非國軍追剿入黔，則貴州可能步贛南後

塵，成爲共黨之又一根據地矣。

六、蘇區瓦解

正當共軍徘徊黔北期間，留守贛南的共軍亦爲國軍擊潰和消滅，「中央蘇區」及其隣近各蘇區因而全部瓦解。經過情形，「剿匪戰史」有如下的記述：

「自民國二十三年十月中旬，我軍於贛南地區第五次圍剿獲得全面勝利，朱毛匪軍主力突圍西竄後，其殘留於零都、會昌、瑞金、石城間之匪第二十四師及各補充師、各獨立團、游擊隊等共約二萬餘人，由匪首項英指揮，企圖一面牽制我軍西進，同時苟延其贛南老巢覆亡之時日。

當時匪軍依其盤踞區域，共分四個地區：石城、瑞金線以東者，稱爲閩贛軍區；會昌、零都以南者，稱爲贛南軍區；零都、會昌、瑞金間者，爲中央軍區；寧都、興國以北者，爲江西軍區。」（註一八）

國軍對於這些軍區及共軍殘部，採取分區清剿的辦法。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首先清剿江西軍區游擊隊：

十二月二十六日，國軍在蔭水（招攜之南）附近擊潰共黨獨立第一、第二兩團；二十七日，在黃沙（招攜東南）附近擊潰共軍樂安獨立營；二十八日，於洽村（廣昌、甘竹之間）附近擊潰共軍南廣獨立團及游擊隊，先後俘獲游擊隊長謝伯庭以下官兵二百餘人，槍百餘枝。

國軍另一部於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上、下陽礫（頭陂之西）附近，擊潰共軍獨立團；同時於稗田（寧都之北）附近，擊潰共軍永豐、南坑區政府及游擊隊，俘獲人槍各四十餘；二十六日，在王家田（寧都西北）擊潰龍岡、黃陂等游擊隊，俘獲隊員三十名，獲槍二十餘枝；二十七日在烏傑（寧都之西）附近擊潰共軍博生獨立營，俘兵五十名，獲槍二十餘枝，復跟蹤窮追，三十日追至龍華山（寧都西北）將該營包圍，全部繳械，計俘獲營長以下官兵二百餘人，槍百餘枝。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國軍在陳坊（龍岡之東）附近擊破共軍江西軍區指揮部及永龍游擊隊、獨立第二團等千餘人；十六日晚，復派隊襲擊上溪游擊隊，消滅共軍三百餘人。一月二十五日，在山嶺（沙溪東南）附近擊潰洛口游擊隊；二十六日，擊破偽獨立第三團，二十八日將該團悉數繳械，先後俘獲團長鄧林生以下四百餘名，獲槍一百八十餘枝。

一月二十六日，國軍另一部在大金竹、中村（沙溪之東）一帶，圍殲偽江西軍區直屬部隊及偽江西省蘇維埃，計俘獲偽中央政府執行委員兼江西政治保衛分局長婁夢俠等首要六名，官兵四百餘名，槍二百餘枝。

同日，國軍另一師於草鞋溝（沙溪東南）一帶，擊破偽獨立團、游擊隊及江西軍區後方辦事處等，計俘獲江西軍區後方辦事處主任陶響以下官兵二百餘名，槍約二百枝。二十七日，於小佈（龍岡之東）附近山中，擊斃共軍江西軍區司令員李賜凡（按：李於二蘇大會時，被選為偽府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并俘獲共軍官兵四十餘名，獲槍三十餘枝。

三月中旬，國軍展開搜剿，將共軍公萬泰獨立營及良材、富田等游擊隊人槍千餘大部撲滅，共軍獨立第十三團及與國獨立營等連同偽府中執委謝名仁、團長陳世昭以下五百餘人全部成擒。

至此，共黨江西軍區殘部除政委兼省委書記曾山漏網外（按：據曾山事後告知陳然稱，江西蘇區失敗後，彼個人化裝逃滬，在滬曾任碼頭工人與人力車伕，待與共黨取得聯絡後，始赴莫斯科云）其餘全被消滅。（註一九）

共黨「中央軍區」直屬部隊紅二十四師，於一九三五年二月中旬，向南逃竄，與贛南軍區配合，活動於粵贛邊區，國軍乃向南追剿，於三月七日至十三日，在高挑、獅子寨（筠門嶺西北）一帶，殲滅紅二十四師之第七十團與獨立第七團各一部及會昌獨立營等股，當場擊斃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賀昌等首要，俘獲官兵一千四百餘人，步槍六百五十七枝，重機槍五挺，輕機槍七挺，手提機槍六枝，駁壳槍十一枝。

國軍另一部於三月上旬，在南山（會昌之西，小溪之南）附近擊破偽零都、贛南等獨立營及游擊隊，俘獲官兵三百餘名，步槍七十五枝，輕重機槍四挺。

至三月底止，被國軍撲滅之「中央」、「贛南」兩軍區共軍，除擊斃者不計外，共俘獲官兵五千八百餘名，步槍手槍二千四百餘枝，輕重機槍四十挺，手提機槍二十四枝，無線電機一架，除共黨首要項英、陳毅、梁柏台等化裝逃匿外，其餘擒斬殆盡。

三月間，國軍另一部在瑞金、零都間進行搜剿，偽瑞金、水西等獨立營及各游擊隊，先後在高陂、

小密（瑞金、零都之間）一帶被撲滅，并尋獲偽醫院、兵工廠、造幣廠、圖書館等機關，擊斃偽中央衛生總管理局長朱非紫，俘獲醫院院長以下人員三千三百餘名，槍三百餘枝。另在岡面墟（零都之東、小密之北）附近，掘獲偽兵工廠埋藏之步槍身八千枝，輕重機槍二百餘挺，砲身十餘門，利刀七百餘把；龍山附近掘獲造幣用鎔銀機、軋皮機、扎壞機、印花機各一部，迫擊砲三十餘門，迫擊砲座一百二十四具；高陂附近搜獲偽中央圖書館藏書三十餘箱，及銅錫塊彈壳等二百餘擔（註二〇）。

至一九三五年三月底止，留守贛南之共軍及各軍區部隊，除若干首要如項英、陳毅等少數人員外，幾爲國軍完全消滅，所謂「中央蘇區」及隣近各蘇區亦隨之土崩瓦解。

七、深山潛伏

當國軍對贛南各蘇區清剿過程中，留守蘇區的共軍及共黨人員大都逃入深山潛伏，經過情形，據項英、陳毅等事後對陳然先生說：一九三五年二月，彼等鑒於國軍清剿之嚴厲，顯已無法在瑞金、零都一線立足生存，乃率部南竄閩粵贛邊，與贛南軍區配合行動，同時將若干高級幹部緊急疏散，一部份派往清剿較鬆之閩西南地區，一部份派返「白區」工作（註二一）。當時派閩西南的有鄧子恢、譚震林等人，打算與閩西南之張鼎丞、毛澤覃等會合（按：此時毛澤覃已被擊斃）。準備撤離蘇區到白區工作的有瞿秋白、何叔衡、周月林（偽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團委員）、張亮（項英妻）、張績之、陳潭秋等人，其中除陳潭秋會到達白區轉往莫斯科外，何叔衡在長汀水口墜崖而死，瞿秋白、周月林、張亮等均被捕

瞿秋白係於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在長汀水口遭捕，拘押於長汀，延至六月十八日始處死，在此期間，瞿在獄中曾接見記者訪問，并寫作「多餘的話」（見附錄），當時報刊曾予掲載，文中滿紙哀怨，大有悔悟已遲之感。

項英、陳毅率部南竄後，所部終被國軍消滅，贛南軍區部隊亦同被擊潰，賀昌（中央軍區政治部主任）、阮嘯仙（贛南省委書記，贛南軍區政委）、劉伯堅（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蔡會文（贛南軍區司令員）等先後被擊斃，龔楚（贛南軍區參謀長）向國軍投誠，最後僅存項英、陳毅、陳丕顯等十餘人，竄至粵贛邊之五嶺油山匿居逃命。

閩西南蘇區，亦因共軍主力西竄而逐漸瓦解，一九三五年三月，撤消福建省委、省蘇維埃和省軍區，合併成立閩西南軍政委員會，張鼎丞任主席，譚震林任軍事部長，鄧子恢任財政部長兼民運部長，郭義任黨務部長。但因國軍隨後亦加強清剿，獨立團與游擊隊被擊潰，殘存若干地方游擊組乃入山潛伏。

湘鄂贛邊區，殘存的紅軍被消滅，師長高詠生被擊斃，至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省委書記兼軍區政委陳壽昌（按：陳原任共黨福建省委書記，後調湘鄂贛邊任省委書記）亦於湖北、江西交界之老虎洞被擊斃（註二二），所剩涂振坤、傅秋濤、鍾期光、譚啓龍、黃耀南、李輝等少數人員，乃分散入山逃匿。

湘贛邊區，自紅六軍團由任弼時、蕭克率領西竄後，即在國軍清剿下逐漸崩潰，軍區司令員彭輝名被擊斃，省委書記陳洪時率部向國軍投誠，僅殘存工作人員及警衛共四十餘人，以譚余保爲首成立所謂

軍政委員會及臨時省委繼續在深山大嶺中逃竄和游擊（註二三）。

至於閩東、閩北、皖浙贛等邊區，由於共軍北上先遣隊全部被國軍殲滅，所有蘇區、游擊區同時解體，同樣亦僅殘存若干共幹在山區逃命藏匿，據「中國紅軍發展小史」記載，在閩北有黃道（按：一九三九年病死於江西鉛山）、曾鏡冰，閩東有葉飛，浙江有劉英（按：劉後被捕處死）、粟裕等人在山中苟延潛伏（註二四）。

這些共黨幹部在深山潛伏時，情形是非常狼狽的，據湘贛邊的譚余保說：「在這些場合中，一兩天吃不上飯是經常的事，有時停下來吃點炒米、豆子充飢，敵人搜索隊伍又跟着到了。部隊在連續的轉移戰鬥中，傷病減員、逃走、叛變、失却聯系，損失嚴重。……至一九三五年三月，我們到達攸（縣）蓮（花）萍（鄉）邊界時，留在省委的就只有自己的警衛和各個機關的工作同志，總共不到五十人。各地武裝和黨組織，都不瞭解情況，無法聯系。我們經常駐在山上，用茅草樹皮搭成棚子，落雨時就打傘蹲著，飯也吃不上，白天我們不敢燒火，怕暴露目標，晚上才能進行活動，派人下山去籌辦糧食。」（註二五）

另據「中國紅軍發展小史」描述當時深山潛伏的情形說：「紅軍在三年游擊戰爭中，許多武裝戰士幹部，很多是三年中都不脫綁腿，不脫衣服睡覺的，甚至鞋子都沒有脫。到處都是國民黨的『圍剿』軍隊，紅軍每天每夜都要移動，要吃一頓飯是很困難的，剛洗好米，打起火來，又要翻幾個山頭，有時敵人在後面跟蹤直追十幾日，脫離不開。」

「那時候講話，不能大聲一點，非常親密，總像講情話。不能咳嗽，白天裹飯要冒煙，不能煮；走路不能有腳印，有了要弄掉，草都非常愛惜，不能踏平；走路有大路不走，要走小路。有時候從山頂一直滾到山脚下，有時跌在坑裏找也找不到。糧食完全沒有，春天吃春筍，秋天吃香菇，夏天吃楊梅。」
(註二六)

這種逃竄生活，後來中共稱之爲「堅持三年游擊戰爭」，「中國紅軍發展小史」更稱譽「是世界史上永垂不朽的壯舉」，其實不過是一批殘兵敗將，在叢山峻嶺中苟延逃命而已。

八、神化毛首

事隔十年，毛共中央對於十年前的遵義會議，作了這樣的評議：

「在第三次左傾路線時期中，以毛澤東同志爲代表的主張正確路線的同志們，是同這條左傾路線完全對立的。他們不贊成并要求糾正這條左傾路線，因而他們在各地的正確領導，也就被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的中央及其所派去的組織或人員所推翻了。但是左傾路線在實際工作中的不斷碰壁，尤其是中央所在地區第五次反圍剿中的不斷失敗，開始在更多的領導幹部和黨員羣衆面前暴露了這一路線的錯誤，引起了他們的懷疑和不滿。在中央所在地區紅軍長征開始後，這種懷疑和不滿更加增長，以至有些曾經犯過左傾錯誤的同志，這時也開始覺悟，站在反對左傾錯誤的立場上來了。於是廣大的反對左傾路線的幹部和黨員，都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團結起來，因而在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澤東同志所領導的在貴州省

遵義城召開的擴大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得以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治，在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

遵義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是完全正確的。這次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是中國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註二七）

毛中央欽定的「中國革命史講義」更具體的寫道：「遵義會議撤換了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領導職務，確立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黨中央和革命軍事委員會的新的領導，否定了錯誤的左傾軍事路線，肯定了毛澤東同志的正確軍事路線。對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書記處、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組織問題作出了正確決議。」（註二八）

顯然，這是不符事實的誇大的過高評價，而是爲了高抬毛酋和神化毛酋的杜撰之詞。如果客觀加以估價，只能說遵義會議是毛澤東翻身的開始，毛澤東利用了西竄途中共黨幹部的不滿，打垮了國際派秦邦憲，擠入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成爲中共中央最高領導成員之一，同時從周恩來手中搶奪了中央軍委主席的職位，掌握了軍權，並對軍事路線作了一次批評和檢討。除此之外，其他的說法都是誇大之詞，都是對史實的篡改：

第一，以所謂政治路線來說，會議中，劉少奇雖然提出了檢討政治路線是否正確的問題，但是，隨即被秦邦憲等駁斥了。遵義會議決議，依然肯定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會議中所檢討與批評的僅僅是軍事路線的錯誤，就連「毛澤東選集」第一卷「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註釋中，對遵

義會議也承認這樣的事實：「但那次會議是在紅軍長征途中召集的，所以只能夠對於當時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和中央書記處、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的組織問題做了決議。」（註二九）因此，所謂「勝利地結束了左傾路線」，所謂「挽救了黨」云云，顯然都是虛構和篡改。直到十年之後，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才在決議中指責六屆四中全會以後，至遵義會議止，在這四年間，中共中央的領導，是執行了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第二，所稱遵義會議「開始了以毛澤東同志爲首的中央的新的領導」，亦屬吹捧之詞。固然，毛會經過遵義會議，已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之一，一躍而爲政治局常委，成爲最高決策者之一，可是，主要的領導者總書記（按：當時中共中央尚無主席之設，當時的總書記等於現在之主席）爲張聞天，即以國際派的張聞天代替國際派的秦邦憲，當時認爲軍事路線的錯誤，除周恩來、李德外，總書記應同負其責，這樣才把秦邦憲的總書記職務撤免了。因此，遵義會議改組後的中共中央，係以張聞天爲首，而不是以毛澤東爲首，那是顯而易見的。

第三，所謂「遵義會議後，黨中央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左傾路線在政治上、軍事上、組織上都逐漸地克服了。」（註三〇）這種說法，同樣與事實不符。

先以打破圍剿、創造根據地來說，秦邦憲固然在國民政府大軍圍剿下，無法拱衛「中央蘇區」，打破圍剿；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掌握了軍權，同樣無法打退國軍的追剿，在國民政府統治最薄弱的黔北建立根據地。據陳然先生說，遵義會議後，當共軍北渡長江受阻，回師黔北，重佔桐梓、遵義時，中共中

央決定消滅追剿部隊，在黔北創造根據地，當時陳然被任爲桐梓革命委員會及黨的負責人，共黨中央派出大批幹部其中包括董必武、林祖涵等在桐梓參加工作，中共中央給陳然的指示是在黔北創造新根據地；正因爲如此，所以共軍曾經在遵義之南幾次尋戰，結果還是無法打退國軍的追剿，迫得變更計劃再向雲南流竄。

其次是關於軍事路線問題，毛澤東批評秦邦憲的中央在突圍西竄時，不在有利條件下去消滅敵人，成爲搬家式的逃跑主義，以致到貴州時七萬紅軍減少到三萬人。可是，在遵義會議後，毛澤東率部長途流竄，由貴州經雲南至川西，同樣沒有在運動戰中去消滅追剿國軍，三萬紅軍減少到不足一萬人，在比例上，減員現象更足驚人，這與秦邦憲中央的逃跑主義又有什麼分別？而且毛澤東的這枝殘兵敗將，如果不是得到張國燾的紅四方面軍的接應和補充，并由紅四方面軍抵禦國軍的攔擊截擊，那麼，毛澤東的部隊恐怕難逃覆沒的厄運。

再次，以遵義會議以後的政治路線來說，既然遵義會議肯定當時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也就是說從陳紹禹到秦邦憲領導的四年中，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那麼，遵義會議之後的路線當然是以前政治路線的繼續，而且共黨和共軍是在逃竄途中，一直沒有提出過任何政治主張，更何來克服左傾路線？當共軍逃抵川西毛兒蓋，張國燾與毛澤東正在鬧分裂時期，中共中央駐國際首席代表陳紹禹（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八一宣言」（一九三五年），首先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這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國際派頭子王明發表的，而不是毛澤東在逃亡期間的主張，這又何來「毛澤

東同志領導下的政治路線？

其實，共產黨人的所謂政治路線或策略的正確與否，不過是內部派系鬥爭或權力傾軋的藉口和工具，就以劉少奇的主張與意見來說，國際派掌權時期，被認為是白區工作和職工運動中的右傾機會主義（見「反羅明路線鬥爭」一章之註二九），毛澤東掌權時期，毛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則盛譽「劉少奇同志在白區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樣是一個模範。……：「一二九」運動（註三一）的成功，證明了白區工作中這些策略原則的正確性。」（註三二）劉少奇因而扶搖直上，成爲偽政權的元首，成爲毛澤東的繼承人，原因是什麼？原因是劉少奇在遵義會議就和毛澤東聯手打倒了秦邦憲，以後更成爲毛澤東門垮王明的功臣，因而一九六六年出版的毛澤東語錄，也引用了劉少奇的說話。可是，曾幾何時，這個白區工作的模範和毛澤東的繼承人，一九六七年便被指爲「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中國的赫魯雪夫」，是「假革命、反革命」了，甚至說，在抗戰以前，即「一二九」運動以後，劉少奇就是一個叛徒，他曾「指使別人自首變節，要他們投降國民黨，叛變共產黨」（註三三）。這樣一來，劉少奇的策略思想原則，由右傾機會主義，一變而爲白區工作的模範，再變而爲資本主義反革命叛徒的路線，其中是非非，使人眼花繚亂，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所謂策略路線的錯誤與否，不過是中共黨內鬥爭的藉口而已。

九、禍延死者

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瞿秋白，是「烈士」抑為「叛徒」，現在成爲中共與俄共間爭論的課題，這一問題的發生，有如下的兩個根源：

第一、當國共兩黨進行地下鬥爭時期，共黨高級幹部大批遭捕自新，國民黨乃不斷公佈這批共黨高幹自新的消息和宣言，當時中共中央對這些宣言不予置信，指爲國民黨的污蔑和偽造，比如黃平（中共中央委員）遭捕自新後發表宣言，向忠發（中共中央總書記）坦誠供述後公佈其自述書，但中共中央的通知却指爲國民黨的假造，通過決議要紀念黃平和向忠發。三十二年前，瞿秋白處死後，各報刊所發表的「瞿秋白訪問記」等文件，同樣被認爲是國民黨假造的贗品。

第二、按照共黨紀律教條的規定，任何黨員幹部遭捕後，絕不得供述黨內任何秘密與機關及同黨人員的姓名地址，否則即視爲叛徒，除開除黨籍外，還要處予極刑，這也就是共黨鐵的紀律之一。瞿秋白處死前，有過四個月的牢獄生活，其所作所爲，是否違反了共黨的紀律，就成爲以後爭論的根源。

瞿秋白死後，中共中央認定「瞿秋白訪問記」等文件爲國民黨所捏造，瞿秋白是「英勇地犧牲」的，因而毛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斥國際派所主持的六屆四中全會及其後的中央「錯誤地打擊了以瞿秋白同志爲首的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瞿秋白同志，是當時黨內有威望的領導者之一，他在被打擊以後仍繼續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主要是在文化方面），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也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之下。」（註三四）一九四九年中共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烈士傳」更稱譽瞿秋白的「卓絕的布爾塞維克的偉大的氣節，也是足以做一切革命者的永久榜樣

的。」（註三五）中共竊據大陸後，在北平天安門建造的烈士紀念碑，以金字刻上了瞿秋白的名字。在常州，建立了瞿秋白故居博物館。此外，還出版了四冊「瞿秋白文集」，這樣來紀念瞿秋白「烈士」。可是，曾幾何時，現在中共把瞿秋白由「烈士」打爲萬惡不赦的叛徒了！

據俄共莫斯科華語廣播稱：由中國作家協會造反派出版的「文學戰報」創刊號，刊載了「文革簡訊」說：造反派曾到常州瞿秋白故居博物館進行搜查，搗毀了瞿秋白母親的墳墓，根據調查所得的可靠資料，以及根據前國民黨三十六師師長宋希濂的證詞，判定瞿秋白是共產黨的叛徒，是「消極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者，要求剝奪瞿秋白的黨員稱號。（註三六）

俄共在廣播中分析道：「爲什麼瞿秋白犧牲三十多年以後，毛澤東及其走卒們，要誹謗過去的革命家，派出造反派搗毀瞿秋白的故居博物館，踐踏和沾污他母親的坟墓呢？」

採取這種行動的真正原因，毛澤東像通常一樣，是要隱瞞的，但是，毛澤東對瞿秋白這樣兇殘、憎惡的原因，是毛澤東企圖從中國人民的記憶中，剷除這樣的事實，即瞿秋白是中共主要領導人之一，是中國馬列主義主要的理論家，和宣傳家；而毛澤東本人，那時在中國革命許多問題上，採取了非常不明確的和錯誤的政治立場。

毛澤東不能寬恕的瞿秋白，是由於瞿秋白不只一次的從原則性的立場上，批判過他的錯誤觀點和行動。毛澤東所以報復已故去的瞿秋白，是因爲在一九二七年，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十一月全會（按：係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對毛澤東在湖南省秋收起義時期所犯的大錯誤，給他以嚴重警告處分

（按：并開除其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在那時，毛澤東背叛中央的指示，沒有進行土地革命，沒有依靠農民，而是用逃兵和脫離勞動階級的份子（按：指流氓地痞而言）拼湊起來，把重點放在單純的軍事戰術上，使起義遭到失敗。

毛澤東所以對瞿秋白進行報復，是由於瞿秋白於一九三〇年和一九三一年在蘇區和上海出版的黨報上，發表了文章，從原則上批判了毛澤東的左傾錯誤，瞿秋白援引了確切的證據和文件，證明毛澤東在一九三〇年積極的參加了實行被稱為第二次的左傾路線。毛澤東過去和現在一直向黨隱瞞自己的錯誤觀點和行動，其中包括一九三〇年的錯誤和行動。

毛澤東企圖污蔑瞿秋白，想給他的文章蒙上陰影，以便把自己的錯誤痕跡埋得更深……」（註三七）。

持平而論，俄共對毛澤東的抨擊，在若干方面不無理由，譬如毛澤東從參加中共起，就不斷犯過原則性的錯誤，瞿秋白也確曾不斷批判毛曾，而且加以處分；立三路線時期，即所謂第二次左傾路線時期，毛澤東也確曾積極執行盲動路線等等。不過，如果因此而確認瞿秋白為烈士，未曾叛變共黨，那就值得研究了。

如果以共黨的紀律為標準，來衡量瞿秋白的「多餘的話」和「瞿秋白訪問記」的內容，那麼，瞿秋白自己違背共黨紀律，是不容置疑的。他所寫的「多餘的話」，把共黨從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從共產國際到中國共產黨內部的祕密盛情暴露（按：「多餘的話」和「瞿秋白訪問記」兩文原文過長，本

篇附錄僅節錄瞿本人之若干感想，原文有關中共內部祕密與黨史資料，均從略），因而稱之爲共黨的叛徒，也未嘗不可，何況瞿秋白自己也說：「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爲我也是叛徒的一種」，「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實在太那麼個了」，「因此，雖然我現在已經囚在監獄裏，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該欺騙的。我騙着我一個人的身後虛名不要緊，叫革命同志誤認叛徒爲烈士却是大大不應該的。所以雖反正是一死，同樣是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願冒充烈士而死。」（詳見附錄）

以前，中共一口咬定「多餘的話」是國民黨所假造，歌頌瞿秋白「英勇地犧牲」，今天却來了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判定瞿秋白是個叛徒，而且禍延考妣，連他母親的坟墓也被挖掉了，這說明什麼呢？

第一，說明中共主觀武斷宣傳的破產。中共與國民黨雖曾有過「合作」，但是，中共對國民黨始終存有深刻的偏見，把國民黨公佈的文件或資料，視作捏造、虛構或造謠、污蔑，因而把「多餘的話」也認爲是國民黨的假造。其實，如果細讀全文，其中內幕，絕非局外人所能知悉者，然而，中共不作此想，而以主觀的武斷視作贗品。事隔三十餘年，現在才從被俘的前國民黨軍官的證詞中來確認瞿秋白的叛變，無怪俄共要起來抗辯了。

第二，說明中共的「文革」連死人也不放過。已往爲了有利於中共的宣傳教育，把瞿秋白說成烈士，要黨徒們效法；現在爲了神化毛酋，又把他視作叛徒。足見今天中共的「文革」既要「鬥倒」活人，也要「鬥臭」死人，以後的鞭屍行爲恐怕也要接踵而來了。

當然，俄共今天爲瞿秋白呼冤叫屈，並不是對瞿秋白有所愛好。已往，瞿秋白在莫斯科搞小組織，反對俄共和共產國際；一九三〇年返國後，看不起國際代表，禁止國際代表說話；因而共產國際曾幾次三番鬥爭瞿秋白，說他是兩面三刀的政客。今天，俄共忽然爲瞿秋白伸冤，究其目的，不過是利用瞿秋白已往歌頌蘇聯的作品，爲俄共宣傳，同時運用瞿秋白已往對毛澤東的批評來打擊毛酋；可見俄共與中共鬥爭已蔓延到死人身上了，把死人當作雙方鬥爭的工具和幌子，如果瞿秋白死後有知，真是要大呼倒霉了。

註 一：一九三七年延安「抗日大學」、「中央黨校」講義「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下冊六三頁。

註 二：關於共黨共軍突圍時之編組、人事配備與兵力情況等，爲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陳先生曾參加共軍之突圍西竄。

註 三：「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下冊六四頁。

註 四：共軍西竄經過與路線，取材於①陳然先生提供之資料。②「中國紅軍發展小史」（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共准北教育出版社出版）。③「星火燎原」（一九六〇年七月香港三聯書店出版）。④「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一九五八年北京人民出版社）。⑤「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下冊。⑥「剿匪戰史」第十冊（一九六二年九月中華民國國防部史政局編印）。

註 五：張南生「遵義會議的光芒」——「星火燎原」四九頁。

註 六：劉伯承「回顧長征」——「星火燎原」三、四頁。

註 八：袁任遠「湘鄂西革命鬥爭的回憶」——「中共在中南地區領導革命鬥爭的歷史資料」第一輯三三一——三三二頁，一九五一年十月中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註九：「剿匪戰史」第十冊八六五頁。

註一〇：劉伯承「回顧長征」——「星火燎原」四頁。

註一一——一四：此爲陳然先生身歷其境所提供之資料。

註一五：蕭華「南渡烏江」——「星火燎原」八三頁。

註一六：劉伯承「回顧長征」——「星火燎原」六一——七頁。

註一七：「剿匪戰史」第十冊八六七頁。

註一八：「剿匪戰史」第九冊七七七頁。

註一九：取材於「剿匪戰史」第九冊八〇二——八〇五頁。

註二〇：取材於「剿匪戰史」第九冊八一〇——八一二頁。

註二一：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據陳先生稱：抗戰開始，共黨在南方之殘餘游擊隊，改編爲新四軍，項英、陳毅等由南嶺油山至南昌，招撫各地游擊隊及深山潛伏之共黨人員。項英、陳毅、曾山、陳丕顯、黃道等在南昌曾與陳然詳談留守蘇區失敗及三年深山潛伏情形。

註二二：鄧洪「堅持湘鄂贛邊老紅色區的回憶」——「中國共產黨在中南地區領導革命鬥爭的歷史資料」第一輯

註二三：譚余保「堅持在湘贛邊區」——同上書。

註二四：「中國紅軍發展小史」六八頁。

註二五：同「註二三」二四六頁。

註二六：同「註二四」六八——七〇頁。

註二七：「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九七〇——九七一頁。

註二八：胡華主編「中國革命史講義」二八六頁（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中共黨史教研室編）一九六二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註二九：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一三八頁。

註三〇：同「註二七」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九七一頁。

註三一：「一二九運動」係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學生數千人，以請願罷課舉行的反日運動而言，此一運動中共自稱爲其所領導的反日鬥爭。

註三二：「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九八〇——九八一頁。

註三三：戚本禹「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一九六七年「紅旗」第五期二二頁。

註三四：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九六六——九六七頁。

註三五：華應申「中國共產黨烈士傳」六六頁，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新民主出版社發行。

註三六：一九六七年四月七日莫斯科華語廣播「造反派不甘心」。

註三七：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二日莫斯科華語廣播「中國革命英雄們永垂不朽」。

附錄一：瞿秋白：多餘的話（節錄）

何必說？——代序

說既然是多餘的，又何必說呢？已經是走到生命的盡期，餘剩的日子，不但不能按照年份來算了，就是說話，也可說可不說的了。

但是，不幸我捲入了「歷史的糾葛」——直到現在，外間好些人還以爲我是怎樣怎樣的。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但願以後的青年不要學我的樣子，不要以爲我以前寫的東西，是代表什麼主義的；所以我願意趁這餘剩的生命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寫一點最後的最坦白的話。

而且，因為「歷史的誤會」，我十五年來勉強做着政治工作——正因為勉強，所以也永久做不好，手裏做着這個，心裏想着那個，在當時是形格勢禁，沒有餘暇和可能說一說我自己的心思，而且時刻得扮演一定的角色。現在我已經完全被解除了武裝，被拉出了隊伍，只剩得我自己了，心上有不能自己的衝動和需要。說一說內心的話，徹底暴露內心的真相，布爾塞維克所討厭的小布爾喬亞知識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氣，不能夠不發作了。

雖然我明知道我這裏所寫的，未必能夠到得讀者手裏，也未必有出版價值，但是，我還是寫一寫罷。人往往喜歡談天，有時候不管聽的人是誰，能夠亂談幾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況我是在絕滅的前夜，這是我最後「談天」的機會呢？

瞿秋白口口一九三五、五、一七於汀州獄中

「歷史的誤會」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這樣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實在是一個「歷史的誤會」，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後還是「文人積習未除」的。對於政治，從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漸減少興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了。工作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情形實在懶得問，一方面固然是身體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現十分疲勞的狀態；別方面也是十幾年為着「顧全大局」勉強負擔一時的政治翻譯，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來，實在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情的結果。這真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

我寫這些話，決不是要脫卸什麼責任——客觀上我對共產黨或是國民黨的「黨國」應當負什麼責任，我決不推托，也決不能用我的主觀的情緒來加以原諒或者減輕。我不過想把實情，在死之前，說出來罷了。總之，我其實是一個很平凡的文人，竟虛負了某某黨的領袖的聲名十來年，這不是「歷史的誤會」是什麼呢？

脆弱的二元人物

一隻羸弱的馬拖着幾千斤的輻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的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候，就是這樣的一種感覺。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到一種無可形容的重壓。精神上政治的倦怠，使我渴念「甜蜜的」休息，以致於腦筋麻木停止一切種種思想。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產黨四中全會開除了我的政治委員之後，我的精神狀態確是「心中空無所有」的情形，直到現在還是如此。

我不過滿三十六歲（雖然陰曆的習慣算，我今年是三十八歲），但是，自己覺得已經非常的衰憊，絲毫青年壯年的興趣都沒有了。不但一般的政治問題懶得去思索，就是一切娛樂，甚至風景都是漠不相關的了。

唉！脆弱的人呵，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需要這種東西幹嗎？我想，假定我還保存這多餘的生命若干時候，我另有拒絕用腦的一個方法，我只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餘年」。但是，最好是趁早結束了罷。

我和馬克斯主義

此後，我勉強自己去想一切「治國平天下」的大問題的必要，已經沒有了！我在十二分疲勞和吐血症復發的期間，就不再去「獨立思索」了。一九三一年初就開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的消極時期，直到現在。從那時候起，我沒有自己的政治思想。這並不是說我是一個很好的模範黨員，對於中央的理論政策都完全而深刻的了解。相反的，我正是一個最壞的黨員，早就值得開除的。因為我對中央的理論政策不加思索了，偶然我也有對中央政策懷疑的時候，但是，立刻就停止懷疑了——因為懷疑也是一種思索；我既然不思索——自然也就不懷疑。

我的一知半解的馬克斯主義智識，曾經在當時起過一些作用——好的壞的影響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不用我自己來判斷——而到了現在，我已經在政治上死滅，不再是一個馬克斯主義的宣傳者了。

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

於是四中全会後，就決定了開除立三的中央委員，開除我的政治局的委員。我呢，像上面已經說過的，正感謝這一開除，使我卸除了千鈞重擔。我第二次回國是一九三〇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離開了中央政治領導機關，這期間只有半年不到的時期。可是這半年對於我幾乎比五十年還長！人的精力已經像完全用盡了似的，我告了長假休養醫病——事實上從此脫離了政治舞臺。

再想回頭來幹一些別的事情，例如文藝的譯著等，已經覺得太遲了。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整整十年我離開了「自己的家」——我所願意幹的俄國文學的研究——到這時候方回來，不但田園荒蕪，而且自己的氣力也已經衰憊了，自然，有可能還是幹一幹「以度餘年」的。可惜接着就是大病，時發時止，耗費三年光陰。一九三四年一月，爲着在上海養病的不可能，又跑到瑞金——到瑞金已是二月五日了——擔任了人民委員的清閒職務。可是既然在蘇維埃中央政府擔負一部份的工作，雖然不必出席黨的中央會議，不必參與一切政策的最初討論和決定，然而要完全不問政治却又辦不到了。我就在敷衍塞責，厭倦政治却又不得不略爲一問政治的狀態中間，過了一年。

最後這四年中間，我似乎記得還做了幾次政治問題上的錯誤，但是現在我連內容都記不清楚了，大概總是我的老機會主義發作罷了。我自己不願意有什麼和中央不同的政見，我總是立刻「放棄」這些錯誤的見解。其實我連想也沒有仔細想，不過覺得爭辯起來太麻煩了，既然無關緊要，就算了罷。

我的政治生命其實早已結束了。

最後這四年，還能說我繼續在爲馬克斯主義奮鬥，爲蘇維埃革命奮鬥，爲着黨的正確路線奮鬥嗎？例行公事辦了些，說奮鬥是實在太恭維了。以前幾年的盲動主義和立三路線的責任，都決不應當因此而減輕的；相反，在共產黨的觀點上來看，這個責任倒是更加加重了，歷史的事實是抹煞不了的，我願意受歷史的最公平的裁判！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

文 人

可笑的很，我做過所謂「殺人放火」的共產黨的領袖（？），可是我確是一個最懦怯的「婆婆媽媽的」書生，殺一隻老鼠都不會的，不敢的。

但是，真正的懦怯不在這裏。首先是差不多完全没有自信力，每一個見解都是動搖的，站不穩的，總希望有一個依靠。記得布哈林初次和我談話的時候，說過這麼一句俏皮話：「你怎麼和三層樓上的小姐一樣，總那麼客氣，說起話來，不是『或者』就是『也許』，『也難說』……等等」。其實，這倒是真心話。可惜的是人家往往把我的坦白當作「客氣」或者「狡猾」。

我的根本性格，我想，不但不足以鍊鍛成布爾塞維克的戰士，甚至不配做一個起碼革命者，僅僅爲着「體面」，所以既然捲進了這個隊伍，也就沒有勇氣自己認識自己，而請他們把我洗刷出去。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個「戲子」——舞臺上的演員，倒很會有些成績，因爲十幾年來我一直覺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着大學教授，扮着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爲「劇中人」。雖然，這對於我很苦，得每天盼望着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面目——躺在床上，極疲乏的念着：「回『家』去罷，回『家』去罷！」這的確是很苦的——然而在舞臺上的時候，大致總還扮得不差，像煞有介事的。

告 別

一齣滑稽劇就此閉幕了！

我已經退出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先鋒的隊伍，已經停止了政治鬥爭，放下了武器，假使你們——共產黨的同志們——能够早些聽到我這裏寫的一切，那我想早就應當開除我的黨籍。像我這樣脆弱的人物、敷衍、消極、怠惰的份子，尤其

重要的是空洞的承認自己錯誤而根本不能轉變自己的階級意識和情緒，而且，因為「歷史的偶然」，這並不是一個普通黨員，而是曾經當過政治局委員的——這樣的人，如何還不要開除呢？

現在，我已經是國民黨的俘虜，再來說起這些，似乎多餘的了。但是，其實不是一樣嗎？我自由不自由，同樣是不能繼續鬥爭了。雖然我現在才快要結束我的生命，可是，我早就結束了我的政治生活，嚴格的講，不論我自由不自由，你們早就有權利認為我也是叛徒的一種。如果不幸而沒有機會告訴你們我的最坦白最真實的態度而驟然死了，那你們也許還把我當一個共產主義的烈士。記得一九三二年訛傳我死的時候，有的地方替我開了追悼會，當然還念起我的「好處」，我到蘇區聽到這個消息，真叫我不寒而慄，以叛徒而冒充烈士，實在太那麼個了。因此，雖然我現在已經囚在監獄裏，雖然我現在很容易裝腔作勢慷慨激昂而死，可是我不敢這樣做。歷史是不能夠，也不應該欺騙的。我騙着我一個人的身後虛名不要緊，叫革命同志誤認叛徒為烈士却是大大不應該的。所以雖反正是一死，同樣結束我的生命，而我決不願冒充烈士而死。

永別了，親愛的同志們——這是我最後叫你們「同志」的一次。我是不配再叫你們「同志」的了，告訴你們：我實際上離開你們的隊伍好久了。

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臺上混上了好些年，我的脫離隊伍，不簡單的因為我要結束我的革命，結束這一齣滑稽劇。也不簡單的因為我的病疾和衰憊，而是因為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的紳士意識，我終究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永別了，親愛的朋友們！七八年來，我早已感覺到萬分的厭倦，這種疲乏的感覺，有時候，例如一九三〇年初或是一九三四年八九月間，簡直厲害到無可形容，無可忍受的地步。我當時覺得，不管全宇宙的毀滅不毀滅，不管革命還是反革命等等，我只要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現在已經有了「永久休息」的機會。

我留下這幾頁給你們——我的最後的最坦白的老實話。永別了！判斷一切的，當然是你們，而不是我，我只要休息

一九三五、五、二二

附錄二：李克長、瞿秋白訪問記（節錄）

「國聞週報」編者按：共黨首領瞿秋白氏，在閩被捕，於六月十八日槍決於長汀西郊。本文作者於其革命前之兩星期（六月四日）訪問瞿氏於長汀監所，所談多關個人身世，了無政治關係，故予刊載，以將此一代風雲人物之最後自述，公諸國人。

本年四月初，瞿秋白與項英妻張亮，梁柏臺妻周月林，在武平（按：為長汀之誤）縣屬水口地方被捕，寄押上杭，是時尚未認出。嗣駐閩第二綏靖區司令部疊據各方報告，有重要匪首數人被俘，嚴電各部隊查詢。瞿解至長汀，為一原在匪中為伙伕者指出。張周二入經押解龍岩第二綏靖區司令部，亦明白供認，並各寫悔過書一紙。瞿在長汀，禁閉於三十六師師部內。記者日前因事赴汀，乃就近至押所，與瞿作一度之談話，時為二十四年六月四日上午八時。

瞿衣青布短掛袴，身材約中人高度，微胖，臉色黃黑，眼珠無甚神采，兩手豐潤。神情態度，頗為暇逸，記者入室時，適瞿正伏案刻石章，聞步履聲，即起立點頭，並問記者來意及姓名。

問：自被捕後，近來意緒若何？

答：近來心境轉覺閒適。過去作政治活動，心力交瘁，久患吐血症，常整個星期失眠。押上杭縣府時，與兵士同待遇，幾至不能支持。來此間後，甚承優待，生活優越多多矣。

問、足下個人歷史，外間頗多揭露，其詳可得而聞乎？

答：我是江蘇武進人，今年三十八歲，照陽歷推算實為三十六歲。我曾向人表示，「田總歸是要牛來耕的，現在要我這匹馬來耕田，恐怕吃力不討好，」他們則說，「在沒有牛以前，你這匹馬暫時耕到再說」。不久，牛來了，就是秦邦憲、陳紹禹、張聞天他們回來了。他們在莫斯科足足讀了六年書，回來發動他們的領導權，大家都無異議。我於是乎覺得卸下了千斤重擔，大大地鬆一口氣，即在浦東賃屋養病。去年二月，由上海到瑞金，任教育人民委員，

職務較爲閒散。六月間猶曾與妻子楊之華通信，嗣後不通消息。朱毛出走，決定留我在後方，與項英等同在瑞金九堡中央後方辦事處。不久國軍搜剿日緊，乃將我與鄧子恢、何叔衡、張亮等送往福建省蘇，省蘇派隊伍送我等往永定，欲出大埔，潮汕往香港或上海，中途在武平（按：應爲長汀）水口被捕。

問：足下云愛好文藝，赤區中的文藝政策若何？對於所謂普羅作家以及左聯等有無指導？

答：蘇區對於文藝方面，認爲暫難顧及，聽其自然發展。至一般普羅作家，原先患幼稚病者甚多，公式化之作品，久已爲人所譏，我素來即不閱讀。上海左翼作家聯盟，其中共產黨員，只有四五人，餘人至多不過爲同路人而已。關於文藝理論方面，左聯有時來問及，即告知以大體輪廓，至於發揮闡述，全由執筆者本人爲之。

問：魯迅、郭沫若、丁玲等與共產黨之關係若何？

答：魯迅原非黨員，伊發表作品，完全出於其個人意志，祇能算爲同路人。郭沫若到日本後，要求准其脫黨，關係出於其日本老婆之主張，以在日本如不脫黨，處處必受日本當局干涉，不能安居。蘇維埃中央原諒其苦衷，已准其脫黨。丁玲原爲上海大學學生，我當時有一愛人與之甚要好，故丁玲常在我家居住。丁玲是時尚未脫小孩脾氣，嘗說：「我是喜歡自由的，要怎樣就怎樣，黨的決議的束縛，我是不願意受的。」我們亦未強之入黨，此時乃爲一浪漫的自由主義者，其作品甚爲可讀。與胡也頻同居後，胡旋被殺，前年忽然要求入黨，作品雖愈普羅化，然似不如早期所寫的好。此外成仿吾爲蘇區黨校教授，已隨朱毛西去。

問：朱毛西竄之計劃若何？

答：蘇區軍事方面，甚爲秘密，我自己是一文人，對於軍事亦不多問，他們也不完全讓我知道。西竄計劃，當然係國軍進展壓迫之結果。他們決定把我留在後方，初時我並不知悉，後由項英告訴我，我覺得病軀不勝萬里奔波之苦，故亦安之。項英等留而不去，用意有二：一則率領二十四師八團九團等牽制國軍追擊，一則尙欲保留相當活動區域，並決定城市盡行放棄，化整爲零，專從偏僻鄉村墟落發展。

問：此外尙有何作品否？

答：我花了一星期的工夫，寫了一本小冊，題名「多餘的話」。（言時，從桌上檢出該書與記者。係黑布面英文練習本，用鋼筆藍墨水書寫的，封面貼有白紙浮簽。）這不過記載我個人的零星感想，關於我之身世，亦間有敘述，後面有一「記憶中的日期表」，某年作某事，一一注明。但恐記憶不清，難免有錯誤之處，然大體當無訛謬。請細加閱覽，當知我身世詳情，及近日感想也。

問：此書亦擬出版否？

答：甚想有機會能使之出版，但不知可否得邀准許。如能買得稿費數百元，置之身邊，買買零碎東西，亦方便多多矣。

問：此書篇幅甚長，可否借出外一閱？

答：可以，可以，如有機會，並請先生幫忙，使之能付印出版。

問：今天談話甚多，改日有機會再來和足下談談，可否請你寫幾首近作給我，並為我刻一顆圖章？

答：那儘可以，反正無事做，請你買紙來和石頭就行了。

談至此，遂興辭，並攜「多餘的話」稿本出，即至街上買紙一張及石章一顆，送與其寫刻，傍晚時着人取來。「多餘的話」一稿，閱未及半，為主管禁押人員催索取去，云即另抄一副本寄與記者。次日匆匆離汀，俟接到該副本後，當再為文記之。

附瞿秋白近作詩詞三首，即寫於記者所送之紙上者：

浣溪沙

廿載沈浮萬事空，年華似水水流東，枉拋心力作英雄。湖海棲遲芳草夢，江城辜負落花風，黃昏已近夕陽紅。

夢回口占

山城細雨作春寒，料峭孤衾舊夢殘，何事萬像俱寂後，偏留綺思繞雲山。

獄中憶內集唐人句

以思千重戀舊遊，他生未卜此生休；行人莫問當年事，海燕飛時獨倚樓。

（錄自：「國聞週報」第十二卷第二十六期）

第二十四章 兩個中央

一、張國燾率部西竄

一九三五年三月，紅一方面軍正在黔北徘徊期間，張國燾所統率的紅四方面軍，也由川北開始向川西轉進。

紅四方面軍原踞鄂豫皖邊區，一九三二年秋，在國軍四次圍剿中潰敗，殘部兩萬人由中央分局書記張國燾、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率領，於十月中旬越平漢鐵路西入陝南，沿途經國軍截擊，殘存僅萬餘人。此時四方面軍名義上保存四軍二十五軍番號，但實際上僅有四個師十二個團，其編組爲：

第四師

師長 王宏坤

政委 周純全

第十一師

師長 倪志亮

政委 李先念

第十二師

第二十四章 兩個中央

師長 何 畏

政委 甘元景

第七十三師

師長 王樹聲

政委 張廣才（註一）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下旬，紅四方面軍復南竄入川北，於十二月廿五日佔領通江；當時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鬥爭」曾刊載紅四方面軍來電稱：「我軍於十二月二十二日入川之通江，擊潰田頌堯部李煒如旅二團，敵傷亡極大，而我軍只傷六人，於二十五日佔領通江縣城。」（註二）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復陷巴中，旋又佔南江。從此，紅四方面軍逐漸擴大，所佔地區遍及川北。其間，川軍雖曾多次圍剿，但因忙於內戰，而為共軍所乘，屢戰皆北。至一九三四年二月，紅四方面軍及「川陝蘇區」擴張情形，「鬥爭」有如下報導：

「川陝蘇區所轄縣份：通江（現改為赤江縣）、南江、巴中、昭化、廣元、劍閣、蒼溪、儀隴、營山、蓬安、宣漢、綏定、萬源、城口（陝西的）、鎮巴、寧巴、寧羌……」（按：全縣連縣城為共軍佔領者僅有：通江、南江、巴中、儀隴、營山、宣漢、綏定（達縣）、萬源、城口等十餘縣）。

在川陝蘇區領土內的人口，……有九百萬人口左右……。

我紅四方面軍由鄂豫皖出發時，人數不到兩萬，武裝不齊；經過幾千里的行軍，沿途都遇着強有力

的敵人，一到四川，即得到偉大的勝利，紅軍已經增加了一倍的力量……。

現在紅四方面軍，下轄五個軍：四軍、九軍、卅軍、卅一軍、卅三軍、每軍三師，每師五團、六團不等……」（註三）

在行政方面，設立「川陝省蘇維埃」，張國燾任主席；黨的方面，組織「中共川陝省委」，周純全任書記；軍事方面，設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由張國燾任主席，指揮「工農紅軍西北軍區」及紅四方面軍，其組織如次：

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

主 席 張國燾

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

總 指 揮 徐向前

副總指揮 王樹聲

政治委員 陳昌浩

政治部主任 傅 鍾（張琴秋曾一度代理政治部主任）

參 謀 長 李 特（倪志亮曾一度出任參謀長）

保衛局局長 曾傳六

紅四方面軍下轄五個軍、十四個師、四十一個團，總兵力七萬餘人。各軍負責人爲：

第四軍 軍長 王宏坤

政委 王建安

第九軍 軍長 何畏

政委 詹才芳

第三十軍 軍長 程世才

政委 李先念

第三十一軍 軍長 孫玉清

政委 張廣才

第三十三軍 軍長 王維舟

副軍長 羅南輝

政委 楊克明（註四）

一九三四年八月，紅四方面軍打破了川軍的六路圍攻，川軍損失人槍近三萬（註五），共軍乃更形壯大，部隊擴充至八萬人，「川陝蘇區」亦隨之向西擴展至嘉陵江東岸。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遵義會議決定「中央紅軍」由川南北渡長江，遂電紅四方面軍渡嘉陵江，策應紅一方面軍北上。張國燾依照中共中央指示，即作渡江準備，紅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傅鍾，事後追述道：

「紅四方面軍在川陝蘇區粉碎了四川軍閥的六路圍攻後，於一九三五年二月，開始準備西渡嘉陵江。

這時，黨中央已經舉行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萬里長征的紅一方面軍……：正勝利地向四川挺進，消息傳來，川陝邊區軍民真是萬眾歡騰，一致要求早日打過嘉陵江去，配合紅一方面軍行動。」（註六）

據傅鍾說，全軍經過一個多月的準備，造了七十隻船和三座竹紮便橋，運至嘉陵江畔，於三月十九晚，在蒼溪與閬中兩縣間之塔子山下水，士兵們乃乘船搶渡，當晚經過激烈戰鬥，始渡江佔領灘頭陣地，「天快亮了，總指揮命令突擊部隊，要不惜一切犧牲，堅決守住灘頭陣地，同時命令部隊在蒼溪城附近強架了竹筏浮橋，投入大量的部隊向敵側後猛插。在塔子山渡江的同時，我軍另兩師兵力：一在蒼溪上游五十里，一在塔子山下游四十里地方，亦投入渡江戰鬥。敵人在我數路大軍的猛攻之下，全線崩潰了。」（註七）共軍遂乘勝渡過了嘉陵江。

「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概述」亦作如下記述：「紅軍第四方面軍八萬人左右，退出川陝革命根據地是從一九三五年三月開始的。在戰略轉移的途中，紅軍第四方面軍首先強渡嘉陵江，佔領閬中、南部、劍閣、昭化、梓潼、彰明、中壩、平武；接着渡過涪江，佔領北川、茂縣、汶川；再渡岷江，攻克理番，并分兵佔領懋功、圍攻松潘。首先與紅軍第一方面軍會合的紅軍第四方面軍一部（按：為四方面軍之第九軍），就是佔領懋功的部隊。」（註八）

從這裏可以瞭解，張國燾率部西進，係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其目的在於策應紅一方面軍北上；所

率部隊多達八萬，連工作人員，對外亦號稱十萬。紅四方面軍自三月強渡嘉陵江，至六月上旬攻陷懋功止，前後兩月有餘，沿途與川軍不斷作戰，傷亡減員將及一萬，至六月中旬與紅一方面軍會師時，張部仍保有七萬餘兵力，成爲當時實力最大的一枝共軍部隊。

二、紅一、四方面軍會合

另一方面，紅一方面軍於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四日進入滇境後，卽向西急竄，四月二十六日佔領白水鎮，二十七日，三軍團以一部圍困霑益縣城，其主力與軍委縱隊則經城南西進；一、五軍團佯攻曲靖，繞道城南竄向馬龍。其時，原留烏江之北的九軍團亦入滇佔宣威，經板橋街向會澤前進，四月二十九日佔領會澤，旋經白龍潭轉向巧家以南，於五月初渡過金沙江。三軍團於四月廿九日攻陷尋甸，經過馬街，在小倉附近西渡普渡河，於五月二日到達金沙江邊。一、五軍團之一路連陷馬龍、嵩明，經富民、勸祿、武定、元謀，亦於五月四日進抵金沙江邊。另一路之共軍幹部團則早於五月一日渡過金沙江，扼守渡口，掩護全軍渡江；從五月二日起，共軍一、三、五軍團及軍委縱隊遂於絞車渡經九天九夜渡過金沙江。經過情形，劉伯承寫道：

「四月下旬，我分三路進軍雲南：一路就是留在烏江北岸牽制敵人的別動支隊九軍團……另兩路是紅軍主力……」

我軍三路連夜向金沙江平行急進：一軍團搶龍街渡，三軍團搶洪門渡，幹部團搶絞車渡，五軍團仍

舊殿後掩護。

幹部團偷渡金沙江襲擊并消滅了川軍一排守敵，迅即以一部控制了綽車渡西岸渡口，前後搜獲七只小船。而團主力則由北岸的深谷，急進至三十里外的高原，擊潰了川軍援兵。這時，洪門渡因江流太急，無法渡過；龍街渡又因江面太寬，敵機可以低飛騷擾不便渡江；因此，一、三軍團都集中到綽車渡渡江，而仍以五軍團的一個師担任掩護。

我軍就依靠綽車渡七只小船，經過九天九夜全部渡過江去……。（註九）

紅一方面軍渡過金沙江，隨即佔領通安，圍攻會理，休整五天後復北進，經德昌、禮州、瀘沽，分佔冕寧、越嶲，「中經彝民區域，因紅軍的正確的少數民族政策，利用『打劉家』（按：指打川軍劉文輝）與彝民歃血爲盟（鷄血沖酒共飲）以散給鹽布，得以安然通過。五月二十五日至大渡河邊之安順場。」（註一〇）「在安順場及其附近強渡大渡河，打敗敵軍一個營，渡過了輕裝的一個師。但因安順場及其附近的渡口船隻很少，全軍不可能都坐船過去，於是以渡河的一個師爲右縱隊，其餘的部隊爲左縱隊，兩隊夾大渡河前進。五月底，左縱隊的一個連，經過極其艱苦的戰鬥，強佔了瀘定橋天險，大軍即從這裏越過了大渡河。六月，我軍經天全、蘆山、寶興，進入了四川西北地區。」（註一一）

「六月十六日正在大雨傾盆之際，第一軍團到了懋功境內，四方面軍派人迎接，兩軍會合，歡樂異常，并開大會，舉行會餐，十七日出發至八角，在此休息。」

紅軍在八角休息一週之後，六月二十三日進至撫邊，二十四日到兩河口，二十六日到黃草坪，二十

七日經夢筆山到了理番境內卓克基，二十九日紅軍向毛兒蓋進發，經過梭磨、馬塘、到康廟寺（俗稱貓兒寺），又經蘆花、由蒼德越打鼓嶺至打鼓。七月七日由打鼓出發，經過拖羅崗、大杵林、黑馬寺，十日到了毛兒蓋，自七月十日到三十日紅軍在此休息。八月一日至八月二十三日，紅軍行動於毛兒蓋和波羅子之間，作入陝甘的準備。」（註一二）

紅一方面軍從一九三五年四月下旬進入雲南，至六月中旬趕至川西懋功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前後不及兩月，其間還越過金沙江、大渡河以及沿途之叢山峻嶺和彝民區域，此種行軍速度，實足驚人，也正因為此一急行軍，使國軍追擊不及，地方部隊亦攔擊失效，終於渡過了重重難關；然而，這種急行軍的結果，却使部隊大大削弱，沿途儘是掉隊與傷患人員，亦有攜械投誠國軍者，據身歷其境的陳然先生說，到達懋功時，紅一方面軍部隊，已由貴州的三萬人減至一萬人，除去機關工作人員，戰鬥部隊僅殘存八千人，減員的速度正與急行軍成正比例；且由於長途急行軍的結果，部隊體力疲憊不堪，彈藥空前缺乏（每槍平均子彈僅十五發），衣服襤褸破爛，有的連草鞋都沒有，形同成羣乞丐，許多幹部與士兵，亦相顧取笑自稱爲「叫化軍」。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時（該山在寶興與懋功之間），因空氣稀薄，許多體力衰弱的士兵倒斃山頭，沿山屍體累累，連林彪亦暈倒數次，幸賴部屬扶持過山。像這樣的一枝殘兵，如果不是紅四方面軍的接應和補充，恐怕難逃覆滅的危境（註一三）。

三、兩河口會議

當這兩個方面軍會師時，明顯的得出兩個部隊截然不同的寫照：一方面是自稱「叫化軍」（一方面軍）的狼狽相，另一方面是四方面軍的威武相；緣因四方面軍由川北到川西，行程短暫，沿途作戰雖有傷亡，但仍保有七萬餘衆，官兵精神飽滿，彈藥充足，裝備齊全，軍容鼎盛。兩軍會合之初，四方面軍熱烈歡迎一方面軍，并予糧秣裝備之補充，後來還撥三個團（卽三十三軍之二九四團，三十軍之一個團，又一個師部及其直屬隊）補充一方面軍；可是，這種不同的對比，就造成了四方面軍幹部的高傲自大及其對中共中央與「中央紅軍」的輕蔑心理。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則以領導者自居，頤指氣使，一意孤行。這種不同的矛盾心理，就是一、四方面軍間，毛澤東與張國燾間鬥爭與分裂的基礎。

兩軍會師後，中共中央於六月二十五日在兩河口（撫邊之北）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與會人員除政治局委員（包括張國燾在內）外，四方面軍的中委陳昌浩，候補中委徐向前等也被指定列席會議。會議主題爲兩軍會師後的行動方向問題，其間因張國燾、陳昌浩提出遵義會議改組中央是否合法、其決議是否妥適問題而引起了一場爭論。

本來，陳昌浩原與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同爲二十八個布爾塞維克的國際派，但自從在鄂豫皖邊區追隨張國燾後，已經成爲張國燾的心腹幹部，因而在會議中與張聞天、秦邦憲站在相反的立場展開辯論。同時，張國燾、陳昌浩否定遵義會議改組中央的意見，本可取得秦邦憲、周恩來的同情，甚至轉而聯合反對毛澤東，但因第一，張國燾認爲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第二，陳昌浩主張重新改組中央并以張國燾爲總書記。這樣就使秦邦憲、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等在爭論中聯合一致，形成一方面

軍與四方面軍兩方高級幹部鮮明對壘的局面。在爭辯僵持中，由朱德從中調解，要求雙方讓步，才取得了暫時的妥協。

(一)關於當前紅軍的行動方向，由於對當時國內政治形勢的不同估計：毛澤東以爲整個中國革命形勢正在高漲發展，張國燾則認爲目前革命形勢是在兩個高潮之間，因而毛澤東力主向北進軍，與陝北劉志丹部會合，以便伺機背靠外蒙，積極發展；張國燾則主張南下，在川康邊建立根據地，背靠西康，相機圍取成都平原。協調結果，決定各部隊休息整頓一時期，在此期間，以建立川陝甘邊區根據地爲目標，留一方面軍之五軍團，四方面軍之第九軍分駐懋功、撫邊一線，掩護創建根據地，主力部隊逐漸北移，向甘陝邊發展。

(二)關於蘇維埃制度，張國燾認爲不適用於中國，尤其在邊遠落後地區及少數民族區域，更不宜建立蘇維埃政府，而應以羣衆所喜聞樂道之組織形式建立政權。其他政治局委員則以爲此係共產國際及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的決議，不應輕加變更亦無權改變，應從長研究和請示國際。協議結果，在新佔地區或少數民族區域，照「六大」決議，可以先行建立革命委員會或人民政府，作爲臨時政權機關。

(三)關於遵義會議決議認定已往黨的政治路線的正確問題，張國燾提出了否定的意見，認爲中央蘇區的失敗不單純是軍事路線的錯誤，而是整個政治路線錯誤的結果，並強調「六大」以來整個政治方針就錯誤了，尤其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是政治路線錯誤的總根源。一方面軍的人員則堅持遵義會議決議，并予激烈反駁。朱德以行軍期間，最好暫緩討論此一空泛問題，爾得雙方同意，留待以後研究。

(四)關於遵義會議改組中央問題，張國燾認爲違反了黨章，政治局會議無權改組中央，而且出席遵義會議的政治局委員還不到一半，實際是政治局常委會，以常委會變更中央領導機關，是絕對非法的。毛澤東等人則以爲在行軍作戰的緊急時期，此種變通辦法應爲組織所許可，且已派人向共產國際報備中。陳昌浩認爲兩大主力紅軍會師後，情勢已非昔比，中央應再行改組，中央總負責人必須以其歷史和功績作爲選擇標準，建議以張國燾出任總書記最爲適合。協議結果，中央維持現狀，等待國際指示後再作研究。爲應目前軍事需要，決定恢復工農紅軍總政委制度，并以張國燾爲紅軍總政委，負責全國紅軍總的領導工作。

(五)關於中央委員的增補問題，陳昌浩認爲紅四方面軍只有兩個中央委員，其餘中委大部係一方面軍幹部，如以目前軍力相比，懸殊太大，有欠公平，既然不改組中央，建議增補四方面軍之中央委員八人，以示公允。協商結果，增補四方面軍之徐向前（原爲候補中委）、王樹聲、傅鍾、周純全、曾傳六、李先念、何畏、李特等八人爲中央委員（註一四）。

兩河口會議的結果，一、四方面軍高級幹部間的矛盾，雖然由於雙方的讓步，取得了暫時的妥協，但消息傳出後，反而加深了雙方的裂痕，事實是這樣的：

第一、會議結果，不脛而走，傳遍全軍後，一方面軍幹部對於四方面軍之增補八名中委，極表不滿，認爲這無異是武裝脅迫而成，等於搶奪中央的開始，張國燾想當中央總書記，更暴露其篡奪中央的野心。四方面軍幹部則以爲中央既然執行了錯誤路線，打了敗仗，而又非法改組，這樣的中央還能領導我們

麼？這種非法中央，爲什麼不改組？張主席（四方面軍幹部稱張國燾爲張主席——因張前任西北軍委主席、川陝省蘇維埃主席）何以不能做中央總書記？率領幾千殘兵的中央還有資格來指揮我們八萬大軍麼？

第二、會議決定創造川陝甘邊區根據地，因而需要建立邊區黨委，但在兩軍會合前，紅四方面軍早已派出大批地方工作幹部至撫邊、懋功等地建立黨委和革命委員會；兩軍會師後，中共中央即派陳然（陳原任中央地方工作團主任）出任邊區黨委書記，李井泉（李原任軍委直屬獨立團政委）任黨委軍事部長，以統一地方黨政軍領導爲名，歸併了四方面軍原派之工作幹部和機構，奪取了四方面軍的地方黨的領導權，因而引起四方面軍幹部的不滿和憤恨，到處宣傳說：川西係四方面軍打下的，中央幹部一來，便搶奪權位，坐享其成！

第三、兩河口會議，協議由四方面軍補充一方面軍之彈藥、服裝和糧秣，並撥三個團補充一方面軍；事後，一方面軍嫌四方面軍以人員最少戰力最弱的部隊撥來充數，四方面軍則認爲中央自己太不爭氣，一來便要四方面軍補充，是不是想慢慢來吞併四方面軍？

第四、此外，在四方面軍幹部中廣泛流傳這樣的一個說法：中共中央和一方面軍把部隊丟了，把傷患戰士丟了，把槍砲也丟了；可是用担架抬來了毛澤東和許多高級幹部的老婆，像這樣只愛老婆不要部隊的中央和毛澤東還能領導我們麼？（註一五）

類此不滿和對立，到處發生，這樣就使一、四方面軍人員由上而下形成尖銳的衝突和鬥爭，終於走

上公開的分裂。

四、共黨和共軍的分裂

兩河口會議後，共軍主力逐漸向北移動，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中共中央在毛兒蓋又召開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仍以討論共軍行動方針爲主題，緣因一、四方面軍會合後，共軍在川西近兩月的休整期間，國軍已從南面、東側與北面完成圍剿共軍的部署，北面爲國軍主力，佔據松潘，其前鋒伸入包坐，攔擊共軍北竄陝甘；東南扼守岷江流域，且已於七月底收復北川、汶川、茂縣、理番各縣，逐步向西進迫；南面以川軍爲主，亦已於七月底收復懋功、撫邊、崇化、綏靖各縣，正向北推進中。共軍在國軍三面進迫下，僞促於荒僻山區和草地邊沿，無法再停留下去，如何打開一條出路，便成爲當時急待解決的課題。

張國燾在毛兒蓋會議中，雖會重提兩河口會議尙未解決之問題，但爲張聞天等所否定，而以當前共軍行動方針爲討論專題。在此一問題上，毛澤東仍力主向北發展，先與劉志丹部會合，圖取內蒙，打通國際路線，爭取蘇聯援助。張國燾則持相反意見，他認爲國軍主力已在川陝甘邊完成部署，如仍越草地北進，必將遭受重大損傷，只有沿大金川南下，突破戰力薄弱之川軍防線，進取天全、蘆山、雅安等地，相機爭取成都平原，才是當前正確的戰略方針；張國燾并進一步聲稱，兩軍會合之初，如照彼之意見，乘國軍未入川西，川軍慌亂之際，向南攻擊，則絕非今日僞促荒區之困頓局勢矣。張國燾的意見，除

陳昌浩、徐向前支持外，未爲張聞天、毛澤東等採納。會議決定過草地，北上向陝甘進軍，在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下，張國燾只好勉強服從決定，揮軍北上（註一六）。

「八月二十三日，紅軍由毛兒蓋出動，向陝甘進發，經過分山嶺南和西面的草地，過了五天艱苦的生活，二十八日到達班佑和巴西……」（註一七）。

劉伯承對此曾作如下的記述：「接着，中央政治局又在毛兒蓋召開會議，就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作出決議。并決定分兵兩路北進。右路軍由中央、毛主席率領，包括一方面軍之一、三軍團及四方面軍之四軍、三十軍。左路軍由朱總司令、張國燾率領，包括四方面軍之九軍、三十一軍及一方面軍之五、九軍團（按：左路軍尚有四方面軍之三十三軍）。

右路軍穿過草地，向班佑、巴西、阿西一帶前進，在包坐河邊的救濟寺，消滅了胡宗南的一個師。左路軍由卓克基出發，經草地向阿壩、班佑一帶前進。但到了阿壩後，張國燾進一步露出了他分裂黨野心的野心，竟打電報給中央，要右路軍全部南下。中央雖曾幾次去電，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糾正其南下的錯誤，後來甚至嚴詞責令北上，但張國燾却悍然不顧中央指示，仍堅持其錯誤路線。」（註一八）

但據陳然先生說：劉伯承所稱「右路軍由中央、毛主席率領」，「左路軍由朱總司令、張國燾率領」一節，與事實仍有出入。因毛兒蓋會議之後，中共中央在軍事上即組織前敵指揮部，徐向前出任前敵總指揮，陳昌浩任總指揮部政委，指揮右路軍北上。左路軍則由紅軍總司令部（包括總司令朱德，總政委

張國燾，總參謀長劉伯承等）直接指揮，由卓克基向阿壩前進。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係隨右路軍行進，彼等固可指導右路軍，但在軍事上實際指揮者與統率者，顯然是徐向前和陳昌浩。

張國燾之所以毅然率軍南下，由於第一，兩河口會議乃至毛兒蓋會議，毛澤東一意孤行，對於張國燾的意見毫不考慮和採納，造成一、四方面軍間的深刻裂痕，以致無法彌補。第二，右路軍第三十軍，為四方面軍主力之一，過草地時任先頭部隊，在包坐與國軍四十九師激戰一日兩夜，雙方均以一萬三千人投入戰鬥，反復肉搏廝殺，狀至慘烈；紅三十軍雖已將四十九師擊潰，并擊斃國軍四千餘人（受傷的不計在內），但紅三十軍本身亦已七殘八落，潰不成軍，傷亡當在五千人以上（註一九）。指揮左路軍的張國燾聞悉此一拚消耗的硬仗後，深表不滿，尤痛惜其部隊之損失，認為剛入草地，即遭此重大損傷，如繼續北上，勢將全部毀滅，乃以政治局委員兼紅軍總政委身份建議中共中央及右路軍南下。第三，當張國燾（時在阿壩）與中共中央（時在巴西）正在電商北上或南下問題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却於九月二日悄然率領一、三軍團及軍委縱隊之一部偷偷離去，既不通知同在巴西一線休息的第四、第三十軍（屬四方面軍），更不告訴同路之前敵總指揮徐向前及政委陳昌浩，類似私率部隊秘密逃跑，此種行動，當即使整個紅四方面軍人員譁然，被棄置於阿壩之朱德、劉伯承及紅一方面軍之五、九軍團人員亦為之震驚不已，連朱德、劉伯承亦認為有不同意見儘可商量協議，悄然北上，置大軍於不顧為不當。於是整個紅四方面軍便掀起了反毛高潮，大罵毛澤東怕死逃跑、分裂黨分裂紅軍，痛斥中共中央為機會主義逃跑主義，不配領導全黨全軍。在羣情憤激下，張國燾乃提出「南下打成都吃大米」為動員口號，指揮四

方面軍及一方面軍之五、九軍團回頭再過草地南進，朱德、劉伯承也只好跟隨行動。

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秘密脫離右路軍，由巴西北上時，所率部隊僅有一、三軍團和軍委縱隊之一部（主要為幹部團與一部份機關工作人員。軍委縱隊之另一部已隨張國燾、朱德之左路軍行動），全部人員僅有六千人（劉伯承說有七、八千人係誇大之詞），毛澤東乃取消軍團番號，改稱為工農紅軍陝甘游擊支隊，以彭德懷為司令員，毛澤東自任政委。支隊之下編成兩個縱隊，林彪任第一縱隊司令員，彭德懷兼第二縱隊司令員，葉劍英則負責軍委縱隊之領導。陝甘支隊北上情形，劉伯承繼續寫道：

「這時，右路軍雖只剩下七、八千人，可是中央北上的意志堅定不移。九月，部隊自巴西出發，渡包坐河，沿白龍江前進，過棧道，攻克天險臘子口，然後即越岷山，脫離了雪山草地地區，到達甘南之岷縣、西固間的哈達鋪。」（註二〇）

另一方面，張國燾所率領的四面軍及被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所遺棄的一方面軍五、九軍團（此兩個軍團僅殘存三千人），總共仍有六萬餘人，於九月中旬南行抵馬塘、梭磨、卓克基、松崗一線時，在「打倒毛澤東」、「打倒逃跑主義中央」的羣憤激下，要求張國燾另組新中央，以統一黨的領導，張國燾遂於綽木彌（卓克基之南）宣佈中共中央之成立，此一中央之中央委員，除張國燾、朱德、陳昌浩及兩河口會議增補之八名中委外，并即增補一方面軍之劉伯承（劉原為候補中委）、李卓然、何長工、邵式平為中委，共有中委十五人，推張國燾為總書記，傅鍾為組織部長，何長工為組織部副部長，李卓然為宣傳部長，劉瑞龍為宣傳部副部長，即日開始工作，執行領導任務（註二一）。這樣，便開始了兩個中共

中央的新局面。

五、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

正當共軍偽促毛兒蓋以及張國燾與毛澤東衝突期間，共產國際於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至八月二十日，在莫斯科召開了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會議通過了七項決議和改選了「共產國際領導機關的成分」，其中重要的有四項決議：

(一)根據曼努斯基(Dimitri Manuisky 共產國際主席團書記處書記)的報告，通過了「蘇聯社會主義底勝利及其全世界的歷史意義」的決議。決議指稱：蘇聯「順利進行了社會主義工業化」，「農業集體化」，因而使「蘇聯勞動者底物質狀況已經根本改善，他們的文化程度已經大大提高」，「無產階級專政已經達到在政治上大大的強固」；「蘇聯社會主義底勝利，是在聯共反對右傾和左傾機會主義的堅決鬥爭中達到的」，因而「在蘇聯內部『誰戰勝誰』這個歷史問題，蘇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問題，已經澈底和永遠解決了，社會主義已經澈底和永遠勝利了。」「蘇聯社會主義底勝利具有全世界的意義」，「在全世界無產階級和勞動羣衆面前，在共產國際所有一切支部面前，擺着以下的首要任務：用所有的力量和所有的方法，來幫助鞏固蘇聯，來反對蘇聯的敵人」(註二二)。

(二)根據皮克(Wilhelm Pieck 共產國際主席團書記處書記)的報告，通過了「關於共產國際執

行委員會工作」的決議，決議「指出共產國際許多支部在工作中有嚴重的缺點：統一戰線策略實行得遲緩……不懂得在殖民地國家和附屬國有建立反帝人民戰線之必要」，「因此，大會特責成共產國際各支部在最短期間內剷除妨礙我們與社會民主黨工人接近的關門主義餘毒」，「因此，向共產國際執委提議……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國共產黨內部組織上的事宜；……不要機械地把一國底經驗搬到別國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籠統公式去替代具體的馬克斯主義的分析。」（參閱附錄一）

(四)根據愛爾科里(P. Togliatti)共產國際主席團書記處書記，即意共陶格里亞蒂)的報告，通過了「帝國主義者準備新的世界大戰與共產國際底任務」決議，決議認為「帝國主義者準備重新瓜分世界底戰爭」，「日本帝國主義在遠東所進行的戰爭，這已經是重新瓜分世界的開始」，「德國法西斯蒂，是挑撥戰爭的禍首」，「意大利帝國主義實行直接去佔領阿比西尼亞，這樣就在帝國主義列強間造成新的更加緊張的關係」。決議強調「蘇聯在保障和平的鬥爭中所起的作用」，并提出「共產國際為擁護和平與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而鬥爭的任務」：「①為擁護和平和保護蘇聯而鬥爭」；「②建立人民統一戰線，以擁護和平和反對挑戰者」；「③把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的鬥爭與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結合起來」；「④進行反對軍國主義和反對軍備的鬥爭」；「⑤進行反對民族侵略主義的鬥爭」；「⑥為民族解放而鬥爭和擁護民族解放戰爭」。

決議案特別指出：「共產黨員，務必積極擁護被壓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底民族解放鬥爭，尤其是擁護中國蘇維埃紅軍反對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者和反對口口口的鬥爭。中國共產黨應當竭力擴大民族解

放鬥爭底戰線，吸收凡是決意抵抗日本及其他帝國主義侵略行動的民族勢力，來參加民族解放鬥爭」。
(註二二二)

(四)根據季米特洛夫(G. M. Dimitrov共產國際總書記)的報告，通過了「法西斯主義底進攻和共產國際爲造成工人階級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鬥爭底任務」決議，這一決議是七次世界大會最重要的議案，其主要內容如下：

(1)「統治的資產階級，日益想靠法西斯主義來挽救自己的性命」，因而產生了「最反動的法西斯主義，就是德國法西斯主義」，「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裏，法西斯主義的危險，都日益增長」，不過，「法西斯主義底勝利是不穩固的」，「無產階級日益實行堅決抵抗法西斯主義的資產階級」。

(2)「實現工人階級反法西斯主義底鬥爭統一戰線，乃是國際工人運動底主要的最近的任務」，「在執行統一戰線策略的時候，遵照下列的指示：保護工人階級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直接利益」，「用共產主義精神來教育羣衆、組織羣衆和動員羣衆的獨立工作」，「實現無產階級統一戰線，應有各種不同的形式」，「應當加緊反對社會民主黨裏的反動派別」，「應當利用選舉運動」，「建立廣大的反法西斯主義的人民陣線」，「必須建立無產階級統一戰線或反法西斯的人民戰線底政府」。

(3)「共產黨人堅決主張在每個國家內國際範圍內恢復工會底統一；主張建立統一的階級工會是工人階級反對資本進攻和反對法西斯主義的最重要支柱之一」。

(4)「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裏，共產黨員底最重要的任務，在於建立反帝人民戰線」，「在中

國必須把擴大蘇維埃運動與鞏固紅軍的戰鬥力，與在全中國開展人民反帝運動連結起來。這個運動，應當在下列的口號下進行：武裝人民進行民族革命鬥爭，反對帝國主義強盜，首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蘇維埃應當成爲全中國人民底解放鬥爭的團結的中心」（註二四）。

七次大會所選出的共產國際領導成員，在四十七名執行委員中，有中共的王明、毛澤東、張國燾、周恩來四人，三十三名候補執委中，有中共的博古、康生二人。二十名監察委員中，有中共的周和生一人。主席團委員十九人中，有王明一人，主席團候補委員十二人中有康生一人。祕書處委員七人（總書記爲季米特洛夫），候補委員三人，王明一人被選爲祕書處候補委員（註二五）。

六、中共的「八一宣言」

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在莫斯科舉行期間，王明一面是中共駐國際首席代表，與康生等代表中共出席七次大會，一面又是共產國際主席團委員、書記處書記，主管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之共黨工作（註二六），因而他在七大會議中，代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共黨和中共作了「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的報告；這一報告是中共「八一宣言」的藍本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指針，同時又是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共黨反帝統一戰線的總方針。

王明在報告中除論述「帝國主義的加緊進攻與殖民地革命力量的日益增長」，「建立、擴大和鞏固反帝統一戰線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中共產黨員的最重要任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內的法西

斯主義問題」，「殖民地革命在革命與戰爭新週期中的意義和作用」外，并對中國、巴西、古巴、墨西哥、阿根廷、印度、阿剌伯各國共產黨的反帝統一戰線策略有所論列和指示，其中特別強調中共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問題，他說：

「抗日救國早已成爲我國每個國民、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在民族危機日甚一日的條件之下，除了我們的偉大民族全體總動員去進行堅決的、無情的、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英勇鬥爭而外，別無其他的救國方法；同時在共產黨方面，除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統一戰線這個策略而外，沒有其他的任何辦法能動員全體中國人民去與日本帝國主義作神聖的民族革命鬥爭。」

王明同時批評中共應用反日統一戰線策略的錯誤，他繼續說道：

「不錯，近幾年來，中國共產黨已經應用而且正在應用反日統一戰線的策略，……然而，應當嚴重地指出一個事實，中國共產黨直到現在，在實行這個策略時，還不能真正澈底，還不能不犯錯誤。

例如，在英勇的上海抗日防禦戰的時候……因爲我們黨的個別領導同志認爲『工、農、兵、商、學聯合』的口號是不能容許的，因此採取了不正確的立場，以致真正廣大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沒有建立起來。……」

第二個例子。中國蘇維埃政府和革命軍事委員會，在一九三三年春曾向全國人民和一切軍隊，號召訂立共同武裝抗日的戰鬥協定……可是，因爲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當時沒有澈底實行自己的政策，沒有進一步想出許多具體辦法，以便收到使國民黨軍隊與紅軍共同抗日的實際結果。

第三個例子。在福建事變的時候……由於我們黨的個別領導同志機械地了解『反對第三條道路』（即中國發展的非蘇維埃的和非國民黨的道路）的理論，所以中國共產黨對於福建事變的意義就不能給予確切和應有的估計；因此就產生了我們當時在軍事策略方面的錯誤……：

最後一個例子，當馮玉祥、吉鴻昌、方振武、孫殿英等部隊起來抗日的時候，……由於我們北方的和上海的工作人員輕視和不瞭解這些事變的意義，以致不能在北方形成反日的新陣地。

如果要問：這些錯誤發生的來源在什麼地方呢？那麼，我們可以答復說：這些錯誤之所以發生，首先是由於許多我們同志過去和現在都還沒有瞭解近幾年來中國所形成的新條件和新環境。因此，他們不瞭解，怎樣用新的方法在中國提出反帝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

關於今後中共的策略路線，王明明確地說道：

「據我個人的意見，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全體的意見，我們現在實行抗日救國政策的具體步驟應當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蘇維埃政府共同向全國人民，向一切政黨，派別、軍隊、羣衆團體以及一切政治家和名流們，提議與我們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

此外，我可以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在全中國的民衆面前，在全世界的輿論面前，正式宣稱：

一、中國共產黨中央和中國蘇維埃政府願意做成立這種國防政府的發起人，中共中央和蘇維埃政府願意根據抗日救國的共同綱領，來與中國各黨派，各團體，各地方軍政機關，各名流，各政治家，進行

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的問題，不管中國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與其他黨派，團體和個人之間，在過去和現在，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在今天大家都應當一致對外。

二、中國紅軍決計首先加入這種抗日聯軍，以便與一切軍隊手攜手地在前線上爲抗日救國而戰。只要任何部隊停止進攻紅軍，只要任何部隊真正進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武裝鬥爭，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不同的意見，不管這些軍隊是否與紅軍進行過戰爭行動，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爲，而且立刻與他們聯絡一起去實行抗日救國。

此外，中國共產黨在全國民衆面前，明顯地提出國防政府的性質問題，即是指出這個政府的基本任務在於抗日救國。因此，國防政府的政綱，應當是能代表全民共同利益的下列各點：

- (一) 抗日救國，收復失地。
- (二) 救災治水，安定民生。
- (三) 沒收日本在華一切財產，充作抗日戰費。
- (四) 沒收漢奸賣國賊財產、糧食、土地，交給貧苦同胞和抗日戰士享用。
- (五) 廢除苛捐雜稅，整理財政、金融，發展工農商業。
- (六) 加薪加餉，改良工農軍學各界生活。
- (七) 實行民主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 (八) 實行免費教育，安置失業青年。

(九)實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護僑胞在國內外生命、財產、居住和營業的自由。

(十)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民衆（日本國內勞苦民衆、高麗、台灣等民族）作友軍，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作同盟，與一切對反日戰爭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國家建立友誼關係。」（註二七）

根據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關於反帝統一戰線的決定，陳紹禹（王明）以中共中央及中國蘇維埃政府名義，在莫斯科發出了有名的「八一宣言」，宣言雖然和過去一樣，猛烈攻訐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及其負責人，但不再提出推翻國民政府的口號，宣言說：

「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動，而且願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

宣言號召組織抗日聯軍并要求與各黨派、各團體、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并提出國防政府的十條行政方針（詳見附錄二）。

「八一宣言」顯然是中共新政策的開始，也就是中共策略路線的大轉變。這種大轉變，當然是王明在莫斯科遵照共產國際的決策發佈的，而不是中共中央的決定；當時的中共中央正在毛兒蓋，與莫斯科交通斷絕，電訊不通，尚不知有此宣言之發表，仍以六屆五中全會決議和遵義會議決議作爲總的政治路線。而且自兩河口會議之後，一、四方面軍間，毛澤東與張國燾間，正爲北上與南下問題爭持不下，終

於走上分裂，形成兩個中央的局面，所以就當時的實況而言，「八一宣言」不過是從莫斯科放出的宣傳號召而已。

七、張國燾、毛澤東分裂之分析

關於張國燾和兩個中央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曾作如下評論：「張國燾，中國革命的叛徒。早年投機革命，參加中國共產黨。他在黨內錯誤極多，造成了極大的罪惡。其最著者爲一九三五年反對紅軍北上，主張紅軍向四川西康間少數民族區域退却的失敗主義和取消主義，并且進行公開的反黨反中央的背叛活動，自立僞中央，破壞黨和紅軍的統一，使紅軍第四方面軍蒙受了重大的損失。」（註二八）

劉伯承也作了這樣的記述：「張國燾公開和中央分裂後，擅自率領左路軍及右路軍中原四方面軍的兩個軍，再過草地、翻雪山，經毛兒蓋、懋功、寶興等地，向川康邊境的天全、蘆山退却。在綽木礪，他終於奸心畢露，公然進行叛黨活動，宣佈成立僞中央，自己擔任主席（按：當時中共中央尙無主席之設，應爲總書記之誤）。」（註二九）

就當時實況而論，張國燾固然錯誤，中共中央與毛澤東同樣錯誤，其間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比而已；就共黨的觀點而言，當時張國燾的看法遠較毛澤東高明，若干地方且有先見之明：

第一，關於蘇維埃政權問題，張國燾認爲不適用於中國，當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在兩河口及毛兒蓋會議均予否定；可是兩年之後，即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公佈國共合作宣言時，自動取消了

蘇維埃政府，宣言說：「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註三〇）

第二，關於過去的政治路線是否正確的問題，張國燾認爲四中全会以後黨的總路線是錯誤的，當時中共中央與毛澤東堅持遵義會議決議的看法，否定了張國燾的意見；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却認爲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止的四年期間，黨的政治路線是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路線。

由此可見，張國燾的上列兩項意見，均爲中共中央事後所接納，但在當時却被指爲逃跑主義或取消主義。

張國燾與毛澤東在戰略問題上的爭論是南下或北上的問題，就當時軍事情勢言，各有利弊得失，難作一定的評議，如就時間論，兩軍會合之初，如照張國燾的意見南下，對共軍是有利的，反之，當國軍部署完成後，再越草地雪山南下，顯然對共軍有害無益。不過張國燾與毛澤東有一點是共同的企圖，即不論南下或北上，都是向邊遠地區逃竄，因而均可視爲逃跑主義，正如兩個中央之互斥對罵然。

紅一、四方面軍分道揚鑣後，由於紅軍主力南移，國軍主力亦由北而南，用以抵禦紅四方面軍的南下；在此情況下，毛澤東所率領的「陝甘游擊支隊」乃能乘機北上，張國燾所率領的四方面軍却因而遭受了損失。不過，如果以部隊的損失比例及其到達陝北的數量來評議成敗，那麼，誰是誰非就值得研究了：紅一方面軍七萬部隊，竄抵陝北時僅殘存二千餘人；紅四方面軍八萬人馬，到達陝北時尚有一萬三千人（註三一），兩相比較，損失孰重，就不言而喻了。

遵義會議改組中共中央是否合法的問題，亦爲張國燾與毛澤東爭論的中心。這裏可以追溯到一九三一年九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改組問題，當時的改組也僅僅召開政治局會議，選舉秦邦憲出任中央總書記，且經共產國際批准，但未召開中央全會，因而此一改組是否合法問題，曾經陝北中共高幹研究三年，後來毛澤東雖追認其合法，但批評其選舉手續不完備，乃改稱爲「臨時中央」（註三二）。遵義會議也僅僅是通過政治局會議改組中央，既未召開中央全會，亦未經共產國際批准，照中共「六大大會」黨章來衡量，其爲非法乃屬顯然，連稱之爲「臨時中央」亦大有問題；張國燾對此提出異議，可謂理直氣壯，也正因如此，中共中央乃不能不任命張國燾爲總政委并增加四方面軍八個中央委員，以妥協方式謀求解決。其實這種臨時增加中央委員，也是不合法的，因爲政治局會議無權作此決定。由此可見，當時的中共中央從遵義會議的改組到兩河口會議的增加中委，處處違反黨章黨紀，無怪張國燾以後要自立中央了。

固然張國燾自立中央，是違反了共黨黨紀，但從中共黨史觀察，一九二七年，「八七」緊急會議，一九三一年九月上海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一九三四年一月遵義會議都是非法改組中央，兩河口會議又是非法增加中央委員，這樣一來，中共的所謂黨章黨紀早已破壞無遺，因而張國燾的自立中央也就不足爲奇了。

至於張國燾之率軍南下，固然違反了毛兒蓋會議的決定，可是在越過草地和包坐之戰以及國軍攔擊的新情況下，張國燾以總政委身份提出新建議，不是不可以重加商討的，當時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不僅不

予考慮，而且正在電商期間悄然首先率領一、三軍團北上，把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總參謀長劉伯承以及同行的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和部隊與整個大軍置之不顧；張國燾被棄置之後，始毅然率軍南下。如果從時間先後來說，所謂退却逃跑，所謂分裂紅軍，究竟是毛澤東抑張國燾也就不問可知了。

然而，張國燾在和毛澤東鬥爭中終於失敗了，他的失敗不在於曾經率軍南下和自立中央，他的失敗在於未能像毛澤東一樣運用權謀爭取共產國際的支持；相反的，毛澤東却利用了以國際派爲首的中共中央取得國際派頭子王明和共產國際的支持，從而擊敗了孤立的張國燾。

八、統一戰線的本質

共產國際所召開的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其所通過的決議，均集中於建立統一戰線，在西方是建立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戰線，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則建立反帝統一戰線，究其原因，在於當時蘇聯在德、意、日諸國威脅下，爲圖自保，乃通過共產國際而提出者，因而所謂統一戰線都歸結到保衛蘇聯爲焦點，一切均從蘇聯的利益出發，「七大」決議也毫不隱諱的呼籲「爲擁護和平和保護蘇聯而鬥爭」。

正因爲如此，當形勢轉變，此種反德、意、日法西斯主義統一戰線有礙於蘇聯時，不僅可以拋諸九霄雲外，而且還要和德、意、日攜手合作，爲禍於世界。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三日，蘇聯與「法西斯主義」的德國訂立互不侵犯條約，九月便與德國共同瓜分波蘭，十一月底更進兵芬蘭，這就是最好的例證。

。到了一九四一年四月，蘇聯又與日寇簽訂日蘇中立條約，促進珍珠港事件的爆發，這又是「反法西斯主義統一戰線」的「傑作」。可見，所謂統一戰線不過是蘇聯通過共產國際所運用的謀略與手段而已，而各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驅使下，也就成爲蘇聯的傀儡與工具了。

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另一特點，便是決議「不要機械地把一國底經驗搬到別國去」，「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國共產黨內部組織上的事宜」。這就是說，共產國際開始有有限的放寬了對各國共產黨的控制，當然這不是丟下指揮棒，而僅僅是「不要直接干涉」而已。後來毛澤東也就利用了這兩點，提出「馬列主義中國化」，「反對教條主義」，並於鬥倒張國燾後進而鬥垮陳紹禹國際派，建立了自己個人的獨裁統治。

在共產國際這樣的統戰策略下，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本質也就不問可知了，這裏暫不置論，不過有兩點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王明在國際「七大」所作的報告，曾經指摘中共在執行反日統戰策略的錯誤，這一指責無異承認了以下事實：即「九一八」事變，中共反日運動的形式主義和關門主義；「一二八」國軍在淞滬抗戰，中共的分裂主義和失敗主義；福建事變，中共的欺騙主義和旁觀政策；以及乘機夾擊國軍，客觀上有利於日寇侵略的種種行爲。這些行爲，在國際「七大」會議上，以共產黨自己的觀點看來，也已經是錯誤的了。

第二，共產國際七次大會期間，王明在莫斯科所發表的中共「八一宣言」，已往由於外界知者甚少

，往往誤以爲是中共中央在毛兒蓋發出的，中共前期黨史書刊，也就將錯就錯，藉以欺騙世人。「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下冊這樣寫道：「中國共產黨根據了這種形勢，於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還在長征過草地，飢餓困苦的途上，提出了有名的『八一宣言』，號召全中國不願做亡國奴的人們、黨派和軍隊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挽民族的危亡，這一號召引起了全中國人民的熱烈響應。」（註三三）這顯然是對史實的歪曲，也是中共竄改黨史的一貫手法，在我們看來，那是司空見慣不足爲奇的。

註一：陳然先生轉據何畏所提供之資料。

註二：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鬥爭」第三十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在上海出版。按：中共中央於一九三二年底遷入江西蘇區後，在上海仍以中共中央名義繼續出版「鬥爭」和「紅旗週報」，在江西蘇區則以蘇區中央局名義出版「鬥爭」。

註三：一九三四年二月烏江之川陝蘇區通訊「川陝蘇區與紅四方面軍的驚人勝利」，「鬥爭」（上海）六十四期，一九三四、二、廿一出版。

註四：取材於①陳然先生轉據何畏所提供之資料②「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下冊③「剿匪戰史」第十冊④「鬥爭」（上海）六十四期⑤「國聞週報」第十一卷第四十四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出版。

註五：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五日「國聞週報」第一卷第四十四期「川省赤禍及川軍剿赤之經過」。

註六：傅鍾「西渡嘉陵江」——「星火燎原」三五六一三五八頁。

註七：「同註六」三六〇頁。

註八：「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四六一頁，一九五八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註九：劉伯承「回顧長征」——「星火燎原」七一八頁。

註一〇：「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下冊第六十八頁。

註一一：「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四六〇頁。

註一二：「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下冊六十九頁。

註一三—一六：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

註一七：「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下冊六九頁。

註一八：劉伯承「回顧長征」——「星火燎原」一〇頁。

註一九：紅三十軍軍長程世才「包坐之戰」——「星火燎原」三八五—三八九頁。

註二〇：同「註一八」一〇—一一頁。

註二一：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據陳先生稱：彼隨紅一方面軍抵達川西後，被中共中央派任邊區黨委書記。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率領一、三軍團北上時，與朱德、劉伯承及五、九軍團同被棄置於紅四方面軍張國燾處，乃隨張國燾、朱德行動，故對當時情形瞭解甚詳。

註二二：「蘇聯社會主義底勝利及其全世界的歷史意義」——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根據曼努斯基同志報告的決議，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通過」——「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的決議案」八三—九八頁，一九三八年六月延安解放社出版。

註二三：「帝國主義者準備新的世界大戰與共產國際底任務」——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根據愛爾科里同志報告的決議，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通過」——同上書六一—七八頁。

註二四：「法西斯主義底進攻和共產國際爲造成工人階級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鬥爭底任務」——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根據季米特洛夫同志報告的決議，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日通過」——同上書二—五八頁。

註二五：「共產國際領導機關底成份」——由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選出」——同上書一〇九—一一五頁。

註二六：一九三四年六月三日，共產國際曾舉行第七次世界大會的籌備會議，王明以共產國際主席團委員、書記處

書記身份出席此一會議。——見俄文「俄共黨史問題」雜誌，一九六五年第七號八三—八八頁。

註二七：陳紹禹（王明）「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一九三八年二月中國出版社出版。

註二八：「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一六〇頁。

註二九：同「註一八」一二頁。

註三〇：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爲公佈國共合作宣言」——見延安解放社出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二冊一九頁。

註三一：紅一方面軍到達陝北時，僅殘存二千餘人一節，見「剿匪戰史」第十冊九六四頁。紅四方面軍到達陝北部隊，除徐向前、陳昌浩所率西路軍二萬二千餘人渡黃河入甘肅走廊被國軍消滅外，張國燾尚率有餘部一萬三千人入陝北。此爲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

註三二：毛澤東「學習和時局」，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九四三頁。另可參閱「查田運動與五中全會」一章之第十節

註三三：「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下冊七一—七二頁。

附錄一：關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工作

（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根據皮克同志報告決議，一九三五年八月一號通過）

一、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贊成共產國際執委底政治路線和實際工作。

二、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贊成一九三三年三月，一九三四年十月和一九三五年四月共產國際執委向第二國際各支部及第二國際領導機關提議共同反對法西斯主義，反對資本進攻和反對戰爭的提議書。可惜第二國際執委及其大多數支部都不顧工人階級利益而拒絕了這一切提議。但同時必須指出極有歷史意義的事實，就是社會民主黨工

人以及許多社會民主黨組織已與共產黨員攜手共同反對法西斯主義和擁護勞動羣衆的利益。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特責成共產國際執委以及共產國際各支部，今後要盡力設法在國家範圍內和世界範圍內都達到統一戰線的建立。

三、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指出：各國共產黨的工作和口號，對於廣大的工人羣衆，同樣對於社會民主黨黨員的革命影響日益增大。因此大會特責成共產國際各支部在最短時期內剷除妨礙我們與社會民主黨工人接近的關門主義餘毒，並改變宣傳鼓動的方法，把常常是空洞抽象而爲羣衆所不大懂得的宣傳鼓動加以變更，使之帶有非常具體的性質，使之與羣衆的切身利益和日常需要連繫起來。

四、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代表大會，指出共產國際許多支部在工作中有嚴重的缺點：統一戰線策略實行遲緩，不會動員羣衆力爭部份的政治要求和經濟要求，不懂得有進行鬥爭以保護最後一點資產階級民主之必要，不懂得在殖民地國家和附屬國有建立反帝人民戰線之必要，忽視在改良工會和法西斯工會以及資產階級政黨所建立的勞動者的羣衆組織裏面的工作，輕視在勞動婦女中間的工作，輕視在農民及城市小資產階級羣衆中間進行工作的意義，同時共產國際執委給這些支部的政治幫助也未免遲緩。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因爲顧及到各國共產黨員有使命來領導正在革命化的羣衆運動，他們的作用和責任日益重大，顧及到有將日常領導集中於各國支部本身之必要。因此，向共產國際執委提議：

(一)將工作重心轉移到規定國際工人運動基本政治路線及策略路線方面去，在解決一切問題時要根據每個國家的具體情形和特點，一般的不要直接干涉各國共產黨內部組織上的事宜；

(二)有系統地幫助造就和教育各國共產黨的幹部及真正布爾什維克的領導者，使各國共產黨當着事變急遽轉變的時候，能根據共產國際各次代表大會以及共產國際執委各次全會的決議而迅速和獨立地來正確解決共產主義運動的政治任務及策略任務；

(三)切實幫助各國共產黨進行思想鬥爭，反對政治敵人；

(四)幫助各國共產黨去正確利用本身的經驗以及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可是不要機械地把一國的經驗搬到別國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籠統公式去替代具體的馬克思主義的分析；

(五)共產國際各最重要支部必須遣派有威望的代表來更積極地參加共產國際執委的日常工作，以保證共產國際領導機關與共產國際各支部之間有更密切的聯繫。

五、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指出：在許多國家內，共產主義青年團和共產黨都輕視在青年中進行羣衆工作的重大意義，對這一個工作做得薄弱，因此特向共產國際執委以及青年共產國際執委提議，採取有效辦法來肅清許多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宗派式的關門主義，責成共產青年團員加入由資產階級民主派、改良派、和法西斯蒂政黨以及宗教團體所建立的一切勞動青年羣衆組織（工會的、文化的、體育的）中去，並在這些組織內進行有系統的鬥爭，去影響廣大的青年羣衆，動員青年去反對軍國主義、反對勞役營、力爭改善自己的物質狀況，力爭青年勞動羣衆的權利，並爲達到這些目的而力謀建立一切非法西斯蒂的青年羣衆組織的廣大的統一戰線。

六、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指出：最近幾年來，因爲蘇聯社會主義的勝利，資本主義各國的危機，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猖獗和新戰爭的危險，全世界各國廣大的工人以及一般的勞動羣衆，已經開始由改良主義轉到革命鬥爭方面，已經開始由散漫凌亂的狀態轉到統一戰線方面來。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估計到：不管社會民主黨個別首領如何反抗，勞動羣衆要求一致行動的趨向，將更發展與前進，因此，特向共產國際各支部提議在建立無產階級統一戰線和全體勞動者人民戰線去反對資本進攻，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反對新戰爭危險的鬥爭過程中，要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去更加鞏固本身的隊伍和爭取工人階級大多數到共產主義方面來。

七、共產國際第七次全世界代表大會指出：要把正在成熟的政治危機變成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就要靠各國共產黨在無產階級廣大羣衆中的力量和影響，要靠共產黨員的努力和不怕犧牲的英勇鬥爭。現在，有些資本主義國家內，政治危機正在成熟的過程中，此時共產黨員最主要的和有決定意義的任務，就是不要自滿於已得的勝利，而要繼續前進去爭取新的勝利，擴大與工人階級聯繫，爭得千百萬勞動者的信仰，把共產國際各支部變成羣衆政黨，使共產黨的

影響普遍於工人階級大多數，這樣去保證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所必需的條件。

(錄自一九三八年六月延安出版「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底決議案」)

附錄二：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八一」宣言摘錄）

國內外工農軍政商學各界男女同胞們！

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我們進攻，南京賣國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繼東北四省之後而實際淪亡了！

有數千年文化歷史的平、津、有無限富源的直、魯、晉、豫各省，有最重要戰略意義的熱、察、綏區域，有全國政治經濟命脈的北寧、平漢、津浦、平綏等鐵路，現在實際上都完全在日寇軍力控制之下，關東賊軍司令部正在積極實行成立所謂「蒙古國」和「華北國」的計劃。自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由東三省而熱河，由熱河而長城要塞，由長城而「遼東非戰區」，由非戰區而實際佔領河北、察、綏和北方各省，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經被日寇佔領和侵襲了。田中奏摺所預定的完全滅亡我國的毒計，正着着實行，長此下去，眼看長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將逐漸被日寇所吞蝕，我五千年古國將完全變成被征服地，四萬萬同胞將都變成亡國奴。

近年來，我國家、我民族，已處在千鈞一髮的生死關頭。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抗日救國，已成爲每個同胞的神聖天職！

中國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認爲日寇和漢奸賣國賊對我國這些行動，是中華民族的無上恥辱！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鄭重宣言：我們不僅對於日寇對我們的領土侵略和內政干涉，表示激烈的反抗；就是對於日寇提出解散國民黨黨部和藍衣社組織底要求，也表示堅決的抗議。在共產黨及蘇維埃政府看來：一切中國人的事應由中國人自己解決，無論國民黨和藍衣社賣國殃民的罪惡如何滔天，但其應否存廢問題，日寇絕無置喙的餘地。

領土一省又一省被人侵佔，人民千萬又千萬地被人奴役，城村一處又一處地被人血洗，僑胞一批又一批地被人驅逐

，一切內政、外交處處被人干涉，這還能算什麼國家？這還能算什麼民族？！

同胞們！中國是我們的祖國！中國民族就是我們全體同胞！我們能坐視國亡、族滅而不起來救國自救嗎？

不能！絕對不能！阿比西尼亞以八百萬人民的國家，尚能對意大利帝國主義準備作英勇的武裝反抗，以保衛自己的領土和人民；難道我們四萬萬人民的泱泱大國，就能這樣束手待斃嗎？

因此，今當我亡國滅種大禍迫在眉睫之時，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再一次向全體同胞呼籲：無論各黨各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見上或利益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大家都應該「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的眞誠覺悟，首先大家都應該停止內戰，以便集中一切國力（人力、物力、財力、武力等）去爲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過去和現在他們與紅軍有任何舊仇宿怨，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爲，而且願意與之親密攜手，共同救國。此外，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現在更進一步的懇切號召：

一切不願當亡國奴的同胞們！

一切有愛國天良的軍官和士兵弟兄們！

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神聖事業的黨派和團體的同志們！

國民黨和藍衣社中一切有民族意識的熱血青年們！

一切關心祖國的僑胞們！

中國境內一切被壓迫民族（蒙、回、滿、藏、苗、僮、黎、番等）的弟兄們！

大家起來！衝破日寇、○賊的萬重壓迫，勇敢地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與紅軍和東北人民革命軍及各種反日義勇軍一塊，組織全中國的抗日聯軍。

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作成立這種國防政府的發起人，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立刻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

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工會、農會、學生會、商會、教育會、新聞記者聯合會、教職員聯合會、同鄉會、致公會、民族武裝自衛會、反日會、救國會等等）、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談判結果所成立的國防政府，應該作為救亡圖存的臨時領導機關，這種國防政府，應當設法召集真正代表全體同胞（由工、農、軍、政、商、學各界的一切願意抗日救國的黨派和團體，以及國外僑胞和中國境內各民族，在民主條件下選出的代表）的代表機關，以便更具體地討論關於抗日救國的各種問題。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絕對盡力贊助這全民代表機關的召集，並絕對執行這一機關的決議，因為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是絕對尊重人民公意的政府和政黨。

國防政府的主要責任在抗日救國，其行政方針應包括下列各點：

- (一) 抗日救國，收復失土。
 - (二) 救災治水，安定民生。
 - (三) 沒收日寇在華一切財產，充作抗日戰費。
 - (四) 沒收漢奸賣國賊財產、糧食、土地，交給貧苦同胞和抗日戰士享用。
 - (五) 廢除苛捐雜稅，整理財政金融，發展工農商業。
 - (六) 加薪加餉，改良工、農、軍、學各界生活。
 - (七) 實行民主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 (八) 實行免費教育，安置失業青年。
 - (九) 實行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護僑胞在國內外生命、財產、居住和營業的自由。
 - (十) 聯合一切反對帝國主義的民衆（日本國內勞動民衆、高麗、台灣等民族）作友軍，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運動的民族和國家，對一切對中國民衆反日解放戰爭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國家建立友誼關係。
- 抗日聯軍應由一切願意抗日的部隊合組而成，在國防政府領導之下，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總司令部。這種總司令部或由各軍抗日長官及士兵選出代表組成，或由其他形式組成，也由各方代表及全體人民公意而定。紅軍絕對首先加入聯軍

，以盡抗日救國天職。

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堅決相信：如果我們四萬萬同胞有統一的國防政府作領導，有統一的抗日聯軍作先鋒，有千百萬武裝民衆作戰備，有無數萬東方的和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和被壓迫民族作聲援，一定能戰勝內受人民反抗和外受列強敵視的日本帝國主義！

中國蘇維埃政府

中國共產黨中央

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

（錄自延安解放社出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一冊）

第二十五章 統一戰線

一、陝北共黨內部的鬥爭

毛澤東與張國燾分裂後，於一九三五年九月二日，率領由紅一、三軍團改編的陝甘游擊支隊自巴西北上，打算與劉志丹之紅廿六軍會合，在陝北重建根據地。可是，就在毛澤東率部北上期間，陝北蘇區和紅軍內部也爆發了尖銳的鬥爭：一方是陝北土共劉志丹、高崗和紅二十六軍，另一方是中共中央代表朱理治和陝北土共郭洪濤，以及新到陝北的徐海東、程子華及其所統率的紅二十五軍。鬥爭的手段和毛澤東在富田事變中所採取的辦法相類似，朱理治等人以肅反爲名，捕殺了許多陝北的土共，最後把劉志丹、高崗也逮捕起來，準備一併加以斫殺，直到中共中央到達陝北，才使這一鬥爭緩和下來。

有關陝北共黨內部鬥爭的經過，及其前因後果與歷史根源，高崗在陝甘寧邊區黨的高幹會講演時，以「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爲題，作了詳細的敘述，他說：

「『九一八』事變後的一月，黨決定以劉志丹等同志在陝甘邊一帶領導的武裝和由山西過來的晉西游擊隊爲基礎成立反帝同盟軍，不久，又改爲陝甘紅軍游擊隊，以枸邑、淳化、耀縣、宜君、新寧、寧縣一帶爲活動地區，進行游擊戰爭，創造陝甘新蘇區……」。

一九三二年的中央北方會議後，決定把陝甘紅軍游擊隊擴編爲紅二十六軍，首先成立紅二團作爲二

十六軍之骨幹，并派杜衡爲政治委員。杜衡是一貫的左傾空談家，是立三路線的堅決執行者，四中全會後並沒有澈底轉變。他參加了北方會議，攜帶著北方會議的精神到二十六軍，從這時起，二十六軍在杜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領導下，以致最後遭到失敗。……結果紅二團渡涇河、渭河由高陵、臨潼轉入渭華，在敵人優勢兵力圍攻中全部失敗。只跑出劉志丹、王世泰等幾個同志。這是一九三三年七月間的事。……杜衡左傾機會主義的第四個表現就是實行宗派主義……打擊劉志丹同志，說劉志丹同志是機會主義動搖。打擊謝子長、楊重遠、閻紅彥等同志，把謝子長、閻紅彥同志以派赴上海受訓名義調開部隊。我也是受到杜衡打擊的一個，當時把我調開部隊，派到隴南做兵運工作。

紅二十六軍二團失敗後，省委把恢復二十六軍整頓陝甘邊黨的任務委託於我，這時正在陝西黨與部隊處在最困難的時候，二十六軍全部失敗了，由王太吉騎兵團暴動過來的西北抗日義勇軍也失敗了（由一千六七百人的部隊只剩下幾十個人）。陝西黨的領導機關及各地組織，差不多破壞光了……我到達陝甘邊時，只有王太吉的一點殘部和渭北幾個小游擊隊，改編爲紅四團（人槍約七八十）……這時黃子文又由西安跑來了，他提議要成立陝西省委……我曉得這些人全是右派分子，……於是我們就將黃子文關起來進行考查，并揭破了黃子文的政治面目，這就是繼陳家坡會議後第二次反右傾的鬥爭……。

一九三四年一月，郭洪濤同志回到陝北，這時，不僅陝甘一帶紅軍與游擊戰爭已有很好的發展，而且陝北之吳堡、清澗、安定、神府各處，也已開始了游擊運動，……郭洪濤同志回來是拿著北方會

議的決議當做自己執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武器，……郭洪濤同志一回到陝北，就拿富農路線的帽子來打擊馬明芳同志，在閻家窪子會議上又給我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又以『白軍軍官』、『一貫的動搖怕死』等來打擊劉志丹同志。對謝子長同志也是採取了許多方法來打擊的。至於對其他許多幹部，不說是『右傾』，就說是『富農』，不說是『土匪』，就說是流氓，一樣採取各種方法來打擊，甚至無辜的槍斃同志，造成黨內濃厚的無原則的空氣，……於是一九三五年五月的王家灣子會議上和郭洪濤進行了鬥爭，……并調動了他的工作……。

正當這個時候（按：指一九三五年七月），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的名義到了陝北。朱理治同志到了陝北後，首先選擇郭洪濤同志做他第一個助手，并將左傾機會主義更加發展了……這時二十五軍來了，與二十六軍在永坪會師，并由朱理治召開了永坪會議，以朱理治、程子華、聶洪鈞三人成立中央代表團，改組西北工作委員會，成立陝甘晉省委，以朱理治、郭洪濤二人為正副書記，改組軍事委員會，以聶洪鈞為主席，決定成立十五軍團，以徐海東、劉志丹為正副軍長，程子華為政治委員，我為政治部主任，這一切組織上的變動說明什麼呢？就是把劉志丹同志和我從黨及軍事的主要機關排擠出來了，而郭洪濤、聶洪鈞等却被提拔到極重要的位置上去……朱理治，郭洪濤在組織路線上是實行極端宗派主義的，朱理治對地方幹部只信任郭洪濤一個，對其他許多創造蘇區有功績在羣衆中有信心的地方幹部，大都採取不信任的態度，并指摘他們是右傾機會主義者，而加以打擊，劉志丹、張秀山、習仲勳、馬文瑞、張邦英、張仲良、朱子休、楊祺等都曾受了打擊的……。

正當粉碎敵人三次圍剿的緊急時候，陝甘蘇區內部却發生了嚴重的肅反事件，在朱理治、郭洪濤、聶洪鈞、戴季英四人的主持與策動下，將劉志丹等一大批創造陝甘紅軍與蘇區的老幹部（我也在內），以莫須有的『反革命』罪名逮捕起來，並且枉害了好些同志……。在肅反中採取指名問供和野蠻殘酷的方法，朱、郭、聶、戴等把人捉起來，不進行任何的調查研究，不重證據，只憑拷打，虛擬出許多名字向被捕人提出，硬打得要他們承認是『反革命』……。如果不是中央到來制止與糾正這次肅反，其前途更是不堪設想的……。」（註一）。

二、徐海東部流竄陝北

陝北（即陝甘邊）蘇區內部的鬥爭，從高崗的報告看來，由來已久，當徐海東的二十五軍到達陝北後，則更加劇烈起來，這是由於鬥爭的雙方均以武力為後盾，正如江西的富田事變然。至於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原來是張國燾紅四方面軍遺留在鄂豫皖邊區的殘部，這支部隊，僅有三千人，何以北竄入陝，徐海東在「會師陝北」一文中有過這樣的敘述：

「一九三四年九月，紅二十五軍正在皖西六安、霍山一帶休整，鄂東道委（按：類似特委）書記鄭位三同志，派陳錦秀同志化裝從鄂東送來了信。信上說：『中央派程子華同志送來了重要指示，已到我處，請你們接信後，火速率領紅二十五軍到鄂東來。』……。」（按：程子華係由「中央蘇區」派去的）。

據徐海東說，接信後乃「從出發地到鄂東，要通過四道封鎖線，我軍一路打一路走，……經過連夜的急行軍，第二天下午到了宣化店以北的殷家灣，見到了鄭位三同志。他拿出中央的指示，內容的大意是：鄂豫皖蘇區經過敵人四、五次圍剿，人力物力損失甚大，糧食已空，紅二十五軍應離開老區，開闢新的根據地。根據中央的指示，省委決定紅二十五軍西去開闢新的根據地……」。

「紅二十五軍轉戰千里，於一九三五年二月，翻越天谷山，進入了陝西的柴家關，……在陝西葛牌鎮，省委召開了擴大會議，決定改組鄂豫皖省委爲鄂豫陝省委。會議並決定：紅二十五軍今後的任務是創造鄂豫陝革命根據地。紅二十五軍根據省委的決議，向東行動，打下雒南，佔領柏峪寺，在這一帶發動羣衆，組織了雒南游擊隊，不久又轉到大小涇川一帶，發動羣衆，又先後組織了三個游擊隊。同時在省委領導下成立了鄂陝工委和游擊司令部，領導該區工作……」。

一九三五年五月，紅二十五軍遭受國軍的圍剿，乃採取「先疲後打」的作戰方針，開始流竄，曾經打下河南的紫荊關及陝南的黑山街。可是，據徐海東說：「由於我軍長期轉戰於山區，兵源、給養發生了困難。爲了解決物資供應問題和擴充部隊，爲了擴大我軍的政治影響，省委決定打出秦嶺，逼近西安。」

六月底，我軍從楊家斜出發，跨過終南山，一天，到了西安西南四十五里的殷家衛（引駕迴）……就在這裏我們看到了一張『大公報』，上面有一條消息：『共軍一、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師後，繼續向北逃竄，先頭部隊到達松潘……』。因爲只是從敵人方面得到的消息，無電台連絡，中央紅軍到

底到了那裏，無法知道。但是，我們相信一、四方面軍是北上了。

在子午鎮西二十里的一個地方，省委召開了緊急會議。經過討論，決定紅二十五軍立刻西進甘肅，牽制敵人。迎接黨中央和一、四方面軍。陝南留下鄧位三（陝南特委書記）及陳先瑞同志，堅持鄂豫陝游擊根據地。

於是，紅二十五軍的全體同志，滿懷著會見中央的熱烈願望，離開了陝南向西行動。當時，我們的決心：即使我們這三千多人都犧牲了，也要把黨中央和一、四方面軍迎接過來……。

走了十多天，行程數百里，經過整屋、駱駝口、佛坪、西江、到達了甘肅和陝西交界的雙石舖。……：我軍在雙石舖停留了一天，開會紀念『八一』建軍節，二號一早，就向天水挺進。剛打下天水北關，敵人一個旅的增援部隊到了，我們放棄了攻佔天水的計劃，連日轉向鳳凰山、沿河鎮、強渡了渭水。……：過了渭水後，便打下了秦安。爲牽制毛炳文的主力，部隊又繼續向通渭前進，一直逼到靜寧附近。……：

在興隆鎮一帶休整了三天，因仍得不到黨中央和一、四方面軍的消息，省委又進行了研究，認爲目前我們是遠離陝南孤軍作戰，要轉回去也比較困難，如果再打聽不到黨中央的消息，就奔陝北，去會合劉志丹同志領導的陝北紅軍。

休整以後，部隊繼續前進，打下隆德。當天傍晚，毛炳文的主力從蘭州增接上來，我軍與敵激戰一陣，又開始轉移。

部隊邊打邊走。政委吳煥先同志在前頭領著大隊，我在後面指揮打敵人的追兵。從隆德轉戰到六盤山，從瓦亭到平涼，日夜行軍。……不幸的是，就在涇川戰鬥中，吳煥先同志犧牲了……

我們從涇川西進，威逼崇信，在西南公路與敵人周轉十七天之久，……我軍在此孤軍作戰，處境不利，便按照原定的計劃去陝北……。

我軍強渡涇水，經過數天的行軍，便進入了陝北蘇區的邊沿——紹山一帶。……消息傳得很快，習仲勳、劉景範等同志先後找到了……和習仲勳同志會面後，又經過連續四天的行軍，到達了永坪鎮。在這裏，我們和劉志丹同志會面了……。

兩軍會合之後，紅二十五軍和陝北紅二十六、二十七軍合編為十五軍團。黨決定由我任軍團長，劉志丹同志任副軍團長，程子華同志任政治委員。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九一八」事變四週年，我們在永坪西南一個幹部學校門前操場上，舉行了紅十五軍團成立大會，兩軍合一，七千多人，真是人精馬壯……。」（註二）

三、高崗的不滿論調

這時，毛澤東率領的「陝甘游擊支隊」，亦已越過岷山，於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日到達甘肅岷縣西固間的哈達鋪。「紅軍在哈達鋪休息兩天，便出動作向天水前進狀，誘使敵人將主力集中天水。我們却

以急行軍自武山、漳縣之間，順利渡過封鎖線，相繼佔領榜羅鎮和通渭城。十月，經回民區連續突破會寧、靜寧之間的封鎖線及平涼、固原之間的封鎖線，擊敗敵四個騎兵團的追擊，翻越六盤山高峯，過環縣，抵達陝北根據地之吳起鎮，與陝北十五軍團會師。」（註三）時爲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此時，「陝甘游擊支隊」僅殘存二千餘人，連十五軍團的七千餘人，聚集在陝北的紅軍也不過是一萬人左右（註四）。

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除指導陝北紅軍應付國軍的三次圍剿外，主要的工作在於處理陝北共黨和共軍內部的派系鬥爭，亦即解決陝北的肅反事件，據高崗說，當時中共中央「認爲這次肅反事件是完全錯誤的，所以被冤屈的同志均釋放了，給直接執行這次肅反工作的聶洪鈞、戴季英二同志以處分。」。不過，高崗認爲雖然「這時左傾路線，已被中央糾正了，但朱理治、郭洪濤的宗派主義，并未停止，且在繼續發展著。」（註五）

當時中共中央解決陝北肅反事件，只處分直接執行者聶洪鈞、戴季英二人，而對朱理治、郭洪濤不予處分，高崗對此表示不滿，他說：「這樣大的錯誤和罪過，到底誰應該負責呢？我以爲朱理治、郭洪濤應負第一等的責任，因爲朱、郭在左傾機會主義路線下，不論政治上組織上都是最主要的負責者，并在二十五軍未到之前，朱、郭就已確定了這個肅反的方針，而在肅反的全部過程中，朱、郭都是主謀者。……聶洪鈞、戴季英要負第二等的責任，因爲聶、戴不但未能絲毫制止肅反，而且火上加油，協助朱、郭擴大肅反，當時聶在前方，戴在後方，都是堅決的實際的執行肅反的人。至於其他人，都是盲從

者，但盲從者也應負一定的責任，因為他們雖是盲，但都從了，也應有責任的……」（註六）高崗在這裏不僅不滿當時中共中央不處分主謀者朱、郭二人，而且認為對盲從者不予追究也是不對的。

中共中央之所以處理錯誤，高崗認為那是中央當時受了朱理治、郭洪濤的欺騙，因此在解決陝北肅反事件時，劉志丹、高崗反而被指為右傾取消主義和對反革命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於是，中央黨務委員會的決議乃指斥劉、高犯了右傾錯誤。所以高崗憤憤不平地寫道：

「朱理治、郭洪濤在中央來了之後，把真實情形隱藏起來，想盡一切辦法，歪曲歷史，蒙蔽中央，朱理治向黨表示他曾創造了十五軍團，郭洪濤却把自己描寫成爲陝北紅軍與蘇區的創造者；另一方面，把肅反錯誤的責任完全推到聶洪鈞和戴季英身上去，中央召開保衛委員會，當時郭洪濤是參加了的，但他沒有講一句老實話。當被捕同志出獄後，中央又召開了活動分子會，在這個會議上郭洪濤還說『我是不贊成肅反的，我早就說肅反是錯了』；中央召開兩次黨務委員會討論被捕同志黨籍問題的時候，郭洪濤一再堅持的說劉志丹和我們是右傾取消主義，說我們對反革命是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使得一九三五年黨務委員會的決議中仍然說我們是有右傾錯誤的。」（註七）

對於中共中央提拔郭洪濤爲陝北省委書記及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一節，高崗尤表不滿，認爲郭洪濤以此來進行其宗派主義活動和繼續欺騙中央，高崗毫不隱諱地說道：

「當郭洪濤負責陝北省委及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時，仍在暗地裏繼續打擊陝甘蘇區過去的老幹部，說這個無能，說那個不行，說這個曾經動搖，說那個過去右傾，於是把他們連降數級，一個個壓到下層去。」

一九三七年的蘇區黨代表大會，張秀山和我都沒有出席的資格，而沒有做過什麼工作，但和郭洪濤要好的一些人却反而出席了這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郭洪濤仍是偽造歷史，欺騙中央，當時曾遭受多數同志的反對，不贊成把他的名字列入邊區黨委委員的候選名單上。這次會議之後，朱理治、郭洪濤又寫了一個關於肅反問題的解釋書，表明他們在這次肅反事件中是沒有責任的，要負這次肅反責任的僅僅是聶洪鈞和戴季英同志。并強制的要我和王世泰同志在這個文件上署名，企圖以之來達到其繼續欺騙黨的目的。其後在一九三八年中央的兩次會議上（一次在藍家坪，一次在城內），郭洪濤的態度一點也沒有改變，不講老實話，繼續欺騙黨。今年春天在棗園的座談會上，郭洪濤還是沒有絲毫自我批評精神，隱瞞了事實而吹噓他的『功績』；直到這次高幹會的發言，依然千方百計的設法隱瞞真實情況，企圖逃避自己在肅反事件中所應負的責任，這樣計算起來，郭洪濤對中央的欺騙和蒙蔽，已經不下十次了。」（註八）

高崗在分析陝北共黨內部鬥爭乃至發生肅反事件的原因時，其中特別強調徐海東的二十五軍到達陝北有決定的影響，他說：

「如果說在文安驛會議朱理治雖已提出他的左傾機會主義的路線，但因有劉志丹同志和我們的反對未能立即執行，那末，在永坪會議後，因為他得到二十五軍主要領導者和郭洪濤們的贊助，就取得了黨和軍隊的全部領導權，所以從這時起，朱理治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就統治了陝甘的黨，使三風不正發展到了頂點。」

二十五軍到來與鄂豫皖蘇區張國燾的錯誤肅反路線的影響。很顯然的，如果沒有二十五軍的到來，朱理治、郭洪濤就沒有軍事力量的依靠，就不容易發動肅反，而二十五軍當時，又是帶著張國燾錯誤肅反路線的影響到陝北的，特別是戴季英同志當時任保衛局長，就把那鄂豫皖蘇區錯誤的肅反經驗應用到陝北來了，所以二十五軍到來也是促進這次肅反事件爆發的一個很主要的因素。」（註九）

由於高崗與朱理治、郭洪濤間不斷的鬥爭，影響陝北共黨內部的團結和一致，中共中央在無可奈何下，乃於抗戰開始後的第二年（一九三八年）調郭洪濤至山東、朱理治到河南工作，以結束此一多年的尖銳鬥爭。

四、恢復黨政機構

共黨和共軍從江西突圍流竄期間，把所有黨政工作人員均作軍事編組，納入軍事系統，原有之黨政機構，名義上仍然保存，但在實際上等於取消；沿途之黨政地方工作，均由紅軍政治部和中央地方工作團負責。當中共中央和陝甘游擊支隊進入陝北瓦窯堡（屬安定縣）後，名存實亡的黨政機構，亦於此時重新恢復；在軍事方面，取消陝甘游擊支隊，又恢復了一、三軍團的番號。此時，黨政軍組織及其負責人，有許多變動，實況如下：

一、黨的組織方面

（1）中共中央

總書記

張聞天

組織部長

羅邁

宣傳部長

吳亮平(代理)

婦女部長

蔡暢

軍委主席

毛澤東

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劉少奇

白軍工作委員會書記

周恩來

白軍工作委員會副書記

張浩

(按：張浩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由俄返陝北，傳達共產國際指示，并參加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後，始分配此一工作。)

秘書長

涂振農

(2) 少共中央

書記

何凱豐

組織部長

胡耀邦

宣傳部長

馮文彬

兒童局書記

賴大超

(3) 陝甘省委

書記

郭洪濤

組織部長

郭滴人

宣傳部長

賈拓夫

職工部長

高長久

二、偽政權方面

(1) 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

主席

毛澤東

副主席

項英

副主席

張國燾

(2) 蘇維埃中央人民委員會

主席

秦邦憲

秘書長

謝覺哉

外交部長

王稼穡

財政部長

林伯渠

教育部長

徐特立

國民經濟部長	毛澤民
糧食部長	鄧發
內務部長	蔡乾
土地部長	王觀瀾
勞動部長	鄧振詢
工農檢查部長	羅梓銘
國家銀行行長	曹菊如
對外貿易局長	錢之光
國家政治保衛局長	王首道

(3) 陝甘省蘇維埃政府

主席	馬明芳
財政部長	劉景範 (劉志丹之弟)
保衛局長	吳德峯

三、軍事系統方面

(1) 中革軍委

代主席	毛澤東
-----	-----

(按：主席朱德隨張國燾之四方面軍行動)

副主席 周恩來

代總參謀長 葉劍英

(總參謀長劉伯承隨四方面軍行動)

代總政治部主任 李富春

(按：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王稼蕃，傷重未愈，後送蘇俄醫治。)

總供給部長 葉季壯

總兵站部長 楊立三

第一局局長 李濤

第二局局長 李克農

第三局局長 曾希聖

第四局局長 張經武

(2)紅一軍團

軍團長 林彪

政治委員 聶榮臻

參謀長 左權

政治部主任

羅榮桓

(3)紅三軍團

軍團長

彭德懷

政治委員

楊尚昆

兼參謀長

葉劍英

政治部主任

袁國平

(4)紅十五軍團

軍團長

徐海東

副軍團長

劉志丹

(按：劉兼西北軍委副主席及瓦窑堡警備司令)

政治委員

程子華

參謀長

戴季英

政治部主任

郭述申

四、羣衆組織方面

(1)中華全國總工會西北執行局

委員長

邵振詢(按：前任委員長爲劉少奇)

文化教育部長

蔡乾

婦女部長

劉羣先（秦邦憲妻）

（2）西北抗日救國聯合會

主任

蔡乾

組 織 部 長

吳志淵

（3）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隊部

總 隊 長

王盛榮（註一〇）

當時中共之黨政軍羣衆組織之恢復與人事之調整，須加說明及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各點：

第一，中共中央在處理陝北肅反事件時，同時也檢討了過去在江西肅反的錯誤，把執行錯誤肅反路線的責任，從毛澤東推給鄧發，因而罷黜了鄧發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調任偽蘇維埃中央政府糧食部部長，改由王首道接任保衛局長。一九三七年取消蘇維埃中央政府時，又把「國家政治保衛局」，更名「政治保衛局」，并改隸中共中央。

第二，瞿秋白於一九三五年六月，在長汀處死的消息傳至陝北後，中共中央曾檢討過去在江西時期對待知識份子的政策問題，認爲已往在「中央蘇區」所執行的「吃知識份子」的政策（即消滅知識份子政策）是錯誤的；突圍西竄時，又把許多知識份子棄置不顧，連瞿秋白也未帶走，致遭捕處死，此一錯誤應由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長羅邁負責，羅邁因而受到批評，後來并免除了他的組織部長，調任黨校校長

第三、中共中央新設的白軍工作委員會，係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通過十二月決議之後的新措施，十二月政治局會議，認為統一戰線應首重白軍工作，乃組織白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任書記，張浩任副書記，全力向東北軍進行統戰策反工作。

第四、這時，國際派在中共內部仍有深厚力量，在機構人事調整中，張聞天的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改由秦邦憲接任，張聞天專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樣一來，國際派便分享了黨政大權。毛澤東自從遵義會議翻身後，則埋頭於掌握槍桿子，他深深瞭解，要在黨內鬥爭中擊敗對手，非依靠武力不可，後來毛酋之所以能打垮國際派，造成個人獨裁，原因在此。（註一一）

五、陳紹禹再論統一戰線

此時（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以前），共黨和共軍，雖已恢復了原有黨、政、軍、羣衆組織之機構和體制，但是，與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國際代表團仍然沒有直接聯系，因而對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和中共的「八一」宣言一無所知，駐莫斯科的陳紹禹，這時爲了進一步解釋「八一」宣言和中共的新策略路線，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旬，分別爲「布爾塞維克」（俄共中央機關刊物）、「共產國際」雜誌（共產國際執委機關刊物）撰寫論文，並將這兩篇論文合編爲「新形勢與新政策」小冊子，在莫斯科印行。陳紹禹（王明）在小冊子裏詳細闡明「八一」宣言及中共抗日救國統一戰線「新政策」的根據和內容。他

這樣寫道：

「第一，中國共產黨規定新政策所根據的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條件和前提，就是中國全體人民抗日救國鬥爭的日益開展和必須把這個鬥爭組織起來。目前在中國，從階級力量對比的觀點看，有了很大的變動……所以抗日救國運動，才日益帶著明顯的全民性質……中國共產黨才決定了建立最廣大的反日統一戰線這個新政策。

第二、中國共產黨決定新政策所根據的第二種條件和前提，就是中國革命發展的基本特點……中國蘇維埃發展的第三個特點，就是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的武裝鬥爭，帶著比較長期的性質。在我們黨內，有一部份同志，對於中國革命發展過程中的這個特點不了解；因此，在近年來，有些同志時常空喊：『革命與反革命之間已經在實行最後決戰』，甚至把紅軍反對蔣○○六次圍剿的鬥爭（按：即指五次圍剿），看成是『中國發展的兩條道路——蘇維埃道路或殖民地道路——的最後決戰』，於是以為紅軍與蔣○○的六次戰爭的結果，將『決定中國是蘇維埃中國或是殖民地中國的命運』……他們把蘇維埃革命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的問題，與奪取一個或幾個省區的中心城市的問題，混淆起來。因此，他們實際上否認了蘇維埃革命已經在數省領土內獲得首先勝利的事實……。

第二，我們黨規定新政策所依據的第三種條件和前提，不僅是中國紅軍和蘇維埃勢力的增長，而且也是牠的弱點……從軍事實力的觀點看來，僅僅靠今天紅軍的力量，還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從政治趨向的觀點看來，還有很大一部分人民，因為種種關係，在今天還沒有脫離其他政權和其他

黨派的影響，他們今天還不擁護蘇維埃……。

最後，我們黨規定新政策所依據的第四種條件和前提，就是在蘇區和非蘇區，在我們的理論上和實際中所表現的錯誤和弱點，有加以糾正的必要。在我們工作中，錯誤和缺點是不少的，但是，我們的錯誤和缺點之中最重要的，都帶著左的關門主義的性質……。」（註一二）

陳紹禹在這本小冊子裏除重復「八一」宣言所提各個問題并加解釋外，特別強調中共「必須在工作各方面都起轉變」，他繼續寫道：

「自四中全會（一九三一年一月）以來，中國共產黨的總政治路線，毫無疑問是正確的。……然而這絕不是說，我們黨在政策方面沒有錯誤和弱點。……必須用十分堅決的態度，去消滅任何在國民黨區域的羣衆政策和羣衆工作中所犯的左的——關門主義的嚴重錯誤和傳統。……我現在舉出我們擬在維蘇埃區中，最近實行改革的幾部分問題：

土地政策……現在我們對於那些由勞動積蓄得到土地的小土地所有者……雖然他們自己不耕種而將土地出租……絕不沒收他們所有的土地。富農的土地及其所謂多餘的生產工具，均不沒收……。參加抗日救國鬥爭的軍人的土地，不在沒收之列……。沒收了某部份人的不應沒收的土地時，蘇維埃政府給予被沒收者以相當代價作補償。

工商業政策……要用各種辦法去獎勵私人資本投到工商業方面來，并設法幫助和獎勵私人工商業的發展……嚴格監督各級行政機關和蘇維埃公民的行動，使不得有妨礙工商業發展的行為。……不

要解散商會，而要經過商會去部分地發展蘇區的工商業……要修改我們的稅收政策，使私人的工商業有發展更大的自由等等。

在勞動問題方面……過去在蘇區裏，有些工會工作人員，有時提出一些過分的要求……現在我們提議：設法避免提出這類要求。……不實行工人監督生產的辦法。

在政治制度方面……必須將蘇維埃的根本法——憲法，加以相當的修改和補充，實行擴大人民的各種民主自由權……所有城市小資產階級分子以及一切真正參加抗日救國鬥爭的人，都有真正的公民權利……應當吸收非勞動份子（不僅資產階級出身的專家，而且其他的非勞動分子）到蘇維埃的相當機關（首先例如各級蘇維埃的工商部等等）中去工作。……在蘇區內，凡是不反對蘇維埃政權而反對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的非共產主義黨派、社會團體和羣衆組織，現在都享有一切民主權利和自由，……凡是與蘇維埃和共產黨一起抗日救國的民族革命黨派，可以選派代表參加蘇維埃政權機關……一切真正參加民族革命運動的分子，特別是小資產階級的青年，有可能來加入紅軍的隊伍。

在對外政策方面……蘇維埃外交政策反對的主要對象，應當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於其他的帝國主義國家，蘇維埃不僅應當設法去與他們建立經常的關係，而且在一定條件之下，還可以與他們聯絡一起去反對共同的敵人。……對於蘇維埃政權所及之地的外籍人員（外交、商業、文化、宗教各方面人員），不加以逮捕或拘留；對於他們所進行的業務，不加以妨害。」（註一三）

陳紹禹這篇「新形勢與新政策」和「八一宣言」，就是當年（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

「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的根據，也是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廿七日）——見毛澤東選集第一卷）報告的藍圖；當然，這張藍圖還是出諸史大林和共產國際精心設計的。

陳紹禹在這裏同時又批評了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決議和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所作報告的錯誤，即所謂蘇維埃道路或殖民地道路決戰的分析（參閱「查田運動與五中全會」一章）；另一方面又批評了中共對「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瞭解的錯誤。其實所謂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方針，是在共產國際直接指導下舉行的中共六次大會決議規定的，這一方針，以後中共雖有各種不同的解釋，但一直視爲不可變易的金科玉律。這時，由於蘇區和紅軍在南方的失敗，在陝北的危亡，已經喪失爭取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可能，乃轉向以統一戰線來挽救其敗亡，遂以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已經實現來替自己解嘲，實際是否定了中共六次大會的決議。

六、中共中央十二月決議

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國際代表陳紹禹，鑒於與中共中央關係之隔絕，爲了恢復聯系和轉達國際「七大」決議與中共新政策，乃派張浩（卽林毓英）返華。張浩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間化裝抵陝北，中共中央遂於十二月廿五日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會議，這一會議根據共產國際和陳紹禹的指示，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這是中共中央爲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一個正式的決議，決議對

「目前形勢的特點」寫道：

「目前政治形勢已經起了一個基本上的變化，在中國革命史上劃分了一個新時期，這表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為殖民地，中國革命準備進入全國性的大革命，在世界是革命與戰爭的前夜。

日本帝國主義併吞東北四省之後，現在又併吞了整個華北，而且正準備併吞全中國，把中國從各帝國主義的半殖民地，變為日本的殖民地，這是目前時局的基本特點。」

決議特別誇大蘇維埃和紅軍的「新勝利」，決議說：「日本帝國主義併吞中國的行動，正當中國蘇維埃運動轉入一個新局面的時期。自從中央紅軍退出蘇區，長江下游一些中央蘇區受到部分損失之後，現在是各地紅軍的新勝利，新根據地的創造，老蘇區以游擊戰爭的開始轉入反攻與新的游擊戰爭蓬勃發展的時期。困難的關頭已經過去了……。」

關於「黨的策略路線」方面，決議寫道：「目前的形勢告訴我們，日本帝國主義併吞中國的行動，震動了全中國全世界。中國政治生活中的各階級階層政黨以及武裝勢力，重新改變了與正在改變著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民族革命戰線與民族反革命戰線，是在重新改組中，因此，黨的策略路線，是在發動團聚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及賣國賊頭子△△△，不論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武裝部隊，什麼階級，只要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賣國賊△△△的，都應該聯合起來開展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在中國的統治，取得中國民族的澈底解放，保持中國的獨立與領土的完整。只有最廣泛的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下層的與

上層的)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共產黨應該以自己積極的澈底的正確的反日反漢奸反賣國賊的言論與行動。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戰線中的領導權……。」

決議對於「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問題，作這樣的解釋：「反日反賣國賊的民族統一戰線之廣泛的與最高的形式，就是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之組織。由於不同意蘇維埃制度與土地革命而同意反日反賣國賊的分子存在，由於政治經濟不平衡而產生的地方割據狀態，由於中國蘇維埃政權現在還只在一部份領土上勝利，此外還由於漢奸賣國賊等民族反革命爲日本帝國主義幫兇的嚴重性，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組織，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至於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行動綱領，決議重復提出「八一宣言」所標榜的十大政綱。

十二月決議，特別把中共的「蘇維埃工農共和國」改爲「蘇維埃人民共和國」，同時改變蘇維埃的各種政策，決議寫道：

「爲了使民族統一戰線得到廣大的與強有力的基礎，蘇維埃工農共和國及其中央政府宣言，把自己改變爲蘇維埃人民共和國，把自己的政策即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的政策，許多部份改變到更加適合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變中國爲殖民地的情况。」

這些政策的改變內容，主要是：「一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份子，蘇維埃願意給于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一切同情於反日反賣國賊的知識份子……都能享受蘇維埃政府的優待」，「一切白軍官長（不分官級）士兵，凡願反日反賣國賊者，都有受蘇維埃優待的權利」，「富農的財產不沒收……富農有

與貧農中農分得同等土地之權」，「對待民族工商業資本家……歡迎他們到蘇維埃人民共和國領土內投資、開設工廠商店，保護他們財產之安全」，「歡迎華僑同胞資本家到蘇區發展工商業」等等。

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共則有其不變的政策，十二月決議說：「爲了保證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黨與蘇維埃自始不變，但須更加努力更加使之適合於民族統一戰線要求的政策。就是擴大抗日紅軍，擴大抗日游擊隊，擴大作爲抗日根據地的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的領土，粉碎賣國賊軍隊進攻，肅清抗日道路，鞏固抗日後方，澈底解決土地問題，爭取工農的大多數，爭取賣國賊軍隊、日本帝國主義的士兵，向少數民族提議建立共同鬥爭的同盟，執行靈活的外交政策等等。」

關於反偏向鬥爭，決議認爲：爲了更大膽地運用廣泛的統一戰線，以爭取黨的領導權，黨必須同黨內左的關門主義傾向作堅決的鬥爭。在目前形勢之下，關門主義是黨的主要危險……當然在反對左的關門主義的鬥爭中，絲毫不要放鬆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

最後，決議提出「爲擴大與鞏固共產黨而鬥爭」，認爲「共產黨需要數十萬數百萬能戰鬥的黨員，才能率領中國革命進入澈底勝利。」「黨要團結全黨，領導最廣大的羣衆走上民族革命與土地革命的戰爭，沒有很多的很好的幹部做紐帶，是不能成功的。正確的組織路線與幹部政策，是黨完成這個任務的前提。」（註一四）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這一決議之後，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澤東在瓦密堡共黨的活動分子會上作了一個報告，題爲「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在這一報告中，毛澤東對於十二月決議作了一個解釋，并

重復了十二月決議和陳紹禹論「新形勢與新政策」的觀點，不過，關於紅軍的所謂「長征」，則特別加以強調，他說：

「差不多一年半以來，中國的三支主力紅軍都在作陣地的大轉移。從去年八月任弼時同志等率領第六軍團向賀龍同志的地方開始轉移起，接著就是十月開始的我們的轉移。今年三月，川陝邊區的紅軍也開始轉移。這三支紅軍，都放棄了原有陣地，轉移到新地區去。這個大轉移，使得舊區域變為游擊區。在轉移中，紅軍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們拿著整個局面中的這一方面來看，敵人是得到了暫時的部分的勝利，我們是遭遇了暫時的部分的失敗。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以為是對的，因為這是事實。但是有人說（例如張國燾）：中央紅軍失敗了。這話對不對呢？不對。因為這不是事實。……我們說，紅軍在一個方面（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在另一方面（完成長征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敵人在一個方面（佔領我軍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在另一個方面實現圍剿追剿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這樣說才是恰當的，因為我們完成了長征。

講到長征，請問有什麼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紀錄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總而言之，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註一五）。

中共中央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除通過決議外，並決定兩項重要措施，其一為設立白軍工作委員會，全力進行統戰策反工作；其二為加強白區工作，認為全國人民反日情緒日益高漲，救亡運動必將進一步

開展，除遵義會議後，已派潘漢年至港、滬南方工作外，應置重點於北方，決定派劉少奇至平津，組織中共中央北方局，以加強華北的白區工作。劉少奇遂於一九三六年二月，離開陝北，潛赴平津活動。劉少奇離開陝北後，其所遺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由張浩接任，全總西北執行局則改由鄧振詢負責。（註一六）

這裏必須指出：毛共中央「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所稱，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的「一二九」反日運動，係劉少奇所領導，而且是劉少奇在白區工作中策略思想正確的明證一節（參閱「遵義會議」一章之第八節），顯然係憑空虛構；「一二九」運動當時，劉少奇尚在陝北，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尚未舉行，亦未決定組織北方局，何來「一二九」運動的領導？更何來策略思想正確的明證？可是，毛共中央何以要編造這種謊言？拆穿來說，不過是毛澤東、劉少奇間互相吹捧的把戲：即是毛曾先在「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稱譽劉少奇為白區工作的模範，然後，劉少奇在「七大」會議中把毛澤東思想列入黨章，互相標榜，如此而已。

七、共軍竄擾晉西

中共中央的十二月決議，雖然強調建立反日民族統一戰線，但同時又強調反蔣，表面上是反日反蔣的統一戰線，實際上反日是空喊，反蔣則是事實，因為共軍遠離日軍，儘在後方竄擾，無異呼應日軍的侵略，所以這種假反日之名行反蔣之實的統一戰線，其為國人所反對是必然的。同時在政策的改變方面

，也與其不變的政策相互矛盾，實際上是抵消了所謂政策的轉變。因而中共在軍事上還是繼續其一貫的夾擊國軍，客觀上與日軍侵略遙相呼應的行動，共軍之竄擾晉西便是最好的例證。

一九三六年二月，陝北糧荒嚴重，中共爲解決糧荒及物資補給，乃調動共軍於二月二十晚分兩處強渡黃河，向晉西進犯：一、三、十五軍團，在中陽縣之坪上村、石樓縣之賀家凹等處，劉志丹部在磧口、軍渡附近分途強渡。二月二十二日，共軍主力渡河後，以一部東進圍攻中陽、石樓縣城，一部北向離石方面竄擾，其主力則南向隰縣方面流竄。三月八日，共軍主力到達孝義西郊，與國軍激戰三日，共軍受挫，被擊斃三千餘名，乃於三月十一日分兩股逃竄，一股北竄交城、文水、興縣、嵐縣、靜樂一帶；一股南竄靈石、霍縣、趙縣；另以一部繼續向臨汾、汾城、侯馬一帶進犯，同蒲鐵路交通遂被截斷。

此時，劉志丹部因在磧口渡河受阻，遂繞道與縣以西之羅峪口附近渡河，并南進至冀家原（離石之北）一帶，三月二十二晚，國軍夜襲冀家原，共軍倉皇應戰，損失慘重，劉志丹亦於敗退至三交時被擊斃。

三月下旬起至四月底止，國軍對竄擾晉西之共軍，展開全線反擊，在石樓之水頭，擊斃共軍千餘人，在隰縣、大寧間之午城鎮，擊斃共軍二千餘名，俘獲共軍千餘人，共軍全線崩潰。五月二、三兩日，共軍殘部乃由毛會率領分途回竄陝北（註一七）。

共軍之竄擾晉西，是爲著大量籌款和解決糧食困難與物資缺乏，因而所到之處，搶劫一空。所得物資糧秣，源源運返陝北。這種土匪式的流竄與劫奪行爲，顯然與中共當時所標榜的願與地方武裝、地方

政府談判建立國防政府抗日聯軍的號召完全相反；於是，當共軍進犯晉西時，遂以偽蘇維埃中央政府名義發表「東征宣言」，藉以掩飾其流寇之掠奪行為，「東征宣言」說：

「但救國大計，事不宜遲，因此，本政府今特主張立刻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正式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開始實行抗日戰爭的具體步驟……」。

最後本政府歡迎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在蘇維埃領土內開會，因為在蘇區內，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帝國主義的勢力都已澈底肅清，蘇區是抗日的根據地，是民族解放與獨立的模範區。」（註一八）

當共軍在晉西戰敗歸來，又於五月五日發出「回師通電」，詭稱：「因此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爲了保存國防實力，以便利於迅速執行抗日戰爭，爲了堅決履行我們每次向國人宣言，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故雖在山西取得了許多勝利，仍然將人民抗日先鋒軍撤回黃河西岸，以此行動向南京政府全國海陸空軍，全國人民表示誠意，我們願意在一個月內與所有一切進攻抗日紅軍的武裝隊伍，實行停戰議和，以達到停戰抗日的目的……。蘇維埃中央政府與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更號召全國凡屬不願意做亡國奴的團體、人民、黨派，贊成我們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主張，組織停止內戰的促進會，派遣代表隔離雙方火線，督促并監視這一主張的完全實現。」（註一九）

共黨共軍的這些「東征宣言」與「回師通電」，當然得不到任何反響，事實上共軍的竄擾掠奪，已經把自己的宣言和主張打得粉碎，所謂抗日和統戰，已經成爲共軍進攻國軍和流竄掠奪的藉口，同時這種竄擾和進攻，也破壞了國軍抵抗日寇侵略的後方，客觀上形成與日軍夾擊國軍的態勢，因而，其爲國

人所不滿和反對，是可以理解的。

共軍竄擾晉西失敗，撤回陝北後，集中全軍應付國軍胡宗南部在西線的進攻，因而瓦窯堡頓形空虛。一九三六年六月下旬，國軍的一個團乘虛突襲瓦窯堡，中共中央各機關在紅軍學校學生及保安大隊掩護下倉皇撤退，西入保安駐紮喘息（註二〇）。自七月至一九三七年一月遷入延安以前的半年內，中共中央各一級機關，即以此荒僻山區保安作爲總的指揮基地。

八、所謂民主共和國問題

由於國人對共黨言行之不滿和反對，逼使中共不能不修改其統戰策略，逐漸放棄其反蔣反國民黨的政策。一九三六年八月，中共中央在保安發出「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在這一文件裏，雖極盡宣傳詭辯之能事，但有兩點值得注意，說明中共政策的轉變，比如說：

「蔣委員長的報告，曾經對貴黨五全大會的政策作了新的解釋，說：『中央對於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領土主權的完整，任何國家要來侵害我們的領土主權，我們絕不能容忍，我們絕對不訂立任何侵害我們領土主權的協定，并絕對不容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的事實，再明白說，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時候，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蔣委員長的這種解釋是非常需要的，因爲中國人民始終不了解如何方可稱爲『和平的絕望時期』與『犧牲的最後關頭』的最低限度。」

「貴黨二中全會宣言中曾鄭重申說：『禦侮之先決條件，乃在集中一切救國力量於中央指揮之下，齊一其步調，鞏固其陣線，故禦侮救亡需求統一與紀律，實爲不可動搖的鐵則，而軍政軍令之統一，尤爲近代國家之最低限度。』我們完全承認爲了發動全國人民的最大抵抗力量，是絕對必要的。」（註二）

近十年來，中共在文件裏稱呼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領袖爲蔣委員長，并承認國民黨的禦侮救亡政策與軍政軍令之統一，這還是第一次，由此足證中共在無可奈何下，正逐步修改其錯誤的統戰政策了。

到了九月，由於中共所提議的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得不到朝野的同情與贊助，同時中國國民黨爲了集中力量，準備抗日，正積極組織國防會議及籌備召開國民大會，在這一情勢下，中共的所謂統一戰線主張，也由強調組織國防政府，進而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了。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了「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詳見附錄），決議說：

「爲著集中全國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略，驅逐日寇出中國，我們不僅要取得更廣泛的民衆的力量，和一切真正革命的、覺悟的純潔份子，而且要爭取統治階層中一切可能的部份到抗日鬥爭中來，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加擴大起來，更加增強自己的陣容與力量。推動國民黨南京政府及其軍隊參加抗日戰爭，是實行全國性大規模的抗日武裝鬥爭之必要條件。……」

「中央認爲在目前形勢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口號之必要，因爲這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來保障中國領土完整和預防中國人民遭受亡國滅種的慘禍的最好方法，而且這也是從廣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

產生出來的最適當的統一戰線的口號，是較之一部份領土的蘇維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因此中國共產黨宣佈積極贊助民主共和國運動。并且宣佈民主共和國在全中國建立，依據普選權的國會實行召集之時，蘇維埃區域即將成爲他的一個組成部份，蘇區人民將選派代表參加國會，并將在蘇區內實行完全同樣的民主制度。」

然而，在同一決議中，同時又提出了許多完全爲中共自己打算及限制統一戰線的論點，決議說：

「加強中國共產黨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政治領導作用，極大的鞏固蘇維埃紅軍，同一切喪權辱國及削弱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言論行動進行堅決的鬥爭，我們才能推動國民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給民主共和國的實現準備前提。」

「中央認爲必須及時糾正以爲階級鬥爭的發動會妨礙民族統一戰線的觀點。」

「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實現民主共和國的鬥爭過程中，絕對不應該削弱蘇維埃紅軍的力量。」

……即在民主共和國建立之後，共產黨也決不放棄對於蘇區人民與原有武裝力量的絕對領導。」

從這些文件與決議看來，中共的統戰政策雖有若干改變，但其基本出發點，還是以中共自己一黨一派利益爲前提，以蘇維埃和紅軍的擴大與鞏固爲目的，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過是適應當時形勢的謀略手段而已。

九、高崗被殺的禍根

從陝北邊區共黨內部鬥爭看來，與其他地區共黨內部鬥爭的規律并無二致。那就是鬥爭的本質是權力的爭奪，鬥爭的藉口是機會主義，鬥爭的勝負取決於武力，鬥爭的殺手鐮為肅反，即以血腥的屠殺而終場。陝北是如此，過去在「中央蘇區」及其他各邊區也莫不如此。因此，高崗在分析陝北發生肅反事件的原因時，歸罪於張國燾錯誤肅反路線的影響，這種說法是值得研究的。因為：

第一、既然中共自稱他們的黨是從內部鬥爭中壯大起來的，那麼，不斷的鬥爭便成爲中共發展的規律，肅反屠殺則是鬥爭的最高形式和手段。因而，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暴動之後，中共對內對外的肅反屠殺便劇烈起來了，瞿秋白的盲動主義的燒殺是如此，毛澤東在江西的肅反屠殺亦復如此，這不是這一邊區肅反影響另一邊區的問題，而是中共嗜殺的傳統。

第二、如以各個蘇區肅反的先後來研究，毛澤東在富田的肅反屠殺（參閱「國共兩黨的地下鬥爭」一章）是在一九三〇年十月至十二月，其他蘇區（包括張國燾領導的鄂豫皖邊區和賀龍的湘鄂西邊區）的肅反屠殺都是在，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間，這是不是說毛澤東的錯誤肅反路線影響了其他所有蘇區呢？如果照此「影響」來推論，那麼，紅二十五軍政治委員程子華是由「中央蘇區」派至鄂豫皖邊區的，是不是程子華帶了毛澤東的錯誤肅反路線到了二十五軍，然後又帶到了陝北，因而發生了陝北的肅反事件呢？

第三、徐海東、程子華的紅二十五軍，尙未竄抵陝北以前，陝北共黨內部就有過長期的鬥爭，高崗說「并在二十五軍未到之前，朱、郭就已確定了這個肅反的方針」，而且在郭洪濤、朱理治未到陝北之

前，也發生過肅反事件，據高崗自己說，他曾把黃子文等關起來進行考查，實際就是肅反鬥爭，似此，高崗、劉志丹對黃子文等的肅反路線，又是從何處「影響」而來呢？

誠然，高崗在陝北共黨內部鬥爭中最後是勝利了，他的報告得到了批准。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關於高幹會對邊區黨歷史問題檢討的決定」這樣說：「關於陝甘寧邊區黨在中央未到達前內戰時期的歷史問題（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以前），西北局完全同意和批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高幹會檢討的基本精神及高崗同志對此問題所做的報告。並決定陝甘寧黨各級組織全體幹部和黨員，應將高崗同志關於邊區黨歷史問題檢討的報告，做為整頓三風的重要文件之一，進行深入的研究與討論。」（註二二）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也作這樣的記述：「一九三五年秋，犯左傾錯誤的朱理治同志以中央代表名義到達陝北革命根據地（包括陝甘邊和陝北），同原在那裏的犯左傾錯誤的郭洪濤同志結合，將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貫徹到政治、軍事、組織各方面工作中去，並排斥執行正確路線的，創造了陝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劉志丹、高崗等同志。接著又在肅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極端錯誤地逮捕了一大批執行正確路線的幹部，造成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嚴重危機。十一月，黨中央經過長征到陝北，糾正了這個左傾錯誤，將劉志丹、高崗等同志從監獄中釋放出來，因而挽救了陝北革命根據地的危險局面。」（註二十三）

可是，從高崗的報告看來，他對於當時中共中央處置陝北肅反事件是不滿的，也就是說他不滿中共中央不處分朱理治、郭洪濤、徐海東、程子華，反而指責高崗、劉志丹為右傾機會主義和腐朽的自由主

義。中共中央當時何以採取此一措施，研究起來，不外兩點：

第一、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所率領的陝甘游擊支隊，到達陝北時僅殘存二千餘人，這支殘兵，必須依托陝北邊區和當地土共始能生存發展，因此，對於陝北內部鬥爭處理的基本原則是調解和安撫，避免分裂，一面釋放劉志丹、高崗等人，同時又給予批評；一面處分聶洪鈞、戴季英，而又重用郭洪濤、徐海東，這顯然是毛澤東一打一拉籠絡雙方的權謀。

第二、鑒於四方面軍分裂的教訓，對於原屬張國燾的徐海東部，不能不慎審處理，不僅不敢以執行錯誤肅反路線批評或處分十五軍團首長，而且毛澤東還親赴前線會晤徐海東，予以安撫和鼓勵，同時還發給了十五軍團一部電台（註二四）。這當然又是毛澤東搶「槍桿子」建立個人武力的手段。

當然，高崗這種粗人，對於毛澤東的這些巧妙手法和權謀是不能理解的，因而在高幹會的報告中，對中共中央作了若干批評。這些批評顯示了高崗濃厚的英雄主義色彩，他以陝北蘇區紅軍創造者的高功自居，并以唯一正確路線的代表者自負，似乎中共中央和各方面的紅軍，都因失敗而不能不依附陝北蘇區而生存，否則都將敗亡，這就是後來（一九五四—五五年）「高、饒反黨聯盟」所謂「根據地和軍隊的黨」和「白區的黨」思想的來源。因而後來高崗強調中共是軍隊創造的，并自認爲是「根據地和軍隊的黨」的代表人應當掌握主要的權力，即應由其担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副主席，以及國務院總理。高崗這種英雄主義，當然不能見容於唯我獨尊的毛澤東，這也就是後來高崗被毛澤東逼殺的禍根。

十、「長征」與流寇問題

中共中央十二月決議和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都特別強調了所謂「長征」的勝利，說敵人在實現圍剿追剿計劃方面是失敗了，「長征是以我們勝利，敵人失敗的結果而告結束」。毛澤東甚至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於今，歷史上曾有過我們這樣的長征麼？」，「十二個月光陰中……長驅二萬餘里，縱橫十一個省……」等等（註二五）。然而，細加研究，所謂「長征」是否如毛澤東所說真的勝利呢？

第一、江西的「中央蘇區」和其他邊區共七個蘇區，皆因共軍的撤離流竄（即所謂「長征」）而全部瓦解和失敗，留守各邊區的游擊隊大都被消滅，共黨幹部和黨員大批遭捕或投誠，這是「長征」結果之一。

第二、所稱三十萬紅軍，絕大部份被消滅。紅一方面軍七萬人，殘存二千餘人到達陝北；紅四方面軍八萬人，到達陝北時僅有一萬三千人；紅二方面軍二萬人，竄抵陝北時亦僅殘存二千人。所稱三十萬紅軍，在陝北會合時（包括陝北的二十六軍，鄂豫皖的二十五軍），總共只剩下二萬餘人，這是「長征」結果之二。

第三、紅一方面軍原定西竄湘西重建根據地，結果因國軍的追剿堵擊而取消；接着打算在黔北再建基地，又因國軍的圍剿而落空；到了川西，本想建立川陝甘根據地，也因紅一、四方面軍的分裂而打消

，被迫北竄陝甘。紅四方面軍南下創建川康邊區失敗，西入西康及北進甘肅走廓均同遭失敗。這就說明：不是國軍在圍剿追剿計劃方面的失敗，而是共黨共軍流竄計劃的失敗。這是「長征」結果之三。

由此可見，所謂「完成長征計劃的方面」是一套謊言，共軍之流竄係被逼逃跑，既無一定的目的，更無所謂「長征」計劃，可說是流寇式的逃跑和逃命，此之謂勝利，只能說是阿Q的勝利（註二六）。

其實，在中國歷史上，若干流寇的竄擾，遠較毛澤東的「長征」有聲有色。就以中共稱譽為農民革命的黃巢來說，他於西元八七五年（唐僖宗乾符二年）聚眾起事，曾經兩出山東，四處竄擾，至八八〇年（廣明元年），佔據長安，建立齊國，自稱皇帝；其後雖於八八四年（中和四年）失敗自殺，但其鼎盛時期兵力多達六十萬，流竄時間共十年，所經地區十一省，行程何止二萬五千里，且屢陷重要城鎮，乃至據長安稱帝，較之毛澤東率部專走荒僻山野，處處逃跑躲命，真有天壤之別。他如明末之李自成、張獻忠（註二七）等等，更是毛澤東的「長征」所望塵莫及，安能說「長征是歷史紀錄上的第一次」？

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中共一再稱讚黃巢、李自成、張獻忠的竄擾為農民起義，與中共的農民土地革命相類似，不過中共批評他們沒有建立根據地，因而最後遭受失敗。如果說，毛澤東思想還雜有中國的傳統，那麼，只能說是這些流寇思想的遺傳；遠在一九二九年，毛澤東就承認了這一事實：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上杭古田召開了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這次會議是毛澤東鬥爭朱德的大會，會議決議揭發了紅四軍的流寇思想（註二八）。可見共黨共軍的流寇思想來源已久，而毛澤東的所謂「長征」，不過是流寇思想的流傳與發展而已。

誠然，中國歷史上的流寇是失敗了，而毛澤東這支流寇却僥倖地竊據了大陸，究其原因，不外是日寇的侵略中國，予中共渡過難關挽救覆亡的機會，同時俄共的全力支援，為共軍竊據大陸提供了充分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力量；否則，毛澤東將與黃巢、李自成、張獻忠等同其命運而失敗。

當然，不可否認的，毛澤東與黃巢等流寇，有其相同之處亦有其不同之點，那就是流寇本質是相同的，不同的是毛澤東這支流寇注入了馬列主義的毒素，也正因為如此，共黨共軍乃能取得俄共的援助而竊據了大陸。

十一、統一戰線的真義

關於中共的統一戰線，劉伯承曾經這樣說：「紅軍長征到達陝北之後，黨中央、毛澤東同志才獲得可能系統地闡明政治策略方面的問題。瓦窖堡會議（按：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是一次極關重要的會議。會後毛澤東同志又作了『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這個報告，不但規定了當時黨的政策，系統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問題，而且總結了兩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根本經驗，規定了黨在民主革命時期的根本路線。」（註二九）好像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毛澤東提出的。

其實，如果從共產國際「七大」決議、「八一」宣言、陳紹禹的「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及「新形勢與新政策」來研究，顯然中共十二月決議和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的報告，都是「七

大」決議與陳紹禹觀點的重複，中共中央與毛澤東不過是在共產國際指揮棒下旋轉而已；後來爲了神化毛酋，才把倡議統一戰線的功績記在毛澤東賬上，這當然又是偶像崇拜與篡改歷史的必然結果。

當共軍流竄期間，共產國際和陳紹禹，何以在莫斯科迫不及待的代中共中央發表「八一宣言」？究其原因，固然由於日寇的侵略和共黨共軍長期在山區流竄，與外界隔絕，不知世界大勢，無從提出政治主張；但最主要的還在於爲中共開闢一條生路。當時共黨共軍的失敗形勢說明，如果固執蘇維埃道路和叛亂政策，其最後的完全失敗已經非常明顯；共產國際爲順應形勢的發展，乃爲中共開出了統一戰線的藥方，這樣才把中共從死亡邊沿拯救出來。

如果細看張浩（林毓英）的講演，就不難瞭解統一戰線對於中共的妙用。張浩曾經在「抗大」講授「中共黨的策略路線」，這一講稿，同時又道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眞義，他說：

「民主共和國是我們的戰略口號。停止內戰聯合各黨各派是我們的策略口號。」

民主共和國是我們的戰略口號，是各黨各派所願意要的，聯合各黨各派，才能孤立國民黨。用民主共和國，才能推翻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政權國民政府。利用民主共和國才能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以期社會主義社會的實現。到民主共和國實現的時候，我們黨就可公開活動或半公開活動，以無孔不入的手段來組織羣衆、影響羣衆及爭取羣衆，以擴大強壯無產階級革命的軍隊和後備軍，以待必要時，而實行無產階級的專政，以到社會主義社會之實現。

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救亡，是中國各階層及一部份軍閥，均是願意的。……以抗日救亡的策

略口號來號召全國，是那一個人都不能反對的，就是反革命中的不滿，他也是說不出的。我們黨假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才能停止及消滅蔣○○的向紅軍的進攻，而蘇維埃紅軍才能得到休息、整理、補充及擴大。能得一天的停止進攻，我們就有一天的收穫，我們就強大一天。而反革命統治就削弱一天，就分裂的加劇一天。我們黨在抗日的策略下，來把持、利用各黨派各軍的矛盾，來分裂他們，中立他們，引誘他們，爭取他們到革命方面來。我們假抗日救亡的號召，來分化削弱和消滅反革命勢力，等到革命情緒到了最高潮時，我們黨即以迅速的手段，來實現無產階級專政，而完成社會主義的革命。」（註三〇）

關於民主共和國決議的作用，張浩繼續寫道：

「甲、中國無產階級想達到社會主義的終極目的，必須建立中華蘇維埃。在目前形勢之下，想中華蘇維埃之實現，必須先促成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要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就是無產階級過渡的台階。

乙、祇有民主共和國，才能得到普選直接選舉，用不記名的投票，成立真正的國民大會，中國共產黨才能參加國會，才能在國會內外活動，而必定的能獲到勝利。這個勝利最重要的條件，就是國民黨的一切的一切，均無組織，雖有組織亦不過形式而已，我們黨在各色各樣的組織上，必能戰勝他，消滅他的。

丙、祇有幫助資產階級，建立民主共和國，才能消滅封建殘餘，才能普遍的擴大的宣傳中國共產黨

的主張。

丁、祇有極力贊助完成民主共和國，才能將國民黨的陰謀黑幕等揭破宣傳，使階級的利益階級的仇視才能尖銳化，才能迅速的必要的實現蘇維埃政權。」（註三一）

張浩對於中共何以強調抗日，它有這樣的分析，他說：

「中國共產黨看到現在的事實如下：

一、抗日可以得到國人的同情可以分散和緩和敵人的進攻，在這個條件下，可以爭取廣大的羣衆，可以擴大紅軍，可以進行加強黨的組織。

二、在革命情緒低落及力量縮小的現在的時候，只有抗日才能保存實力，才能擴大實力。

三、只有抗日才能擴大帝國主義者間的衝突，才能有利中國及世界革命。

四、只有抗日才能保護蘇聯，因蘇聯是無產階級的祖國，是世界革命的根據地，就要保護他。

共產黨看見現在的條件，只有退守才能繼續革命，才能實現社會主義革命：

一、以退爲進的策略，而與國民黨妥協。

二、中國人不管貧富各階層，均願抗日，不願要蘇維埃，中國共產黨在這種情形之下只有抗日，在抗日之下，進行加強黨的組織，增加人民革命的情緒，壯大前方軍，組織和訓練後備軍，以待新的時機，新的條件到來。……」（註三二）

這些就是張浩對統一戰線的詮釋。張浩曾經被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國際代表團派返中國，向中共中央

傳達統一戰線的新政策，同時又是中共中央的負責人（白軍工作委員會副書記及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他的講稿不但可信而且應該是「正解」。

從張浩的解釋中，不難瞭解「八一宣言」、十二月決議、東征宣言、回師通電、致國民黨書乃至關於民主共和國決議等等文件的作用所在，同時也足以辨別中共當時所強調的抗日救國是不是一個幌子，想來已不必再作解釋了。

註一：高崗「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七、十八兩日高崗同志在陝甘寧邊區黨高幹會上的講演），一九四三年六月西北局印發（黨內文件、高幹會文獻之四）。

註二：徐海東「會師陝北」——「星火燎原」二〇—二三四頁。

註三：劉伯承「回顧長征」——「星火燎原」一一頁。

註四：「剿匪戰史」第十一冊九七三頁。

註五：同「註一」

註六—九：同「註一」

註一〇、一一：此為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據陳先生稱，此時彼雖不在陝北，但當他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隨張國燾、朱德到達保安後，即瞭解前此恢復組織與人事調配情形，惟其中若干細節則係轉據蔡乾先生所提供者。

註一二、一三：陳紹禹「新形勢與新政策」，一九三六年莫斯科出版。

註一四：「中國共產黨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一冊，延安解放社出版。

註二五：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一四四—一四五頁。

註二六：此為陳然先生轉據蔡乾先生所提供之資料。據蔡先生稱：當時彼任西北抗日救國聯合會主任（為反帝同盟改組而成），此一機構與劉少奇之職工運動委員會及全總西北執行局設於同一處所，故對劉少奇離開陝北（瓦窰堡）期間有確切之瞭解。

註二七：取材於「剿匪戰史」第十一冊九八三—九八九頁。

註二八：「東征宣言」即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關於召集全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通電」——「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一冊。

註二九：「回師通電」即「中華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中國人民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於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所發「停戰議和一致抗日通電」——「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一冊。

註三〇：陳然先生轉據蔡乾先生所提供之資料。另據「剿匪戰史」第十一冊九九四頁載稱：「二十三日（六月）第一零五師劉多荃部進抵瓦窰堡以南之黑山寺，與匪軍展開激戰，經我軍奮勇進攻激戰終日，始將匪軍擊潰，於（二十三日）十四時許，確實佔領瓦窰堡，殘匪西竄。」

註三一：「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一冊。

註三二：同「註一」。此一「決定」刊載於該「文獻」之第一頁。

註三三：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第一〇〇〇頁。

註三四：徐海東「會師陝北」——「星火燎原」二二三頁。

註三五：毛澤東「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一四五頁。

註二六：「阿Q」是魯迅小說「阿Q正傳」之主角，這位主角在任何失敗情形下，都說是自己勝利，被人揪住小辮子，在壁上碰了四五十個響頭，或者被人打倒在地，也說是「兒子打老子」，自己勝利了。

註二七：明末流寇李自成，於一六二八年（明思宗崇禎元年）自陝北聚眾作亂，自稱「闖王」率部竄擾晉、豫、湖

廣、巴蜀等地，焚戮至慘。一六四四年（崇禎十七年），稱王於西安，僭號大順，擁兵百萬，旋經山西攻佔北京，一六四五年失敗自殺。張獻忠爲明末陝北流寇，後與李自成股合流，竄擾長江流域，大肆屠殺，一六四四年入川陷成都，自稱大西國王，一六四六年兵敗被捕殺。

註二八：○毛澤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九七頁。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中共在北平出版「戰報」第六期（由「鬥爭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籌備處」所主辦的刊物），以「大軍閥大野心家朱德的滔天大罪」爲題，攻擊朱德五大罪狀，其中指斥朱德：「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以前，朱德積極倡導舊軍隊的資產階級軍事思想來建設紅軍，竭力反對毛澤東的軍事路線，同毛澤東路線唱反調。毛主席政治掛帥軍事，朱主張單純軍事觀點，認爲『黨管得太多』，『黨代表權力過大』，提出『黨只管一部份』，『軍政並重』，『司令部對外，政治部對內』；毛主席紅軍三大任務，朱主張軍隊只能打仗，打仗只靠軍隊；毛主席建立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朱主張流寇主義，想用流動游擊的方法，走州過府，去擴大政治影響，以配合城市起義，奪取革命的勝利；毛主席擴大地方赤衛隊，由地方紅軍擴大爲主力軍，朱主張『招兵買馬』，『招降納叛』；毛主席軍政一致，瓦解敵軍，寬待俘虜，朱主張打罵用刑和槍斃逃兵，提倡『軍官權威高於一切』。

一九二九年六月，在紅軍第七次代表大會上，朱德利用一部份對資產階級路線認識不清的人，來反對毛澤東的軍事路線，排擠了毛澤東路線。會後，朱德率領紅軍二、三縱隊向閩中進軍，分兵冒進，又一次使紅軍遭受嚴重損失。回來以後，在朱德主持下召開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繼續反對毛澤東，使其錯誤發展到最高峯，並引起分裂。會後，朱德再率紅軍主力向廣東冒進，再次遭受了嚴重損失……。「戰報」所載不無誇過他人，吹捧毛酋，羅織罪名，打擊朱德之嫌。但早期朱毛間之鬥爭與分裂則是事實，同時也說明，共軍一開始就走流寇的道路。

註二九：劉伯承「回顧長征」——「星火燎原」——一頁。

註三〇：張浩（林毓英）：「中共黨的策略路線」（一九三七年春在「抗日軍政大學」的講稿）四至五頁——一九四一年三月，重慶中央調查統計局翻印。

註三一：同上書五二—五三頁。

註三二：同上書二七—二八頁。

附錄：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通過）

（一）日本帝國主義自去年策動華北獨立以來，對於中國的侵略，沒有一刻停止的。不論它侵略的方式與方法怎樣跟着具體的情況變化而變化，然而它併吞全中國的基本政策是始終不變的，在華北進兵之後，高唱着的「經濟提攜」，實際上不過是以經濟的侵略方法鞏固已得的陣地，並給新的進攻準備基礎。平、津與察北的增兵，綏東的進攻，成都、北海、海口、上海、豐台等地的挑釁，表示出日寇的新侵略行動又將開始。民族危機較之過去是更加嚴重了。這指出保衛華北，保衛西北，保衛中國，收復東北失地，驅逐日本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的任務，更加嚴重的放到革命政黨與全民族身上了。

（二）一年來全中國抗日救亡運動的廣大發展，抗日統一戰線的開始發動，已經給了日寇侵略計劃以相當的打擊，暫時的阻止了日寇建立華北國與建立「防共統一戰線」的實施，這是中國人民一年來抗日救亡運動的勝利。然而由於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還不够廣泛，它的力量還不够雄偉，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有組織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現時還僅在開始的階段，最大的政黨——國民黨及其領導與影響下軍隊還沒有參加這個戰線，國民黨的政策還沒有基本的轉變，因之，民族革命戰爭還沒有能够發動，以致我們不但沒有能够停止日寇的繼續侵略與保持中國領土主權的再不受到損

害，而且日寇還鞏固了它在華北的地位，獲得了對中國領土主權的新侵佔，並準備新的大舉進攻。這證明日本帝國主義是能够戰勝的，但是需要全中國各黨、各派、各軍、各界的共同行動與艱苦卓絕的奮鬥。

(三)在日本帝國主義不斷進攻之下。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現在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了，這主要的表現在全國工、農、小資產階級廣大羣衆抗日救亡運動的繼續增長，中國共產黨、蘇維埃、紅軍抗日救國主張的得到全國廣大人民的贊助，與全國主力紅軍的集中於西北抗日前進陣地，一部份民族資產階級的開始轉向抗日陣線，國民黨軍隊官兵中廣大成份抗日情緒的增長，和在這些基礎上產生的搖擺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與其各派間關於抗日問題上的爭論，明顯的表示出它現在是在動搖的中間，在日寇繼續進攻，抗日救亡運動繼續發展，國際形勢新的變動等條件之下，國民黨、南京政府有縮小以至結束其動搖地位，而轉向參加抗日運動的可能。

(四)爲着集中全國力量去抵抗日寇的侵掠，驅逐日寇出中國，我們不僅要取得更廣泛的民衆的力量，和一切真正的革命的、覺悟的、純潔的份子，而且要爭取統治階層中一切可能的部份到抗日鬥爭中來，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更加擴大起來，更加增強自己的陣容與力量。推動國民黨南京政府及其軍隊參加抗日戰爭，是實行全國性大規模的抗日武裝鬥爭之必要條件。但這絕對不應放鬆對於國民黨南京政府一切違反民族利益的錯誤政策的嚴厲批評與鬥爭。只有這樣，才能使國民黨南京政府內部的抗日傾向日漸發展，擴大抗日份子的影響，克服其本身的動搖，戰勝親日派，而走向抗日救國的大道。中央必須着重指示：共產黨在爲着實現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鬥爭中，不但對於統一戰線之公開的或秘密的敵人應該進行嚴重的鬥爭，而且對於口頭上贊成而實際消極的假抗日份子以及各種各樣的同盟者，應該保持批評的完全自由，同時中國共產黨贊助一切真正的抗日戰爭之發動，即使這種發動是部份的。但主要的，應用盡一切方法與力量，最迅速的促進大規模的全國性的真正對日武裝抗戰。爲此目的，共產黨應繼續堅持「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口號，反對一切民族危亡面前自相殘殺的內戰。

(五)中央認爲在目前形勢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國口號的必要，因爲這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來保障中國領土完整和預防中國人民遭受亡國滅種的慘禍的最好方法。而且這也是廣大的人民的民主要求產生出來的最適當的統一戰線的

口號，是較之一部份領土上的蘇維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較之全中國主要地區上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大大進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戰爭的普遍發動與徹底勝利。同時，民主共和國不但能够使全中國最廣大的人民羣衆參加到政治生活中來，提高他們覺悟程度與組織力量，而且也給中國無產階級及其首領共產黨爲着將來的社會主義的勝利而鬥爭以自由活動的舞台。因此中國共產黨宣佈積極贊助民主共和國運動。並且宣佈民主共和國在全中國建立，依據普選權的國會實行召集之時，蘇維埃區域即將成爲它的一個組成部份，蘇區人民將選派代表參加國會，並將在蘇區內完成同樣的民主制度。

(六)中央嚴重指出：只有繼續開展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運動，擴大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加強中國共產黨在民族統一戰線中的政治領導作用，極大的鞏固蘇維埃與紅軍，同一切喪權辱國及削弱民族統一戰線力量的言論行動進行堅決的鬥爭，我們才能推動國民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才能給民主共和國的實現準備前提。沒有艱苦持久的鬥爭，沒有全中國人民的發動與革命的高漲，民主共和國的實現是不可能的。中國共產黨在爲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的過程中，應該使這個民主共和國從實行本黨所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開始。一直到中國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基本任務徹底的完成。

(七)去年十二月中央政治決議上所確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大半年來黨在執行這一路線下，雖然得到了許多成績，主要的在於蘇維埃紅軍的力量是加強了，黨在全國的政治影響是擴大了，向各黨各派各界各軍進行統一戰線的工作是進步了，這些成績應當成爲今後工作的有利的基礎。許多黨的組織極不善於具體的運用統一戰線的策略，對於每一個人，每一個派別，每一個社會團體，每一武裝隊伍，每一階級與階層，常常不善於根據他們不同的情況，不同的需要與要求，在抗日救國的總方針下，同他們接洽協商談判，以求訂立各種地方的，局部的，暫時的，或長久的，成文的，或口頭的這種具體實際的行動綱領，並在爲着實現這些綱領的共同鬥爭中，引導推動與組織他們走向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最高形式——全國抗日救國代表會議（或國防會議），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以至民主共和國，我們許多黨的組織不善於這樣做，而僅僅滿足於一般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滿足於少數先進份子的活動，以抽象

的刻板的與機械的方法方式去對付各個具體的問題，同時在統一戰線一時不能建立的場合，却又表現出：共產黨員以共產主義精神來教育羣衆，動員羣衆與組織羣衆的獨立工作之放鬆或不足。這些弱點，是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直到今天還沒有成爲千千萬萬抗日大衆實際參加的主觀上的重要原因。

(八)中央認爲必須及時糾正那種以爲階級鬥爭的發動會妨礙民族統一戰線的觀點。民族革命的勝利決不是少數上層份子所能完成的，不吸收成千百萬工人農民與小資產階級羣衆參加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來，就不能形成抗日救國的雄厚力量，就不能推動以逼迫動搖的遊移的上層份子與當權者走向真正抗日的道路，就不能實現民主共和國，而領導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羣衆的日常經濟政治的鬥爭，解決他們迫切的生活要求，是組織他們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要關鍵，但在這種領導日常經濟政治的鬥爭中，共產黨員要同樣的善於運用統一戰線的策略，吸收最廣大的羣衆到鬥爭中來，并根據於他們覺悟的程度，與組織力量，把羣衆日常鬥爭提到更高的階段，使這種鬥爭成爲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繼續擴大，繼續發展與繼續前進的力量，成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堅決的基礎。

(九)在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實行民主共和國的鬥爭過程中，絕對不應該削弱蘇維埃紅軍的力量。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是蘇維埃與紅軍在一定綱領上同其政權及武裝力量所成立的政治軍事協定，但并不與其他政府及武裝力量相混合，可以在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統一指揮之下，但并不取消蘇維埃紅軍組織上的獨立性，須充分注意於紅軍的擴大與鞏固，那種不經過選擇允許學生及其他軍隊的舊軍官加入紅軍的意見是錯誤的，因爲這樣足以破壞紅軍的統一和團結。必須充分注意加強蘇維埃的領導成分，那種允許資產階級參加蘇區政治管理的意見，也是錯誤的，因爲他們可以從內部來破壞蘇維埃機關。即在民主共和國建立之後，共產黨也決不放棄對於蘇區人民與原有武裝力量的絕對的領導，相反的，黨在堅決領導全中國人民羣衆抗日鬥爭與日常經濟政治鬥爭要堅持着擴大與鞏固自己的政治與軍事的力量，保障抗日戰爭與民主共和國之徹底的勝利，爭取社會主義前途的實現。

(十)擴大與鞏固共產黨，保障共產黨政治上組織上完全獨立性，和內部的團結一致性，是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民主共和國得到徹底勝利的最基本條件。因此在蘇區內特別在非蘇區內有系統的徵收黨員是非常必要的，但必須避免大批

入黨的辦法，而只吸收經過考察的工人農民與革命知識份子入黨。在這個意義上去年中央十二月決議中「一切願意爲着共產黨的主張而奮鬥的人，不問他的社會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產黨」與「黨不怕某些投機份子侵入」的意見是不正確的。黨的各級領導機關必須採取實際辦法培養黨的工作幹部，因爲不論在蘇區與非蘇區，在澈底實現黨的政治路線上，有獨立工作能力的優秀幹部有着決定一切的意義。動員成千成萬的共產黨員到一切無組織與有組織的羣衆中去爭取千百萬的羣衆在自己的周圍，正確的建立公開工作與祕密工作的聯系，是中國共產黨在爲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偉大政治面前一刻不可放鬆的任務。在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的過程中，對於忽視黨的政治上與組織上的獨立性，忽視鞏固蘇維埃與紅軍，放鬆對於廣大下層羣衆的日常經濟政治鬥爭的領導。對同盟者批評不夠等等右的機會主義傾向必須及時的給予糾正，但在目前說來「左」的關門主義傾向，依然是澈底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的主要危險。正確的黨內思想鬥爭的發展，將是完成黨的一切政治任務的有力的武器。

（錄自延安解放社出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一冊）

第二十六章 共軍的流竄與會合

一、張國燾率部南下

張國燾與毛澤東分裂後，於一九三五年九月下旬，率領紅四方面軍的五個軍（即四軍、九軍、三十軍、三十一軍、三十三軍），及紅一方面軍的兩個軍團（即第五軍團、第九軍團、合共殘存三千人）共六萬餘人，自松岡、卓克基、梭磨、馬塘一線，分兩路沿大金川兩岸南下。在南下之初，并將部隊番號加以變更，將一方面軍之五軍團改稱第五軍，九軍團改稱第三十二軍，一以統一番號，一以避免四方面軍之第九軍與一方面軍之九軍團番號混淆重複；同時成立騎兵部隊，以適應草原作戰，派許世友爲騎兵總指揮（註一）。

張國燾之南下部署，與進攻路線，係以四軍、九軍、三十軍、三十三軍爲左翼，向撫邊、懋功、寶興進擊。十月中旬攻佔上列各縣後，直趨天全、蘆山，十一月九日至十四日，攻陷天全、蘆山、名山各縣。另以五軍、三十一軍、三十二軍組成右翼軍，於十月八日在靖化之北渡過大金川，旋沿河南下，十二日陷靖化，十三日佔獨松、崇化，十六日陷丹巴并進佔奎庸、金湯，逼近瀘定。至此，沿雅河之北及大金川西岸廣闊地區盡爲共軍佔領。（註二）

十一月二十三日，由天全南渡雅河之共軍攻佔榮經，形成圍困雅安態勢，一時震動成都。「剿匪戰

史」紀述當時的情勢說：「自榮經失守，洪雅告急後，成都由是吃緊，蓋因榮經距成都雖有四百三十里，因川康公路交通便捷，若匪軍冒死南竄，不難一日百里，故成都民衆異常恐慌。」（註三）

其實，紅四方面軍的南下，正遭遇極大的阻力和困難，據鄭維山（時任紅三十軍八十八師政治委員）紀述當時的困難情形說：「四川軍閥得悉我孤軍南下，糾集了五十多個團，北起懋功層層佈防。敵人把懋功通往寶興之間的棧道（註四）拆去了木板，并且把棧道的許多橫木鋸壞了，以此防止我軍向岷江以西的邛崃、大邑地區推進。我軍在強敵面前，以兩經草地疲憊之師攻佔懋功後，攀過被破壞了的棧道，翻越夾金山——大雪山，打下了寶興縣城。這次戰役，雖然殲敵約四個團，可是當我軍順河而下，進入雅（安）名（山）地區時，又遇到了敵劉湘、楊森、李抱冰、劉文輝等部四十多個團。他們固守着有縱深配置的碉堡封鎖線，阻擊我軍向邛崃、大邑迫近。我軍遂在百丈關一帶，與敵展開了惡戰……這樣的惡戰，整整持續了兩天兩夜。」

百丈關戰鬥的結局……殲滅不了敵人的有生力量，打不開局面，最後只好退出了這場拚消耗的惡戰……我軍在懋功、寶興、天全、蘆山等地瘠民貧的縣內，兵源、補給都十分困難。在百丈關附近作戰的部隊稍好些，能吃上糧食。而散佈在夾金山南北的後方機關和醫院的同志們，則靠野草樹葉充飢。有不少的同志，因饑餓、疾病而犧牲……

自南下以來，由於全軍指戰員的英勇作戰，奮身殺敵，曾先後打了一些勝仗……但這些勝利，并沒能改善我們的困境。」（註五）

紅四方面軍之南下，初期頗有進展，連克雅河各要地，但進犯雅安則受阻，遂與國軍陷於相持狀態。在此期間，紅軍總司令部（按：中共中央毛兒蓋會議後，包括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總參謀長劉伯承及中革軍委人員之紅軍總司令部，隨左路軍由卓克基至阿壩。毛澤東與張國燾分裂後，張國燾率部南下時，仍沿用紅軍總司令部名義。至於毛澤東之右路軍，係以前敵總指揮部名義率領，故當毛、張分裂，前敵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表示擁護反毛時，毛澤東乃私率一、三軍團北上，并改稱「陝甘游擊支隊」。）及以張國燾爲首的南方中共中央，亦隨軍於十一月上旬到達蘆山，設中央一級機關於蘆山鄉間（鄰接寶興縣之山邊），并積極開展建立川康根據地的工作。共軍所佔各縣，設立黨的縣委會及革命委員會的政權機關，同時成立中共川康省委，由傅鍾兼任省委書記，邵式平任副書記（邵原任紅一方面軍五軍團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長）。另成立臨時川康省革命委員會，以周純全爲省主席。

在南方中共中央方面，則積極開展宣傳教育工作，出版中央機關刊物「團結」，調陳然任主編。設立紅色中華社，以張琴秋（女）爲社長，廖承志爲編輯。成立中央黨校，訓練黨的幹部，派劉希平爲校長。組織少共中央，以葉德貴爲書記，羅華民爲組織部長（按羅原爲一方面軍幹部，曾任少共國際師政治部主任。）於是，南方中共中央便有聲有色地從各方面展開工作，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各點：

第一，依照張國燾的意見和主張，在各地建立政權機關時，不再使用蘇維埃名義和制度，而以革命委員會爲政權機關，其最高領導機關爲西北聯邦政府，張國燾自任聯邦政府主席；所稱聯邦之作用和意義，係指包括西南、西北各少數民族之民族平等及其有權獨立自主或自願加入聯邦政府而言。

第二，張國燾鑒於一、四方面軍之分裂，造成雙方幹部的隔閡和對立，嚴重影響工作，乃以各種辦法，力圖打破一、四方面軍的界限；一面告誡四方面軍人員改變態度，掃除歧見，一面對一方面軍幹部一視同仁，按能力分配工作。

第三，通過朱德，以中革軍委電台與一方面軍及二方面軍保持聯系，瞭解各方情況。

第四，對於已經北上之北方中共中央停止批評與攻擊，並對原一方面軍之五、九軍團做解釋教育工作，以化除成見。（註六）

這時，南方中共中央最感困憊的：第一，是無法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絡，中央機關雖已建立起來了，但一時得不到國際承認和支持，雖曾考慮派人赴俄，但又難覓適當人選。第二，是對於「白區」工作，一無辦法。因而所謂中央的指揮範圍只局限於紅四方面軍及其所佔領的地區。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從電訊聯絡中，南方中共中央已得知張浩到了陝北。一九三六年一月，北方中共中央電台拍來了「八一宣言」、「十二月決議」和共產國際「七大」決議摘要。對於這些，南方的中共中央並沒有積極的反映或另行做成決議，僅僅在機關刊物，紅中社廣播以及宣傳文件中表示抗日救國的意願而已。同時，張浩也曾試圖瞭解和調解一、四方面軍的分裂以及兩個中央對立問題，南方中共中央曾歷數毛澤東的錯處，電張浩轉請共產國際嚴正處理，因而張浩的試探，一時得不到任何結果，南北兩個中央對立的局面仍僵持不已（註七）。

二、紅四方面軍竄擾西康

紅四方面軍南下之初，攻擊猛烈，川軍集中堵擊，亦未能遏止其攻勢，直至國軍追剿部隊由陝甘邊回師川西後，始穩定陣地，并於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八日，藉空軍助戰，開始反攻，以收復榮經爲第一目標；其間經過多次激烈戰鬥，至十二月十五日，始收復榮經縣城。此役國共雙方傷亡均重，尤以共軍爲甚，共軍被擊斃四千餘，被俘千餘，損失步槍二千餘枝。

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國軍復向天全、蘆山攻擊前進，幾經苦戰，終於二月十五日克復天全，十七日進佔蘆山，共軍向寶興退却。是役前後激戰一月又半，共軍損失較重，計被俘千餘，傷亡四千餘，損失步槍一千六百枝，輕重機槍六十餘挺，惟國軍亦有傷亡（註八）。

關於國共兩軍在天全作戰情形，鄒維山寫道：「百丈關戰鬥後不久，敵薛岳乘我苦戰方罷未得休整，又糾集了十多個團向天全殺來。爲保障我軍從容向川康轉移，上級命令我八十八師主力向蘆山馳往天全，配合紅三十三軍防禦敵人的進攻，我師一到即與敵激戰於天全城下，頭上有敵人的飛機，地面是國民黨的中央軍，我軍在極端不利的情况下，又一次以大刀、手榴彈擊潰敵人的進攻，就在這次戰鬥結束後不久，我軍主力大部撤出了川西。」

一九三六年三月，我軍由丹巴西進。翻越終年積雪的黨嶺山，佔領西康的道孚、鎭霍、甘孜後，才擺脫了敵人，獲得休整的機會。我們三十軍到達甘孜後，熊厚發同志率師部及師的主力駐守甘孜，我和

二六五團來到了甘孜以西的絨壩岔。」（註九）

劉伯承關於紅軍南下作戰情形也有這樣的紀述：「四方面軍在天全、蘆山一帶停留了三個月。這時敵中央軍周渾元部隊入川，與劉湘配合，向我們進攻，兩軍對峙，仗越打越大。部隊消耗很大，張國燾却舉棋不定，直到部隊防地被突破，才被迫撤向道孚、爐霍、瞻化、甘孜和大金寺一帶……。」（註一〇）

張國燾率部南下之初，以為川軍及少數國民黨中央軍易於對付，殊不知國軍追剿部隊掃數從陝甘邊撤回，全力予以攔擊，這樣，他原定創造川康根據地的計劃便完全失敗。共軍在川西前後與國軍作戰五月，死傷萬餘，最後被迫放棄川西、由寶興、丹巴翻越大雪山竄入西康，於一九三六年三月佔領道孚、爐霍、甘孜各縣，旋又分兵進取瞻化、雅江、理化等地，暫時取得了休整的機會。

張國燾決定把西康作為暫時的根據地，在西康既可擺脫國軍的追擊，又可等待時機，再圖發展。因此，當紅四方面軍進入西康之後，南方中共中央又開始了重建根據地的工作，在黨的組織方面，建立了西康省委，派邵式平為省委書記。在政權方面，在甘孜及共軍所佔各縣建立「博巴政府」，即「博巴伊特哇」（Bod—Pahi—Sde—Wa）——藏族的部落政治組織。在軍事方面，則分散警戒，追剿土司騎兵，分兵搶奪牛羊，剪集羊毛，編織毛衣禦寒，並全力籌糧（主要為青稞、酥油、糌粑），以解決給養之困難。

這些措施，當進入西康之初，尚有若干效果，但時間一久，便困難重重。緣因甘孜一帶，地廣人稀

，儘是草原雪山，爲一片游牧地區，所謂縣城，僅爲一座大喇嘛廟，除僧侶居住喇嘛寺外，大部藏民均飼養牛羊逐水草而居。以此落後貧瘠地區，供養四萬餘共軍（到達西康時，張國燾率領的共軍已減少到四萬餘人），其困難是無法克服的。（註一一）

一九三六年四月下旬，南方中央總部駐在鑪霍期間，曾舉行過一次中央會議，討論如何解決當前困難及今後行動方針問題。會中朱德、劉伯承與張國燾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朱德、劉伯承力主再過草地，即行北上入陝甘，但爲張國燾堅決拒絕。張認爲陝北紅軍已冒險深入山西，無法呼應我軍行動，如孤軍北上陝甘，損傷必大；且紅二方面軍已入滇西，勢將過江北上西康，此時我軍必須與之配合并予接應，目前仍須留駐西康，待機行動。會中并決定：第一，派兵南下，接應渡江北上之紅二方面軍。第二，發動全軍進行打毛衣運動，規定每人至少打一件毛衣送給二方面軍戰士，作爲見面禮物（註一二）。

在這一決策下，「五月，紅四軍一部與三十二軍（按：即原一方面軍之九軍團）由道孚南下，擊潰敵主力李抱冰師兩個團，佔領雅江後，在理化甲洼與紅六軍團會合。與此同時，我也在絨壩岔與從巴安北上的紅二軍團會合。」（註一三）。

此時，紅軍總司令部及南方的中共中央亦由鑪霍遷入甘孜。六月，紅二方面軍行抵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得到了休息和整補。

三、賀龍部長途流竄

紅二方面軍之撤離湘西，同樣是在國軍圍剿中被迫流竄；當時二方面軍之人事配備與編組如次：

紅軍第二方面軍

總指揮 賀龍

政治委員 任弼時

政治部主任 甘泗淇

第二軍團

軍團長 賀龍（兼）

政治委員 關向應

第六軍團

軍團長 蕭克

政治委員 王震

全軍編組爲五個師，二軍團轄四、五、六師，六軍團轄十七、十八師，總兵力兩萬人。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紅二方面軍自湘西之桑植突圍流竄，當時湘西形勢，劉轉運（紅六軍團十七師四十九團政委）這樣寫道：

「一九三五年十月底，敵人對湘鄂川黔蘇區新的圍剿開始了，這次圍剿的規模較之以往多次大得多……：共約一百個團的兵力……：由於地形的局限，難以和敵人在當地周旋，加之我軍創造湘鄂川黔蘇

區以來，即處於緊張的反圍剿鬥爭，蘇區未來得及建設，內部還不鞏固，部隊的兵員補充，物資供應都得不到充分的保證，要粉碎敵人這樣大規模的圍剿確是有困難的；同時中央紅軍已經到達了陝北，紅四方面軍也早已離開了通、南、巴，二六軍團已處於孤立的地位，根據這一形勢，領導上決定：離開湘鄂川黔蘇區，打到敵佔區域，再相機北上。

部隊火速從津市、澧州、臨澧、石門等地集中到蘇區中心桑植一帶，進行了短期間的整理訓練，作好出征的準備。十一月十九日傍晚，大軍告別了蘇區，開始了英勇的長征。「（註一四）」

經過情形，「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概述」作了如下的記述：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紅軍第二方面軍兩萬人左右，自湖南桑植出發，衝破敵軍的包圍，消滅敵軍三個營又一個連，連續強渡澧水、沅水，橫掃湖南中部，佔領辰谿、淑浦、新化、藍田……我軍乃西渡沅江，進軍湖南貴州邊境。一九三六年一月，我軍通過芷江附近，相繼佔領晃縣、玉屏。接着組織便水戰役，打敗何鍵部的尾追，佔領石阡、江口。在石阡、江口進行了短期的休整後，我軍繼續西進，衝破龍溪封鎖線，佔領甕安、平越、修文；二月間，又佔領黔西、大定、畢節、在黔西、大定、畢節一帶，我軍休整了將近一個月……根據當時的形勢，我軍決定退出貴州，於三月間進軍至雲南的鎮雄、宣威、昭通一帶。……我軍決定渡金沙江北上，爭取和紅軍第一方面軍、第四方面軍會師，爲了迷惑敵人，在北渡金沙江之前，我軍首先東進，佔領了貴州的盤縣。當敵軍東調的時候，我軍又折回雲南。四月，我軍分爲兩個縱隊，以連續的急進行軍向西北前進，相繼攻克尋甸、富民，渡過了普渡河，順利地佔領

了楚雄、鎮南、祥雲、鹽興、牟定、姚安、鹽豐、賓州、鶴慶、麗江，直達金沙江邊。四月底，大軍分別自石鼓至巨甸間一百二十里的江岸，迅速地渡過了金沙江。

渡過了金沙江以後，進入雲南、西康間的雪山地區，我軍繼續分兩路前進。第六軍團爲右路，五月間佔領中甸、定鄉（今鄉城）、稻城，六月間佔領理塘、瞻化（今新龍）、甘孜（按：瞻化、甘孜早巳爲紅四方面軍佔領）。第二軍團爲左路，五月間自中甸出發，進佔德榮，六月間經過巴塘附近，進佔甘孜，紅軍第二方面軍和紅軍第四方面軍全部會合了……」（註一五）。

紅二方面軍近八個月的連續行軍，雖然躲避了國軍的堵擊和追剿，到達了西康，取得紅四方面軍的接應和補給，可是，全軍疲憊不堪，士兵面黃飢瘦，衣服襤褸，有如一方面軍到達懋功與四方面軍會師時一樣狼狽，而且沿途損失慘重，減員驚人，到達甘孜時，全軍已由兩萬人減少到三千人了。（註一六）

四、張浩調解兩個中央糾紛

一九三六年六月，正當紅二方面軍到達甘孜與紅四方面軍會師期間，張浩以共產國際代表資格電南方中共中央，聲稱彼接受共產國際的授權，爲調解兩個中央糾紛之國際代表，并轉達共產國際調解意見大要爲：

第一，北方與南方的兩個中央，同時撤消，停止行使中央職權。

第二，改組北方中央爲西北局，南方中央爲西南局；以地區及所轄部隊爲界限，分別行使職權。

第三，西南局應包括紅二方面軍的主要負責同志。

第四，各個方面軍應配合行動，向西北發展，目前以寧夏、甘肅爲發展方向。

第五，以前糾紛，應在共同行動，共同執行統戰新政策前提下，化除歧見，謀取團結。

張國燾及南方的中共中央，對於張浩轉達的共產國際的調解原則，雖在軍事方針上仍有若干意見，但在基本上決定接受，旋在甘孜召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成立會議，到會委員除原有南方中共中央各委員外（一部份委員遠在道孚、鹽源，未及到會），邀請了二方面軍之任弼時、關向應、甘泗淇等出席會議。會議由張國燾主持，傳達和討論了共產國際調解指示，幷作出如下決定：

一、接受共產國際調解指示，即日宣佈撤消中共中央，改組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領導紅二、四方面軍和西南地區黨的工作。

二、西南局以原有中央委員十五人及二方面軍之任弼時、關向應、賀龍、甘泗淇、蕭克五人組織之（按：西南局共有委員二十人，如以方面軍區分，則二方面軍委員五人，一方面軍委員亦五人，卽朱德、劉伯承、李卓然、邵式平、何長工；四方面軍委員爲十人，卽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王樹聲、傅鍾、周純全、曾傳六、李先念、何畏、李特）。

三、推張國燾爲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郭潛爲西南局祕書長（按：郭潛卽陳然，陳原爲紅一方面軍中央地方工作團主任，彼之被推爲祕書長，含有協調各方面軍委員之作用）。

四、西南局之組織宣傳各部，即以原中央各部改組而成，其人事維持原狀。

五、關於軍事行動方針，由紅軍總司令部與二方面軍負責同志研究決定之。

六、有關已往之糾紛，由書記張國燾同志詳電張浩轉報共產國際。

七、西南局之成立與組織報請共產國際核備并通知西北局。

八、目前應動員全黨全軍正確執行我黨之少數民族政策，健全地方黨部及軍中黨的組織，改善與羣衆之關係，通過「博巴政府」與羣衆之動員，解決衣食問題，并應籌足三個月的糧食。

經過張浩代表共產國際的調解，兩個中央對立的僵局已經改變，西南局與西北局有逐漸走向合流的趨勢。惟關於部隊的行動問題，在甘孜期間就有爭執，張國燾主張在西藏再停留若干時日，以視國內局勢發展再決定戰略方針，爲此，提出籌足三個月糧食的動員口號。朱德、任弼時等則持相反意見，認爲西康糧食缺乏，無法久駐，主張待部隊稍事休整後，即行北上，以配合一方面軍的行動。當時張國燾雖堅持己見，但到了七月，籌糧的結果，雖已羅掘俱窮，仍不足一個月的糧秣，僅勉強能維持越過草地，在此困難情形下，張國燾乃同意率部過草地北上甘肅（註一七）。

五、紅一、二、四方面軍會合

張國燾所以同意率部入甘肅，一面是因西康地瘠民貧，無法供養四萬餘部隊，另一方面則是國內政治有了變化，即在北方，日軍正在挑釁，隨時有進犯綏遠可能；在南方，發生兩廣事變，陳濟棠、李宗

仁背叛國府，準備向北進軍。西南局當時估計，國軍勢將向南北兩方調動，減弱堵擊追剿共軍的兵力，造成共軍向陝甘寧發展之有利形勢；因而七月間，紅軍總司令部遂指揮紅二、四方面軍北上，自甘孜、鐘霍、道孚一線，經西康東北的東谷和四川西北的阿壩、包坐、巴西等地，越過雪山草地，於八月間進入隴西之洮河流域，稍事休整後，繼續分途竄擾。

八月十六日，紅四方面軍主力，進抵岷縣近郊，十八日至二十日圍攻岷縣未逞。八月下旬復分兵兩路：二方面軍東向成縣、徽縣出擊，以分散國軍追剿兵力，主力紅四方面軍則北陷臨潭并進犯臨洮各縣。

九月上旬，紅四方面軍佔領漳縣、隴西、渭源，圍攻臨洮，并分兵東進攻陷通渭。九月二十日佔據蘭州以東約七十餘公里之稱鈞驛，截斷蘭州至定西交通，西安、蘭州公路交通因而中斷。

九月下旬，紅二方面軍經西和、武山之間東進，陷成縣、徽縣、康縣、兩當，并圍攻陝西的鳳縣。十月上旬復折回甘肅，突破天水、鹽關間封鎖線，渡過渭水，於十月下旬與盤據定西、靜寧、秦安各縣中間地區之紅四方面軍會合。

十月底，紅二、四方面軍繼續北竄至會寧，與紅一方面軍之先頭部隊會合。至此，經過多年流竄的紅一、二、四方面軍乃正式會師與合流（註一八）。

紅二、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前鋒部隊會合後，張國燾已從一方面軍幹部方面瞭解陝北及一方面軍的大概情形，當時最使張國燾不滿的爲所謂國際代表張浩調解兩方糾紛的若干決定，在陝北的中共中央

竟未履行，北方的中共中央既未停止行使中央職權，亦未改組爲西北局，仍以中共中央自居，照樣行使職權。因此，張國燾懷疑張浩之調解是否真的國際授權，抑爲張聞天、毛澤東串通張浩、王明假國際之名行欺騙之實的一場圈套，在此情形下，張國燾乃即電張聞天、毛澤東，說明爲了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決定組織西路軍渡河西進，其理由如下：

一、遵照共產國際指示，我軍應向寧、甘發展，其目的在於與外蒙或新疆取得聯絡，打通國際路線，接受國際援助。

二、陝北地瘠民貧，物資缺乏，經過多年戰爭，已無法供養三個方面軍。寧夏戰役計劃，不宜局限於河東，而應在黃河西岸夾擊敵軍，以創造甘寧新根據地。

三、除一方面軍照原定計劃就陝甘邊向寧夏進軍，四方面軍之一部及二方面軍向寧夏之同心城配合北進外，四方面軍之主力決定組織西路軍，渡黃河配合行動，相機向甘肅走廊發展。

張國燾的建議電發後，即將四方面軍的主力紅九軍、三十軍及原一方面軍之第五軍組成西路軍，裁併紅三十二軍、三十三軍，取消該兩軍番號，除軍官調紅軍大學外，戰鬥兵全部併入紅五軍（按：當時紅五軍僅殘存一千人，三十二軍、三十三軍併入後，擴增至六千人），裝備補給亦儘可能補充西路軍。西路軍之人事配備如次：

總指揮 徐向前

政治委員 陳昌浩

政治部主任 曾傳六（兼保衛局局長）

第五軍

軍長 董振堂

政委 黃超（原任政委何長工因腿跛調紅軍大學）

政治部主任 楊克明

第九軍

軍長 孫玉清（原任軍長何畏因在懋功作戰，腿部受傷，行動不便調紅軍大學）

政委 陳海松（原任政委詹才芳調三十一軍）

政治部主任 洪學智

第三十軍

軍長 程世才

政委 李先念

政治部主任 李天煥

西路軍爲四方面軍之精銳，總兵力共二萬二千五百餘人，由徐向前率領，向靖遠前進，準備渡過黃河入甘肅走廊。

四方面軍除以精銳編成西路軍外，所餘第四軍、第三十一軍亦有若干變動，四軍軍長王宏坤，政委

王建安仍維持原狀，但三十一軍軍長孫玉清調西路軍後，改由許世友接任軍長（許之騎兵總指揮部撤消），詹才芳接任政委。

張國燾所率部隊，在西康時尚有四萬餘人，經過草地之減員及沿途作戰之損傷，到達會寧時，僅有三萬五千餘人，除將精銳組成西路軍外，所剩第四軍、第三十一軍及直屬部隊（包括地方工作人員）與編餘之軍官仍共有一萬三千人，張國燾乃親率此一萬三千人（戰鬥部隊僅爲一萬人）及紅二方面軍之二千餘人，掩護西路軍渡河并向寧夏北進。

當時張國燾之另一措施爲成立紅軍大學，以容納編餘軍官和大批地方工作人員；派劉伯承爲紅軍大學校長，何畏（原紅九軍軍長）爲政治委員，劉希平（前黨校校長）爲政治部主任，張宗遜（原九軍團參謀長）爲教育長，郭潛（西南局祕書長）兼任政治主任教官，并將所有地方工作人員包括西南局的工作人員全部配屬「紅大」，隨「紅大」行動，因而「紅大」學員由一千五百人增至三千人，隨紅軍總司令部行動。（註一九）

據陳然先生說：張國燾這些措施，顯然爲的是應付與陝北的會合，由於張國燾確認張浩之調解爲一套騙局，遂把四方面軍主力置於黃河之西，既可遙爲聲援又可另創局面或首先與國際打通聯系。然而，張國燾的計劃落空了。因爲他的西路軍在河西甘肅走廓幾乎是全軍覆沒。

六、西路軍全軍覆沒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上旬，張國燾的西路軍北進至靖遠之北渡過黃河，向西竄擾。渡河情形，據「剿匪戰史」說：「不意十一月九日，忽有我方商人，由蘭州運送羊毛皮筏數十艘往包頭出售，行經靖遠附近，突被匪軍截獲，徐匪向前所部利用是項渡河材料，於十一月十二日由靖遠以北地區，以羊毛捆連成防護掩體，乃向景泰一帶施行強渡……至十一月十六日，匪軍主力萬餘（按：西路軍共有二萬二千餘人）全部渡至黃河左岸。」（註二〇）共軍渡河後，即與守備國軍劇戰兩晝夜，并攻陷景泰、一條山、索罕堡等地，國軍前進指揮官馬廷祥亦於景泰縣督戰時陣亡。

張國燾的西路軍旋又由景泰向西竄擾，於十一月二十日佔領古浪，并分兵向武威、永昌進擊。十一月廿四日，國軍調集兵力，向古浪反攻。經一晝夜的苦戰，始將共軍擊潰，收復古浪。西竄武威、永昌之共軍亦大部為國軍消滅。餘部再竄張掖、高台，終於一九三七年一月為國軍消滅，殘部千餘人進入祁連山向西逃竄。

事後，紅四方面軍三十軍政治部主任李天煥曾作如下追述：

「古浪一戰，九軍兵力損折一半，高台城血戰七晝夜，五軍又幾乎全軍覆沒，軍長董振堂同志、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同志英勇犧牲。最後又在黎園口、康龍寺作戰失利，三十軍遭受重大傷亡，九軍餘部又損失大半，政委陳海松同志戰死。三十軍殺出重圍之後，部隊已潰不成軍。至此，西路軍的三個軍及軍總指揮部直屬部隊已被大部斷送……」。

追兵像烏雲似地捲來。爲了避免全軍覆沒的命運，只好把不到兩千名的部隊，編爲左右兩個支隊，

跑到深山打游擊。

當時，紅九軍剩下的五百多人編爲右支隊；紅三十軍餘部千餘人，加上西路軍總直屬隊的一些幹部編爲左支隊，自石窩進入祁連山……。我們沿着渺無人烟的祁連山西進。整整走了四十三天，才從河西附近跨出祁連山口……。我軍攻安西不下，在王家園子又陷入重圍。激戰了一整天，當晚才突圍。突出重圍之後，我們涉過寒澈骨髓的黑水河，一口氣跑了九十里，第二天黎明才到達白墩子。剛到那裏，那知道敵人的騎兵追上來了，我軍且戰且走，在紅柳園子又遭包圍。

這是西征中最後的一戰，我們砸碎了電台，守着一片起伏地，準備和敵死拚到底……。入夜，我們又突圍出來，進入了戈壁灘……。

當時和我們有統戰關係的新疆部隊，把我們接進了星星峽，「五一」節，黨中央的代表陳雲同志和滕代遠同志，帶着幾十輛汽車，載着衣服、碗筷和哈密瓜來迎接我們。我們像些虎口餘生的孩子撲進了母親的懷抱，一時百感交集，熱淚橫流……。

悲壯的西征結束了，活着到達烏魯木齊的只有七百多人……。」（註二一）

張國燾的西路軍，原有二萬二千五百餘人，是紅四方面軍的精銳，河西作戰失敗的結果，除陳昌浩、洪學智等先行化裝逃返陝北外，就只殘存七百餘人，其中包括徐向前、曾傳六、程世才、李先念、李天煥、鄭維山等人。這七百餘人，在新疆編成戰車團，由俄共加以裝備和訓練。抗戰開始後，才陸續遭

巫延安（註二二）。

張國燾自己統率的部隊，包括賀龍的二千人，共仍有一萬五千人，這枝部隊，一面掩護西路軍渡河，一面向寧夏出擊，於十一月中旬佔領寧夏之同心城。此時，一方面軍之指揮部亦移向同心城，兩方高級人員終於在此荒城會合。張國燾與毛澤東分裂後，在同心城係第一次會面，見面之初，張國燾立即陳述其作戰計劃與西路軍在古浪激戰情形，并力主即刻派隊馳援西路軍，張國燾認為如果及時派隊渡河來擊國軍，必可大獲全勝，并奪取甘肅走廓為根據地。但毛澤東不贊成，他認為如果派隊馳援，不僅渡河困難，且蘇區內部因而空虛，必將招致國軍的進犯，大有失却立足基地之危險。在辯論中，張國燾提醒毛澤東注意，西路軍雖然大部份為四方面軍的精銳，但也有原一方面軍之五、九軍團，如果坐視其敗，是黨和紅軍的整個損失。結果，毛澤東以中央軍委主席的資格打消了張國燾的建議，西路軍遂在孤軍奮戰之餘全軍覆沒。事後，據涂振農（中共中央祕書長，曾隨毛澤東至同心城與張國燾晤面）說，毛澤東於會晤張國燾後，曾向涂振農等大發張國燾的牢騷，毛說：張國燾擅作主張，組織什麼西路軍，渡河入甘肅走廓，明明是走的死路，還說什麼打通國際路線，就讓國民黨把它消滅了吧，還有什麼援救不援救等等（註二二三）。

但就當時西路軍軍力與在河西戰況而言，如果毛澤東同意派兵馳援，情況就大不相同了。據當時指揮國軍進剿西路軍的馬步青說：

「如果說古浪之役是這一整個戰役的轉捩點，那麼張掖、高台之役，無疑是決定性的一戰。我軍防守張掖的部隊是韓起勁旅，而匪方進襲該縣的是程世才的第三十軍。高台地區，進擾的匪軍是董振堂的

第五軍。當時的兵力既然是旗鼓相當，所以在張掖地區形成了拉鋸戰，一直持續了一個多月。雙方的死傷都很慘重，而且都已經瀕臨精疲力竭的地步。很明顯的，既然雙方實力的天秤扯得很平，那末祇要有一面再加添上一點新的重量，自然就會使得整個情勢立即改觀。我就是這樣做的——從青海調了幾個地方團隊投入戰場，於是起了預期的效應，不久就急轉直下的結束了這場戰爭。」（註二四）

同樣的，如果毛澤東同意張國燾的建議，派出少數援軍，在天秤上「加添上一點新的重量」，那麼，河西走廊的戰局又將大大改觀，可是，毛澤東不此之圖，且樂於坐觀其敗，其居心如何，那是不言而喻了。

七、共黨共軍決定分散游擊

張國燾與毛澤東在同心城會晤期間，國軍的追剿部隊亦尾追不捨，向同心城進擊。共軍原擬在同心城西南迎擊追剿的國軍，後因國軍兩翼迂迴，共軍三面受敵，毛澤東、張國燾乃不得不率部向東轉移，國軍遂乘勝長驅直入，十一月十九日佔領惠安堡，二十日入佔山城堡，直接威脅共黨中央所在地的保安。在此一情勢下，毛澤東與張國燾決定集中三個方面軍的兵力兩萬餘人（當時四方面軍除「紅大」與地方工作人員三千人外，尚有戰鬥部隊一萬人，二方面軍二千人，一方面軍包括十五軍團二十八軍等共一萬人）在山城堡（甘肅環縣之北）以東迎擊追剿國軍；同時由於形勢之惡劣，毛澤東先行遣返保安并令中共中央作緊急應變措施。據當時之中共中央祕書長涂振農說：中共中央根據毛澤東的建議，準備把紅

軍及中央機關分成兩路撤退，一路再入山西游擊，另一路入秦嶺向陝南游擊，中央機關之大部份人員準備隨南路軍入山行動。因而保安之中央一級機關連夜作輕裝準備，除疏散工作人員外并把許多文件書籍以及笨重的資材都燒燬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廿一日，國軍由山城堡向東推進，預伏在山城堡周圍的共軍遂展開猛烈的抵抗與反擊，經過一晝夜劇烈的戰鬥，國共兩軍損失均重，其中紅一軍團、與國軍之七十八師損失較大，因而國軍直取保安的進攻暫被遏阻，但整個圍剿計劃仍着着進行，保安仍在圍剿部隊威脅下，中共中央分散游擊的計劃也沒有變更，不過把行動的時間稍為推延而已（註二五）。

這時，日軍又向綏遠挑釁，國軍湯恩伯部當即調綏增援，準備迎擊進犯之日軍。值此綏遠局勢緊張之際，準備分散游擊之中共中央，認爲此一時機，或能實施抗日統戰策略，以轉變國府圍剿之意向，遂於十二月一日，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王稼靄、彭德懷、賀龍、任弼時、林彪、劉伯承、葉劍英、張雲逸、徐向前、陳昌浩、徐海東、董振堂、羅炳輝、邵式平、郭洪濤等率中國工農紅軍名義上書 蔣委員長稱：

「今日者，綏遠形勢，日趨惡化，前線之守土軍隊爲數甚微，長城抗戰與上海一二八之役，前車可鑒，天下汹汹，爲公一人，當前大計，只須先生一言而決。今日停止內戰，明日紅軍與先生之西北剿共大軍，皆可立即從自相殘殺之內戰戰場，開赴抗日前線，綏遠之國軍力量驟增數十倍，是則先生一念之轉，一心之發，而國仇可報，國土可保，失地可復，先生亦得爲光榮之抗日英雄，圖諸凌煙，馨香百世

，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誠再一次的請求先生，當機立斷，允許吾人之救國要求，化敵爲友，共同抗日，則不特吾人之幸，實全國民族唯一之出路也……。」

同時，又以中共中央及偽蘇維埃中央政府名義發出「關於綏遠抗戰通電」，主張：

「一、調集大軍增援晉綏前線，動員全中國海陸空軍準備全國性的抗戰。

二、停止進攻紅軍，實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三、開放人民抗日救亡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立即釋放政治犯及上海各愛國領袖。

四、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或國防會議，商討救國大計。」（詳見附錄）

共黨共軍之所以以上書蔣委員長及發出通電，乃迫於當時的惡劣形勢與覆亡危境，是年共軍竄擾山西失敗，西出寧、甘又遭挫折。陝北老巢瓦窑堡既已失守，保安荒地又岌岌可危。所剩兩萬餘共軍，正遭國民黨大軍圍剿，所謂陝甘蘇區，已縮小到無迴旋餘地，除放棄蘇區分散游擊外，別無生路可循，唯一希望爲利用綏遠緊張局勢，以抗日爲名，請求國軍停止剿共，以渡過覆亡危境。

八、張國燾失敗之分析

張國燾率軍南下，基因於對國內政治形勢的估計與中共中央有不同的看法。據陳然先生說，四方面軍南下期間，張國燾曾寫過一些文章和小冊子，他的基本觀點，認爲「白區」工作的失敗，各個蘇區的

放棄以及紅軍的轉移，是中國革命處於兩個高潮之間的標誌，亦即進入革命低潮時期，在此期間，紅軍應向敵人統治薄弱的地區發展，以保存有生力量並等待時局的變化，因而決定南下川康邊，建立新的根據地。在川康邊無法立足時，乃又轉入西康，最後終於不得不率部北入甘肅。

張國燾南下失敗的原因，主要的在於：第一，對敵情判斷的錯誤，低估川軍和追剿軍的力量，尤其沒有估計到四方面軍的南下，吸引了國軍的全部追剿大軍，以致在川西展開三個月的拚消耗的劇戰，使紅四方面軍遭受重大損失。第二，對少數民族地區認識錯誤，沒有充分估計少數民族與漢族間的距離和成見，更沒有瞭解西康地區之貧窮與落後，遂使共軍進入西康後無法生存不能不北走陝甘。

當然，張國燾的南下，亦有其不可抹煞的作用，即第一，為毛澤東北上陝甘開闢了道路，即四方面軍的南下，調動國軍跟蹤南下，毛澤東的陝甘支隊乃能乘機北上。第二，為賀龍部鋪平入康大道，即二方面軍進入西康時，得到四方面的接應和糧秣的補充，使能越過草地，北上陝甘。

關於調解兩個中央的對立問題，如果說，把兩個中央改為西北局和西南局係共產國際的決定，那麼，陝北的中共中央必須服從，但在事實上，西康的中央已經改為西南局，而陝北的中央則迄未變動，這就說明，取消兩個中央改為兩個局的決定，不是共產國際的意見，而是陝北中央假共產國際名義，以誘騙張國燾的手法。同時，張浩是否得到共產國際授權，成為國際代表來調解兩個中央的對立也大有問題，據陳然轉據蔡乾先生所提供的資料說，張浩是中共駐國際首席代表王明派至陝北的聯絡員，一個聯絡員突然搖身一變而為國際代表，顯然是毛澤東、張聞天等串通王明、張浩所設計的一套把戲，目的是誘

騙張國燾率部北上，然後再加以鬥爭和處置，所以當張國燾約略瞭解情況後，難怪他要把四方面軍主力置於河西，作爲對抗的後盾了。

張國燾組織西路軍渡河之另一原因，爲執行所謂寧夏戰役計劃，當時中共中央軍委的決策是一方面軍由環縣北進，二、四方面軍由打拉池、海原向同心城進擊，以包圍進剿國軍的主力，但張國燾則認爲爲完成這一作戰計劃，應分兵過河西，以牽制馬家軍之進擾並相機爭取甘肅走廊，打通國際路線。如果以共產黨人的觀點，就當時共軍的處境來衡量，這一意見，亦未可厚非；可是，當西路軍失敗後，劉伯承指責張國燾「借口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擅自命令四方面軍西渡黃河。」（註二六）中共中央更斥責張國燾爲西路軍失敗的罪魁禍首。

其實，西路軍的失敗，照馬步青的說法看來，國共兩方兵力扯得很平，是一個勢均力敵的局面，後來國軍取得青海地方團隊的增援，才把西路軍消滅；可見其失敗在於兵力不足及無後續部隊的增援，就共黨的觀點來說，張國燾的錯誤在於兵力分散，沒有把四方面軍之第四軍、第三十一軍同時派赴河西；毛澤東的錯誤則在於見死不救，拒絕派兵增援，情願讓國軍把西路軍消滅，這樣，西路軍就被張國燾、毛澤東斷送了。

事後，在紅軍大學受訓的許多四方面軍的高級幹部，在議論一、四方面軍會合和西路軍失敗的時候，大都爲張國燾惋惜，認爲張國燾的失敗在於：

第一，張國燾到底還保有若干君子風度，而毛澤東則是心狠手辣而又狡猾奸詐的陰謀家，君子可欺

，張國燾乃被誘騙入彀而失敗。

第二，當一、四方面軍會合之初，張國燾既然約略瞭解受騙，但依然表示謀求團結的意願，親率兩個軍和四方面軍總部馳赴陝北，這無異是送入虎口，焉有不敗之理。

第三，同心城會晤期間，毛澤東既然見死不救，寧願假手國軍消滅西路軍，當時張國燾如敢再冒分裂危險，親率兩個軍渡河赴援，情勢必將大變，但張國燾不作此圖，其失敗也就無法挽救了。

第四，組織西路軍當時，張國燾對於甘、寧、青回教少數民族之團結及馬家軍戰力之頑強估計不足，以爲三個主力軍足以應付而有餘，這種輕敵觀念，遂造成西路軍的全軍覆沒（註二七）。

註一：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

註二：取材於「剿匪戰史」第十冊九二五——九三〇頁。

註三：「剿匪戰史」第十冊九三〇頁。

註四：所謂棧道，即於懸崖絕壁山間，沿絕壁打洞，置橫木之一端於洞中，橫木之另一端則懸空，橫木之上再架木塊而成危險之走道。

註五：紅三十軍八十八師政委鄧維山「踏上毛主席的道路」——「星火燎原」三九〇——三九三頁。

註六、七：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陳先生當時被調至張國燾爲首的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

註八：取材於「剿匪戰史」第十冊九三三——九五七頁。

註九：同「註五」——「星火燎原」三九三頁。

註一〇：劉伯承「回顧長征」——「星火燎原」一二頁。

註一一、一二：均爲陳然先生親身經歷而提出之資料。

註一三：同「註五」——「星火燎原」三九五頁。

註一四：紅六軍團十七師四十九團政委劉轉運「搶渡澧水、沅江」——「星火燎原」二七一頁。

註一五：「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概述」——「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四六四——四六五頁，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出版。

註一六：紅二方面軍之減員情形係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陳先生當時正在甘孜，故對紅二方面軍情形頗為瞭解。

註一七：關於張浩調解兩個中央糾紛及西南局成立情形，係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陳然（即郭潛）當時被任為西南局祕書長，故對當時情形瞭解甚詳。

註一八：取材於①「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四六六頁②劉伯承「回顧長征」——「星火燎原」一一——一三頁③「劉匪戰史」第十一册九九七——九九九頁。

註一九：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當時陳先生（即郭潛）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祕書長並隨張國燾（西北局書記及紅軍總政委）行動，故對張之各種措施，瞭解甚詳。

註二〇：「剿匪戰史」第十一册一〇〇〇頁。

註二一：紅四方面軍三十軍政治部主任李天煥「走出祁連山」——「星火燎原」四三七——四四一頁。

註二二：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

註二三：陳然先生當時轉據涂振農（中共中央祕書長）所談毛澤東與張國燾在同心城會晤與爭論情形。

註二四：馬步青「河西走廊殲滅戰」——「今日大陸」一四六期，一九六一年十月出版。

註二五：陳然先生轉據中共中央祕書長涂振農所提供之資料，據涂稱：當時中共中央爲了輕裝游擊，把許多文件資料都燒光了，連中央祕書處也僅僅保存一摞文件，保安各中央一級機關會連續幾晝夜燒燬文件書籍以及銷毀埋藏笨重資料與輜重，中央各機關人員亦作軍事編組，準備隨軍行動，入山游擊，後因爆發西安事變，局勢轉變而作罷。

註二六：劉伯承「回顧長征」——「星火燎原」一三頁。

註二七：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陳先生當時兼任四方面軍紅軍大學政治主任教官，到達保安後，四方面軍「紅大」與一方面軍「紅大」合併，陳先生仍執教於「紅大」，故對紅四方面幹部之議論與批評，瞭解甚多。據陳先生說，四方面軍幹部大都擁護反毛，故毛澤東在延安鬥爭張國燾時，紅四方面軍幹部曾於「抗大」（爲「紅大」改組而成）組織反毛擁護暴動，詳情另篇記述。

附錄：關於綏遠抗戰的通電

中國國民黨南京政府全國各報館各團體各黨派各界各武裝隊伍及全國人民均鑒：

日僞匪軍進攻晉綏的前哨戰已經開始，大規模的侵略即將爆發。當此中華民族生死關頭，非動員全國兵力人力財力以抗戰，則戰勝日寇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實行下列處置：

- 一、調集大軍增援晉綏前線，動員全中國海陸空軍準備全國性的抗戰。
- 二、停止進攻紅軍，實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 三、開放人民抗日救亡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立即釋放政治犯及上海各愛國領袖。
- 四、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或國防會議，商討救國大計。

我們再一次的要求南京政府，立即放棄對日妥協政策，停止中日談判，實行上述迫切要求。若再因循延誤，坐視傅作義將軍等局部抗戰而不救，而仍舊專心致力於壓迫人民抗日救亡運動與進攻抗日紅軍，則其結果不但將給民族國家以不能補救的損失，而南京當局亦將自絕於國人。

爲了實現全民族的抗戰，我們更號召全中國人民不分黨派，不分階級，不分職業，更親密的聯合起來，督促南京政府實現我們的主張，克服一切困難，自動的組織各種救國團體與武裝力量，如救國會、後援會、義勇軍、宣傳隊、救護、

隊、慰勞隊、募捐隊等，努力擴大救亡陣線，加強抗日力量，援助現在綏遠堅決鬥爭着的英勇將士。抗日救亡是每一個中國人的天職，也只有中國人民的偉大力量，才能逼使南京政府決心抗戰，給日寇以致命的打擊。

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人民紅軍，一年來艱苦奮鬥，東進山西，西出寧夏，無非要尋找一條抗日去路，以保衛中國領土主權的完整，然而南京當局總不見諒，一再阻攔紅軍抗日去路。當此晉綏危急，全國人民均願效命疆場，為民族爭生存之時，南京當局偏又調動大軍向抗日的紅軍進攻，此真令人百思不解。此次晉綏危急，全國人民均願效命疆場，為民族爭生存之時，南京當局偏又調動大軍向抗日的紅軍進攻，此真令人百思不解。此次紅軍在山城堡消滅××軍一部，實出於不得已的自衛行動，並對對外妥協，對內鬻武之主持者略施警告，我們認為今日而猶繼續內戰，實屬對民族國家之罪惡行爲，實際上不啻執行日本帝國主義之使命，而遺民族國家以無窮之禍。

我們現在向全中國人民宣言，全中國主力紅軍一二四方面軍現已集中完畢，只要給我們以抗日去路，我們準備立刻開赴晉綏前線，擔任一定的抗日戰線，並願受全體抗日軍最高統率機關之指揮，以抗擊日偽匪軍的進攻，為保衛晉綏，保衛華北，保衛中國而血戰到底，我們希望南京政府立即承認我們的要求，希望全國人民擁護與贊助我們的要求，我們對於中國人民的最後勝利是有充分信心的！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中國蘇維埃中央政府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

（錄自延安解放社出版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一冊）

第二十七章 中共輸誠前後

一、西安事變經過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正當共黨共軍準備分散游擊，亦即四散逃竄期間，突然發生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關於這一事變的經過，蔣總統的「蘇俄在中國」曾作如下的記述：

「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對蘇交涉，一面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我對於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解除，而後對他的黨的問題纔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民國二十三年底，五次圍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陳立夫擔當這一政治任務……」。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發出『停戰議和』通電。隨即由周恩來代表中共，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到上海與張沖會商。當時我得到這個報告，對於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一節甚為懷疑。但據立夫考驗後，知道潘持有他與共產國際通電的密碼，及其來往電報無誤。我認為此事真偽虛實，對本案不甚重要，故亦不再追問。潘漢年乃即到南京與陳立夫談判。政府對中共所提的條件為下列四點：

- 一、遵奉三民主義；
- 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
- 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

四、取消蘇維埃，改爲地方政府。

「經過了長時間的談判，最後他們終於接受這四項原則。一切條件大抵都達到協議，只待我回京作最後之核示。

「在這同一時期，共黨在各省亦開始發動其『和平』宣傳攻勢，而以陝西爲其第一目標，並對張學良與楊虎城積極勾結。而且張學良所部的東北軍中，發現其『抗日不剿共』的宣傳品，並有張、楊皆與共黨已發生直接關係的情報，所以他們在西安竭力掩護共黨份子及其外圍組織的活動，於是『第三黨』與『救國會』公開作反動宣傳，亦毫無顧忌。這一事態的發展，如不設法防止，勢將演成叛亂。我乃親往西安坐鎮，並準備在年終召集一般將領開會宣佈中央對剿共與抗日的方針，說明共黨和平攻勢，及其所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口號的作用所在，使之不爲共黨煽惑。就在這個時候，即十二月十二日，我在西安忽被張學良和楊虎城以暴力劫持。我當時就斷定這是張楊二逆受共匪欺詐，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國家以致命的一擊。所以張學良前來見我時，我就簡單明瞭的訓斥他說：『無論其爲個人利害，或國家安危，只有立即徹悟痛悔，送我回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穽，及今悔悟，尙未爲晚。』他在這樣情勢之下，就不敢提出其所預定的八項條件，只說內容複雜，沒有如我所說的那樣簡單，反要求我先行息怒，容他盡言。我就斥止他，不許其提任何政治有關的事。直至第三日，他纔含糊其詞，半勸半求的說出他們所共同議決的八項條件，並說只要我應允簽一個字，他就立即親自送我回京。我乃對他說，無論你說得任何動聽的請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脅之下，絕無商討餘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張等有悔悟之意

，而其主謀之共匪，必認爲千載一時的良機，也就是他匪黨的一個生死關頭，非迫我接受他的條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時，只有下定捨生取義的決心，對叛徒始終拒絕與他們商議任何政治條件。國民政府亦不理張楊的荒謬要求，立即下令討伐。

「二十二日，蔣夫人突然來到西安，我見面第一句話告訴她說：『十日來叛徒每日用各種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條件上簽字，就可送我回京。你來共患難，是爲公而非爲私，一切須以國家爲重。如有叛徒以任何條件，託爲轉勸，必嚴厲拒絕。我們寧死，亦不可答應。』蔣夫人此行下了決心，她回答我道，她重視我的人格，甚於我的生命，她決不勸我有違背素志的行爲，她只願與我同生死。過了三天，到了聖誕節二十五日下午，我們終於無條件的脫險回京。

「但是這種震動世界的事變之真相，到了事後纔得完全明瞭。此事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點，就是其主動者，實是張學良的本身，而首先提出此一規持主張者，則爲楊虎城。且其事前，並未與共黨就此事有任何商量。不過當時張學良與共產黨直接的接觸，已有半年之久，故共黨與張之關係，亦自到了相當的程度，又因爲他們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中央發覺，故張與共黨的祕密接洽，乃在陝北的延安舉行（當時延安守軍還是張的所部）……………」（註一）

「張楊通電所提的八項條件，就是（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救國會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六）開放民衆愛國運動；（七）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這八項條件顯然是當時共匪及

其同路人的政治號召。其實質的意義就是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軍事，放任共黨及其外圍團體的活動，採取聯俄容共政策，召開所謂黨派會議，改組國民政府為聯合政府。」（註二）

二、西安事變與中共

誠然，西安事變的主動者為張學良楊虎城，事前並未與共黨有任何商量，即共黨在事前毫無所悉。但張揚之反抗中央與發動事變，則係受中共統戰的流毒與影響，這也是不容置疑的。

事實上，中共自執行統戰策略開始，即處心積慮的進行瓦解國軍的工作，在陝北，以東北軍為主要對象；中共認為東北軍入關後，背井離鄉，家仇國恨，滿懷抗日復土情緒，最易挑撥煽動，接受抗日統戰政策；因而中共中央通過十二月決議之後，即於一九三六年一月成立白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張浩（林毓英）分任正副書記，一九三六年五月，共軍竄擾晉西失敗後，復成立北線白軍工作委員會，派蔡乾任書記，全力對東北軍進行策反工作，其所採步驟，主要為開辦俘虜訓練班，將被俘之東北軍軍官加以訓練說服，然後再派返東北軍，替共黨担负統戰策反工作。

據陳然轉據蔡乾先生告稱：一九三五年九月底，共軍在陝北甘泉之勞山及榆林橋擊潰東北軍一一〇師與一〇七師，擊斃一一〇師師長何立中，俘虜東北軍官兵三千餘人，其中有一〇七師團長高福源，他曾任張學良的警衛營營長。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下旬，共軍在直羅鎮擊潰東北軍一〇九師，師長牛元峯被俘。這兩仗所俘東北軍軍官，成為中共俘虜訓練班的主要成員；中共對這些被俘軍官做了許多宣傳說服

工作，當這些被俘軍官訓練成熟準備釋放時，毛澤東曾先後和高福源、牛元峯談話，要他們返回東北軍後，向張學良轉達中共抗日統戰政策，希望東北軍與共軍并肩作戰，共同抗日（註三）。

在共黨的統戰攻勢下，張學良終於跌進了共黨的陷阱。一九三七年二月五日，周恩來在西安接見大公報記者范長江時，對於西安事變前，張學良與共黨的勾結有過說明，他說：「王以哲首先與紅軍幹部發生關係」，「二十五年夏季，張學良乃與周恩來在膚施（即延安）正式見面」（註四），因而在「『雙十二』之前，葉（劍英）曾應張學良之邀，祕密來西安，在張學良公館附近，與張研究東北軍之改造問題，葉對於東北軍之政訓工作提出意見。他的說法，很使張學良受影響。」（註五）另據陳然先生提供之資料稱：他於一九三九年夏季，在桂林八路軍通訊處與李克農討論統戰與情報工作時，李克農曾以彼在西安及東北軍中所進行之統戰情報工作爲例加以解說，李稱在西安事變前，他就和葉劍英到了西安，進行祕密工作（註六）。

西安事變期間，中共中央尙設於保安，事變當晚，保安共黨一級機關始獲得消息，當時中共幹部歡喜若狂，中共中央亦漏夜討論此一問題。由於張學良決定派機迎接中共代表到西安，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即動員紅軍大學學員和各機關幹部，在紅大前面的平地上修築飛機場，備供飛機降落。十四日，機場草草修成，但因山谷太窄，飛機無法降落，專機在保安上空盤旋後又飛返西安去了。中共中央所派代表周恩來、秦邦憲等遲至十五日始離開保安，十七日到達西安。

西安事變第二（十三）日下午四時，中共中央在紅大附近小溪旁的草坪上，召開了三百餘人的活動

份子會議，其中包括各一級機關的幹部。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在會議上作了有關西安事變的報告，報告時，毛澤東得意忘形地近乎瘋狂，他的講話類似狂呼與叫罵，他除說明事變經過外，並誣指蔣委員長向日寇屈辱投降，專事剿共爲西安事變爆發的基因，強調西安事變是中共抗日統戰策略成功的重大表現，同時着重指出：蔣委員長自從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事變以來，所欠共產黨人的血債如山，現在是清償血債的時候了；接着他大聲疾呼：必須把蔣委員長解至保安交全國人民公審，給予應得的制裁，以償還十年的血債。此外，他警惕到會人員說：西安事變後，南京國民黨政府一定不會罷休，必將調兵遣將進攻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因此，我們在軍事上必須即刻動員，開赴西安，準備與友軍並肩作戰，粉碎國民黨的進攻。毛澤東報告時，共黨幹部不斷歡呼叫喊，似乎公審大會就要舉行，十年的深仇大恨就要得到報復了。這就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當時對西安事變所持的態度與立場（註七）。

可是，第三天（十四日）深夜，莫斯科共產國際的電令到了，電文中批評中共對西安事變所持的報復主義與內戰方針的錯誤，指斥這一方針正符合日本軍閥和中國親日派的願望，對中共與蘇聯都是不利的，且違背了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與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要求中共中央即刻改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註八）。據當時任中共中央祕書長的涂振農說，中共中央各負責人，對於共產國際指示電有兩派不同的意見，以張聞天、秦邦憲爲首的國際派，力主完全接受國際的指示，即刻改變方針，「表和平通電，派出和談代表；以毛澤東爲首的一派則認爲南京政府在軍事上已積極部署，準備進攻張楊，和平解決恐不可能，必須採取兩套辦法，一面執行國際指示，一面在軍事上積極行動支援張楊。因

此，除原定派赴西安之代表團以國際指示爲依據，執行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方針外，並在軍事上把紅軍主力即刻開赴三原、咸陽、西安一線，配合張揚部隊向潼關進發，另派紅十五軍團經咸陽東出商縣，作翼側防禦。

據涂振農說，西安事變發生後的一週內，最值得注意的，便是中共中央電令地方黨部以各種辦法（包括使用東北軍代表，救國會代表等名義）徵詢各地方實力派，特別是山西、山東、四川、兩廣各實力派對西安事變及處置蔣委員長的意見，作爲決策的參考。因而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通電（參閱附錄一）也遲至十二月十九日始行發出，在電文中雖主張召開所謂和平會議，但提議「討論蔣介石先生的處置問題」，足見當時共黨的居心所在了。

十二月廿五日，蔣委員長之飛離西安，以及張學良之隨行，完全出乎中共代表團的預料，據周恩來、葉劍英、李克農說：中共原定步驟是召開和平會議，討論國策與蔣委員長之處置問題，殊不知張學良因受感召悔悟，竟突然釋放蔣委員長，並親自隨行護送；當周恩來、葉劍英聞訊趕至飛機場時，已經無法制止亦無法挽救了（註九）。

三、中共中央遷入延安

西安事變後，東北軍自延安撤出，中共中央各一級機關遂於一九三七年一月由保安遷入延安，從此，延安便成爲中共中央指揮的基地。

西安事變後，國軍停止進剿共軍，共黨共軍亦作輸誠準備；共黨入據延安後，即準備撤消蘇維埃中央政府，另組特區政府，在過渡期間，僅保存蘇維埃中央政府名義，在延安改設蘇維埃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並以秦邦憲（原任蘇維埃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為辦事處主任，處理撤消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善後問題及籌建陝甘寧邊區政府。

中共中央遷入延安後，其內部分工除總書記張聞天，軍委主席毛澤東，白軍工作委員會書記周恩來，婦女部長蔡暢未變動外，新更動人事如左：

組織部部長 秦邦憲（原任部長羅邁調任黨校校長）

宣傳部部長 何凱豐（原代理部長吳亮平仍留宣傳部工作）

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張 浩（原書記劉少奇前已調任北方局書記）

中共為著迎接新形勢之到來，在全國範圍內展開活動，遂於延安全力從事訓練工作，除調訓軍中及地方工作幹部外，并通令「白區」黨動員各地青年到延安接受訓練；在共黨的宣傳煽動下，延安便成爲若干好奇青年的嚮往所在。當時中共所設訓練機構，約有下列幾種：

一、抗日大學：全名爲「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簡稱「抗大」，係紅軍大學改編而成，即一九三六年六月，紅一方面軍在瓦密堡設立紅軍大學，七月遷保安，十二月與紅四方面軍之紅軍大學合併，一九三七年一月遷入延安後改名「抗大」。校長林彪，教育長羅瑞卿，政治部主任傅鍾（原四方面軍政治部主任）。校址在延安城內，以原延安師範學校及前府衙門爲校本部，後因學員增加，加闢延安北面

之山間窑洞爲校舍。學員初期六百人，後來增加至一千三百人，分設十四個隊，每隊設隊長指導員各一人，第一第二隊爲共軍團級以上幹部（第一隊爲紅一方面軍幹部，第二隊爲紅二、四方面軍幹部），第四至第八隊爲營連級幹部，第九至第十四隊則爲共黨白區工作幹部或外圍團體的非黨幹部，其中第十四隊爲女生隊。學員受訓期間爲六個月或八個月，名義上雖稱之爲軍政大學，實際是以政治教育爲主的訓練班。校訓（共黨稱之爲校風）是「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八個字。

二、中央黨校：校長原爲董必武，遷入延安後，改派羅邁爲校長，校址位於延安東面之山溝內（離延安約十華里），以一天主教堂爲課室，學員僅三百人，大都爲共黨之地方黨政幹部，若干自白區來延之共黨幹部，亦派至黨校作短期訓練。受訓之基本條件，必須是黨員。一九三七年七月，江青（藍蘋）到了延安，由於她的黨籍發生問題（在白區長期與黨脫離關係），被留在招待所考查了幾個月，直至是年十月，才恢復黨籍，送至黨校受訓。

三、陝北公學：陝公是一所統一戰線的學校，凡是到延安的青年，不問黨派、階級、出身，只要不是漢奸、托派，都可以到陝公受訓，因而入陝公的青年，有各黨各派的，也有國民黨所派遣的情報人員，份子相當複雜。校舍設於延河之東的清涼山下，與延安僅有一河之隔。校長成仿吾，學員初期有五百人，後來逐漸增加至兩千人。「忠誠團結、緊張活潑、艱苦奮鬥」是該校的校訓。

四、魯迅藝術學校：這是一所專門培養藝術人才的學校，後來改稱爲藝術學院，內分戲劇、音樂、美術三部份，包括話劇編導與演出，音樂的演唱，歌舞的教導等等。校舍設於延安城內，學員百餘人，

大都是由白區（後改稱統戰區）前來的男女青年。校長沙可夫，是一位留俄學生。

五、青年訓練班：在吳堡所設的青訓班，是少共中央主辦的，目的是訓練青年工作幹部，當時在統戰區來延的「民族解放先鋒隊」幹部，大都送至吳堡受訓。該班由馮文彬任班主任。

共黨招收與訓練大批青年的目的，是爲著在統戰區開展共黨的組織和工作，因而在各訓練機構中，大批吸收學員入黨，結業後，再派往全國各地工作；其中不够入黨條件的青年或其他黨派人員，則施以抗日統戰教育，使其返回各地後，配合共黨的統戰政策，推進統戰活動，成爲共黨的同路人。

由於中共中央對於這些訓練機構的重視，尤其對於抗大更寄予熱切的期望，因而把許多高級幹部都派到抗大當教員、隊長、指導員或學員，如陳賡、何長工、聶鶴亭，邊章五、康克清（任女生隊長）等都曾任抗大隊長。又如劉亞樓、楊成武、莫文驊、耿飜、張愛萍、譚家述、蘇振華、唐天際、曹理槐、許世友、王建安、洪學智、詹才芳等也曾在抗大當學員。

抗大、黨校、陝公的課程大體包括：黨的建設（限於黨校講授），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包括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基本問題，統一戰線，社會進化史，哲學（包括唯物辯證法），政治經濟學，聯共黨史，列寧主義以及若干軍事課程如戰略與戰術，游擊戰爭等等。每一課程之講義或教材，均由中共中央負責人直接指導編寫，由各校講授同一課程之教員組成某一課程之研究委員會，以中共中央負責人爲該委員會之主任委員，如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研究委員會（包括中共黨史與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之研究），由總書記張聞天任主任委員，成仿吾、何幹之、陳伯達、陳然（負責編寫）等爲委員；哲學研究委員會

，亦由張聞天主持，以艾思奇、張如心等爲委員；列寧主義與聯共黨史則由秦邦憲負責，吳亮平、羅世文等參加；其他課程之講授負責人爲：政治經濟學——張國燾，社會進化史——董必武，統一戰線——何凱豐，黨的建設——羅邁，戰略戰術——毛澤東，游擊戰爭——朱德。

在這些訓練機構內部，時常發生問題，如在抗大、陝公，偷竊事件曾流行一時，好些學員的鋼筆手錶失竊，中共的特務人員爲此曾破獲一些案件，據說這些行竊的學員都是托匪（中共罵托派爲托匪漢奸），於是在校內便大張旗鼓的開展反托匪漢奸的鬥爭；這些被鬥爭的學員，雖然不承認行竊，更不承認是托派，可是從此便不知下落了。

在男女關係上，發生過槍殺事件：抗大隊長黃克功，出身紅三軍團，曾任紅三軍團師級政治部主任，他熱戀陝公女生劉茜，劉茜係山西來陝的年青學生，後來她變了心，黃克功氣憤不過，在六月（一九三七年）的一個晚上，把她槍殺了。這一事件，引起陝公學生的憤怒，中共中央爲了平息衆怒，乃逮捕黃克功，並於清涼山下（陝公操場）舉行公審大會，傳達中共中央判處黃克功死刑的決定，會後把黃克功槍斃了。

中共中央遷入延安後，爲加強宣傳工作，開始出版機關報「新中華日報」和機關刊物「解放」；在黨內則充實「黨的工作」期刊，以加強黨內教育工作（註一〇）。

四、鬥爭張國燾與暴動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在延安駐定之後，才開始鬥爭張國燾，其所以遲遲與張國燾作鬥爭，原因在於：第一，張國燾於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初率部抵達保安時，正值共黨共軍準備分散游擊，旋又發生西安事變，忙於應付時局變化，無暇計及張國燾問題。第二，張國燾的西路軍，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以前，尚未完全失敗，鬥爭張國燾不無顧忌。第三，張國燾尚擁有第四第三十一兩個軍，這些部隊均掌握在其親信幹部手中，如果匆忙開展鬥爭，勢將導致部隊的反抗與分裂。因此，中共中央除歸併紅四方面軍之紅軍大學外，并以調訓爲名，將紅四方面軍團級以上幹部，全部調抗大受訓，另派紅一方面軍親毛反張幹部接管紅四方面軍，這樣把張國燾的武裝解除後，而張國燾的西路軍恰好又於一九三七年三月在甘肅酒泉被消滅，於是鬥爭張國燾便開始了。

一九三七年三月，中共中央各直屬機關，抗大、黨校各訓練機構，各武裝部隊，在中共中央指導下，紛紛召開「活動份子」會議（後來改稱「積極份子」會議，實際就是幹部會議）清算張國燾的錯誤，中共中央黨內刊物「黨的工作」刊載了「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路線報告大綱」，作爲清算鬥爭的依據。中共中央所指張國燾的錯誤路線，「中國共產黨簡史提綱」曾作如下紀述：

「在紅軍長征行軍中，產生了右傾逃跑主義——國燾路線。這是以張國燾（當時他是中央委員，蘇維埃副主席）爲首的右傾逃跑主義。國燾路線的錯誤，主要表现在：

「（1）過高估計敵人的力量，過低估計革命力量，對國民黨的進攻表現動搖，對革命失掉信心。

「（2）破壞了黨的統一性的紀律，向黨鬧獨立性，鬧宗派主義，組織了以張國燾爲首的偽中央委員

會。

「(3)破壞了工農紅軍對人民的嚴肅的紀律，對土地革命的執行缺乏明確的階級分析和階級路線，這樣的結果，使紅軍方面未能得到廣大羣衆的擁護，戰鬥力大大的削弱。

「(4)在幹部政策上，對犯錯誤的幹部，採取打擊和懲罰主義，對幹部的教育是非常不夠的。

「由於以上的錯誤，張國燾路線使紅軍戰鬥力大爲減弱，加上脫離羣衆的現象，其結果是不堪設想的。

「一九三七年春，在全黨全軍的範圍內，展開了反對張國燾路線的鬥爭，明白地指出張國燾路線的實質是右傾機會主義；在軍事方面的表現是右傾逃跑主義；在黨的作風上是個人獨裁和狹隘的宗派主義；在與羣衆的關係上是軍閥主義。」（註一一）

在各機關、各學校、各部隊展開反張國燾錯誤路線鬥爭之後，中共中央於四月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正式面對面鬥爭張國燾。到會人員四十餘人，包括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和有關軍政幹部，張國燾亦以政治局委員身份出席會議。會議由總書記張聞天主持，他宣佈會議討論專題是檢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亦即「長征」期間黨和紅軍分裂的教訓之檢討，顯然這是專門鬥爭張國燾的會議，於是與會人員便紛紛指責張國燾的錯誤，從政治、組織、軍事、蘇維埃問題、肅反政策以及羣衆運動方面，把張國燾所領導的紅四方面軍與所創造的蘇區（鄂豫皖蘇區和川陝蘇區），批評得一無是處，而其重點則集中攻擊其政治上的機會主義路線，組織上分裂黨自立中央，軍事上分裂紅軍造成西路軍失敗等等錯誤。

這次會議，攻擊張國燾最爲激烈而又最引人注目的有下列各人：

彭德懷批評張國燾違反毛兒蓋會議的決定，擅自率軍南下，造成紅軍的分裂，同時自立中央，破壞了黨的團結，而對四方面軍的領導，則形同軍閥與土匪，把軍隊作爲個人的工具等等。由於彭德懷出身行伍，是一個老粗，他的發言聲高而粗野，類似罵人，引起全場的注視。

賀龍的發言最爲粗野狂妄，他說：「張國燾！你是知識份子出身，又是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也可以說是共產黨出身，而我呢！則是土匪出身，又當過軍閥，也可以說是軍閥出身，我現在由土匪、軍閥變成了共產黨，而你則由知識份子、共產黨變成了土匪、軍閥。張國燾！現在請你和我比一比，你現在成了什麼樣的屁人物？」賀龍這段無理謾罵，引得全場哄然。

羅世文（註一二）因有托派嫌疑，曾被四方面軍長期監禁，在會議中乃大肆抨擊張國燾的肅反政策，他以自身所受苦況爲例，歷數四方面軍在肅反中屠殺知識份子的情況，說到自身所遭受之痛苦時，竟是聲淚俱下，到會人員亦爲之動容。

其中說話最下流而又最可笑的是廖承志，因他有反革命嫌疑（註一三），被四方面軍長期禁閉和監視，因而在會議中繼續攻擊張國燾的肅反政策，并特別著重於形容肅反工作中的男女關係問題，他說紅四方面軍同志逮捕了土豪劣紳的妻子或女兒時，有的讓士兵輪姦至死，有的則以各種最下流最陰毒的刑罰來玩弄他們的陰戶（他列舉了許多使人不忍聽聞的刑罰辦法作例），直到這些人無法忍受時，始加以處死；最後他幽默而大聲喊道：這就是張國燾的路線，這就是張國燾玩弄女人的妙術。

在會議中，張國燾曾經憤慨而激動地駁斥所有對他的批評，並不承認有什麼路線錯誤，他說，所有這些批評，都是虛構與誣蔑，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你們的所謂批評，簡直是對我黨我軍（四方面軍），對鄂豫皖和川陝蘇區的不可容忍的侮辱，關於我個人，士可殺而不可辱，是可忍孰不可忍？如果說我黨的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傳統，就是這樣的無理謾罵與任意誣蔑和侮辱，那麼，中國革命將被斷送，而我黨的前途也是可悲的。

張國燾憤激的抗辯又引起了其他與會人員的反駁，最後還是會議主席張聞天打圓場，他一面批評若干過火的發言，並說明其動機是善意的，一面又規勸張國燾從長細心檢討；政治局擴大會就在互相對罵與面紅耳赤的爭辯中結束（註一四）。

三月和四月的延安，掀起了鬥爭張國燾的高潮，但也引起了紅四方面軍幹部的激動和反抗，他們認為這種無理的鬥爭，不僅侮辱了張主席，同時也侮辱了所有紅四方面軍幹部，繼續留在延安，只是等待挨鬥，已經沒有前途了，因而到處議論紛紛，密謀反抗與另找出路。四月初，在「抗大」遂爆發了擁張（國燾）反毛（澤東）的暴動事件。

紅四方面軍幹部被調至抗大受訓的共有百餘人，其中四十個團級以上的幹部憤恨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對張國燾的無理鬥爭，遂密謀反抗暴動，另找出路。主要份子為：許世友（紅三十一軍軍長，前騎兵總指揮）、詹才芳（紅三十一軍政委，前九軍政委）、王建安（紅四軍政委）、劉世模（紅四軍副軍長）、洪學智（紅九軍政治部主任）、朱德崇（三十三軍參謀長）、詹道奎（師政委）、汪乃貴（三十軍師

長）、韓東山（九軍二十五師師長）、鄒國厚（團長）、孔慶德（團長）、石志本（團長）、李國棟（四軍政治部科長）等人。

這些紅四方面軍幹部都攜有短槍，還有帶槍的勤務兵，他們計劃以此武裝為基礎，先收繳抗大衛兵及守城衛隊槍枝後衝出延安，然後與原四方面軍之紅四軍紅三十一軍聯合行動，以此兩軍武力，另建新根據地，如無法聯絡四軍三十一軍時，則單獨進行游擊戰爭。他們暴動的口號是「打倒毛澤東，擁護張主席」。

在計劃暴動當時，他們曾研究是否要先和張國燾聯絡，或把張國燾一併挾帶出去，結論認為在今天不能拖累他，要待暴動成功，找到四軍三十一軍并開始行動之後，再派人請張國燾前來領導。同時也會討論到要不要找何畏（前九軍軍長，紅四方面軍「紅大」政委）參加暴動，後因顧慮到何畏在懋功作戰左腿受傷後行動不便而作罷。

可是，當他們準備暴動的當晚，全體四十人均為中共當局一網打盡，一起逮捕起來了，這場反毛擁張暴動，就此流產失敗。其原因是參加暴動的李國棟曾向中共中央告密，他們的一切計劃和行動事前均在中共中央控制之下。李國棟之所以告密，則是為著「愛人」問題：李曾搶奪徐夢秋（註一五）的妻子，當計劃行動時，李捨不得離開這個新歡婦人，遭受四方面軍幹部的批評，李在羞憤之餘乃向中共中央告密，致暴動計劃，全歸失敗。

密謀暴動份子遭捕後，中共中央指派董必武、李克農、杜理卿等人組織審判團，以董必武為審判長

，嚴審暴動份子之圖謀與幕後指使人，特別指名追詢暴動與張國燾的關係，窮追結果，只能證明鬥爭張國燾就是引發這次暴動的基因，審判團只好以分別判處徒刑結束這一暴動案件。直到是年（一九三七）七月，抗戰爆發後，這批服刑人員才陸續釋放（先釋放團級幹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六中全會通過「大赦令」，才撤銷了這批暴動份子的處分與徒刑（註一六）。

延安的擁護反毛暴動雖被事前鎮壓下去，可是由於張國燾不承認錯誤，影響四方面軍各級幹部的情緒，到處議論紛紛，傳播張國燾如何反駁政治局擴大會的批評，同時還流傳這樣的說法；兩個中央和紅軍分裂是國際代表調解的，調解的條件是不算舊賬，現在鬥爭張主席（國燾），顯然是清算舊賬和報復主義，以後所有紅四方面軍幹部都要遭殃；組織西路軍，進兵甘肅走廊，靠近新疆是國際的指示，張主席不能担負西路軍失敗的責任，毛澤東見死不救，才應對西路軍失敗負責；張主席是國際執委，他執行的是國際路線，毛澤東鬥爭張主席，國際不會同意等等；這種傳言，使四方面軍幹部更爲動搖悲觀，有的攜槍逃跑，有的打算再打游擊，還有的準備再暴動，情勢十分嚴重。

在這一情勢下，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除安撫四方面軍幹部外，并請朱德等人一再向張國燾進言，勸他以黨的利益和全局爲重，要他承認錯誤并發表申明書，以安定四方面軍幹部的情緒；張國燾被糾纏不過，勉強寫了百餘字的空洞的聲明書，作爲應付過關，題爲「我的錯誤」，聲明書說：

「經過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許多同志對於我的錯誤的澈底揭發，使我對自己的錯誤有更深的了解。的確，我的錯誤是整個路線的錯誤，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退却路線和軍閥主義最壞的表現，是反黨反中央

的錯誤，這一錯誤路線不僅在各方面表現它的惡果，使中國革命受到損失，而且造成極大罪惡，客觀上幫助了反革命。」（註一七）

在一般共黨幹部看來，這是毫無內容的聲明書，既未揭發事實與經過，又未檢討錯誤的根源，更無悔過改正的表示，顯然是出於敷衍應付的寫法，但中共中央却以此一聲明書作為說服四方面軍幹部的重要資料；事實也是如此，這一聲明書在「黨的工作」發表及再經過反復解釋之後，暫時平定了四方面軍幹部的激動情緒。

五、中共輸誠的商洽

中共自放棄反蔣政策後，即積極向國民黨接洽輸誠，蔣總統的「蘇俄在中國」寫道：「二十六年二月，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着手收編共軍；其關於黨與政治的問題，由周恩來到南京續行商談，仍以四項原則為根據。二月十日，中共中央委員會根據商談的結果，致電本黨三中全会，指出四項原則（參閱附錄二）：：

（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揮；

（三）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註一八)

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於二月二十一日，針對共黨來電通過「根絕赤禍案」，對中共輸誠問題提出下列四項最低限度的辦法：

「第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可許主義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併存者，故須澈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假借名目之武力。

第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故須澈底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

第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相容，與我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須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第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之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使之相殺相讎，故必出於奪取民衆，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之不寧，民居為之蕩析，故須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註一九)

關於中共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文中所提之五項要求(參閱附錄二)蔣委員長於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發表談話，提出「開放言論」、「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三項主張，作為側面的答復。至此，中共的輸誠問題，也就是中共自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已經到了完全成熟的階段。

可是，在中共內部却因國共兩黨的商談，掀起了一場議論與動搖，尤其在致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電文

公佈之後，整個邊區都在議論，軍心民心開始動搖與迷惘，認為取消蘇維埃紅軍和土地革命，無異是向國民黨投降，十年鬥爭白費了，烈士的血也白流了，蘇維埃運動是錯誤了，黨已經喪失了原則性和獨立性等等，有的偏激份子甚至主張與其向敵人投降，還不如拉部隊再打游擊去（註二〇）。這種議論與反映，給共黨以嚴重威脅，為此，中共中央乃在黨內外進行廣泛的解釋與說服工作，並印發「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意義及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会電宣傳解釋大綱」，其中特別說明：

「上述各條（按：指致國民黨三中全会電文中之四條保證）是我們對國民黨一個原則上的讓步，其目的在於取消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便利於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致的反對日本侵略，這個讓步是必須的，因為沒有這個讓步，就不便於組織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就不便迅速實現對日抗戰。這是中央前年十二月決議案與去年九月決議案的具體施行步驟之一部份。

「蘇區中蘇維埃制度取消，施行普遍的民主制度，並不能放棄工人農民已經獲得的政治權利，而要繼續保障之。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並不能放棄工農主要成分與黨的政治上組織上的領導，而要繼續保障之。在全國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並不能恢復蘇區土地剝削制度，而要繼續保障土地在農民手中。且在全國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必須沒收漢奸份子的土地。

「一九二七年黨的八七會議以來，一貫的執行蘇維埃政權與土地革命的路線，是完全正確的，因為那時以來的國內國際環境要求我們執行，也僅能執行這樣的路線。一九三五年黨的八一宣言及十二月決議案以來，我們一貫的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與為着徹底執行此路線，現在又提出取消蘇維埃

制度與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確的，因為此時的國內國際環境要求我們執行，也能够執行這樣的路線。

「總之，中央的政策是從團結全國抗日救亡的歷史任務出發，全黨同志都應徹底了解中央的政策，團結在中央政策的周圍，爲民族階級的利益而鬥爭，爲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全部勝利而鬥爭。」（註二一）

接着，中共中央又發出告全黨同志書，號召全黨同志「爲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而鬥爭」，其中關於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作了更詳細的解釋：

「本黨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四項保證，決不能解釋爲所謂『共產黨的投降』。這些保證，在某種意義上說來是一種讓步，但這種讓步是必要的與許可的。首先因爲這是爲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的必要步驟。爲了團結全國一致抗日，取得中華民族的徹底解放，需要全國各黨各派間的互相讓步與妥協，需要取消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這是本黨兩年來的主張，也是全國人民所擁護與贊助的。其次，這種讓步與妥協，決不是等於取消或降低共產黨組織的獨立性，與批評的自由，也不是等於對於本黨長期革命鬥爭中所創造的組織與有高度警覺的革命力量放棄領導。保持本黨組織的獨立性，與批評的自由，對於本黨所創造的革命力量保持領導，是本黨對國民黨讓步與妥協的最後階段，否則是不能容許的。最後這些讓步與妥協，不但不是束縛與削弱本黨的發展，正是爲了要使本黨取得全國範圍公開活動的機會，千百倍的去擴大黨的政治影響與組織力量，以增強黨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領導作用，沒有這個條件，民族革命是不能勝利的。」（註二二）

六、中共蘇區黨代表大會

一九三七年五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蘇區黨的代表大會，此次會議後來更名為「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更名的原因是：

第一、已經準備取消蘇維埃，原來的陝北蘇區也準備改為國民政府的特區，如再沿用「蘇區」，已不合了。

第二、就以「蘇區」言，亦只限於陝北蘇區，其他游擊區和南方各省并無代表參加，不能代表「蘇區」之全體。

第三、以到會代表分析，除陝北蘇區代表外，尚有華北統戰區代表以及東北軍中黨的代表，足以擴大會議名稱。

第四、會議目的是批准八一宣言以來黨的統一戰線新政策，尤須著重討論與批准致國民黨三中全会電之四項保證，蘇區黨的代表會議無批准此項全國性策略轉變之權力。

因此之故，後來便把這次會議誇大，稱之為全國代表會議。

這次大會，到會代表共百餘人，主要人員有：張聞天、秦邦憲、何凱豐、朱德、毛澤東、張國燾、彭德懷、林彪、任弼時、楊尚昆、李富春、林伯渠、賀龍、徐海東、朱理治、郭洪濤、王首道、羅邁、陳賡、王震、朱光等人，其中還有統戰區北方代表劉少奇，北方學生代表李昌（李任北平民族解放先鋒

隊總隊長），北方婦女代表陳少敏（女），東北軍代表劉瀾波（國軍師長劉多荃之弟，任東北軍共黨上層工作委員會書記），小項（任東北軍共黨工作委員會書記）等人。

會議從五月三日開始，直到五月下旬始結束，其間還因劉少奇的報告發生問題而中途休會。會議雖然組織了主席團，以張聞天、毛澤東、朱德、秦邦憲、張國燾、林伯渠、林彪為主席團成員，但實際主持會議的還是總書記張聞天（註二三）。

會議主題為討論與通過兩個報告。第一個報告為毛澤東的政治報告，「報告提綱」取名為「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子題分：「民族矛盾與國內矛盾的目前發展階段」，「為民主與自由而鬥爭」，「我們的領導責任」，其主要內容如下：

毛澤東認為「由於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與服從的地位，而產生的國際關係與國內階級關係的變化，形成了目前革命形勢新發展的階段。

「從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按：指北平一二九運動）開始的中國革命新時期的第一階段，至一九三七年二月國民黨三中全會時宣告結束了。

「目前的階段，即從國民黨三中全會到開始實現全國性對日武裝抗戰之時的階段，是中國革命新時期的第二階段。……所以爭取民主，是目前發展階段中革命任務的中心一環。」

關於中共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所提四項保證，毛澤東在報告中解釋為：「這些保證，是必須的與許可的。……這是一種有原則有條件的讓步，拿這種讓步去兌換全民族所需要的和平、民主、與抗戰。」

……如果說這是共產黨的投降，那不是阿Q主義，就是惡意的污蔑。」

關於三民主義，毛澤東說：「共產黨是否同意三民主義？我們的答復：是同意的。……我們不但拒絕三民主義，而且願意堅決實行三民主義的。」

「我們過去蘇維埃口號是否錯了？沒有錯的……蘇維埃口號，過去的提出與今天的放棄，都是正確的。」

「在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而鬥爭的任務之下，紅軍與蘇區的任務是：①把紅軍提高到適合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的新階段。為此目的，紅軍即改組為國民革命軍，並將軍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到超過自己現狀及一切國內軍隊的水平之上，造成民族革命戰爭中的模範兵團。②蘇區改變為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組成部分，實行新的民主制度，重新編制保安部隊，肅清漢奸搗亂份子，造成抗日與民主的模範區。③在此區域內實行有計劃的經濟建設，恢復與增進人民的經濟生活狀況。④以消滅文盲為目的，實行有計劃的文化建設。」（註二四）

大會對於毛澤東的報告，曾加討論，雖有若干不同意見，經毛澤東在結論中解釋後，乃予通過。

大會的第二個報告，為劉少奇的「十年來的中國共產黨」，劉少奇當時係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以其身份言，不配作此一全般工作總結性的報告，但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他代表中共中央作十年（一九二七—一九三七）來中共工作的總報告。在遵義會議的爭論中，劉少奇就曾指責中共中央對白區工作的領導，犯了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關於四中全會以來，中央的總路線是否正確，也曾要求檢討。劉少奇這

種觀點，在「十年來的中國共產黨」報告中，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認爲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白區黨的工作應該組織退却和防禦，避免和敵人決鬥；白區的羣衆工作特別是職工運動應利用公開合法手段，以積聚羣衆力量，提高其覺悟程度；對於羣衆鬥爭，只能根據其覺悟程度及其所能接受的要求，提出部份口號，去發動羣衆。可是在已往十年來，在革命形勢轉入低潮時期，黨在白區工作方面，拒絕退却和防禦，拒絕利用一切合法可能，更拒絕公開工作與祕密工作之配合，依然採取進攻路線，不顧白色恐怖的嚴重，組織脫離羣衆的龐大的黨的機關、赤色職工會和赤色羣衆機構，不顧主客觀環境之惡劣，不斷號召政治罷工、同盟罷工，組織示威遊行與飛行集會乃至武裝暴動，結果遭受不斷的打擊和失敗，徒然犧牲了僅有的力量和基礎。一九二七年「八七會議」後的盲動主義，一九三〇年的立三路線，一九三一年四中全會後的組織破壞，都是左傾冒險主義錯誤的惡果，而爲十年來我黨的痛苦教訓。

劉少奇的報告很長，還說到十年來共黨在各方面的成就，可是上述基本觀點，却貫穿着全部報告的每一重點，成爲檢討中共中央領導錯誤的一篇報告。因此，劉少奇的報告引起全場激動，當即遭受猛烈的攻擊。張聞天、秦邦憲、何凱豐、陳賡等立即予以批評反駁，認爲這一報告，是對共黨十年來艱苦奮鬥的誣蔑，是對十年來犧牲流血的烈士的侮辱，也是對黨的正確領導和共產國際正確指導的否定和歪曲，他們分別列舉事證連續加以反擊，結論是劉少奇的報告充滿了托陳取消派攻擊共產國際攻擊中國共產黨的論點，客觀上幫助了敵人，幫助了托陳取消派，成爲他們的代言人和應聲蟲。這一攻擊，有如連珠砲響，主席無法遏止，全場爲之騷然。旋經主席團商議後，宣佈休會，一場激烈的論戰始告結束。

休會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了會議，劉少奇受到嚴重的批評。大會復會時，宣佈取消劉少奇的報告，由總書記張聞天再作「十年來的中國共產黨」的報告，他認為十年來中共中央的總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其間雖然有過盲動主義與立三路線等錯誤，但為時甚短，在共產國際的指導下，很快就糾正了。他針對劉少奇的觀點逐條加以駁斥，認為白區工作的挫敗，是基於嚴厲的白色恐怖與缺乏祕密工作經驗情況下極難避免的一種損失，絕不能因此而否定黨的總路線的正確。

張聞天的報告，於會後改寫為「關於十年來的中國共產黨」一文并公開發表，在這篇文章裏，刪去批駁劉少奇字樣，改稱對托派和民族資產階級代言人王芸生的駁斥，同時把白區工作檢討部份，以及今後在統戰區如何利用公開合法，公開合法工作與祕密非法工作如何配合等等具體工作問題全部加以刪除，文章所包含的，僅僅是他的報告的一半（註二五）。

張聞天寫道：

「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托洛斯基派，是中國共產黨最公開的與露骨的敵人……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世界法西斯蒂的警犬托洛斯基派在這方面表示了他的最大的積極性。

「但是還有一批人，主要的是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言人，……他們却要用一切方法證明中國共產黨過去十年來的一切，都是錯誤的。比如『國聞週報』的編輯王芸生氏就是這樣的一個。他在『三寄北方青年』的一篇文章中說：

『這十年來，共產黨一直在錯誤中過生活。八一暴動，秋收政策，立三路線，游擊蘇維埃，一

直到流竄西北，那一項不是錯誤？要知道一個行動的黨，它若執行了錯誤的政策，不僅是一個黨的損失，而且直接關係國運的。請共產黨想一想，這十年來你們給予國家的影響是什麼？殘酷的廝殺，斲喪了無限的國力，是給誰謀了福利？聽聽口號，看看事實，不慚愧嗎？當然錯誤是不能完全避免的，我是希望大家以後少犯錯誤，發現了錯誤須趕快改，我不是爲某一黨謀，實是爲了我們國家的生命」（『國聞週報』十四卷，第五期）

「從武漢國民政府開始叛變之日起，中國共產黨即召集了『八七緊急會議』，八七會議完全不是什麼『盲動主義的開始』，……八七會議所決定的方針是唯一正確的。

「誰能責備八七會議前後的『南昌暴動』，『秋收暴動』，『廣州暴動』爲『盲動主義』呢？」

「一九二八年八月開的中國共產黨第六次代表大會，正確的總結了過去大革命的經驗與教訓，指出了以後奮鬥的總方針。

「中國共產黨在六次大會的總方針下奮鬥了九年，雖是我們沒有能够『把蘇維埃的紅旗插遍全中國』，然而在這一方面也取得了相當的成績。我們創造了許多蘇維埃的根據地，其中最大的是閩粵贛邊的中央蘇區，在那些地區我們實現了一切有益於中國人民的辦法……。

「在國民黨區域內，中國共產黨在最黑暗的白色恐怖的統治下，始終不動搖的爲了民族與人民的利益奮鬥到今天……。

「中國共產黨絲毫不否認，他在六次大會之後，曾犯過立三路線的錯誤。這一錯誤曾經給了我們黨

以很多的損失。然而立三路線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機關內佔到統治地位不過半年（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一九三〇年底），四中全會很快的糾正了這一錯誤……。

「總結起來，我們應該說中國共產黨十年來的鬥爭，是獲得了偉大成績的。這些成績就是：（甲）在發動組織與領導全中國人民反日反帝的民族解放鬥爭中，喚起了全國人民的民族覺醒；（乙）在發動組織與領導工農小資產階級的一切政治經濟的鬥爭中，提高了他們覺悟的程度與鬥爭的力量；（丙）創造了工農自己的蘇維埃政權與紅軍——推動中國革命前進的偉大因素；（丁）首先提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並爲了促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奮鬥至今，爲中華民族開始打下了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戊）鍛鍊了中國共產黨，使他成爲同中國人民有密切聯系的堅強的戰鬥的黨。」（註二六）

張聞天的報告獲得大會順利的通過。

張聞天於報告結束後，向到會人員提出緊急建議說：日軍侵略華北的大戰即將爆發，華北黨應即發動武裝鬥爭，把主要力量轉入農村，在農村中進行游擊戰爭，留在城市的工作同志要嚴格的轉入地下，繼續秘密活動并策應游擊戰爭。他建議和催促到會人員儘速返回崗位，緊急佈置工作，以迎接戰爭之來臨（註二七）。

這次大會，張國燾雖是主席團成員，但僅到會一次并以自我批評的態度作簡短的報告，題爲「從現在看過去」，意謂如果從現在情勢的發展看過去的所作所爲，那是錯誤了。他這寥寥數百字的自我檢討，後來被刊載在「黨的工作」上。他報告結束後，即離開會場，因而引起若干與會人員的不滿，陳少敏

(女)首先起立發言，她說：照張國燾同志的說法，如果從過去看過去，豈不是都是正確的了，中央負責同志犯了錯誤，可以輕描淡寫的一筆帶過，我們以後犯了錯誤，也要好好學習效法。到會的紅四方面軍幹部當即要求發言，大有爲張國燾辯護之勢；會議主席鑒於又將發生爭論，乃宣佈停止發言，并說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中央已予檢討批判，大會不必重復討論；國燾同志過去固然有其錯誤，然而對黨也有很大功績，不能一筆抹煞，一場爭辯局面乃告平息（註二八）。

七、關於劉少奇的問題

蘇區黨代表大會之後，劉少奇被免除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的職務，降調爲中央組織部祕書長，這一措施，顯然是對他所作右傾機會主義報告的一種調職處分。不過，他曾經在遵義會議與毛澤東聯手打垮了秦邦憲，成爲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在毛澤東的支持下，不久又升爲中央幹部部部長，從此扶搖直上，成爲毛澤東的繼承人和僞政權主席。可是，三十年之後，即一九六七年，劉少奇被毛澤東指爲「中國赫魯曉夫」和「大叛徒集團的總頭子」，其罪行恰好就是正當毛澤東全力支持劉少奇期間，即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劉少奇在北方的所作所爲；當日稱之爲「白區工作的模範」，現在却斥之爲「大叛徒集團的總頭子」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九日，「文匯報」、「解放日報」、「支部生活」編輯部，共同發表了一篇「策動叛黨就是爲了篡黨」的專論，文章寫道：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滾滾怒濤，把黨內最大的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一個又一個地拉下了馬。轟然一聲，革命的紅衛兵小將和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揭出了一個潛伏在黨內的，多至幾十個人的大叛徒集團，……………。

「這個大叛徒集團的總頭子是誰？現已查明，不是別人，正是中國的赫魯曉夫（作者按：指劉少奇）。在抗日戰爭爆發前夕，他一方面大肆宣揚叛徒哲學，一方面策劃和決定一些人自首變節。一九三六年，他利用主持北方局工作的機會，通過當時竊據中央領導職務的一個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作者按：指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背著毛主席，盜用黨中央的名義，向獄中傳達他的『指示』，允許寫自首書出獄，允許寫『反共啓事』登報。這個叛賣革命的指示下達後……………：那一伙叛徒，本來就企圖叛黨保命，中國赫魯曉夫的『決定』就成爲他們自首叛黨的『合法』根據。於是，這一伙無恥的叛徒，在中國赫魯曉夫的庇護下，從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這一段時間內，陸續發表了反動透頂的『反共啓事』，拜倒在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敵人面前，表示『誠心悔悟』，並履行了簽名、打手印及參加『自新儀式』，領取『自新證書』等叛賣革命的『手續』，從反動派『恩賜』開放的狗洞裏爬了出來。」（註二九）

這篇聯合專論所指劉少奇罪證，係根據紅衛兵調查得來：天津「紅代會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於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編印揭發劉少奇叛徒集團的專輯，專輯中說：「我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戰士……………頑強戰鬥近四個月，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終於把劉少奇、薄一波、安子文大叛徒集團挖出來了。」

「這批反共啓事，是我們調查高仰雲的問題時在國民黨的『華北日報』上查出來的，格式內容文字都完全一致，從一九三六年八月五日到十一月一日共有十幾批，查出共七十七人。」如徐子文（卽安子文）、張宗璞（卽薄一波）、楊仲仁（卽楊獻珍）、劉華甫（卽劉瀾濤）等九人的反共啓事，原文如下：

「子文等前因思想簡單，觀察力薄弱，交游不慎，言行不檢，致被拘禁於北平軍人反省分院反省自新。當茲國難時期，凡屬中國青年均需確定方針爲祖國利益而奮鬥。余等幸蒙政府寬大爲懷，不咎既往，准予反省自新。現已誠心悔悟，願在政府領導之下，堅決反共，作一忠實國民。以後決不參加共黨組織及任何反動行爲，並望有爲青年，俟後莫再受其煽惑，特此登報聲明。（一九三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二日『華北日報』第二版。」

天津紅衛兵報同時公佈了山西反省院叛徒集團的名單，這些人以同樣方式發表「反共啓事」出獄。此外，毛派「追窮寇」刊物，則公佈了在江蘇反省院自首過的叛徒名單。綜合起來，被毛共指爲劉少奇叛徒集團的叛徒已經公佈的共有一百七十人（參閱附錄三）。

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的專輯，同時也刊載了劉少奇所持的理由與說法：「劉少奇之流認爲：寫反共啓事出獄，並不能算是叛徒，當時只不過是爲了欺騙敵人一下，是假投降。」「劉少奇說：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寫反共啓事出獄，正是具體的共產黨人的革命氣節。」「寫反共啓事，是組織決定，上級命令，我們得服從而且是爲了保存革命實力。」等等。

這裏，問題的關鍵在於，寫反共啓事是否爲中共中央「組織決定」，這種「決定」是否背著毛澤東

，以及這種「決定」是否有利於中共的問題。

據陳然先生說：一九三六年以前，中共的白區組織幾乎全被國民黨破壞，絕大多數共黨白區工作幹部被關在反省院反省，中共中央爲了營救這批幹部并爲開展邇後白區工作着想，故有准許假投降假自首并寫反共啓事出獄的決定，這個決定不但北方的劉少奇執行，其他各地如南方的閩粵贛邊省委也得照樣遵辦，中共閩粵贛省委曾經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作了若干具體的規定，發出組字第一號通知（見附錄四），足見這一問題的的確確是「組織決定」，而不是劉少奇「盜用黨中央的名義」的「指示」。

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的專輯說：「劉少奇給當時在延安的張聞天寫了一封信，說現在監獄中有一批幹部，想早些處理這批人，所以想讓他們履行一個手續出來……張聞天簽字復信後，……劉少奇又一次指示獄中人叛變。」這裏正說明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已經批准了劉少奇的處置，可見，這不是劉少奇的個人「指示」，而是以張聞天爲首的中共中央的重要決策。

說是「背著毛主席」，或「瞞著毛主席、黨中央及其他領導同志」一節，顯然也是推卸責任諉過他人的謊言，緣因：

第一、當時毛澤東不但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且是中央書記處書記之一，類此有原則性之重大決策，必須經過書記處討論後始能作出決定。毛澤東既係書記處書記之一，焉有不知之理？

第二、中共中央組織部曾發出「關於自首自新份子的決定」，省級單位如閩粵贛邊省委又根據這一決定發出通知，足見這是共黨黨內的公開文件，安能瞞過毛澤東或中共中央其他人員？

第三、「華北日報」連續幾個月刊登反共啓事，出獄人員一批批返回延安，這又安能瞞過毛澤東或其他任何人？

第四、這批出獄人員，曾經通過「報社、出版社、廣播電台，大肆吹噓他們的獄中生活，和監獄鬥爭的『光榮歷史』。」「薄一波、安子文之流，這個叛徒集團賊心不死，先後於一九五〇年、一九五六年、一九六〇年，三次於北京集會，碰頭開會，并在反省院照相留念。」既然出獄人員如此自我宣傳，那就不致於欺瞞過任何人了。

第五、「在黨的七次代表大會（一九四五年）上，劉少奇企圖規定有變節、自首行爲的人，也可以做中央委員。并且也的確把彭眞、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楊獻珍、廖魯言等安插進中央委員會，還把彭眞、薄一波、劉瀾濤等提拔到中央政治局、書記處。」這當然不但不能背著毛澤東，而且必定取得毛澤東的支持和贊助的。

第六、「在黨的八次大會（一九五六）年前，劉少奇、鄧小平還專門召集中央各部門負責人開會，研究如何看待登報自首的問題。在討論過程中，劉少奇特別強調登報自首的人有些是假自首，騙敵人的，不能稱是政治上的錯誤。還有些是生死關頭怕死，并不是叛黨。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的一手操縱下，會議最後決定起草一個文件，訂出『六條規定』。」（註三〇）既然開會討論，而且訂出六條規定，那在中共黨內已經是盡人皆知的事了。

至於准許假投降假自首是否對中共有利一節，就當時情勢論，中共白區組織瓦解，幹部缺乏，其活

動侷促邊區，處此惡劣情勢下，以假自首手法，救出大批幹部，開展統戰區工作，為邇後抗戰期間擴張實力及竊據大陸打下基礎，無疑對中共是有利的。

可是，三十年後，毛澤東對這批三、四十年來始終為共黨坐牢賣命的幹部，忽然要加以清算，且以叛徒論處，同時把一切責任諉諸劉少奇，目之為「大叛徒集團的總頭子」，此中原因，顯然是毛劉權力鬥爭的藉口，也是毛澤東當年在富田整肅異己的故技，絕無是非曲直可言。中國有句古語：「烏盡弓藏，兔死狗烹」，這就是這些共黨幹部的悲慘寫照。

註一：蔣總統「蘇俄在中國」七二—七六頁。

註二：蔣總統「蘇俄在中國」七九頁。

註三：陳然先生轉據蔡乾先生所提供之資料。當時蔡先生擔任中共中央白軍工作委員會所派出之北線白軍工作委員會書記，負責白軍工作與戰俘之訓練。

註四：范長江「陝北之行」，載於黃峯編「第八路軍行軍記——長征時代」九四頁，一九三八年一月漢口光明書店總經售。

註五：全上書九九頁。

註六：李克農為中共特務頭子，曾任僞外交部副部長、中共中央社會部（即特務部）部長兼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一九六二年二月九日死於北平。抗戰期間，曾以八路軍駐桂林通訊處主任名義為掩護，從事統戰區之特務工作。其時陳然（即郭潛）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兼新四軍駐贛辦事處處長，有關大後方之統戰情報工作，經常與李克農聯系接洽。

註七：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紅四方面軍與紅一方面軍之兩個紅軍大學合併後，陳先生仍在紅大任教，對於西

安事變在保安之反映及毛澤東之演講等係陳先生親身經歷之報導。

註八：陳然先生轉據當時任中共中央祕書長涂振農所談而提供之資料。

註九：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據陳先生稱：一九三九年周恩來至江西，與陳然同道至浙江晤項英，并返原籍紹興，途中曾敘述西安事變經過。一九三八年底，葉劍英代表中共中央向湘、贛兩省委書記傳達六中全會決議，約陳然晤談於八路軍長沙通訊處并乘船遊湘江時亦有同樣之說法。李克農在桂林亦曾向陳然作同樣之報導，李克農并強調稱，此一消息係彼首先得到的，可惜時間上遲了一步。

註一〇：「中共中央遷入延安」一節，為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據陳先生說，當時彼正在延安，一面在抗大、黨校任教，一面任中共中央宣傳委員并參加張聞天所主持的「現代革命運動史研究委員會」，編纂「中國現代革命運動史」，作為抗大黨校講義。

註一一：中共中央「中國共產黨簡史提綱」第八頁，一九五〇年十月再版（油印本）。

註一二：羅世文，四川人，留俄學生，返國後，派至川陝蘇區工作，被認為有托派嫌疑遭捕審訊，後隨四方面軍行動，派有特務人員跟隨監視。至陝北後，入抗大任教，講授列寧主義。七七抗戰後，被派返四川，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後因領導成都搶米暴動，為當局捕殺。

註一三：廖承志為廖仲凱之子，一九三三年三月在滬被捕，旋經其母何香凝請國民黨元老保釋後，被中共派至川陝蘇區工作；經人密告廖在滬被捕時曾向國民黨情報機關密辦自新手續，并為國民黨担任滲透工作，因而遭四方面軍逮捕，西竄期間，派有特務人員跟隨監視，到保安後，始准自由。

註一四：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據陳先生說，他曾參加鬥爭張國燾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同時也參加過鬥爭張國燾的中央直屬機關活動份子會議以及抗大黨校的幹部會議。

註一五：徐夢秋，留俄學生，返國後，曾任紅一軍團政治部宣傳部部长，隨軍流竄至陝北後，被派至新疆省政府任教育廳廳長，因西北寒冷，雙腳凍僵後被鋸去而成殘廢。

註一六：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陳先生說，彼在抗大得悉此次反毛擁張暴動及中共之鎮壓情形，惟若干細節如暴動計劃等等則係轉據參與計劃暴動之朱德崇（紅三十三軍參謀長）所談資料。

註一七：中共中央黨內刊物「黨的工作」第三十一期，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出版。

註一八、一九：蔣總統「蘇俄在中國」第八〇——八一頁。

註二〇：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

註二一：中共中央「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之意義及中央致國民黨三中全會電解釋大綱」，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

日。

註二二：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告全黨同志書，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一冊。

註二三：陳然先生轉據小項所提資料。小項當時任共黨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書記，由西安赴延安，與劉瀾波代表東北軍中共黨出席蘇區黨代表大會。故對會議所作報導，為其親身經歷之資料。

註二四：中共中央印行「毛澤東同志在蘇區黨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及結論」（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至七日）小冊子。此一報告與結論，後來列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二四三—二七〇頁，惟已重作刪改。

註二五：全「註二三」。

註二六：洛甫等著「十年來的中國共產黨」，真理小叢書之五，一九三八年一月五日，解放出版社印行。該書第一篇洛甫之「關於十年來的中國共產黨」一文，註明寫作時間為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日。

註二七：全「註二三」，據小項先生稱：張聞天這一消息報告，事後證明確實，即一多個月後，日軍進攻蘆溝橋（七月七日），抗日戰爭爆發，其情報可能來自第三國際與俄共。

註二八：全「註二三」。

註二九：「紅旗」一九六七年十三期第二十五頁，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出版。

註三〇：均摘自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所出版之「揭發劉少奇叛徒集團內幕」專輯原文，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七日

編印。

附錄一：對西安事變通電

南京孔庸之（祥熙）、孫哲生（科）、馮煥章（玉祥）、陳立夫等先生，及國民黨政府諸先生，西安張漢卿（學良）、楊虎城、王鼎芳（以哲）、孫蔚如先生，暨抗日聯軍西北臨時軍事委員會諸先生勛鑒：

自西安提出抗日綱領以後，全國震動，南京的「安內而後攘外」政策，不能再續。平心其論，西安諸公愛國熱心，實居首列，其主張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諸公，步驟較緩，可是除親日份子外，亦非毫無救國者，其發動內戰，當非心願。以目前大勢，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無非自速其亡。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本黨、本政府謹向雙方提出如下建議：

（一）雙方軍隊暫以潼關為界，南京軍隊勿向潼關進攻，西安抗日軍亦暫止陝、甘境內，聽候和平會議解決。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會議，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並通知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代表參加，本黨、本政府亦準備派代表參加。

（三）在和平會議前，由各黨、各派、各界、各軍先提抗日救亡草案，並討論蔣介石先生處置問題，但基本綱領應是團結全國，反對一切內戰，一致抗日。

（四）會議地址暫定在南京。

上述建議，實為解決目前緊急關頭之合理有效方法。南京諸公，望立即決定國策，以免值此國家混亂中，日寇得乘虛而入也，並望全國人民、各黨、各派、立即督促當局召集和平會議，討論一定國策，共赴國難！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

(錄自延安解放社出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一冊)

附錄二：中國共產黨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会電

中國國民黨三中全会諸先生鑒：

西安問題和平解決，舉國慶幸，從此和平統一、團結禦侮之方針得以實現，實為國家民族之福，當此日寇猖狂，中華民族之存亡千鈞一髮之際，本黨深望貴黨三中全会，本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

- (一) 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 (二) 開放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 (三) 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材，共同救國；
 - (四) 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
 - (五) 改善人民的生活。
- 如貴黨三中全會果能毅然決然確定此國策，則本黨為着表示團結禦侮之誠意，願給貴黨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證：
- (一) 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 (二) 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
 - (三) 在特區區政府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
 - (四) 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 國難日亟，時不我待，本黨為國忠誠，可矢天日，諸先生熱心為國，定能允許本黨之請求；使全民族禦侮救亡統一戰線，從此實現也。我輩同為黃帝子孫，同為中華民族兒女，國難當前，惟有拋棄一切成見，親密合作，共同奔赴中華民族最後解放之偉大前程。謹此電達，佇候明教。并致 民族革命的敬禮！

(錄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一冊)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二月十日。

附錄三：毛派所公佈之劉少奇叛徒集團名單

(一)北平軍人反省院自新出獄者：

薄一波 國務院副總理、國家經委會主任。

安子文 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李楚離 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徐子榮 公安部副部長。

廖魯言 農業部部長。

周仲英 國家經委會副主任。

楊獻珍 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副校長。

高仰雲 河北省政協副主席。

劉瀾濤 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書記。

胡錫奎 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處書記。

賀志平 中國農業機械化研究院黨委書記。

劉錫伍 中央監委副書記。

劉有光 七機部副部長。

劉 昭 軍委總政政幹部部副部長。

胡敬一 中央第二檔案館館長。

第二十七章 中共輪誠前後

- 朱則民 農科院副院長。
劉聚奎 西安東方機械廠黨委書記。
劉文蔚 陝西省工會主席。
劉子久 西北局政策研究所。
唐方爵 黃河水土保委會副主任。
劉尙之 北京內燃機總副廳長。
吳遠福 山西省委統戰部部長。
丁子珍 唐山地區。
王玉堂 山西省文聯祕書長。
馮明新 山西省水利廳水產局局長。
王鶴峯 東北局監察組長。
彭德 大連海洋學院黨委書記。
趙林 吉林省代第一書記。
王新波 大慶油田工委委員、副總指揮。
張正身 哈爾濱鐵路局某工廠。
王德 中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兼組織部長。
付雨田 廣西壯族自治區副主席。
劉愼之 華東局監察組長。
侯正亞 福建省委書記處書記。
趙明新 科學院上海分院長。

王其梅 西藏工委副書記。

(二)山西反省院自新出獄者：

郭洪濤 國家經委會副主任。

江冬 國家建委會綜合局副局長。

龔子榮 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

郝一民 中共中宣部人事處處長。

喬明甫 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

薛向晨 中央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

張茂甫 中國人民銀行信貸局局長。

劉俗峯 全國物價委員會副主任。

王卓如 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副主任。

閻子祥 中央建築工程設計局副局長。

王亞林 中央第二機械部第十局局長。

黎玉 機械部副部長兼山東分局局長。

趙子雲 全國農業展覽館。

趙樹理 中國作家協會理事。

孫芳山 黨北京市監委副書記。

張文昂 北京農機化研究院院長。

周芳庭 北京化工學院黨委書記。

李逸三 北京植物研究所所長。

- 婁瀛先 天津南開大學副校長。
王志成 天津棉花機械製造廠黨委書記。
宋日昌 上海市副市長。
何英才 山西省委常委、山西政協副主席。
馬林 山西省政協副主席。
武光湯 山西省委書記處書記兼偽副省長。
喬峯山 太原市農機局黨委書記。
袁志和 山西省委工業部長。
孫哲聽 太原市副市長。
高順喜 山西電管局行政處長。
姚慶惠 山西省委黨校哲學研究所副所長。
范俊順 山西太谷科學儀器廠黨委書記。
姚青甫 山西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林南 山西手工業管理局副局長。
王文生 山西圖書館。
武俊圖 山西圖書館。
安尙泰 太原鐵工廠。
譚安禮 山西忻縣半工半讀中學。
衛文周 山西××中學校長。
宋二貨 山西大鋼加工廠。

郭欽安 山西省委常委、工業部長。

楊高桐 河北井陘礦務局副局長。

于克昌 河北井陘礦務局副局長。

李子昂 山東省委副祕書長。

劉展一 安徽宿縣專區民政局副局長。

時逸之 西安市市長。

陳雲飛 陝西礦務管理局。

韓其貴 西安草灘農廠廠長。

田世俊 新疆地質局駐西安辦事處。

王時青 西北局總工會。

郭實甫 成都市委書記處書記。

李文炯 四川銀行行長。

閻秀峯 西南局書記處書記。

侯富山 廣州市委監委書記。

劉紹南 河南供銷合作社主任。

王慶生 ××軍區政治部主任。

(三)太原陸軍監獄自新出獄者：

王若飛 當時獄中負責人，已死亡。

趙武生 當時獄中負責人。

辛安亭 甘肅教育廳長。

王道昌 山西大學黨委書記。

劉裕民 國務院建工部長。

席丙五 上海工交政治部主任。

岳維藩 太原市市長。

林 韋 新華社記者、人民日報編輯、國家建委政軍辦公室主任。

李丙全 又名李一農，匪福建省委。

張性軒 山西省人委會工作。

吳振江 曾譯過幾本小冊子，通英、法語文。

蘇國泰 世界語專家，出獄後到延安工作。

張 知

范紀真

紀 勳 擅長蒙古語。

陳 均 作家。

郝玉明 中宣部幹部處處長。

王樹山 財政部工作。

侯壽榮 一九六四年在通縣結核病院養病。

智澤民 西藏人委公安處長。

趙瑞磨 山西省人委。

趙小如 山西省人委。

李生磊 獄中表現不好。

胡兆啓 軍事科學院工作（已退休）。

李安牟 社會科學聯盟新盟互救會。

任善元

郭停業 原名郭大連

韓長太 已死亡

張俊嵩

張興五 原唐山衛山學校校長。

宮志榮

杜元瑾

李洪波

王秋野

（四）太原警備司令部自新出獄者：

胡榮桂 雲南軍區副政委。

梁文英 西康昌都專區專員。

徐布 南京市委書記。

揚對

（五）江蘇反省院自新出獄者：

李初黎 中央海外部副部長

楊放之 國務院副祕書長

徐邁進 國務院文教辦公室副主任

- 章漢夫 外交部副部長
溫宗岳 外交部情報研究所副所長
宋劭文 國家計委副主任
梁膺庸 化工部副部長
李舜琴 教育部司長
盧正義 教育部副司長
丁華 高教育部部長助理
廖體仁 外貿部商檢局副局長
李林 交通部副局長
張鐵璋 水電部
袁也烈 水產部副部長
阿申 文化部戲劇改進局
丁贊 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副所長
陳白塵 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成員
艾青 作家、右派分子
王興讓 全國供銷合作總社局長
袁超俊 國際旅行社游覽局局長
陳穆 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
曾一凡 政協全國委員會副祕書長
唐哲民 工兵司令部副參謀長

廖沫沙	舊北京市委統戰部長
柴川若	舊北京市委
王禹夫	前政法學院歷史研究室副主任
凌子風	北京電影製片廠導演
張有	北京工藝美術學院
曹荻秋	上海市委書記、副市長
馬一行	上海市計委副主任
沙梅	上海音協文聯負責人
葉以羣	上海中蘇友協負責人
管文蔚	江蘇省副省長
方元生	福建省財貿學校
朱明亞	浙江農業大學總務處長
張忍之	浙江建設公司
陸植三	南京民政局局長
匡亞明	南京大學校長
縱漢民	南京藝術學院院長
吳覺	安徽治淮委員會主任
蘇銘熙	遼寧圖書館
宋振鼎	內蒙農辦副主任

(錄自南開大學衛東紅衛兵出版之「澈底埋葬劉少奇叛徒集團」專輯及教育部五七公社毛澤東思想紅衛兵

之「追窮寇」刊物）

附錄四：關於自首自新決定的通知

組字第一號

根據中央組織部關於自首自新的決定，及省臨時代表會對失聯絡及自首自新份子決定，製成通知如下：

一、失聯絡黨員或支部，如在失聯絡期間仍然保存組織，領導羣衆，取得關係時應即承認其組織或黨籍；如失聯絡期間停止活動或表現消極，現在取得關係，應分配工作後，根據工作狀況，重新介紹入黨恢復組織

二、受捕後沒有破壞黨的組織，沒有發表宣言文件破壞黨的政治影響，經黨批准書寫一般的自新書者，出獄後仍爲黨員

三、因上級人員被捕供及整個支部，統治階級要整個支部同志從形式上去填寫自新書，填後支部仍祕密活動保護工農利益者，仍承認其支部組織

四、受捕後沒有經黨允許而填寫自新書向黨作政治的進攻者，目前雖不拒絕其做革命工作，但應長期觀察，不能隨便恢復黨籍

五、受捕後破壞黨的組織者永遠開除黨籍（只可給其自己做公開部份工作），並應嚴密注視其行動，使黨避免重復受其危險

六、拖槍逃跑份子，如拖槍回來，不能恢復黨籍

七、因家庭觀念而動搖逃跑逃回家，且沒有帶走公家物品，回家後又積極參加地方工作，經長期考察後，可重新介紹入黨。

八。總之，黨應時刻教育每個黨員以堅決爲黨爲階級犧牲決心，動搖逃跑，自首自新是黨的污點，是最可恥的現象
我們堅決要消滅這些現象

（錄自該通知油印原件）

中共閩粵贛邊省委組織部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

第廿八章 洛川會議

一、共軍之改編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日寇全面侵略我國，八年抗戰於是開始。蔣總統紀述當時的抗戰決心寫道：

「蘆溝橋事變發生，我在廬山談話會中明白宣佈：

「我們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抵抗到底。唯有犧牲的決心，纔能博得最後的勝利。

「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的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的決心。」（註一）

業已輸誠的中國共產黨，亦於七月八日發出「爲日軍進攻蘆溝橋通電」，提出下列口號：

「武裝保衛平津，保衛華北！

不讓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中國寸土！

爲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

全中國同胞，政府，與軍隊，團結起來，築成民族統一戰線的堅固長城，抵抗日寇的侵掠！

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

驅逐日寇出中國！」（註二）

同日，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聯名電廬山蔣委員長稱：「紅軍將士，咸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爲國効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註三）

七月九日，彭德懷、賀龍、劉伯承、林彪、徐向前、葉劍英、蕭克、左權、徐海東率人民抗日紅軍全體指揮員戰鬥員致電蔣委員長等，表明「我全體紅軍，願即改名爲國民革命軍，并請授命爲抗日前鋒，與日寇決一死戰！」（註四）

在共黨共軍的請求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廿六年八月廿二日，發佈收編投誠的共軍命令如下：任命朱德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爲副總指揮；共轄三個師，其兵額是二萬人。軍事委員會并指定第八路軍列入第二戰鬥序列，歸閻長官錫山指揮，開赴晉北作戰。

「陝甘寧邊區政府由林祖涵與張國燾分任正副主席。

「此後（作者按：指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軍事委員會發佈收編江南共軍游擊隊爲新四軍之命令）又收編葉挺、項英的江南各地共軍，成立新編第四軍，以葉、項爲正副軍長，共轄四個支隊，其兵額是一萬餘人，列入第三戰鬥序列，歸顧長官祝同指揮」（註五）

朱德、彭德懷奉命後，於八月廿五日發出就職通電稱：「本月養日（八月廿二日）奉國民政府軍事

委員會蔣委員長任命開：特派朱德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爲副總指揮等因，奉此，遵即將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並宣佈就職，部隊現已改編完畢，東進殺敵。德等願竭至誠，擁護蔣委員長，追隨全國友軍之後，効命疆場，誓驅日寇，收復失地，爲中國之獨立自由幸福而奮鬥到底。」（註六）

共軍改編情形，「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十年」有如下記載：

「一九三七年八月，主力紅軍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同志任總指揮，彭德懷同志任副總指揮。以紅軍第一方面軍和第十五軍團爲主編爲一一五師，林彪同志任師長，聶榮臻同志任副師長。以紅軍第二方面軍爲主編爲一二〇師，賀龍同志任師長，蕭克同志任副師長。以紅軍第四方面軍爲主編爲一二九師，劉伯承同志任師長，徐向前同志任副師長。」（註七）

八路軍之編制與人事配備，據陳然先生說：改編當時，額定編爲三個師，每師兩個旅，每旅轄兩個團，每團分三個營，每營轄四個連，連分三排九班，每連士兵約有七十至八十人。當時之主管姓名如左：

總指揮部

總指揮

朱德

副總指揮

彭德懷

政治部主任

任弼時

中共史論 第三冊

參謀長

葉劍英

副參謀長

左權

砲兵團團長

武亭

第一一五師

師長

林彪

副師長

聶榮臻

政治部主任

羅榮桓

參謀長

周昆

第三四三旅

旅長

陳光

副旅長

周建屏

政治部主任

蕭華

參謀長

陳士渠

六八五團團長

楊得志

六八六團團長

李天佑

六八六團副團長

楊勇

獨立團團長

張國華

第三四四旅

旅長

徐海東

副旅長

程子華

政治部主任

黃克誠

參謀長

韓振紀

六八七團團長

韓先楚

六八八團團長

陳錦秀

獨立團團長

楊成武

第一二〇師

師長

賀龍

副師長

蕭克

政治部主任

關向應

政治部副主任

甘泗淇

參謀長

周士第

第三五八旅

旅長

彭紹輝

副旅長

張宗遜

政治部主任

張平化

參謀長

李天開

七一五團團長

王尚榮

七一六團團長

賀炳炎

七一六團副團長

廖漢生

第三五九旅

旅長

王震

副旅長

姚喆

政治部主任

袁任遠

參謀長

李仲英

七一七團團長

劉轉運

七一八團團長

龍時光

騎兵團團長

康建民

第二二九師

師長

劉伯承

副師長

徐向前

政治部主任

張浩（後由鄧小平接任）

參謀長

李達

第三八五旅

旅長

王維舟

副旅長

王宏坤

政治部主任

謝富治

參謀長

陳伯鈞

七六九團團長

陳錫聯

七七〇團團長

張才千

獨立團團長

鄒國厚

第三八六旅

旅長

陳廣

副旅長

韓東山

政治部主任

王新亭

參謀長

周希漢

七七一團團長

徐深吉

七七二團團長

葉成煥

獨立團團長

吳成忠

陝甘寧邊區後方留守處

主任

蕭勁光（註八）

共軍改編完畢後，於九月開赴晉北，參加對日作戰，但其領導仍完全爲共黨操縱，不受國府軍委會之任何干預，且以發展實力爲第一要義，把對日作戰視作次要。據八路軍共黨幹部李法卿說：當八路軍由陝北出發時，毛澤東對八路軍之幹部曾作如下之具體指示：

「中日之戰，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決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發展自己，百分之二十作爲妥協，百分之十對日作戰。爲使我們的同志明瞭其工作任務，即使在和總部連絡斷絕的時候，仍能向共同目標努力起見，我樂於爲同志們指出下述的政策。」

「這一決策，可分爲三個階段來實施；第一、妥協階段，在此階段中，應藉自我犧牲，表面上表示服從國民政府，並奉行三民主義，但事實上這只是掩護本黨的生存發展；第二、競爭階段，以二、三年工夫，建立本黨的政治與武力基礎，並繼續發展至能與國民政府抗衡而破壞之爲止，同時極力消滅國民黨在黃河以北的勢力；第三、進攻階段，在此階段中，深入華中地區，建立根據地，割斷中央軍在各地

區的交通，使他們孤立而失去聯繫，直至我們反攻力量已準備成熟，然後從國民黨手中奪取領導地位。
」（註九）

此後抗戰八年，共黨共軍即完全遵循此一路線行動，因而共軍得到了迅速的壯大和發展。

二、毛澤東的演講

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延安充滿興奮和樂觀的氣氛，共黨幹部認為只要抗戰開始，共軍便可擴大活動範圍，壯大自己的實力。同時由於抵禦外侮，國共兩黨的關係必將進一步改善，共黨可能取得合法地位，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公開活動，擴大影響和力量。這一希望，就使中共高級幹部往往把日寇緩兵之計或分化陰謀當作事實，誤以為國府地方當局屈辱投降而任意批評和指責，破壞抗戰陣營的團結，實際上恰好了日寇的詭計，客觀上正為日寇的分化陰謀效勞，就以「七七」事件發生後的情況來說，當時日寇因兵力尚未集中，乃採取緩兵之計，引誘宋哲元停戰和談。蔣委員長有鑒於此，曾於七月十二日電宋哲元就地抵抗，並調中央軍集結保定，滄縣一帶以為支援，十三日再電宋氏稱：

「蘆案必不能和平解決，無論我方允其任何條件，而對方目的，則以冀察為不駐兵區域，與區內組織用人皆須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東，若不做到此步，則彼必得寸進尺，決無已時。中正已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以保持我國家與個人之人格。平津國際關係複雜，如我能抗戰到底，祇要不允簽任何條件，則在華北有權利之各國，必不能坐視不理；而且重要數國外交，皆已有把握，中央

決宣戰，願與兄等各將士共同生死，義無反顧。總之，此次勝敗，全在兄與中央共同一致，無論和戰，萬勿單獨進行，不稍予敵方以各個擊破之隙，則最後勝算必爲我方所操。請兄堅持到底，處處固守，時時嚴防，毫無退讓餘地。今日對倭之事，唯在團結內部，激勵軍心，絕對與中央一致，勿受敵欺則勝矣。」「（註一〇）

可是，中共中央却認定宋哲元「喪權辱國」、「投降屈辱」，於七月二十三日發表「中國共產黨爲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第二次宣言」，內稱：

「據各方面消息已證實冀察當局宋哲元已接受日方所提下列三個條件，即（一）冀察當局向日軍道歉；（二）二十九軍從平津蘆溝橋永定河以東撤退；（三）鎮壓民衆抗日救亡運動，實行中日共同防共。這些條件已開始實行。此外有無祕密協定，尙不得而知。」（註一一）

發表宣言之同一日（即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在「抗大」操場（即舊延安府衙門），召開了近千人的活動份子會議。傳達中共中央宣言，與會人員爲延安共黨各機關幹部及「抗大」的全體教職學員。會中，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一個報告，題爲「反對日本進攻的方針、辦法和前途」，報告中雖然說：「七月十七日，蔣介石先生在廬山發表了談話。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日的方針，爲國民黨多年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該談話舉出解決蘆溝橋事件的四個條件：『（一）任何解決不得侵害中國主權與領土之完整；（二）冀察行政組織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變；（三）中央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不能任人要求撤換；（四）第二十九軍

現在所駐地區，不能受任何約束。』」（註一二）

可是，當毛澤東說到平津當局宋哲元的時候，重復強調中共中央宣言，說宋哲元已經向日軍屈辱投降了（註一三）。不過，當這篇講詞刊入毛澤東選集時，已經修改過了，成爲：「近月以來，平津之間的漢奸和親日派份子積極活動，企圖包圍平津當局，適應日本的要求，動搖堅決抗戰的方針，主張妥協退讓。這是非常危險的現象。」（註一四）

就在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及毛澤東演講四天之後，即七月二十七日起，日軍便向平津進攻，宋哲元和他統率的二十九軍，也展開了英勇抗戰，壯烈殉國的官兵共達五千餘人，二十九軍副軍長佟麟閣、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亦力戰殉職，這怎能說是妥協退讓或屈辱投降呢？中共中央宣言和毛澤東演講，豈不是侮辱了二十九軍十萬將士和五千餘殉國的官兵！？

三、所謂十大救國綱領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把中共中央宣傳部前已發出的十大救國綱領作爲議題加以追認通過。據毛澤東選集第二冊三四〇頁記載，這一文件是毛澤東起草的，原題爲「爲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副題是「目前形勢與任務的宣傳鼓動提綱」，其中所列十大救國綱領如下：

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對日絕交，驅逐日本官吏，逮捕日本偵探，沒收日本在華財產，否認對日外債，廢除與日本簽訂的條約，收回一切日本租界。

爲保衛華北和沿海各地而血戰到底。

爲收復平津和東北而血戰到底。

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反對任何的動搖妥協。

二、全國軍事的總動員：

動員全國陸海空軍，實行全國抗戰。

反對單純防禦的消極的作戰方針，採取獨立自主的積極的作戰方針。

設立經常的國防會議，討論和決定國防計劃和作戰方針。

武裝人民，發展抗日的游擊戰爭，配合主力軍作戰。

改革軍隊的政治工作，使指揮員和戰鬥員團結一致。

軍隊和人民團結一致，發揚軍隊的積極性。

援助東北抗日聯軍，破壞敵人的後方。

實現一切抗戰軍隊的平等待遇。

建立全國各地軍區，動員全民族參戰，以便逐步從僱傭兵役制轉變爲義務兵役制。

三、全國人民的總動員：

全國人民除漢奸外，都有抗日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和武裝抗敵的自由。廢除一切束縛人民愛國運動的舊法令，頒佈革命的新法令。

釋放一切愛國的革命的政治犯，開放黨禁。

全中國人民動員起來，武裝起來，參加抗戰，實行有力出力，有錢出錢，有槍出槍，有知識出知識。動員蒙民、回民及其他少數民族，在民族自決和自治的原則下，共同抗日。

四、改革政治機構：

召集真正人民代表的國民大會，通過真正的民主憲法，決定抗日救國方針，選舉國防政府。

國防政府必須吸收各黨各派和人民團體中的革命分子，驅逐親日分子。

國防政府採取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

國防政府執行抗日救國的革命政策。

實行地方自治，剷除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

五、抗日的外交政策：

在不喪失領土主權的範圍內，和一切反對日本侵略主義的國家訂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軍事互助協定。

擁護國際和平陣線，反對德日意侵略陣線。

聯合朝鮮和日本國內的工農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六、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

財政政策以有錢出錢和沒收漢奸財產作抗日經費爲原則。經濟政策是：整頓和擴大國防生產，發展農村經濟，保證戰時生產品的自給。提倡國貨，改良土產。禁絕日貨，取締奸商，反對投機操縱。

七、改良人民生活：

改良工人、職員、教員和抗日軍人的待遇。

優待抗日軍人的家屬。

廢除苛捐雜稅。

減租減息。

救濟失業。

調節糧食。

賑濟災荒。

八、抗日的教育政策：

改良教育的舊制度、舊課程，實行以抗日救國爲目標的新制度、新課程。

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

十、抗日的民族團結：

在國共兩黨合作的基礎上，建立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領導抗日戰爭，精誠團結，共赴國難。（註一五）

洛川會議，同時把中共中央組織部所頒發的「關於抗戰中地方工作的原則指示」（參閱附錄一）加以追認和通過。這一指示除強調「應該向各地政府與軍隊進行各種具體的統一戰線的活動與組織」外，特別值得重視的有下列各點：

第一、「利用一切舊政權的武裝組織形式，如民團、保安隊、壯丁隊、義勇軍等，實行組織羣衆、武裝羣衆，並取得其中的指揮的地位。」

第二、「共產黨員應該以抗日積極分子的面目，參加到政府與軍隊中去，並取得其中的領導地位。」

第三、「同各黨各派的鬥爭是任何時候不能放棄的。」

第四、「用一切方法爭取黨的公開與半公開，但同時應該鞏固擴大黨的祕密組織。」

這一祕密指示說明；不管中共如何高唱全面抗戰與十大綱領，也不管中共如何表示向政府輸誠和團結禦侮，但其基本目的還是爲其一黨一派的私利打算，以爭取武裝，奪取政權爲中心。

四、洛川會議的爭論

上述兩項議題，其實都不是洛川會議的主題。因爲「關於地方工作的原則指示」，早在八月十二日就曾以中共中央組織部名義祕密頒發；「十大救國綱領」則於八月十五日以中共中央宣傳部名義發出的

，洛川會議不過是加以追認並在形式上予以通過而已。據當時任中共中央祕書長的涂振農說：洛川會議的舉行，係因國府軍委會於八月二十二日發佈收編共軍爲八路軍的命令而召開的，因而共軍之改編，共軍今後之作戰方針，以及共黨共軍在統一戰線中的態度與立場，便成爲會議討論的主題與爭論的重點。

據陳然先生提供的資料稱：自從中共中央提出改編紅軍爲國軍後，在共黨共軍內部便發生兩種不同的意見，一種是死硬的反對傾向，認爲把紅軍改爲國軍，無異是向國民黨投降，而且是對十年蘇維埃運動和紅軍歷史的一大諷刺；另一種是樂觀的歡迎傾向，以爲十年艱辛的日子過去了，從此是新的好的生活的開始。這兩種不同傾向反映到共黨高級幹部，便成爲洛川會議爭論的根源。

爭論的第一個重點，是關於共軍改爲八路軍後，應否照國軍的編制和制度加以改編的問題，以周恩來、朱德爲代表的一方，認爲既然中共曾經同意軍令政令之統一，且主動提出把共軍改編爲國軍，接受國府軍委會之薪餉補給，就應在共同抗日前提下，照國軍的編制和制度加以改編，並應有限度的接受軍委會派遣的參謀人員。以毛澤東、任弼時爲首的另一方，則主張除把共軍更名爲八路軍並依照規定暫編爲三師外，其餘軍中的一切組織仍維持紅軍原有制度，並應嚴拒國府軍委會派遣任何人前來，以保障共黨對八路軍之絕對領導。

爭論結果，毛澤東讓步，而以張聞天的調和意見爲結論；即形式上照國軍制度加以改編，取消紅軍的政治委員制度，原來的政治委員改任副首長或政治部主任，原有的政治部組織與職權仍維持現狀，但上報國府軍委會時，可照國軍的制度改稱爲政訓處或政訓室，但須加強軍中黨委的職權和領導，並以副

首長或政治部主任執行原政治委員的職權，以維持黨對軍事首長之監督領導；關於國府軍委會派遣參謀人員至部隊一節，應予拒絕，惟歡迎其派遣參謀常駐延安，以資聯絡。

爭論的第二個重點，是關於八路軍入晉後之作戰方針問題。以朱德爲首的軍人，大都主張在國府軍委會之統一戰略意圖下，與國軍併肩對日作戰，以擴大八路軍的影響。但毛澤東提醒到會人員注意，入晉作戰的共軍不足兩萬人，數量上與國軍不成比例，不管你如何英勇作戰，都不能起決定作用，因此，今後的第一要義，就是以全力壯大自己。至於作戰地區和範圍，不必受戰區之限制，而應分散鑽隙轉向敵後，在敵後發展武力和建立根據地。在戰術方面，無論如何不能打陣地戰，不能和日軍拼消耗，而應在敵側尤其在敵後進行游擊戰，以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爲作戰方針。

幾經討論與協商，還是以張聞天的調和意見爲結論，即進入山西之初，應按照國府軍委會命令和戰區之戰略意圖統一行動，并在作戰初期，爭取若干表現，以擴大宣傳和影響；但當日軍進一步深入，戰局逆轉與混亂時期，八路軍即應單獨行動，以山西爲基地，分散向河北、山東、河南、熱河、綏、察各地區發展，並以獨立自主的游擊戰，在敵後爭取民衆、擴大武力、建立根據地。

洛川會議最激烈的爭論，是關於當前抗戰形勢的估計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在這一問題上，毛澤東與張國燾有不同的看法和辯論。毛澤東認爲當前國民黨發動的抗戰，是單純政府與軍隊的片面抗戰，其前途將走向失敗；在抗戰過程中，國民黨內部也將分化和分裂，親日派與右翼集團將投降日本，抗日派與左翼集團則將與中共親密合作堅持抗戰，這樣就將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重新組合，形成以中共爲領導

的新陣容；在這一新情勢下，抗戰前途，日寇固然失敗，國民黨也同樣失敗，勝利的只能是中國人民和中國共產黨。因此，在今天，不能對國民黨再有任何遷就和讓步，必須在統一戰線中採取獨立自主的政策，採取積極爭取領導權的方針。但張國燾則持不同的看法，他以為抗戰係國民黨所發動與領導的，目前固然可以說是片面抗戰，但全國民眾必將奮起參戰，使片面抗戰轉變而為全面抗戰，不宜以目前狀況論斷其前途為失敗，國民黨固然有分化可能，但無損其中堅力量，且由於抗戰，國民黨威望在增高，為適應抗戰情勢，其政策亦將有所改變，尤其對抗戰領導權的掌握，當不會有絲毫放鬆；在此一情勢下，亦即在抗戰開始的今天，如果本黨在統一戰線中即強調獨立自主政策，即與國民黨爭奪領導權，勢將引導統戰走向破裂，而陷自己於孤立，結果有利的是日寇而不是國共雙方。因此，如何在國共雙方均有利的條件下，鞏固和維持統一戰線到擊敗日寇，便是當前問題的中心，否則大敵當前，自亂步驟，那是明智的。

到會人員，有的支持毛澤東的觀點，有的同意張國燾的看法，形成不斷辯論的局面，最後因相持不下而休會。在休會期間，幾經折衝，寫成雙方均能接受的「決定」，再提會議討論，始予通過（註一六）。

洛川會議通過的決議題為「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參閱附錄二），「決定」雖然批評國民黨發動的抗戰「中間包含有極大的危險性」，「存在着嚴重失敗的可能」，但也明白指出「只要真能組織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戰爭的勝利是無疑的。」當然，雙方爭論的觀點與內容是

祕密的，不會載入「決定」而公開出來。

關於洛川會議的爭論，後來張國燾只是簡單的寫道：「當時毛同秦邦憲提使日本失敗，蔣也失敗，我提（周恩來同）日本人失敗，中國人都勝利，因此發生衝突，休會三日未能解決，最後只強調獨立自主。」（註一七）

對此，毛澤東則是另一種說法，他說：「特別是在八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洛川會議）時，我們就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在統一戰線中，是無產階級領導資產階級呢，還是資產階級領導無產階級？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國民黨？在當前的具體的政治任務中，這個問題即是說：把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所主張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全面抗戰呢，還是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的地主資產階級專政和片面抗戰？」（註一八）

毛澤東在這裏所批評的「片面抗戰」，係指國民黨沒有發動民衆參戰，而局限於政府與軍隊的抗戰，因而「其前途走向失敗」。當然，事實並不是如此，蘆溝橋事件一發生，蔣委員長就說：「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的責任。」還在中共洛川會議之前，即一九三七年八月八日，蔣委員長又發出告抗戰全體將士書，其中特別強調發動民衆參加抗戰之重要，他說：「任何戰爭，得到民衆幫助的，一定勝利。這次抗戰，尤其應該發動全國各地方全體民衆的力量，來和敵人拼命。但是要希望民衆和軍隊合力一心，合拍應手，一定先要對民衆表示親愛精神，得到他們的信仰，才能達到希望。……」（註一九）由此可見，當時中共所渲染的「片面抗戰」，不過是爲著削弱國民黨領導抗戰的

威望，擴大中共政治影響的宣傳手法，目的顯然又是爲著「爭取領導權」。

洛川會議對於中共中央人事上有兩項新決定：第一，以李富春接替秦邦憲之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第二，以楊尚昆接替劉少奇出任中共中央北方局書記。

五、共赴國難宣言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參閱附錄三），向國民政府提出四項諾言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并待命出動，担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蔣委員長爲中共「共赴國難宣言」於二十三日發表談話，其要旨如左：

「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爲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其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爲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而其宣稱願爲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有一個努力的方向。」

「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註二〇）

這樣，便開始了抗戰期間國共兩黨「和平共存」的新階段。

九月二十九日，毛澤東亦以「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成立後中國革命的迫切任務」為題，發表專文，其結論稱：

「當權的國民黨同志們，我們同你們在今天一道負著救亡圖存的歷史責任。你們已經同我們建立起抗日統一戰線了，這是很好的。你們實行了抗戰政策，這是很好的。但我們不同意你們繼續其他的老政策。我們的統一戰線應該發展下去，應該把它充實起來，把民衆加進去。應該把它鞏固起來，實行一個共同綱領。應該決心改變政治的制度與軍隊的制度。一個新政府的出現是完全必要的，有了這樣一個政府才能執行革命的綱領，也才能在全國範圍內着手改造軍隊。」（註二一）

在這裏，毛澤東所說的重點，就是改組政府，改造軍隊，也就是中共一直強調的「民主共和國」、「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這是中共利用抗日時機，以共赴國難禦侮救亡為名，實施其擴展實力爭奪領導權的重大陰謀。關於這一點，張浩（林敏英）在「抗大」的講稿說得很明白，他說：

「中國共產黨現在的戰略是民主共和國，策略是停止內戰聯合各黨各級各軍一致抗日，而與國民黨合作。因此，第二國際說，中國共產黨出賣了無產階級利益，投降資產階級。國民黨說，中國共產黨在

現在無法的環境中，投誠國民黨。本黨同志看見了不行土地革命，放棄階級鬥爭，取消蘇維埃政權，改紅軍爲國民革命軍，因此發生很多的懷疑。以上三方之說法，都是不對，都是估計錯誤的。我們看見目前的條件，必須與國民黨妥協，而與國民黨暫時的合作，並不是投降，亦不是出賣無產階級利益，正是爲着廣大的勞苦羣衆的利益。我們也不是投誠國民黨，是以能走通的一途抗日。與國民黨合作，是在抗日的階段與之妥協，本黨同志更不要懷疑。究竟是什麼？是下面幾項：

「甲、我們是放棄以前走不通的道路，是尋求一條能走通的，而易於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另一條道路。

乙、我們黨在現在的條件之下這樣做，於革命是有利的，是不脫離羣衆的。

丙、我們黨現在的策略，正是革命的策略，正是破壞資產階級政權的武器，正是鞏固革命的武器，正是擴大革命勢力的支柱。

丁、我們黨的策略，正是掩護我們祕密工作之發展，正是溝通公開的工作，以爭取廣大羣衆力量，準備推翻資產階級的政權。

戊、我們現在的讓步，是給革命以休養時間，積聚力量，準備新的進攻之條件，也就是給無產階級以必需的休養時間。

己、暫時放棄顯明的進攻策略，改爲退守策略，亦就是採取轉彎抹角的進攻策略。

庚、因爲鬥爭疲乏，必需休養，及儲存革命力量，暫時放棄革命制度，就是放棄表面名目，保留實

質存在的制度，以求將來新的更大的勝利。

辛、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是改番號，不是改編，而紅軍的獨立性是保存的，不但如此，而且更能擴大與鞏固。

壬、蘇維埃暫時取消，改爲特區政府，而實質的本性是未變的。用實質政府，不特不能削弱無產階級政權的力量，更能得到廣大羣衆革命力量之發展。

「我們的黨是在抗日的階段與國民黨合作，並不是投誠，我們的妥協是有利而無害的。……如物資得到了，經濟得到了，彈藥得到了，精神上得到了，黨員增加了，共產黨的影響亦擴大了等等。」（註二二）

從張浩的講稿中，已經把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的真意暴露無遺。同時，八路軍政治部於共赴國難宣言發表後，編發了「幾個問題的解答」小冊子，以問答方式解答了十個問題，其中第四、第五、第七個問題解答如下：

「問：國共兩黨重返合作的雙方讓步，事實是怎樣？

答：國民黨過去對紅軍蘇區的進攻，轉變到停止內戰，和平統一，改變降日爲抗日，將過去對民衆壓迫轉變到給人民以說話開會結團體的自由，將曾經被捕的革命份子完全釋放。改組國民黨，排除國民黨內的親日份子。過去獨裁的國民政府將召集國民大會，由人民來選舉真正代表民意的民主政府，這都是國民黨此次最大的讓步。也就是它過去錯誤政策的改變。

「國民黨有了上述的讓步，所以共產黨就給他們幾個保證：停止推翻國民黨的武裝暴動，不沒收地主土地，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并接受南京中央軍事委員會的指揮，蘇維埃政府改爲特區政府。這種雙方的讓步，是抗日救國的必要前提。這種讓步，我們並沒有吃虧，也並不是誰投降誰。說共產黨是投降了國民黨的人，也不過是漢奸親日派的造謠與破壞聯合戰線的陰謀，而爲日本效勞罷了。」

「問：紅軍改爲國民革命軍，是不是變了國民黨的軍隊？」

答：紅軍名義的改變，是爲了全國抗日的統一指揮，雖然在名義上是改變了，但是實際上還是照紅軍一樣的辦法，仍然是共產黨的領導，我們的指揮員，還是我們的人，國民黨不能派一個人到我們隊伍來負責工作。通俗的說：外面雖是白的，內面還是紅的。

「問：爲什麼要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日？」

答：現在的蔣委員長已經轉變到抗日的方面來了，他已接受我們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他把原來進攻我們的軍隊，開到前方抗戰，實行共產黨提出的抗日政綱，因此我們擁護他，並不是擁護他個人，而是擁護他實行抗日主張，也就是鼓勵他堅決在抗日民族陣線上走。假使他不抗日或反動了，那我們不僅是不擁護他，而且還要打倒他。」（註二三）

從這一問答中，可以瞭解：中共的共赴國難宣言剛剛公佈，信誓旦旦的四項諾言剛剛發表，中共就說「外面雖是白的，內面還是紅的」，其居心何在，那是不問可知了。

所以 蔣總統在追述他爲中共共赴國難宣言發表談話時的想法與教訓寫道：

「我發表這個談話，當時實在相信共黨是有悔過歸誠、共同禦侮的誠意。而且我討伐匪軍的宗旨，一向認為中共黨徒是中國人，終必愛中國。只要政府加以相當制裁，不難使其就範聽命；只要他放棄武裝暴動，自可與其他政黨一樣通力合作，為革命救國而努力。所以自十九年剿匪開始，直到二十五年為止，我對共黨的方針，始終是剝離兼施的。我認為共黨這次共赴國難的宣言，就是我們政府精誠感召的實效。當時一般愛國有識的人士，都相信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戰勝利的朕兆。

「不料共黨此後的行動，完全與他的諾言相反。這固然是我自信太過，卒致重大的挫敗，亦可證明共產黨徒畢竟是共產黨徒。他們決沒有所謂祖國愛與民族感。……這一事實的嚴重教訓，雖對於我個人是一種無比的恥辱，而對於今日自由世界反共鬥爭，却不無貢獻的價值。」（註二四）

註一：蔣總統「蘇俄在中國」二一〇——二一一頁。

註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日軍進攻蘆溝橋通電」，見一九三八年四月延安解放社出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二冊三——四頁。

註三、四：「七月八日紅軍將領為日寇進攻華北致蔣委員長等電」——同上書二——三頁。

註五：「蘇俄在中國」八三頁。

註六：「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二冊二五——二六頁。

註七：黃濤：「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十年」一八一——一九頁，一九五八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註八：陳然及前八路軍一一五師教導第五旅政治委員王宏鳴先生提供之資料，據陳王兩先生稱：約兩個月之後，八路軍即擅自擴充部隊，陸續成立許多補充團、教育團、獨立團、獨立旅、教導旅、獨立師以及各種名稱之挺進縱隊支隊等部隊，并恢復政治委員制度，惟照國府軍委會之規定，并無此類制度與番號。

註九：「剿匪戰史」第十一冊一〇三五頁，另在張浩之「中共黨的策略路線」講稿附錄，及「磨擦問題真相」一書中均有全文與記述，據稱：此項資料，係十八集團軍（即八路軍）獨立第一師楊成武部騎兵連共黨支部書記李法卿，於一九四〇年逃離八路軍後之談話。

註一〇：「抗日戰史」第五章：「七七事變與平津作戰」二四頁，國防部史政局編印，一九六二年六月出版。

註一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二冊第五頁。

註一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三三〇頁。

註一三：陳然先生提供之資料，陳先生曾參加是次活動份子會議。

註一四：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三三一頁。

註一五：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三四一——三四四頁。另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二冊一三一——一六頁。惟此一

十大綱領列入「毛選」時，已有若干修改，如援助抗日聯軍一條內，已將援助東北義勇軍刪除。

註一六：此係陳然先生轉據曾任中共中央祕書長之涂振農所述資料。

註一七：王健民「中國共產黨史稿」第三冊七二八頁。

註一八：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三八二頁。

註一九：「蔣總統集」第一冊九六八頁，一九六〇年十月國防研究院印行。

註二〇：「蘇俄在中國」八二頁。

註二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二冊七十八頁。另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三六〇頁。惟「毛選」所載題目與內

容均已若干修改。

註二二：張浩（林毓英）一九三七年「抗大」之講稿：「中共黨的策略路線」三八——三九頁，一九四一年三月重

慶中央調查統計局翻印。

註二三：「人民抗日軍（按：即八路軍）政治部」編：「幾個問題的解答」油印本原件，一九三七年十月四日出版

註二四：「蘇俄在中國」八二—八三頁。

附錄一：關於抗戰中地方工作的原則指示

(一)一切地方工作，以爭取抗戰的勝利為最基本的原則，一切鬥爭的方法與方式，不但不應該違犯它，而且正是爲了取得抗戰的勝利。

(二)對於所有參戰的政府與軍隊，我們應該完全站在積極擁護的立場；在這一立場上，對於它們的缺點與錯誤進行善意的嚴肅的批評。

(三)可能時應該同各地政府與軍隊進行各種具體的統一戰線的活動與組織，並盡可能的吸收其他黨派及人民團體參加進來。凡已有這類包辦團體的地方，我們應該積極的參加，逐漸擴大內部的民主，使之更加羣衆化。

(四)應該普遍組織合法的統一戰線的人民參戰團體，或某些已經普遍存在的合法組織（如抗戰後援會）轉變爲這類性質的團體。在它的總的領導下，可以發起各種吸收羣衆參加的活動與組織（如各種委員會，戰地服務團，慰勞隊，運輸担架隊，募捐隊，義勇軍，偵察隊，抵制日貨十人團，國防文藝團體等），保證一切願意抗日的派別到內面工作，並發展其中的民主，或者可以首先組織各種上述的個別的統一戰線團體，然後再把他們聯合起來，組織總的領導機關，這可以就各地的情況來決定。

(五)利用一切舊政權的武裝組織形式，如民團、保安隊、壯丁隊、義勇軍等，實行組織羣衆，武裝羣衆，並取得其中的指揮的地位，并用一切其他合法的可能，達到這一目的。

(六)共產黨員應該以抗日積極份子的面目參加到政府與軍隊中去，並取得其中的領導位置。在一定的條件下，如政府的確表示堅決抗日，容許共產黨的獨立組織，與公開活動，歡迎共產黨到政府工作，我們可以公開用共產黨代表的名

義去參加，採取自上而下的辦法，推動抗戰運動的前進與勝利。

(七)在抗戰中應該堅持爭取民主權利的鬥爭。利用一切機會組織工人、農民、學生、市民自己的合法的羣衆團體，或加入到已有的國民黨所控制的機關（如黃色工會、農會、學生自治會等）中去工作，轉變他們爲這類的羣衆團體。利用一切方法動員羣衆爭取民主權利，擴大政府所允許民主的範圍，一直到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之完全取得。

(八)應該領導改善民衆的生活的鬥爭，但鬥爭的方式亦應適合於抗戰的利益，以採取用羣衆出力爲後盾的民主的與合法的方式爲主。在改善羣衆的生活的過程中，應該鼓勵一切同國防有關的生產事業中羣衆革命的熱情，自覺的提高生產率。在抗日的直接後方，要能竭力避免採用對日抗戰有害的罷工之英勇鬥爭方式。

(九)在日寇佔領區域及其側後方，發動廣泛的游擊戰爭。組織游擊隊，游擊小組，抗日義勇軍，人民革命軍，到處實行騷擾破壞，捕殺日本官兵，解除日軍小部隊的武裝等。同察北義勇軍及東北人民革命軍、義勇軍取得密切聯絡。組織各種合法團體（如在察北等）以組織羣衆。在「中國人不打中國人」的口號下，經過秘密的或半公開的活動方式去組織僞軍及僞保安隊的全部叛變與倒戈。在這類區域中黨的組織應該絕對保守秘密。

(十)在民族自決、民族獨立、共同抗日的口號之下，組織與武裝全體韓民、蒙民、回民參加抗戰。應該爭取這些少數民族的動搖上層份子（如德王之類）到抗戰中來。漢人的政府與軍隊應該與少數民族的上下層建立良好關係，反對大漢族主義，使他們自願的與我們親密的聯合。

(十一)同各黨各派的政治鬥爭是任何時候不能放棄的，但如何「爭取抗戰的勝利」的問題，應該成爲鬥爭的中心，應該到處公開提出黨對於保證抗戰勝利的具體主張與辦法，批評其他黨派的不徹底與不堅決，以動員全國人民環繞在我黨主張與口號的周圍。

(十二)用一切方法爭取黨的公開與半公開，但同時應該鞏固與擴大黨的祕密組織。黨的工作與組織應適合於戰時形勢，加強地方黨獨立工作的能力。共產黨員應該以自己的正確主張、堅苦工作、模範行動、謙虛態度去取得羣衆的信仰、擁護與愛戴。

(十三)紅軍在抗戰中，應該成爲一切抗日友軍的模範，取得友軍與羣衆的信仰，應利用現在公開的與合法的地位進行多方面的活動。

(十四)堅決同漢奸賣國賊親日派做鬥爭。但不要輕易把這類帽子戴到動搖份子的頭上，必須耐心的用一切方法爭取他們到抗戰中來，沒收漢奸賣國賊的財產應該經過政府機關或羣衆團體來進行。

(十五)必須同民族失敗主義做鬥爭。在鬥爭中鞏固民族的自信心，指出抗戰必然勝利的前途。

(錄自中共中央祕密印發的油印原件)

中央組織部一九三七，八，十二。

附錄二：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

一、蘆溝橋的挑戰與平津的佔領不過是日寇大舉進攻中國本部的整個計劃的開始。日寇已經開始了全國的戰時動員。他們一切所謂「不求擴大」的宣傳不過是掩護進攻的煙幕彈。

二、南京政府在日寇進攻與人心憤激的壓迫下已經開始定下了抗戰的決心。整個的國防部署與各地的實際抗戰也已經開始。中日大戰不可避免。七月七日蘆溝橋的抗戰，已經成了中國全國性抗戰的起點。

三、中國的政治形勢從此開始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實行抗戰的階段。抗戰的準備階段已經過去了。在這一新階段內的最中心的任務，是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的勝利。過去階段中，由於國民黨的不願意與民衆的動員不夠，因而沒有完成爭取民主的任務，這必須在今後爭取抗戰勝利的過程中去完成。

四、在這一新階段內我們同國民黨及其他抗日派別的區別與爭論，已經不是應否抗戰的問題，而是如何爭取抗戰勝利的問題。

五、今天爭取抗戰勝利的中心關鍵，是在使國民黨發動的抗戰發展爲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戰。只有這種全面的全民族

的抗戰，才能使抗戰得到最後勝利。本黨今天所提出的抗日救國的十大綱領，即是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具體的道路。

六、今天所發動的抗戰，中間包含有極大的危險性，這主要的由於國民黨還不願意發動全國人民參加抗戰，相反的，企圖把抗戰看成只是政府的事，處處懼怕與限制人民的參戰運動，阻礙政府軍隊與民衆結合起來，不給人民以抗日救國的民主權利，不去徹底改革政治機構，使政府成爲全民族的國防政府，這種抗戰可能取得局部的勝利，然而決不能取得最後勝利。相反的，這種抗戰存在着嚴重的失敗的可能。

七、由於當前的抗戰還存在着上述的嚴重的弱點，所以在今後抗戰過程中，可能發生許多挫敗，退却，內部的分化叛變，暫時與局部的妥協等不利的情况。平津的喪失就是東三省喪失後最嚴重的教訓，因此應該看到這一抗戰是艱苦的持久戰。但我們相信已經發動的抗戰必將因爲我黨與全國人民的努力，衝破一切障礙物，而繼續的前進與發展。我們應該克服一切困難，爲實現本黨所提出的爭取抗戰勝利的十大綱領而堅決奮鬥。堅決反對與此綱領相違背的一切錯誤方針，同時反對悲觀失望的民族失敗主義。

八、共產黨員及所領導的民衆與武裝力量，應該最積極地站在鬥爭的最前線，應該使自己成爲全國抗戰的核心，應該用極大力量發展抗日的羣衆運動，不放鬆一刻工夫一個機會去宣傳羣衆，組織羣衆，武裝羣衆，只要真能組織千百萬羣衆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戰爭的勝利是無疑的。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錄自一九三八年四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二冊）

附錄三：中共共赴國難宣言

親愛的同胞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謹以極大的熱忱，向我全國父老兄弟諸姊妹宣言：當此國難極端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爲着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上，已經與中國國民黨獲得了諒解，而

共赴國難了。這對於我們偉大的中華民族前途有着怎樣重大的意義啊！因爲大家都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萬狀的現在，只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民族團結的基礎已經定下了，我們民族獨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創設了，中共中央特爲我們民族的光明燦爛的前途慶賀。

不過我們知道，要把這個民族的光輝前途變爲現實的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仍需要全國同胞，每一個熱血的黃帝子孫，堅韌不拔的努力奮鬥。中國共產黨願當此時機，向全國同胞提出我們奮鬥之總目標，這就是：

一、爭取中華民族之獨立自由與解放，首先切實的迅速的準備與發動民族革命抗戰，以收復失地和恢復領土主權之完整。

二、實現民權政治，召開國民大會，以制定憲法與規定救國方針。

三、實現中國人民之幸福與愉快的生活。首先須切實救濟災荒，安定民生，發展國防經濟，解除人民痛苦，與改善人民生活。

凡此諸項，均爲中國的急需，以此懸爲奮鬥之鵠的，我們相信必能獲得全國同胞之熱烈的贊助。中共願在這個總綱領的目標下，與全國同胞手攜手地一致努力。

中共深切知道，在實現這個崇高目標的前進路上，須克服許多的障礙和困難，首先將遇到日本帝國主義的阻礙和破壞。爲着取消敵人的陰謀和藉口，爲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懷疑者之誤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披瀝自己對於民族解放事業的赤誠之必要。因此中共中央再鄭重向全國宣言：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爲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爲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親愛的同胞們！本黨這種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與委曲求全的態度，早已向全國同胞在言論、行動上明白表現出來，並且已獲得同胞的贊許。現在爲求得與國民黨的精誠團結，鞏固全國的和平統一，實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準備把這些諾言中在形式上尙未實行的部份，如蘇區取消，紅軍改編等，立即實行，以使用統一團結的全國力量，抵抗外敵的侵略。

寇深矣！禍亟矣！同胞們，起來，一致的團結啊！我們偉大悠久的中華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起來，爲鞏固民族的團結而奮鬥，爲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奮鬥，勝利是屬於中華民族的。

抗日戰爭勝利萬歲！

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萬歲！

（錄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二冊）

第二十九章 陳紹禹與毛澤東之矛盾和鬥爭

一、陳紹禹飛返延安

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一個月之後，即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中共駐共產國際首席代表陳紹禹，乘坐蘇俄重型專機飛返延安，同機返國的有陳雲、康生、曾山等人。這架飛機係經新疆飛來，機上還帶來了大型無線電台和高射砲等防空武器。中共中央進駐延安後，這是第一次的飛機降落，整個延安爲之震動，陳紹禹隨機返延，更引起共黨幹部之重視，他們預料今後的「國際援助」將源源而來，心中充滿渴望的喜樂。

中共中央於當晚舉行歡迎會，總書記張聞天首先介紹陳紹禹等人對黨的貢獻與艱苦奮鬥經過：他盛讚陳紹禹在四中全會前後反立三路線、反羅章龍右派、執行國際路線、挽救黨的危機之功績，和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對中國黨的支持與幫助，特別對提高中國黨的國際地位起了決定的作用。他說明陳雲赴俄完成中央所賦予任務和在新疆收容紅四方面軍餘部的貢獻。張聞天同時介紹康生在上海時期保衛中央機關之經過。關於曾山逃離江西，流落上海當苦力做車伕的艱苦經過也有說明。

接着由毛澤東致歡迎詞，他說中國有句形容「喜出望外」的俗話，說是「喜從天降」，今天陳紹禹同志乘機從天上回來，豈不就是「喜從天降」？我們以這樣的喜樂心情來歡迎王明、陳雲、康生、曾山

各同志。中國還有一句成語，叫做「飲水思源」，今天統一戰線的成就，其本源是什麼呢？那就是「八一宣言」有了「八一宣言」的源泉，才有統一戰線的長流，「八一宣言」的源泉又是誰掘出來的呢？那正是今晚我們熱烈歡迎的王明同志，是他在莫斯科起草的，所以「飲水思源」，今日統一戰線的成就，王明同志應居首功！（註一）

在歡迎晚會中，從張聞天的介紹與毛澤東的致詞，已可看出當時陳紹禹在中共黨內的重要性了，這不是因為他曾任中央總書記，現任駐國際首席代表和中央政治局委員，主要還在於他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主席團委員和書記處書記，他這次返華，有如共產國際的「欽差大臣」光臨它的屬國——中國支部，因而連最富英雄主義和帝王思想的毛澤東也不能不暫時低頭奉迎了！

陳紹禹返延後，在不同場合分別傳達了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對中國黨的三項重要指示：

第一，史達林說：毛澤東有許多缺點，如不懂馬列主義，沒有世界眼光，只是以狹隘經驗來解決問題指導革命等等，不過，他已逐漸成爲中國黨和中國革命的領袖，由俄國回去的許多幹部，要從理論上思想上和各方面幫助他，并克服他的弱點，使他成爲健全的領袖。

第二，共產國際認爲張聞天不適於任中央總書記，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候，他曾任黨的支部書記，結果全支部的黨員都是托派，雖然沒有事實證明他是托派，但就這一點，也很難洗刷他本身的嫌疑。

第三，史達林說：中國黨鬥爭張國燾過火了，對於一個有功績有威望現在還在中央負責的老幹部，採取公開的全面的「無情鬥爭」是不適宜的；「長征」途中，不單張國燾有錯，其實雙方都犯了錯誤，

中國黨要好好檢討和改正。(註二)

據當時任中共中央祕書長的涂振農說，陳紹禹的返延及三項指示的傳達，引起了中共中央內部的若干變化：

第一個變化是對張國燾轉取懷柔政策。張國燾被鬥後，意志消沉，每日到延安城外跑馬消遣，以解除胸中的抑鬱；陳紹禹返延後，要他對陝甘寧邊區政府的工作多負責任，同時仍保留他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替中共中央多分担工作。

第二個變化是國際派內部的矛盾和分化。中共黨內的國際派，在莫斯科時期，有過二十八個布爾塞維克的稱號，返回中國後，雖仍是一個派系，但已改變為無形的組織，延安時期，國際派的要角，只是每週在張聞天住處不拘形式的交談一次，不露任何痕跡。但自從遵義會議張聞天採取調和態度并乘機接替秦邦憲為中央總書記後，秦邦憲與張聞天已存有芥蒂，內部正醞釀着矛盾；此次陳紹禹返延，竟說張聞天有托派嫌疑，不適用於任總書記，更加深了國際派內部的矛盾和分化。據涂振農說，陳紹禹傳達這一指示，一面不滿張聞天受毛澤東利用搶奪了秦邦憲的總書記，另一方面，最主要的還是陳紹禹自己想藉此取得總書記的職位，殊不知毛澤東却利用了這一矛盾，一步一步把國際派各個擊破，最後全部加以打倒。

第三個變化是毛澤東領袖地位的「欽定」。經過史達林的認可和指示，毛澤東從此便逐漸成為中共黨的領袖，也正因為如此，所以毛澤東對於史達林是沒齒難忘畢生感戴。據涂振農說，陳紹禹當時的打

算，是把毛澤東捧爲掛名的領袖，而由他自己和國際派掌握實權（註三）；殊不知毛澤東是一位最具暴君思想的極權主義者，當他利用史達林的指示，造成了自己的領袖地位以後，便逐步把他的政敵甚至是當年的「戰友」一一加以剷除，而成爲一個絕對獨裁者。後來，迫得陳紹禹也不能不以治病爲名逃往莫斯科避難去了。

二、毛澤東低頭屈服

對日抗戰，我爲弱國，準備不足，而敵居優勢，且處心積慮吞併我國，故抗戰初期，全國軍民雖英勇作戰，仍難免若干城市之陷落，惟中共却乘機責難政府：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一日，太原、上海同被日軍佔領，毛澤東遂於十一月十二日，在延安共黨活動份子會議上發表演講，大肆抨擊政府，他說：

「不要人民羣衆參加的單純政府的片面抗戰，是一定要失敗的。因爲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戰爭，因爲它不是羣衆戰爭」。

「國民黨主張的片面抗戰，雖然也是民族戰爭，雖然也帶着革命性，但其革命性很不完全。片面抗戰是一定要引導戰爭趨於失敗，是決然不能保衛祖國的。」（註四）

上海、太原失陷後，毛澤東認爲「中國抗日民族革命戰爭現在是處在嚴重的危機中」，因而他再度強調要改造國民黨，改造政府，改造軍隊，同時尖銳地提出「是國民黨吸引共產黨呢，還是共產黨吸引

國民黨？」實言之，就是誰領導誰的問題，也是統一戰線中國共兩黨爭奪領導權的問題，爲此，毛澤東號召「在黨內，反對階級對階級的投降主義」，即是反對在統一戰線中不積極爭取領導權而遷就國民黨的右傾傾向。

發生這種傾向的原因，毛澤東認爲一方面是國民黨的引誘，「另一方面，共產黨內理論水平的不平衡，許多黨員的缺乏北伐戰爭時期兩黨合作的經驗，黨內小資產階級成份的大量存在，一部份黨員對過去艱苦鬥爭的生活不願意繼續的情緒，統一戰線中遷就國民黨的無原則傾向的存在，八路軍中的新軍閥主義傾向的發生，共產黨參加國民黨政權問題的發生，抗日民主根據地中的遷就傾向的發生，等等情況」。

「由於上述兩方面的嚴重情況，必須尖銳地提出誰領導誰的問題，必須堅決地反對投降主義」。

「幾個月以來，主要是抗戰以來，共產黨中央及其各級組織，對這種已經發生的和可能發生的投降主義傾向作了明確而堅決的鬥爭和必要的預防，並且收到了成效」。

「在八路軍中，開始向新軍閥主義傾向作鬥爭。這種傾向，表現在紅軍改編後某些個別分子不願意嚴格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發展個人英雄主義、以受國民黨委任爲榮耀（以做官爲榮耀）等等現象上面。這個新軍閥主義傾向雖然和表現在打人、罵人、破壞紀律等等現象上面的老的軍閥主義傾向同其根源（把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同其結果（脫離羣衆）；然而它是在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時期發生的，它帶着特別大的危險性，所以特別值得注意，需要堅決地加以反對。因受國民黨干涉而取消的政治委員制度

，因受國民黨干涉而改爲政訓處的政治部的名稱，現在已經恢復了。提出了『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這個新的戰略原則，并堅持地執行之，因而基本上保證了八路軍作戰上和工作上的勝利。拒絕了國民黨派遣他們的黨員來當八路軍幹部的要求，堅持了共產黨絕對領導八路軍的原則。在各革命的抗日根據地，同樣提出了『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註五）

毛澤東這次報告，再度強調和堅持其在洛川會議的主張，曾在洛川會議協調的若干決議也一併加以推翻：關於取消政治委員制度和政治部的問題，很快便推翻前議予以恢復；對於抗戰形勢的估計與爭取領導權問題，再次加以強調，尖銳地提了出來；有關統一戰線陣營中區分爲左、中、右集團，分別採取團結、分化、打擊的政策也提出來了。

毛澤東這些觀點，在洛川會議期間，就曾受到張國燾、周恩來等人的激烈反對，由於張聞天的調解折衝，毛澤東當時不能不作了若干的修正和讓步；到了十一月，太原、上海相繼失守，初期抗戰遭受挫折，毛澤東認爲他已往的分析是正確的，已爲戰局的發展所證實，於是再度提出并進一步加以強調，結果同樣受到了中共中央大部分人員的反對。

當時以陳紹禹爲首的國際派，代替了張國燾、周恩來成爲反對毛澤東左傾機會主義錯誤的健將，陳紹禹先後在中央書記處和中央工作會議上，正面批評毛澤東的錯誤觀點和提綱，其主要論點如左：

（一）關於抗戰形勢的估計，初期的挫折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因此而認爲是失敗，亦不宜完全歸罪於國民黨的片面抗戰。在抗戰受挫的今天，不可批評片面抗戰，而應強調抗戰的收穫，以鼓舞民心士氣，

堅定國民黨長期抗戰的決心。關於抗戰勝利後的情勢判斷，更不宜在今天即強調是中國人民和中共的天下，這無異證實了「抗日勝利了，是共產黨蘇維埃的天下」的惡毒謠言。

(二)如果把抗日陣營分成左、中、右集團，必將自亂步驟，無法團結更廣大的抗日羣衆進入統一戰線陣營，今天應該是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以抗日與否做標準，來劃分友敵的關係，即凡抗日者皆吾友，降日者皆吾敵，今天最重要的任務是團結一切抗日力量，打擊日寇、漢奸、托匪和親日派。

(三)處於大敵壓境、國難當頭的情勢下，應以鞏固和擴大統一戰線爲中心，如果強調獨立自主，強調爭取領導權，只能嚇走同盟者，自毀統戰陣容；今天要以聯合團結爲主，批評鬥爭爲輔，在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下，不要提爭取領導權，不要形成互相對立和對消，而要提倡共同負責，共同領導，互相幫助，互相發展。

(四)必須承認，今天領導抗日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是抗日的而又是革命的，雖然它的革命性還不夠，它的許多制度政策和作法還沒有改變，還是一黨專政時期的老套，然而也應該承認，現在正在逐步改進中，吾人應在長期抗戰過程中促其改變和進步。本黨所提的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的主張，亦應在加強和改進國民政府與國民革命軍的基礎上求其實現。如果繼續強調改造政府改造軍隊，甚至要求改造國民黨，勢將引起同盟者的疑懼反感，造成國共兩黨進一步的對立和磨擦。

陳紹禹這個新論點，駁倒了毛澤東的報告提綱（即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任務提綱），獲得了中央書記處和中央各部會負責人的支持，成爲當時中共的政策方針，在這一情勢下，毛澤東放棄

了自己的意見，轉而支持陳紹禹的觀點（註六）。

會後，陳紹禹寫就了與毛澤東針鋒相對的提綱，題為「目前抗戰形勢與任務」，并提至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討論。

直到一九五二年，即十五年之後，北平出版毛澤東選集時，才又把曾被打消的毛澤東這一報告提綱刊了出來，并在註釋中特別加以說明稱；「這是毛澤東同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延安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提綱。從這時起，黨內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就反對這個提綱，直到一九三八年十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才在基本上克服了這種右的偏向。」（註七）

三、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為期五天的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是中共中央五中全會（一九三四年一月）以來，政治局委員到會最多的一次會議，五中全會選出的及以後增補的政治局委員，除顧作霖病亡，王稼蕃赴俄就醫外，陳紹禹、陳雲、康生（康為政治局候補委員）從俄國回來，項英從江西大庾縣的油山出來，都參加了這次會議（註八）。

會議的主要議題為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由陳紹禹作報告，他着重指出上海失陷後，日寇正通過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向國民黨誘降，目前戰局亦處於緊張關頭，南京即將棄守，因此，吾人當前任務在於如何堅定國民黨長期抗戰的決心，使抗戰能够堅持下去，發展下去。接着他詳細解釋了他草擬的「

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提綱（參閱附錄一）。這是他上月爲批評毛澤東錯誤觀點而寫成的，現在作爲會議討論的主題，其中特別著重於「堅持長期抗戰的任務」，提綱寫道：

「（一）鞏固和擴大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一切爲著抗日統一戰線，一切經過抗日統一戰線——擁護國民黨在中國政府及軍隊中的領導權力，共同綱領，共同負責，共同磋商，互相幫助，互相發展，不是爭領導權，……。」

（二）在國民政府基礎上，加強統一的國防政府——國民政府是全中國的政府——加強不是改組……。

（三）在現有國民革命軍基礎上，加強與擴大統一的國防軍——鞏固與擴大現有軍隊是第一位工作——打破地方觀念與割據思想，尊重抗日軍人與抗日軍隊——統一指揮，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補給，統一作戰計劃，……。」

陳紹禹的報告，得到了與會人員（包括毛澤東在內）的一致贊成和通過，經討論後并作出三項決定

（一）由駐漢中共代表團（按：即陳紹禹、周恩來、秦邦憲三人組成之代表團）向國民黨當局闡明本黨對於目前時局與統一戰線的立場，以消除國民黨及各方面對於國共合作的疑懼與誤解。

（二）由中央各負責同志針對國民黨及各方面的誤解與謠言，爲文解釋本黨的立場與態度。

（三）委托中央書記處起草對時局宣言。

關於黨的任務方面，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統戰工作和黨的工作。有關統戰工作方面，着重討論上層統戰與一般統戰的策略和作法，並為加強此項工作，決定在中央書記處之下設立統一戰線部，以原有之白軍工作委員會為基礎，改組成立統戰部；同時決定在我大後方各城市各地區，儘可能設立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或通訊處，作為統戰活動之公開據點。有關黨的工作方面，則置重點於敵後方與我後方黨的組織之建立與恢復，并作如下決定：

(一) 加強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領導。北方黨應配合武裝活動放手向各省區發展，以領導羣衆游擊戰爭創造新根據地為中心任務。

(二) 設立中共中央長江局，代表中央指揮大後方黨的工作，長江局暫設漢口。

(三) 建立中共中央東南分局，指揮新四軍及東南各省區黨的組織，東南分局暫設南昌。

(四) 即在漢口出版「新華日報」，以擴大黨的影響。

(五) 設立青年運動委員會，以加強青年運動之領導，打破共產青年團時代之關門主義。

(六) 責成中央各單位，選派大批幹部，到軍中及全國各地區開展黨的工作（註九）。

政治局會議之另一議題為軍事問題，由朱德報告八路軍現況及今後發展方向，由項英報告南方三年游擊戰爭與建立新四軍問題。會議決定關於八路軍及新四軍問題由中央軍委具體規劃，惟對於堅持南方三年游擊戰爭之幹部同志及其艱苦奮鬥精神，應予慰勉，乃通過「中央政治局對於南方各游擊區工作的決議」（參閱附錄二），決議宣稱：

「項英同志及南方各游擊區主要的領導同志以及在游擊區長期艱苦鬥爭之各同志，他們的長期艱苦鬥爭精神與堅決爲解放中國人民的意志，是全黨的模範。政治局號召全黨同志來學習這些同志的模範。」

政治局會議討論了召開黨的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問題，認爲在最近期間必須舉行七次大會，并通過「關於準備召集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參閱附錄三），推定毛澤東、陳紹禹、朱德、周恩來、項英、張聞天、張國燾、秦邦憲等二十五人爲「七大」準備委員會委員，毛澤東爲準備委員會主席，陳紹禹爲書記。

政治局會議改組了中共中央的組織，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即是陳紹禹傳達共產國際的指示，張聞天不適用於中共中央總書記，因而把總書記制度取消了，改由政治局常委直接領導書記處的日常工作；這一變化，與陳紹禹傳達指示的原意和企圖完全相反，共產國際并無取消總書記制度的指示，而只是說張聞天不適任而已，陳紹禹的企圖則是取張聞天而代之，不料毛澤東却利用了國際派內部這一矛盾，煽動其他政治局委員，索性把總書記制度取消，逐漸形成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共中央；「七大」準備委員會，推定毛澤東爲主席，即是這一趨勢的起點，陳紹禹在「七大」準備委員會雖然排名第二，并出任準備委員會書記，但其欲出任總書記，掌握黨的實權，把毛澤東捧爲掛名領袖的企圖，却逐漸幻滅了。

政治局會議改選了中央書記處和變更了各部的組織和人事：原書記處書記七人，除王稼鰲赴俄治病除名外，餘六人連任，并增補陳紹禹、陳雲、康生三人爲書記處書記。改組後之中共中央新的組織如次

書記處書記

毛澤東、陳紹禹、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張國燾、秦邦憲、廖陳

雲（即陳雲）、趙容（即康生）

李富春（後由陳雲接任）

組織部部長
宣傳部部長

何克全

統戰部部長

周恩來

幹部部部長

劉少奇

軍委主席

毛澤東

政治保衛局局長

康生（原任局長王首道調祕書處。按：政治保衛局次年改組為中

央社會部，康生升任部長）

黨報委員會書記

張聞天

民運工作委員會書記

陳雲

（民運工作委員會之下轄職工、婦運、青運三個委員會）

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

陳雲兼（原任書記張浩調八路軍政治部工作，後病亡）

婦女運動委員會書記

蔡暢

青年運動委員會書記

馮文彬

祕書長

王首道（原任祕書長涂振農調東南分局工作）——（註一〇）

四、中共中央對時局宣言

政治局會議之後，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出「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副題為「鞏固國共兩黨精神團結，貫徹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參閱附錄四），宣言說：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正式宣言：蔣介石先生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告全國國民書所提出之『貫徹抗戰到底』，『爭取國家民族最後之勝利』之主旨，與本黨目前對時局之基本方針，正相符合……。」

「共產黨不僅誠意在抗戰階段中與國民黨併肩攜手地共同救國，而且決心在抗戰勝利後與國民黨和衷共濟地共同建國……。」

同時，中共中央各負責人，根據陳紹禹的報告提綱及對時局宣言，在「解放」期刊及「新華日報」不斷撰文解釋中共的主張與立場。前後計有下列各文：洛甫（張聞天）「鞏固國共合作爭取抗戰勝利」（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陳紹禹（王明）先生與美國合衆社記者白得恩先生的談話」（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陳紹禹「挽救時局的關鍵」（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博古（秦邦憲）「抗戰形勢與抗戰前途」（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周恩來「怎樣進行持久抗戰」（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洛甫「戰時民運工作的八個基本原則」（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任弼時「怎樣渡過抗戰的困難時期」（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二日），朱德「八路軍半年來抗戰的經驗與教訓」，項英「南方三年游

擊戰爭對於當前抗戰的教訓」，「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毛澤東先生與合衆社記者王公達先生的談話」（一九三八年二月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洛甫、毛澤東和陳紹禹的文章和談話（註一一）。

洛甫在文章中「關於兩黨關係的問題」寫道：

「有人說共產黨同國民黨合作是假的，共產黨的目的是要在合作的中間削弱國民黨的影響與力量，是在利用合作的名義同國民黨爭取領導權。我們認爲這是一種非常有害的謠言……。」

「相反的，我們兩黨在合作的過程中，不但不是要互相抵消，互相削弱，而正是要『互相幫助，互相發展』……。」

「所以共產黨人始終主張各黨各派的合作，以達到『共同負責，共同領導』的目的。這并不是同國民黨爭領導權，而是願意在民族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幫助蔣介石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擔負起一部分責任。關於目前抗日戰爭中，蔣介石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已經處在領導地位，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因爲國民黨是中國最大的一個政黨，而且向來是一個統治的黨……。」

「所以在我們共產黨人看來，今天的問題不是『爭取領導權』的問題，而是爭取替國家民族多做一些事業的問題。」

關於國民政府的問題，洛甫繼續寫道：

有人說，共產黨人總是要反對政府，總是不擁護政府，而且甚至說共產黨人把現在的政府看做俄國

的克倫斯基政府，因而共產黨人要推翻現在的政府另行組織新的政府。我們認爲這是一種非常有害的謠言……我們應該向國民黨同志聲明，我們是竭誠擁護現在蔣介石先生領導下的國民政府的，因爲這個國民政府今天是一個已經開始担任著國防任務的政府，已經開始代表著民族利益的政府，這是全中國人民自己的中央政府，也是我們共產黨人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同俄國二月革命後的克倫斯基政府完全不相同……。」（註一二）

關於所謂國民黨一黨專政問題，毛澤東在答復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時說道：

「我們中國共產黨，是國民黨以外的我國第二個大的政黨，我們今天并不要求參加政府。關於這一點，我們黨的領導人陳紹禹同志，在其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與美國記者白得恩先生的談話當中，以及我們黨的另一領導人張聞天（卽洛甫）同志，在『解放』二十八期所發表的『鞏固國共合作爭取抗戰勝利』一文中，已經代表中共中央坦白懇切地聲明過。關於這一點，我可再代表中國共產黨中央作一次鄭重聲明：我們中國共產黨現在誠懇地幫助國民黨對日抗戰，但我們現在并不要求參加國民政府。」

「我們共產黨員雖然自己不參加政府，但我們對領導抗戰的國民政府絕對擁護」，「我們共產黨員對國民政府的擁護和幫助是絕對真誠的，是從國家民族根本利益的根本立場出發的。」（註一三）

關於統一戰線問題，陳紹禹在「挽救時局的關鍵」一文中提出了以下的辦法：

「爲更加鞏固和擴大國共兩黨合作，現在須要採取那些具體辦法呢？

第一、須協商和通過一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同綱領；

第二、須成立一個由國共兩黨代表組織的經協商和計議各種問題的組織；

第三、在軍事問題，政府問題和民運問題各方面，國共兩黨應該更加鞏固和擴大合作的範圍和程度，以便達到鞏固和擴大全中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加強和充實全中國統一的國民政府，以及真正達到全中國人力、武力、智力、物力、財力總動員對日抗戰并取得最後勝利的目的。

「爲的在國共兩黨基礎上，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今天須要採取那些主要辦法呢？

第一、須將國共兩黨以外其他真正抗日救國的黨派，吸收到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中來，爲共同綱領而奮鬥；

第二、須使現存的各種工農軍學商羣衆組織，有權利加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中來，擴大抗日救國力量；

第三、須將還無組織的廣大各界民衆，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和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織方式組織起來，使他們能成爲有組織的抗戰生力軍。」（註一四）

顯然的，南京失守前後，中共對於抗戰形勢，統戰政策，和對國府國軍的態度都有不同程度的轉變，其原因在於：第一、抗戰初期的挫折，全國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在此一形勢下，迫使中共不能不由強調鬥爭轉向強調團結，以迎合全國軍民堅持長期抗戰的決心。第二、抗戰之初，毛澤東所強調的「獨立自主」和「爭取領導權」的方針，受到了全國同胞與輿論的批評和指摘，在這一情勢下，中共不能不暫時退縮和讓步，以平息全國同胞的憤怒和輿論的抨擊。第三，在共產國際支持下，陳紹禹的緩和主張代

替了毛澤東的死硬政策，成爲當時中共的統戰指針。

當然，在另一方面，中共政策之暫時趨向緩和，還是受了蔣委員長決心抗戰到底的影響，因此，中共之對時局宣言，亦以蔣委員長之告國民書爲號召。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蔣委員長所發表的「我軍退出南京告國民書」宣稱：

「中國持久抗戰，其最後決勝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實寄於全國之鄉村與廣大強固之民心；我全國同胞誠能曉然於敵人之鯨吞無可倖免，父告其子，兄勉其弟，人人敵愾，步步設防，則四千萬方里國土以內到處皆可造成有形無形之堅強壁壘，以制敵之死命，故我全國同胞，在今日形勢之下，不能徒顧慮一時之勝負，而當澈底認識抗戰到底之意義與堅決抱定最後勝利之信心。」（註一五）

五、中共展開全面活動

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之後，中共的武裝鬥爭、統一戰線和黨的工作，在全國範圍內展開了積極的活動。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二月，延安中共中央各機關，抗大、黨校各訓練機構，抽調了大批幹部，源源不斷的向北方南方輸出。在北方，經八路軍總部隨部隊分送到各基地和敵後，以擴大地方武裝和創建根據地，八路軍部隊亦分散轉入敵後，向華北各省區發展。在南方，則以武漢爲中心，藉八路軍辦事處爲掩護，分派至南方各省，以恢復和建立各地黨的組織并展開全面的統戰活動。中共中央在我大

後方的機關報——「新華日報」亦於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漢口創刊，成爲中共宣傳工作的有力武器。

這時，在我大後方設有八路軍辦事處通訊處或連絡站的地區計有：西安、武漢、重慶、長沙、廣州、桂林、貴陽、成都等地。在南昌則有新四軍軍部和吉安、平江、上饒等地之新四軍通訊處或辦事處。這些機構就成爲中共的統戰工作中心和中共黨的組織的掩護機關。延安派出的共黨幹部以及當地的幹部，均藉此進行公開的或祕密的活動（註一六）。

一九三八年春，中共中央派至各地的代表機關與地方黨的機構和主要負責人，除原有陝甘寧邊區黨委等機構外，北方與南方的主要組織如次：

中共中央北方局（以八路軍總部爲掩護）

書 記

楊尙昆

組織部部長

朱 瑞（後由李雪峯接任）

宣傳部部長

李大章

中共中央長江局（以漢口八路軍辦事處爲掩護）

書 記

陳紹禹

組織部部長

秦邦憲

宣傳部部長

何凱豐

統戰部部長

周恩來

軍事部部長

葉劍英

婦女部部長

鄧穎超

祕書長

李克農

中共中央東南分局（以南昌新四軍軍部爲掩護）

書記

項英

組織部部長

曾山

宣傳部部長

涂振農（後由黃道接任）

統戰部部長

涂振農

軍事部部長

陳毅

婦女部部長

陳少敏（涂振農妻，後離異，均調返陝北）

祕書長

郭潛（即陳然，後調江西省委）

中南各省中共主要負責人如左：

湖北省委

錢瑛（女）

湖南省委

周小舟

四川省委

羅世文

第二十九章 陳紹禹與毛澤東之矛盾和鬥爭

貴州省工委

鄧止戈

江西省委

郭潛

廣東省工委

雲廣英

福建省委

黃道

閩粵贛邊省委

方方

浙江省委

劉英

江蘇省委

劉曉

中共在我大後方的組織，省委（或省工委）之下設特委（特別委員會），特委之下設縣委、區委、支部。至於各省省委之組織與分工，視各地情況與需要而定，以江西省委為例，因該省為共黨蘇維埃運動之老巢，且有所謂三年游擊戰爭之山區與武裝，省委之組織較大，當時之組織與分工如次：

省委書記

郭潛

組織部部长

曾金聲（後在平江事件中死亡）

宣傳部部长

郭潛（兼）

統戰部部长

涂正坤（在平江事件中死亡）

軍事部部长

顏國華

保衛部部长

（後改為社會部）羅梓銘（在平江事件中死亡）

民運部部长

鄧振詢（後病亡）

婦女部部长

李堅貞（鄧振詢妻）

青年部部长

陳丕顯

祕書長

楊尙奎（註一七）

從以上中共組織狀況瞭解，這時陳紹禹國際派的力量，仍然相當雄厚，北方局書記楊尙昆，原係二十八個布爾塞維克之一，為陳紹禹之中堅幹部，長江局、東南分局以及大後方各地黨部，大都在陳紹禹領導之下，周恩來、葉劍英、項英、李克農等均成為陳紹禹、秦邦憲國際派的得力支持者，項英掌握的新四軍亦成為陳紹禹的政治資本。這時陳紹禹在武漢，除主持長江局全盤工作外，着重於展開統戰工作和宣傳工作，他通過「新華日報」和各左派書店，盡量發表文章和出版多種多樣的陳紹禹抗戰言論集，并四出演講，風頭極健，於是陳紹禹在中共黨內外聲望日隆，大有與毛澤東一爭長短之勢。毛澤東此時，雖已被欽定為中共黨的領袖，并全力掌握八路軍及北方地方武力，但對陳紹禹聲望日高之威脅，深感不安，乃於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共中央六中全會，挑剔陳紹禹之「一切經過抗日統一戰線」為不當，藉以削弱其聲勢并提高自己的地位（註一八）。

六、新四軍之招募與編組

國府軍委會為應中共請求，於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二日，發佈收編江南共黨游擊隊為國軍新編第四軍

之命令，并派葉挺、項英爲正副軍長。命令發佈之後，新四軍遲遲未能組成，其原因如左：

(一)所謂江南之共黨游擊隊，即爲各地土共，大都爲烏合之衆，如無曾經受訓之軍官爲骨幹，實無法編組成軍。當國府軍委會命令發佈之後，中共中央始令項英赴延，并在「抗大」、留守部隊與八路軍中抽調軍事幹部至江西，作爲編組新四軍之骨幹。

(二)江南共黨游擊隊，散處贛、閩、粵、湘、浙、皖各叢山峻嶺中，苟延逃命，形同野人，武器殘破，人數極少，以項英、陳毅潛伏之大庾油山爲例，當時僅殘存十餘人，其他各山區，亦僅有數十人不等，全部共約三千餘人；當時軍委之額定編制爲一萬二千人，相差將近萬人。處此情況，中共乃臨時在各地大量招募地方農民參軍湊數，并在各山間挖掘埋藏三年，已無法使用之破槍爲武器，如此稽延，以致一時無法集中。

(三)江南各地土共，與國民黨地方團隊作戰三年，大部被消滅，所餘殘部對國民政府恨之入骨，一旦要他們改編爲國軍，彼等絕不置信并嚴加拒絕，有的還把派來傳達改編命令之共幹，視作叛徒間諜，加以槍殺，陳毅就幾乎因此喪命。緣因項英、陳毅出山後，陳毅奉命到湘贛邊譚余保部傳達收編命令，當他到達九龍山（江西安福縣、萍鄉縣交界之大山）時，就被游擊隊捆绑起來了，他雖然持有黨的介紹信，但被視爲國民黨所偽造，把陳毅認作叛徒，要執行槍決，處此生死關頭，陳毅情急智生，要游擊隊把他解到譚余保那裏去（按：譚當時任湘贛邊軍政委員會主席，潛伏於武功山上），游擊隊總算沒有把他處決，於第二天解送至譚余保處，可是，譚還是不相信陳的說法，依然把他捆在那裏，直到譚的交通

員從吉安帶來收編新四軍的消息和報紙予以證實後，才把陳毅釋放。

(四)若干地區之土共，認爲共黨之統戰策略爲背叛革命，游擊隊改編爲新四軍，是對國民黨的投降，因而堅決反抗收編命令，繼續游擊搶劫，流爲土匪強盜。如贛東北之楊文翰、關英所率領之游擊隊（約八十人），瑞金、長汀邊區劉國興所領導之游擊隊（亦有八十餘人）均反抗收編，後來流爲土匪，卒被國民黨軍隊消滅（註一九）。

遲至一九三八年一月，新四軍軍部始在南昌成立，惟收編工作仍未完成，延至是年五月，始編成四個支隊，其中一、二、三支隊集中皖南，四支隊集中皖北，六月軍部移設皖南涇縣，才沿長江兩岸開始對日作戰。

新四軍之編制，經國府軍委會之核定爲四個支隊，每支隊轄兩個團隊，每團隊轄三個營，每營分四個連，全部員額爲一萬二千人，由第三戰區指定如下之作戰區域：江南方面，以孫家埠爲起點，一路經蘇浙皖越蘇州而達江陰，一路沿長江東下至江陰；江北方面則以淮南路沿線爲範圍。

當時新四軍之編組與主官姓名如左：

新四軍軍部

軍長

葉挺

副軍長

項英

參謀長

周子昆

祕書長

李一氓

參謀處長

賴傳珠

副官處長

黃序同

軍需處長

朱裕如

軍醫處長

沈其霞

特務營營長

朱謀緒

政治部主任

袁國平

政治部副主任

鄧子恢

組織科科长

李子芳

宣傳科科长

朱鏡我

民運科科长

余再勵

敵軍工作科科长

林植夫

戰地服務團團長

朱克靖

戰地服務團副團長

白 丁

教導隊兼隊長

周子昆

政治部主任

余立奎

教育長

馮達飛

第一大隊長

謝祥軍

第二大隊長

饒守坤

第一支隊

司令

陳毅

副司令

傅秋濤

政治部主任

劉炎

第一團

團長

傅秋濤

副團長

江渭清

政治處主任

鍾期光

第一營營長

張振光

第二營營長

徐贊輝

第三營營長

丁廉章

第二團

團長

張政坤

副團長

劉培善

政治處主任

蕭國立

參謀長

王必成

第一營營長

段煥竟

第二營營長

張志秀

第三營營長

劉玉林

游擊大隊長

紀振綱

第二支隊

司令

張鼎丞

副司令

譚震林

政治部主任

王集成

參謀長

羅忠毅

特務大隊長

朱昌魯

第三團

團長

丘金聲

副團長

廖海濤

政治處主任

鍾國豐

參謀長

熊夢麟

第一營營長

邱立生

第二營營長

楊鴻方

第三營營長

鄭桂清

第四團

團長

盧勝

副團長

黃火星

政治處主任

張道庸

參謀長

吳勝

第一營營長

池義標

第二營營長

王玉廷

第三營營長

余龍貴

第三支隊

司令

張雲逸

副司令

粟裕

政治部主任

胡榮

參謀長

趙凌波

第五團

團長

孫仲宇

副團長

曾昭銘

政治處主任

張友來

參謀長

桂鳳洲

第六團

團長

葉飛

副團長

胡坤

政治處主任

汪猷安

參謀長

黃元慶

第一營營長

沈強

第二營營長

李白夫

第三營營長

柏元之

游擊大隊長

章嘯衡

第四支隊

司令

高俊亭

副司令

林維先

政治部主任

鄭位三

參謀長

楊一麟

特務營營長

李實懷

第七團

團長

秦鶴喬

政治處主任

徐海珊

參謀長

秦賢安

第一營營長

艾明山

第二營營長

陳元良

第三營營長

何作周

第八團

團長

周駿民

副團長

林愷

政治處主任

戴秀符（註二〇）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新四軍軍長葉挺的問題，他在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前就是一個共產黨黨員，一九二七年曾參加共黨所發動的南昌暴動（任前敵總指揮兼十一軍軍長）和廣州暴動，在廣州暴動中，他以總指揮和紅軍總司令名義指揮作戰，可是他對暴動缺乏信心，非常遲疑和動搖，臨時被共黨廣東省委撤職，葉挺被撤職後心灰意冷，遂逃往香港轉赴德國寓居，從此與共黨脫離關係，中共中央亦曾開除他的黨籍。抗戰開始後，始返國與共黨聯絡，中共以其曾是共黨黨員，且與國軍有歷史淵源（曾任國軍團長、師長），遂推薦其出任新四軍軍長。在新四軍軍長任內，因其仍非共黨黨員，軍中問題全由項英負責，葉僅負責與國府軍委會及戰區方面之聯絡接洽工作。

這時，項英掌握了新四軍，同時又是東南分局書記，成爲東南半壁之中共紅人。如論關係，他和周恩來及國際派較爲接近，在江西蘇區時期，曾先後夥同周恩來、秦邦憲等把毛澤東打擊得不能擡頭，與毛澤東結下了深仇大恨，從此被毛澤東視作眼中釘；不過，項英在共黨黨內資歷甚深，且係工人出身，常以無產階級代表自居，視毛澤東爲腐朽秀才、三家村學究，譏諷毛之觀點爲農民意識、書生之見。自陳紹禹返延傳達史達林意見後，毛澤東在黨內地位逐漸上昇，但項英對毛仍輕視如故，常在東南分局負責人間談論毛曾過去錯誤并予譏笑；正因爲如此，當項英死亡後，毛澤東仍不放鬆，對項英進行類似鞭屍的嚴厲批評，以洩其胸中積憤！（註二一）

註一：陳然及涂振農提供之資料。

註二、三：陳然先生轉據當時任中共中央祕書長之涂振農所提供之資料。

註四：毛澤東「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見「毛澤東選集」二卷三七七—三七八頁。

註五：同「註四」——「毛澤東選集」二卷三八二—三八三頁。

註六：陳然先生轉據涂振農所提供之資料。

註七：「毛澤東選集」二卷三七八頁，關於「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說明。

註八—一〇：陳然先生轉據涂振農所述而提出之資料。

註一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三冊，題為「挽救時局的關鍵」，一九三八年五月延安解放社出版。

註一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三冊第八—一二頁。

註一三：同上書第三三—三四頁

註一四：同上書第五〇—五四頁

註一五：蔣總統「蘇俄在中國」第二一一頁。

註一六—一八：陳然先生及涂振農所提之資料

註一九：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當時陳先生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參與收編江西中共游擊隊之工作。

註二〇：陳然先生根據其記憶及參證有關文件所提出之資料。

註二一：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陳先生担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之前，曾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祕書長，調離江西省

委後，又曾一度出任中共中央東南局宣傳部長，（東南分局後來改升為東南局）故對項英情況與言論甚為瞭解。

附錄一：陳紹禹：「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

（一）抗戰四個月的經驗與教訓

甲、抗戰的收穫——中華民族得到些什麼？

- ① 提高了民族自信心，粉碎了恐日病，衝破了鴉片戰爭以來一擊即破的積弱傳統。
- ② 由分崩離析的局面，轉變到全國統一，一致對外的局面。
- ③ 國民政府開始建立中國統一的政權與起了國防政府的作用。
- ④ 開始建立全中國的國民革命軍，并起了國防軍的作用，增加了作戰經驗。
- ⑤ 中國政治制度開始了民主化，民衆運動與組織開始發展，開始了戰爭的動員。
- ⑥ 因爲中國軍隊英勇抗戰，使日寇不能不付出很大的代價方能佔領中國一部份領土。
- ⑦ 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獲得了世界同情，因此前線將士的血不是白流的，全國人民的熱望也不是空的，他將由此基礎培植出獨立自由的幸福的中華民主共和國。

乙、但抗戰爲什麼失敗？

- ① 軍事上的失利是不容諱言，但并不是抗戰失敗，而且弱國自衛戰中可能遇到初期挫折。
- ② 失利的原因：
 - A、日本強於中國，中國國防力量與技術條件大大落後於日本，決不僅三與一之比。
 - B、日本有了長期準備，中國沒有。
 - C、中日經濟對比大不相稱，尤其軍工業與運輸，我們居於絕對劣勢。

D、日本取得了中國漢奸托派親日份子的內應，而中國初期沒能取得日本後方的反戰運動的響應。

E、軍事戰略戰術的某些錯誤，及軍隊尚未能完全統一。

F、軍民尚未密切結合起來，羣衆的動員和組織十分不夠。

③然而這種失利，這種部份領土的喪失與軍事上的失利，決不能決定整個抗戰的勝負，只有長期抗戰才能決定整個抗戰最後的勝負。

丙、決定長期抗戰最後勝負的力量在那裏——三個因素：

①中國抗日力量的增長，尤其是政權開始統一，民運的開始發展，使全中國力量走向團結，這是保障抗戰勝利的基本條件。

②日本侵略中國的強點與弱點，強點如前所估計他在初期戰中將表現的作用；而他的弱點如：A、財政困難；B、軍工業原料缺乏；C、國內矛盾增長；D、後方不鞏固；E、戰線延長兵力分散不夠使用等將愈因戰事延長而增長起來。

③國際條件的發展如：A、國際同情中國運動的發展；B、英美雖尚不能一致，但反對日本的傾向是增長著的；C、德意雖想援助日本，但也有矛盾的；D、法蘇對中國的同情與援助是增長著的。

因此，決定中國對於長期抗戰的條件是增長著，向前發展著，只有長期抗戰才能使敵人的困難增加，使國際有力的條件增長，而主要的關鍵就在國內條件增長與發展，才能取得長期抗戰的最後勝利。

(二) 目前抗戰危機與克服危機的出路。

甲、目前抗戰的危機究在那裏？

①抗戰危機不在部份的軍事失利與領土喪失，而在：

第二十九章 陳紹禹與毛澤東之矛盾和鬥爭

A、漢奸親日派的活躍。

B、抗日戰線內部的動搖——無信心，無辦法，離心傾向，互相埋怨磨擦——這雖是微弱的開始，然而內部不團結，嚴重過外來的禍患，漢奸敵探托派更可以挑撥利用，推波助浪來破壞抗日統一戰線。

②因此，我們要認清多難可以興邦，內亂必致國亡，我們應沉痛的認識歷史的教訓——敵人所願，非我所願。

乙、和平統一團結禦侮：

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堅持長期抗戰是克服危機的出路。

(三) 堅持長期抗戰的任務

甲、堅持長期抗戰的三個基本條件：

①鞏固和擴大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高於一切，一切服從抗日，一切為著抗日統一戰線，一切經過抗日統一戰線——擁護國民黨在中國政府及軍隊中的領導權力，共同綱領，共同負責，共同磋商，互相幫助，不是爭取領導權——承認孫先生革命三民主義為救中國的基本方針，而以民族解放為中心做起，直到建設獨立自由幸福的中國——團結一切力量，朋友愈多愈好，敵人愈少愈孤立愈好。

②在國民政府基礎上，加強統一的國防政府——國民政府是全中國的政府——加強不是改組——上層的政制改善與下層互相配合的統一國防政府是建立在統一的民衆基礎之上的——民主自由是以抗日為中心的民主自由而不是與抗日對立的——民生改善是在抗日條件之下實現的，並不是對立的——民衆武裝是從努力抗日中武裝起來的，更不是對立的。

③在現有國民革命軍基礎上，加強與擴大統一的國防軍——鞏固與擴大現有軍隊是第一位工作——打破地方觀念與割據思想，尊重抗日軍人與抗日軍隊——統一指揮，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補給，統一作戰計劃——建立政治工作

，建立軍事工業，加強教育幹部，一切努力應爲著補充部隊，建立軍事工業。

乙、動員和組織千百萬羣衆，爭取長期抗戰的最後勝利。

在統一的民運基礎上深入到羣衆中去——統一的條件，公開聯合，共同綱領，共同負責，互相幫助，互相發展，反對對立，反對傾軋等——一切羣衆工作要以動員爲中心——反對關門主義，反對併吞主義——要堅決肅清漢奸敵探托派，以鞏固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以加強統一的中央政府，以擴大統一的國民革命軍，以擁護蔣委員長領導抗日到底，爭取中華民族的最後解放！

（錄自一九三八年二月漢口民族解放社出版的「陳紹禹（王明）抗戰言論集」）

附錄二：中央政治局對於南方各游擊區工作的決議（黨內文

件）

政治局聽了項英同志關於南方游擊區的報告之後，認爲項英同志及南方各游擊區的同志，當紅軍主力離開南方後，在極艱苦的條件下，長期堅持了英勇的游擊戰爭，基本上正確的執行了黨的路線，完成了黨所給予他們的任務，以致能夠保存各游擊區在今天成爲中國人民反日抗戰的主要支點，使各游擊隊成爲今天最好的抗日軍隊之一部，這是中國人民一個極可寶貴的勝利。

項英同志及南方各游擊區主要的領導同志以及在游擊區長期艱苦鬥爭之各同志，他們的長期艱苦鬥爭精神與堅決爲解放中國人民的意志，是全黨的模範，政治局號召全黨同志來學習這些同志的模範。

現在放在中國共產黨前面的任務，是在擴大與鞏固國共兩黨的合作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戰勝日寇，政治局相信南方過去各游擊區的同志，同樣能夠在中央及中央東南分局的領導之下，完成爭取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的神聖的

任務。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

(錄自中共中央祕密印發的油印原件)

附錄三：關於準備召集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

(一)政治局認為在最近時期內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全中國人民解放鬥爭和黨的工作均有最嚴重的意義。

(二)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心任務，在於討論和規定如何在鞏固和擴大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方針下，組織和保障全中國人民取得對日抗戰的最後勝利；同時黨七次大會應當對於自黨六次大會以來的革命鬥爭經驗作一個基本的總結。

(三)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期間不能過長，應盡可能的在較短時間內召集大會。

(四)黨七次代表大會的主要議事日程，政治局暫決議為下列各項：

- ①十年奮鬥的基本總結和今後奮鬥的基本方針。
 - ②如何組織和保障全中國人民對日抗戰的勝利。
 - ③動員工人階級積極參加對日抗戰工作。
 - ④在新工作條件下的黨的建設問題。
 - ⑤改選黨的中央領導機關。
- 此大會議程應交六中全會審核及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最後決定。

(五)為的有系統地進行一切有關於召集七次大會的準備工作，政治局決定成立一個籌備召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

代表大會的準備委員會，準備委員會由下列同志組織之：

- | | | | | | | | |
|------|------|------|------|------|------|------|------|
| ①毛澤東 | ②陳紹禹 | ③朱德 | ④周恩來 | ⑤項英 | ⑥張聞天 | ⑦張國燾 | ⑧秦邦憲 |
| ⑨趙容 | ⑩廖陳雲 | ⑪王稼祥 | ⑫彭德懷 | ⑬任弼時 | ⑭鄧發 | ⑮劉少奇 | ⑯何克全 |
| ⑰林祖涵 | ⑱吳玉章 | ⑲董必武 | ⑳徐特立 | ㉑曾山 | ㉒張鼎丞 | ㉓陳毅 | ㉔楊靖宇 |
| ㉕高崗 | | | | | | | |

準備委員會之主席爲毛澤東同志，書記爲陳紹禹同志，爲的便利於進行經常工作，決定在準備委員會下設立祕書處，由下列同志組織之：

- ①毛澤東 ②張聞天 ③趙容 ④廖陳雲 ⑤陳紹禹

(六)準備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之責任，在於在中央領導之下，動員全黨同志和廣大民衆積極參加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準備工作。

(七)各級黨部對於大會之應行具體準備工作，由準備委員會祕書處擬定交政治局批准後通知全黨。

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通過

(錄自中共中央祕密印發的油印原件)

附錄四：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

——鞏固國共兩黨精神團結，貫徹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

全國各界同胞們！

自蘆溝橋事變以來，我國軍民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先生領導之下，對暴敵已進行了五個半月的英勇抗戰

第二十九章 陳紹禹與毛澤東之矛盾和鬥爭

；雖然由於日寇軍事技術的優越，由於我國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存在有不容否認的弱點，以致平津察綏太原瀋寧相繼失守，遭受部份的領土損失和暫時的軍事失利；然而五個半月的英勇抗戰，表示出中華民族空前未有的覺醒，造成我民族力量空前未有的團結，顯示出我軍將士驚人的英勇犧牲精神，開始形成了我統一國家政權和統一的國家軍隊，提高了我民族抗敵致勝的信心，相當地打擊了日寇的兇焰，部份地消耗了日寇前進的困難，助長了日寇內部矛盾，同時，增加了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和進步力量對我人民和政府的同情和援助，因而也就奠定了我們今日繼續抗戰和爭取最後勝利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正式宣言：蔣介石先生本年十二月十七日告全國國民書所提出之「貫徹抗戰到底」「爭取國家民族最後勝利」之主旨，與本黨目前對時局的基本方針，正相符合。中共中央堅決地相信國共兩黨同志和全國同胞，定能本此方針，親密攜手，共同奮鬥。

中共中央鄭重的宣告：我國抗戰目前正處在一個嚴重的困難關頭，然而部份領土和中心城市的得失，初期戰線上的部份軍事的失敗，均不能決定中日戰爭的最後命運；而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的堅決團結和長期艱苦抗戰之毅力與信心，實為爭取最後勝利之保證；且目前最大難關，既不在於兵力不濟，武裝不足和財政困難，亦不在於日寇的前進深入，而在於日寇於暴力之外，又加緊「以華制華」的企圖，并在於漢奸、敵探、土匪等正在加緊挑撥離間，以破壞我民族力量團結的陰謀，尤其在於我民族力量量的團結還未達到應有的程度。

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國同胞宣佈：當此民族危機更加緊迫之時，我全民族抗日力量量的更加團結，實為挽救時局的中心關鍵。團結全民族抗日力量量的根本方案，在於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鞏固和擴大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環節，則為鞏固國共兩黨的親密合作，中共中央認為當前足以告慰於全國同胞的，就是在國共兩黨方面不僅都有了更加精神團結必要的認識，而且都有了更加親密合作的決心，共產黨不僅誠意在抗戰階段中與國民黨并肩攜手地共同救國，而且決心在抗戰勝利後與國民黨和衷共濟地共同建國。在目前千鈞一髮的緊急關頭，中共中央相信國共兩黨同志和全國同胞，為保證繼續持久抗戰，爭取最後勝利，定能共同努力實現下列工作：

(一)動員全中國的武力、人力、智力、財力、物力繼續守土衛國的長期抗戰——這首先要堅持華北和東南的持久抗戰，鞏固江防，保衛武漢，發展敵人佔領地區的廣大游擊戰爭，援助東北及各地的義勇軍，來擊破敵人的前進，阻止敵人的深入，以便爭取時機，加強力量，準備進行決定的戰鬥。

(二)鞏固和擴大全中國的統一的國民革命軍——在政治上。組織上、武裝上、加強現有軍隊、建立新軍隊，有組織的進行徵募兵役運動，使我國在持久抗戰中，有統一指揮、統一紀律、統一武裝、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的足夠數量的有新式武裝的和政治堅定的國防軍隊。

(三)充實和加強全中國統一的國民政府——吸收堅決參加抗戰的各黨各派各團體的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參加政府工作，刷新各省吏治，肅清貪污腐化份子，使政府一切機構和施政方針，能適應抗戰勝利的需要。

(四)實行國防經濟政策——首先須努力建立軍事工業，加速軍事交通和實行戰時財政政策。

(五)建立鞏固後方，動員和組織廣大民衆協助軍隊和政府積極抗戰——一方面堅決肅清漢奸、敵探、及日寇走狗的托洛茨基匪徒分子，另方面廣大地動員和武裝政府統治區域和被敵佔領區域的民衆，使之積極參加各種有利於戰勝日寇的工作，同時加緊動員千百萬國外僑胞盡力於保衛祖國的各種事業。

(六)擴大國際宣傳和增加國際援助。

中共中央堅決相信，國共兩黨及一切抗日力量定能在最近期間內，共同完成這幾項迫切的基本工作，我四萬萬五千萬人的大中華民族，在全世界主持正義的人民和國家的同情援助之下，定能在持久抗戰中，最後戰勝內受人民仇恨外遭列強疾視的日本帝國主義！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錄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三冊，一九三八年五月延安解放社出版)

中共史論 第三冊

第三十章 陳獨秀與張國燾事件

一、中共圖再度加入國民黨

一九三八年三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安舉行了三天的會議，會議情形，陳紹禹在「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一文中寫道：

「議事日程是：（一）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二）黨的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具體準備工作。在報告和討論中，充分地表現出出席政治局會議人員對目前時局和黨的工作問題的意見完全一致。

「關於抗戰形勢的估計，在報告討論中，大家都一致認為：從去年十二月上半月前一次政治局會議到現在的三個月過程中，我國在軍事上和政治上都表現出一些新的進步……。

「同時政治局會議指出：我國第二期抗戰中的這些軍事上與政治上的進步，遠趕不上日寇繼續侵略和民族危機繼續加深的速度和程度；我國這些進步，不僅還未能造成全線反攻驅逐倭寇收復失地的一切必要的軍事上和政治上的條件，而且還不足以打破敵人第二期進攻的主要危險……。因此，保衛山西、河南、陝西，以達到保衛武漢的目的，是一切抗日黨派和全國軍民今天最緊急最重要的任務。」（註一）

關於「如何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勝利」問題，陳紹禹繼續寫道：

「有許多人問：『現在我們固然要用一切力量去達到保衛武漢的目的，但是，設若萬一不幸而武漢不保，中國是否能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呢？』政治局會議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是：我國軍民現在應當盡一切可能用一切力量來達到武漢不被敵佔領的目的，同時，並且應當對保衛武漢事業具有最高度的熱忱和抱著最堅強的信心；但是，我們也應當有更深遠的認識和更長期的準備，即我們應當假定和確定：在武漢不失的條件下，我們固然能夠繼續抗戰和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而即在武漢不守的情勢之下，我們抗戰雖然要遭遇更大更多的困難，但繼續長期抗戰和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的基本條件依然存在的。

「有那些基本條件決定我國能夠繼續長期抗戰和能夠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呢？

「第一個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條件，是我中華民族和中華民國本身具有偉大的能夠長期抗戰和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許多基本因素……。

「第二個條件，是敵人具有的許多重大困難和弱點……。

「第三個條件，是國際形勢基本上與我國抗戰有利……。

「然而這不是說：我國抗戰的國內外條件全部順利，我國抗戰已經沒有嚴重的困難和弱點，我國抗戰的最後勝利已預先有了保證呢？不是的，絕對不是的！

「八個月的抗戰固然造成了我國空前未有的進步：全民族的空前覺醒和空前團結，統一政府和統

一軍隊的建立，政府與人民關係的開始逐漸改善，武力開始與人民結合，中華民族和國家地位在國際上的增高和世界先進人類對我國同情的空前增長，所有這一切，都是舉世公認的事實。但是，同時，我國抗戰，無論在政治方面，無論在軍事方面，都還有極嚴重的困難和弱點：軍隊新式武裝和新的軍事幹部的不夠，軍事工業的缺乏，軍事運輸的遲緩和不够，軍事戰略轉變的不充分，統一軍隊條件的不充分具備，這一切都是軍事上不容否認的弱點和困難；抗日各黨派本身力量都還不能滿足抗戰形勢的需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未達到應有的鞏固和擴大的程度，政府設施還不能完全適合抗戰的需要，戰時民意機關的缺乏，民衆運動和民衆組織的不發展，貪污土劣的橫行，這一切都是政治上無容諱言的弱點；大批難民和失業同胞的流離失所和飢寒交迫，許多軍事原料和軍用品的供給不足，大量的財政消耗，許多地方物價的高漲，這一切無疑的是財政經濟方面的困難；歐洲的緊張局面，英國張伯倫對侵略者讓步的政策，國聯的軟弱無力，美國的動搖政策，這一切都是目前我國抗戰的國際形勢中的困難和弱點。」（註二）

對於當時的軍事政治與外交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也提出了許多意見，陳紹禹接著寫道：

「爲的使第二期抗戰能够順利進行，爲的使我國能繼續長期抗戰和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認爲我們對於目前抗戰的許多重要問題有坦白表明意見的必要，這不僅是爲的使我們黨的全體同志對這些問題有清楚的認識和共同的了解，而且是爲的使我們這些意見能提供國民黨同志和國民政府當局以及全國各抗日黨派各抗日部隊團體和全國同胞，作爲討論和實行的參考材料：

「一、對軍事問題的一般意見：

- (一) 確定和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爲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
 - (二) 建立真正統一的、政治堅定的戰鬥力強的國民革命軍……………。
 - (三) 建立幾十師新的有新式武裝的部隊作爲全軍的骨幹……………。
 - (四) 迅速建立和擴大軍事工業和加速軍事交通……………。
 - (五) 加速普遍地給軍民以防毒的常識和設備……………。
- 二、對國內政治中幾個迫切問題的意見：
- (一) 對鞏固和擴大國共及一切抗日黨派的抗日救國團結問題，……………。政治局會議一致認爲：解決此問題的唯一正確辦法，在於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種包括各黨派共同參加的某種形式的民族革命聯盟。這種聯盟建立的基本原則，應有下列三點：
 - (甲) 各黨派各團體擬定一統一戰線綱領，作爲各方宣傳行動共同遵守的方針；
 - (乙) 由各方代表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與地方的統一戰線組織，以規劃抗日救國的大計和調整各黨各派各團體間的關係；
 - (丙) 參加此聯盟之各黨派仍保存其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
 - (二) 對國民黨的關係和希望：

我們誠懇和熱烈地希望國民黨本身有如下的改進和加強：

(甲)淘汰貪污腐化和一切不忠於黨不忠於抗戰革命事業的分子，刷新黨的組織；

(乙)大量吸收先進青年和進步人士到國民黨中來，以增進新生力量；

(丙)在組織內實行真正民主集中制……以健全黨內生活和培養大批幹部人材；

(丁)加強政治上和組織上的團結，以鞏固黨的統一；

(戊)提高和嚴格執行黨的紀律，使黨員均能自覺地為黨革命事業而努力。

(三)對於統一政府問題的意見：

此次政治局會議更一致堅決認為：我們不僅在努力維護領導抗戰的統一政府，即在將來抗戰更困難更複雜的局面之下，我們也是竭力贊助統一政府……。

(四)關於建立健全民意機關問題：

至於民意機關的形式，政治局會議認為：或為更擴大的國防參議會，或為國民大會，或為其他形式，均無不可……。

(五)關於動員和組織民衆問題：

我們提議：將工農商學各界按照其職業地域而組成各種職業的聯合團體，將青年婦女文化界等按照其切身利益和特殊需要而組織成各種統一的羣衆團體，將已有的羣衆團體加以健全和充實，將無組織的民衆吸收到各種羣衆團體內去，同時在全國範圍內成立統一的全國性的領導機關，在地方組織統一的各界羣衆團體的領導機關……。

三、對外交問題的意見：

我國在外交政策方面，不僅政府要更加積極地去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抗日的朋友爲外援，同時，還須發動和組織廣大的國民外交行動，……。」（註三）

從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對國民黨國民政府提出許多意見看來，這次會議似乎是爲著商討如何向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建議而召開的。緣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原定三月底舉行，中共中央乃提前於三月初召開政治局會議，并首先通過「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書」（參閱附錄一），提出了三項建議，即（一）關於鞏固和擴大各黨派的抗日救國的團結問題；（二）關於健全民意機關問題；（三）關於動員和組織民衆問題。這些建議和陳紹禹的「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一文中有關上列問題是完全一致的。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一，關於「統一戰線組織形成的方式」，中共提議「或恢復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方式」，即中共黨員以個人資格參加國民黨，同時又保留中共黨籍的方式，這是過去中共滲透和分化國民黨與爭奪領導權的故技；此時，中共圖在團結禦侮的掩護下再度加入國民黨。第二，中共建議派代表團列席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同時也預請國民黨派代表團出席共黨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又是武漢左派政權時期中共統戰陰謀的花樣，其爲國民黨拒絕那是必然的。不過，這一時期，中共統戰策略，在陳紹禹的緩和政策下，國共兩黨的和平共處在表面上是較爲融洽的，國府軍委會於一九三八年二月一日發表周恩來爲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就是這一時期突出的事例。

二、中共決定大量發展黨員

三月政治局會議，同時討論了中共黨的工作問題，陳紹禹這樣寫道：

「政治局會議討論了中共本身的強固和改進問題……政治局會議特別指出：

(一)我們黨今天在數量上還遠不能適應抗戰事業的需要，因此要求全黨同志把發展黨員看作日常工作的一種最基本工作。

(二)我們黨的質量(即社會成份)須要有大的變更，過去幾年因為特殊的歷史環境和種種原因，所以我們黨員的社會成份是農民僱農和手工工人佔多數，大城市產業工人的比例不夠，現在我們應當努力克服這一弱點，應當努力吸收重要產業的先進工人和先進知識分子入黨。

(三)因為國內外政治環境的複雜和緊張，因為新黨員增加和老幹部修養的不夠，加強黨內馬克斯列寧主義的經常政治教育，加強黨內對三民主義的深刻研究，已經成爲全黨各級機關和每個同志的刻不容緩的嚴重任務。

(四)加緊選拔和培養大批新的黨的幹部和非黨的革命幹部，以增強抗戰的力量。

(五)爲適應抗戰環境的需要，建立和健全地方黨部的獨立工作能力。

(六)加強黨報工作和使全黨同志了解黨報的意義和重視黨報的指示。

(七)建立正確的公開工作與祕密工作的聯繫，加緊祕密工作，以防制日寇及漢奸的破壞和搗亂。

(八)加緊兩條戰線上的思想鬥爭，堅決反對那些不懂得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堅持長期抗戰和取得抗戰最後勝利基本保證的左傾關門主義的分子；同時，無情打擊那些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曲解成爲無原則的投降或者對中國革命前途抱完全悲觀失望態度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分子。

(九)加緊黨內教育工作，保持黨員的艱苦勤奮犧牲的光榮的布爾塞維克的作風和傳統，嚴厲打擊那些思想墮落和行爲腐化的個別分子，直至將他們驅逐出黨。

(一〇)提高革命警惕性，嚴密注意和打破日寇漢奸及一切反動分子用盡各種方法在共產黨內外進行破壞工作的陰謀。

(一一)特別注意鞏固黨在思想上組織上的團結和統一。(註四)

關於中共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準備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了進一步的討論，陳紹禹說：

「去年十二月間，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在最近期內召集黨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此次政治局會議討論了進一步具體準備這一大會的工作問題。此次政治局會議認爲，前次政治局決議所指出的，在最近期間內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救亡工作，對於黨的本身工作，都有最嚴重的意義，是非常正確的。全黨同志現在應該努力進行七次大會的具體準備工作。政治局會議決定，中央本身應該立刻進行下列具體準備工作：

(一)發佈爲召集七大事告全黨同志書。

(二)發表爲召集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告全國同胞書。

(三)給地方黨部怎樣在政治上和組織上進行七大準備工作的指示。

(四)成立大會四個議事日程報告的準備委員會。

(五)責成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同志起草大會第一第二兩個議程的政治提綱，以及寫關於第三第四兩個議程的論文和其他專門問題的論文（作者按：四個議程題目請參閱上一章之附錄三），不僅作為地方黨部和全黨同志討論和研究大會問題的材料，而且作為一切對中共七次大會願意發表意見和提出建議的人士們的參考。

中央政治局要求和責成所有地方黨部領導全體同志立即積極進行關於七大議程各問題的廣泛熱烈的討論……。」（註五）

根據政治局會議的決定，中共中央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發出「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定」（參閱附錄二），其中值得重視的為：第一，在決定中規定要在戰區、前方及我後方大量發展黨員，建立強大的黨的組織。這顯然是中共乘國共「和平共處」時期，積極擴張力量以與國民黨爭奪領導權的重要步驟。第二，在決定中把發展黨員的注意力，同時放在吸收左傾軍官方面，所謂左傾軍官，即國民黨部隊中的軍官，亦即中共兵運工作、策反工作（抗戰時期稱為友軍工作）的一貫伎倆，這種在國民革命軍中進行滲透分化活動，乃至策動國軍叛變的陰謀，就成為以後國共兩黨磨擦的一個根源。

綜觀中共中央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與上年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決策并無根本區別，惟對國民黨的臨全大會則抱有很大希望。至於中共領導階層方面，從陳紹禹撰寫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看來，國際

派的力量與聲望正在增長，這也就加深了毛澤東的嫉視和妒忌，挑起了毛澤東整肅國際派的殺機。

三、抗戰建國綱領與中共

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於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在武昌開幕，四月一日閉幕。這次大會除確立國民黨領袖制度，選舉蔣委員長為總裁及設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外，最主要的是通過了有劃時代意義的抗戰建國綱領。綱領全文如下：

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

(甲) 總則

- (一) 確定三民主義暨 總理遺教，為一般抗戰行動及建國之最高準繩。
- (二) 全國抗戰力量，應在本黨及蔣委員長領導之下集中全力，奮勵邁進。

(乙) 外交

- (三) 本獨立自主之精神，聯合世界上同情於我之國家及民族，為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共同奮鬥。
- (四) 對於國際和平機構，及保障國際和平之公約，盡力維護，並充實其權威。
- (五) 聯合一切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之勢力，制止日本侵略，樹立並保護東亞之永久和平。
- (六) 對於世界各國現存之友誼，當益求增進，以擴大對我之同情。
- (七) 否認及取消日本在中國領土內以武力造成之一切偽政治組織，及其對外之行爲。

(丙)軍事

(八)加緊軍隊之政治訓練，使全國官兵明瞭抗戰建國之意義，一致爲國效命。

(九)訓練全國壯丁，充實民衆武力，補充抗戰部隊，對於華僑回國效力疆場者，則按照其技能，施以特殊訓練，使之保衛祖國。

(十)指導及援助各地武裝人民，在各戰區司令長官指揮之下，與正式軍隊配合作戰，以充分發揮保衛鄉土，捍衛外侮之效能，並在敵人後方發動普遍的游擊戰，以破壞及牽制敵人之兵力。

(十一)撫慰傷亡官兵，安置殘廢，並優待抗戰人員之家屬，以增高士氣，而爲全國動員之鼓勵。

(丁)政治

(十二)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之決定與推行。

(十三)實行以縣爲單位，改善並健全民衆之自衛組織，施以訓練，加強其能力，並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條件，以鞏固抗戰中之政治的社會的基礎，並爲憲政實施之準備。

(十四)改善各級政治機構，使之簡單化合理化，並增高行政效率，以適戰時需要。

(十五)整飭綱紀，責成各級官吏忠勇奮鬥，爲國犧牲，並嚴守紀律，服從命令，爲民衆倡導，其有不忠職守，貽誤抗戰者，以軍法處治。

(十六)嚴懲貪污官吏，並沒收其財產。

(戊)經濟

(十七)經濟建設，以軍事爲中心，同時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本此目的，以實行計劃經濟，獎勵海內外人民投資，擴大戰時生產。

(十八)以全力發展農村經濟，獎勵合作，調節糧食，並開墾荒地，疏通水利。

(十九)開發礦產，樹立重工業的基礎，獎勵輕工業的經營，並發展各地之手工業。

(二十)推行戰時稅制，澈底改革財務行政。

(廿一)統制銀行業務，從事調整工商業之活動。

(廿二)鞏固法幣，統制外匯，管理進出口貨，以安定金融。

(廿三)整理交通系統，舉辦水陸空聯運，增築鐵路，公路，加開航線。

(廿四)嚴禁奸商壟斷居奇，投機操縱，實施物品平價制度。

(己)民衆運動

(廿五)發動全國民衆，組織農工商學各職業團體，改善而充實之，使有錢者出錢，有力者出力，爲爭取民族生存之抗戰而動員。

(廿六)在抗戰期間，於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廿七)救濟戰區難民及失業民衆，施以組織及訓練，以加強抗戰力量。

(廿八)加強民衆之國家意識，使能輔助政府肅清反動，對於漢奸嚴行懲辦，並依法沒收其財產。

(庚)教育

(廿九)改訂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戰時教程，注重於國民道德之修養，提高科學的研究，與擴充其設備。

(三十)訓練各種專門技術人員，予以適當之分配，以應抗戰需要。

(卅一)訓練青年，俾能服務於戰區農村。

(卅二)訓練婦女，俾能服務於社會事業，以增加抗戰力量。(註六)

國民黨這一抗戰建國綱領獲得全國人民的歡迎和擁護，可是，中共除由新華日報以短評和社論方式有所表示外，遲遲沒有正式的代表和響應，因而引起各方的指責，在這一情勢下，中共領導人洛甫乃於四月十六日爲文在「解放」發表，以示擁護，題爲「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的成功」，他說：

「這次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是最近十年來國民黨最有歷史意義的一個會議。因爲這個會議吸收了抗戰九個月來的許多寶貴經驗，並且確定了以後堅持抗戰的許多基本方針。無疑的，這個會議將得到全國廣大人民的同情與擁護……」。

「從大會決定的上面這幾個要點看來，雖是有些問題尙待充實與發展，但我們對於大會決定的基本原則則是贊成的。這些基本原則同本黨過去發表的抗日救國綱領的基本原則，雖在某些問題上如民權與民生等問題上，尙有某些差別，但兩者在堅持抗戰與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方向上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中國共產黨是堅決擁護這次大會的這些決定的，並願爲其完全實施而奮鬥……」。

接着洛甫向國民黨提出實施臨全大會決定的六項意見，並建議把抗戰建國綱領作爲各黨派共同奮鬥

的綱領，他說：

「照孫中山先生過去同各黨派合作的基本精神，在保持各黨派組織上、政治上獨立的條件下，建立一種各黨派共同參加的某種形式的聯盟，基本上接受與充實這個綱領，使之成爲這一聯盟共同奮鬥的共同綱領。」（註七）

在武漢、陳紹禹、周恩來、秦邦憲於四月二十八日，用「答復子健先生的一封信」爲名，在新華日報表示中共對「抗戰建國綱領」的意見，公開信說：

「我們願利用回答你的信的機會，再一次說明中共中央對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宣言和綱領的態度，我們認爲此次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所通過的宣言和綱領，對於抗戰建國問題有重要的意義，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所提出的我國抗戰時期的一般施政方針，我們是贊同和擁護的，它和中共中央歷次發表的抗戰時期的政治綱領的基本方向，是共同的；不過有一點，我們還未得到國民黨中央明白指明的，就是這一綱領發表時，命名爲『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因而我們到現在還不清楚知道：國民黨領導機關是把這一綱領只作爲國民黨的綱領，還是用國民黨大會名義提出交各黨派及各團體共同討論和研究，以便得到各方意見而變成抗戰時期各黨派各團體共同遵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綱領，關於這一問題，中共中央準備再與國民黨領導方面交換意見。」（註八）

國民黨的抗戰建國綱領，在全國同胞的熱烈支持下，自然中共也只好表示擁護，不過它強調一點，說這一綱領與中共歷次提出的政治綱領，基本方向是共同的，藉以提高中共的地位和影響，當然，這又

是中共自我宣傳的花樣。

四、陳獨秀與托派的問題

一九三八年三月和四月，在武漢發生了所謂陳獨秀與托派的問題，中共的「新華日報」和其他各報刊展開了陳獨秀與托派問題的論爭，成爲當時的熱門新聞，其經過如下：

陳獨秀於一九三二年十月被捕，次年四月，以文字爲叛國之反宣傳罪名，判處有期徒刑十三年。抗日戰爭開始後，一九三七年八月，國民政府大赦政治犯，陳獨秀出獄，初住南京，後移居武昌。當時情形，陶希聖先生寫道：「獨秀由南京到武漢之後，在華中大學青年會等處發表演講，飽受青年學生歡迎。同時又在『政論』、『民意』等週刊上發表論文，引起社會的重視。中共黨徒怎能放鬆他呢？」（註九）

果然，延安的「解放」期刊第二十四期，首先發表「陳獨秀先生到何處去」的短評說：

「當陳獨秀先生恢復了自由以後，大家都在爲陳先生慶幸，希望他在數年的牢獄生活裏檢討自己的政治錯誤，重振起老戰士的精神，再參加到革命的隊伍中來。

「陳先生出獄後，在武漢的第一次演講中說到『這次抗戰是一個革命的戰爭，全國民衆應當幫助政府，世界也應當幫助政府』，這與中國的托洛斯基派的主張已大有差別……。

「但望陳先生更能進一步地認清中國抗戰勝利的大道。可是陳先生在目前抗戰的任務與爭取勝利的

方針上，却是面向著『五四』時代。他的思想却是表現著倒退，倒退到『五四』時代去。

「陳先生在他的演講裏（見十月十一日的大公報）及談話裏（見十月十五日的大公報及十月七日的華美晚報）說：『我們要了解抗日的意思，不僅是因為他們壓迫我們，而且我們要發展工業，我們要發展科學。』……」

「陳獨秀先生的實體是自由了，但是他的思想却是資產階級的俘虜！」（註一〇）

接著，康生在「解放」第二十九期、三十期上發表了「剷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的一篇長文，三月十五日，漢口「新華日報」全文轉載，康生在文中大肆抨擊托派和陳獨秀，其中最令人驚異的是如下的一段話，他說：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佔領了我們的東三省，同時，上海的日本偵探機關，經過親日派唐有壬的介紹，與由陳獨秀、彭述之、羅漢等所組織的托匪『中央』進行了共同合作的談判。談判的結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礙日本侵略中國』，而日本給陳獨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貼，待有成效後再增加之。這一賣國的談判確定了，日方津貼由陳獨秀托匪中央的組織部長羅漢領取了，於是中國的托派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使下在各方面扮演著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幫助日本侵略中國的雙簧戲。」（註一一）

康生的文章在「新華日報」轉載之次日，即三月十六日，漢口的「大公報」，「武漢日報」及三月十七日的「掃蕩報」刊載了一封來函，為陳獨秀呼冤叫曲，該函署名者均為當時的聞人，計有王星拱，

周佛海、傅汝霖、段錫朋、梁寒操、高一涵、張西曼、陶希聖、林庚白等九人。該函說：

「××日報台鑒：中國共產黨內部理論之爭辯，彼此各一是非，黨外人士自無過問之必要。惟近來迭見共產黨出版之『羣衆』『解放』等刊物及『新華日報』，竟以全國一致抗日立場誣及陳獨秀先生爲漢奸匪徒，曾經接受日本津貼而執行間諜工作，此事殊出乎情理之外。陳獨秀先生平生事業，早爲國人所共見，在此次抗戰中之言論行動，亦國人所週知。漢奸匪徒之頭銜可加以獨秀先生，則人人亦可任意加諸異己，此風斷不可長。鄙人等現居武漢，與獨秀先生時有往返，見聞親切，對於彼蒙此莫須有之誣，爲正義，爲友誼，均難緘默，爲此代爲表白。凡獨秀先生海內外之知友及全國公正人士，諒有同感也。特此函請貴報發表爲荷。」（註一二）

第二天即三月十七日，中共的「新華日報」刊出了「陳獨秀是否托派漢奸問題」的短評，認爲「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爲斷」。這樣就迫得陳獨秀不能不出來說話了。三月二十日「掃蕩報」刊載了陳獨秀於三月十七日致「新華日報」的公開信，全文如次：

「我在去年九月出獄之後，曾和劍英、博古談過一次話，又單獨和劍英談過一次，到武昌後，必武也來看過我一次，從未議及我是否漢奸的問題，并且據羅漢說，他們還有希望我回黨的意思，近閱貴報及漢口出版羣衆週刊及延安出版之解放週報，忽然說我接受日本津貼充當間諜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頃見本日貴報短評，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評可以看出，你們所關心的，并非陳獨秀是否漢奸問題，而是陳獨秀能否參加反對托派運動的問題，你們造謠誣毀的苦心，我及別人都可以明白了。你們對我的要求

是：『他如果不甘與漢奸匪徒爲伍，他應該公開坦白地宣言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并在實際上反對托派漢奸行動』、我坦白地告訴你們：我如果發見了托派有做漢奸的真憑實據，我頭一個要出來反對；否則含沙射影血口噴人地跟著你們做啦啦隊，我一生不會幹這樣昧良心的勾當！受敵人金錢充當間諜，如果是事實，乃是一件刑事上的嚴重問題，決不能夠因爲聲明脫離漢奸組織和反對漢奸行動而事實便會消滅；是否漢奸應該以有無證據爲斷，決不應該如你們所說：『陳獨秀是否漢奸，要由陳獨秀是否公開聲明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和反對托派漢奸行動爲斷』，除用真實的證據而外，聲明不聲明并不能消滅或成立事實呵！況且現在并非無政府時代，任何人發現漢奸，只應該向政府提出證據，由政府依法辦理，在政府機關未判定是否漢奸以前，任何私人無權決定他們爲漢奸，更不容許人人相互妄指他人爲漢奸以爲政治鬥爭的宣傳手段。我經過長期入獄和戰爭中的交通梗塞，中國是否有托派組織存在，我不甚知道，我在南京和劍英談話時，曾聲明：我的意見，除陳獨秀外，不代表任何人，我要爲中國大多數人說話，不願爲任何黨派所拘束；來武漢後，一直到今天，還是這樣的態度，爲避免增加抗戰中糾紛計，一直未參加任何黨派，未自辦刊物，我所有的言論，各黨各派的刊物，我都送去發表，我的政治態度，武漢人士都知道，事實勝於雄辯，我以爲任何聲明都是畫蛇添足，從前我因爲反對盲動政策，被中國共產黨以取消主義而開除，此全世界週知的事，所以有人要求我公開聲明脫離『赤匪』，我曾以爲這是畫蛇添足而拒絕之，我現在對於托派，同樣也不願做此畫蛇添足之事，你們企圖捏造漢奸的罪名，來迫壓我做這樣畫蛇添足的事，好跟著你們做啦啦隊，真是想入非非！你們向來不擇手段，不顧一切事實是非，只要跟著你

們牽著鼻子走的便是戰士，反對你們的便是漢奸，做人的道德應該這樣嗎！」（註一三）

陳獨秀這封公開信，係致新華日報的，但新華日報並沒有登載出來，該報三月二十一日除刊出短評「關於陳獨秀來信」外，同時發表葉劍英、博古、董必武三人聯名的來信說：

「記者先生！陳獨秀在昨天的信上曾涉及我們與他會見事，關於此事，我們有如下的說明，藉明真相，而杜招搖。

「九月初，陳氏出獄後托羅漢來談：陳願回到黨的領導下工作，我們因陳為中國托派之領袖，事關重大，應與中共中央商談決定，故囑羅漢赴陝。羅離京後，陳又托李××先生來談：陳氏已與托派決裂亟欲一見，我們以陳未公開表示政治立場，認為未便。李××先生說：陳氏正欲面向我們聲明政治立場，故有博古、劍英與陳氏之見面。當時我們要求陳氏表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態度，及脫離托派。并告以托派已成爲漢奸，如不公開反對托派一切均談不上。陳表示贊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但對托派不明確表示態度。事後陳又托人來說：因李××在座，未便無顧忌的說話，要求劍英再和他見一面。會見時，劍英曾要求陳氏公開向全國表示三點：對抗戰的態度，對民族統一戰線的態度及公開的反對托派之理論與行動。但陳始終不曾實踐。羅漢在陝及返京時，兩處均以中共中央的三條件書面交羅。這三項條件是『（一）公開放棄并堅決反對托派全部理論與行動并公開聲明同托派組織脫離關係承認自己過去加入托派之錯誤；（二）公開表示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三）在實際行動中表示這種擁護的誠意。』并說明在上述條件實現後方能考慮其他關係問題。且再三向羅漢說：托派已成日寇工具之漢奸組織，陳羅必

須堅決反對托派的理論和行動，作爲先於一切的條件。當時陳已赴漢。必武在漢見陳亦爲督促陳氏實行此項條件。然而，陳氏始終不願公開表示反對托派漢奸之理論及行動，及坦白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這是三次與陳會見，再三要求陳氏公開聲明脫離托派漢奸組織反對托派漢奸行爲及擁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經過，特請加以披露爲荷。」（註一四）

葉劍英等這封公開信，因爲涉及羅漢，於是羅漢也發表了一封公開信，詳述此一事件的經過，題爲「致周恩來等一封公開信」，開頭就說：「劍英、博古、必武、伯渠、若飛、恩來以及各位不久以前會過面的朋友：」接著他敘述經過并駁斥康生的文章說：

第一，「康生君說去年六七月間我和獨秀曾與美國偵探接洽。先生們，你們只管造謠得高興，竟連陳、彭（述之）那時尚在南京獄中的事實也忘得乾乾淨淨了！」

第二，「你們不是早已發覺我和獨秀遠在一九三一年便和日本偵探機關發生了關係嗎？可是自去秋抗戰發生以後，我挺身出來奔走團結抗日的事，你們居然肯和我談判，這又作何解釋呢？」。

第三，「記得六七年前，你們曾指某些人爲『取消派』，并說他們的活動，曾得中國法西斯蒂××社（作者按：指復興社）的資助，後來這一班人下了獄，天才們又說是『取消派』與法西斯勾結串演的苦肉計。及至最近，天才的造謠家不知怎樣忽然良心發現『公道』起來了；陳紹禹君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發展』上這樣寫道『大家應該說句公道話，中國……也沒有什麼法西斯蒂』。……中國既沒有法西斯蒂之存在，則中國法西斯蒂贊助中國『取消派』這一控訴，是不是也可以連帶『取消』了呢？

關於羅漢與中共接洽談判經過，信中有詳細敘述，其大要如左：

羅漢於一九三七年八月間至南京營救危陷在獄中的朋友，其中包括陳獨秀在內，至南京時，在傅厚崗晤及李克農、葉劍英二人，當時李、葉欣然允諾相助，并囑羅漢將所知老朋友姓名悉行開出，以便請政府照指定人名先行開釋。

羅漢繼與李、葉談及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滬戰發生時，彼等曾向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議，當時中共對聯合戰線很不熱心，致未獲復，現在舊事重提，并請中共中央重加考慮、葉、李均以爲然，除電告延安外，并介紹羅漢赴延安談判。

八月三十日，羅漢在李克農手中領了旅費和致西安七賢莊辦事處（即八路軍駐陝辦事處）的介紹信後，即行赴陝。九月三日在辦事處與林伯渠詳談，林電延安，隨得復電約羅赴延，恰因山洪毀路，汽車不通，一時無法前往。林謂既係以私人資格陳述意見，儘可以電台來解決。

九月十日，林伯渠約羅，出示毛澤東、洛甫復電，復電內容，據羅稱：「電文（一）（三）兩條關於一致合作抗日之具體辦法，第二條則分（甲）（乙）（丙）三項，均涉及組織問題，我既未代表任何組織或個人，我與獨秀亦僅師友之誼，且此次到京，亦未與面，自無資格替人接受『招降』條件。」當將此意告林，林亦以爲然，「勉我晤獨秀時善爲說辭，并謂陳在文化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黨的歷史上有比別人不同的地位……」。

是晚王若飛訪羅漢，羅詢以延安「解放」週刊，何以竟把張慕陶、葉青諸人作托派來攻擊呢？王答復說：「也許是寫那文章的人弄不清那幾個人的政治關係，也許是那幾個人自己冒充托派」，「這未免太兒戲了。」

九月十五日，羅漢由西安返抵南京，往與博古、劍英相晤，會晤情形，羅稱：「據他們告訴我，已和獨秀見過面，關於合作抗日問題談得很融洽，不久，獨秀即赴武漢，故中央來電無從向之轉達。嗣後他們又告訴我，獨秀對他們與國民黨抗日合作的路線是大體贊成的，不過只是覺得未轉變前的路線未免太左，既轉變後的路線又未免太右一點。最後博古并告訴我：據他自己的觀察，獨秀的意見，很少有和托洛茨基相同之點，故近來中央在刊物上已不把托陳併爲一派，至於中央的電文還恐辭句上會引起獨秀的反感，他再三囑咐我，不妨口頭傳達，原電暫時不必交給獨秀看」。

接著羅漢至上海，潘漢年等約晤，催羅速往武漢會陳獨秀，并爲介紹信給潘梓年轉董必武。羅遂持函至武漢，經過情形羅漢寫道：

「十月初，我到了漢口，恰好必武已往南京，是晚獨秀在青年會演講，乃得會晤，這是他入獄以後我和他相見的第一次，次日至獨秀寓所，將由南京至西安的一切情形告訴了他，至於獨秀對中共中央所提出的意見如何回答，有他自己的一封親筆信和親手寫定的七條綱領在。這文獻是由我帶回南京親手交給博古、劍英二人的，後來博古告訴我，他們認爲獨秀起草的抗戰綱領與中共中央所決定的路線，並無不合，不過第六條牽涉到英國問題，在外交策略上微嫌過早，但亦不是什麼嚴重問題……。」（註一五）

羅漢的公開信敘述了許多具體資料，是非曲直可以從上列評論與若干公開信中得到解答了。

五、張國燾脫離中共

繼陳獨秀事件之後，在武漢又發生了張國燾脫離中共的事件。

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張國燾以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的身份，由延安至中部縣（即黃陵縣）參加祭黃陵，祭後即自行到西安轉武漢，據張國燾自稱欲在漢口做些工作。不料，四月二十日，新華日報登載了「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決定」，決定全文稱：

「張國燾已於四月十七日在武漢自行脫離中國共產黨。查張國燾歷年來在黨內曾犯錯誤極多，造成許多罪惡，其最著者爲一九三五年進行公開的反黨反中央鬥爭，並自成立僞中央，以破壞黨的統一，破壞革命紀律，給中國革命以很多損失。在中央發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後，他始終表示不滿與懷疑。西安事變時，他主張採取內戰方針，懷疑中央的和平方針。此次不經中央許可，擅自離開工作，跑到武漢，對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總路線表示不信任，對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絕望，並進行破壞全國抗日團結的各種活動，雖經中央採取各種方法，促其覺悟，回黨工作，但他仍然毫無改悔，最後竟以書面申明自行脫離黨。張國燾這種行動，當然不是偶然的，這是張國燾歷來機會主義錯誤的最後發展的必然結果。中共中央爲鞏固黨內的鐵的紀律起見，特決定開除其黨籍，並予以公佈。」（註一六）

接着張國燾在漢口掃蕩報刊登如下的聲明啓事：

「閱讀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之決定一節，本人特爲如下簡單之聲明：（一）本人素具抗戰到底之堅強決心，和抗戰必勝之堅強信心。對於抗戰建國之光明前途，並無絲毫失望。本人更願貢獻一切，爲國家民族效力。（二）當此國家民族危急存亡關頭，本人認定國家民族高於一切。（三）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中國國民黨爲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蔣先生爲全國唯一之最高領袖，此三點中共中央亦不否認。中共中央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自是中共中央之進步，本人亦表贊同。但深感如此還是不夠，因主張中共中央對於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應卽爲更懇切之響應，以達更進一步之精神團結，和增強抗戰建國之力量。（四）本人曾本以上主張，用至誠態度，與陳紹禹、周恩來、秦邦憲三同志初步商討，不料此項商討僅在開始進行，中共中央突有開除本人黨籍之決定，公佈報端。本人與中共關係極深，該決定內容所說各點，均不必急於答辯，甚望中共中央和中共諸同志對於本人上列主張，深切考慮，並與本人誠懇商討，不使稍有遺憾，俾吾人與全國人士，均得共本抗戰救國抗戰建國之主旨，向前邁進，則幸甚矣。」（註一七）

張國燾的聲明恰好擊中了中共的要害，緣自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所通過之宣言與綱領發表後，全國各界均紛起擁護，各報刊亦不斷爲文讚揚，獨有中共除新華日報以一篇短評和社論予以應付外，中共中央並無正式表示，延至四月下旬，延安的「解放」期刊，始刊載洛甫的「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的成敗」一文，因而引起各界對中共的不滿和指責。張國燾在聲明中所稱「還是不夠」與「應卽爲更懇切的響應」，深爲各方所稱道並從而增長對中共的不滿。在此一情勢下，中共駐漢負責人被迫在「新華日報

「以「答復子健先生的一封公開信」爲名，解釋中共對國民黨臨時全國大會宣言纏繞的態度及反駁張國燾的聲明啓事。這封公開信係由陳紹禹、周恩來、秦博古三人具名，信中關於中共對國民黨臨時全國大會的態度問題，除公佈中共中央致臨全大會建議書（見附錄一）外，並以「新華日報」四月三日的「一個嚴重意義的大會宣言」短評及四月四日「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的成就」社論，作爲中共的響應表示。信中有關張國燾的問題，這樣寫道：

「此次張國燾從延安到武漢以致被開除出黨的事實簡單經過如下：

「四月四日因爲張國燾在邊區政府工作，他要求去中部參加祭黃帝陵，可是祭陵完畢後，張國燾不通知我黨中央自行到西安，到西安後住西京招待所兩天，沒有與駐陝辦事處發生關係，只在火車快要開動前，用電話約林伯渠同志在車上略談幾句，即自動來武漢。到武漢後又不肯去駐漢辦事處，經我們三人屢加責勸，才勉強搬住辦事處，當時他曾電告中央謂：『不辭而別，歉甚。願在武漢做些工作。』我們看到這種態度，表示還有回黨工作可能，既來武漢，他是邊區政府負責人之一，當然應當晉謁中央政府領袖報告邊區工作狀況，於是周周恩來同志陪他晉謁蔣先生，不意在見蔣先生後，渡江至江漢關碼頭時，乘恩來同志與另一同行朋友談話之際，抽身疾馳而逃，始在漢口繼在武昌各大街小巷亂跑亂撞數小時，然後始在武昌寓住一個事先與別人約好的旅館中，我們見國燾深夜未歸，派人四出尋找，得知他所住旅館後，即又於深夜渡江勸其返漢，當他不得已而返漢時，堅不願再回辦事處住，於是遂轉寓於一個朋友家中。在我們與他幾次談話中，他在政治上再三表示說：『國民黨沒有辦法，共產黨也沒有辦法。中國

很少辦法的。」因此他再三提出意見說：『我感覺到消極，請允許我回江西老家去作老百姓，我家裏飯有得吃的，我此後再不問政治了。』同時，他又私自去找看陳獨秀等人。由此可見，張國燾在聲明中說什麼他對中國革命的光明前途並未絕望等，完全係一種欺人自欺的昧心之說。

「張國燾的政治觀點既如此悲觀，而個人行動又如此反常，我們知對他已無從遷就可能，遂正式向他提出三點辦法：（一）改正錯誤回黨工作（這是我們最希望的）；（二）向黨請假，暫時休息一時期中考慮，並允兩日內閉門考慮後答復。不料談話後不及一小時，即十七日晚，張國燾竟跑到太平飯店，乘一有三人保護的汽車而去，臨行時用書面寫交我們三人的信說：『弟已決定採取第三條辦法，已移寓別處，請不必派人找，至要。』從此，張國燾便脫離了中國共產黨。因此，黨中央於十八日正式決定開除張國燾的黨籍，於是二十二日才將開除他的決議公佈，因為中央還希望他在脫離黨後或尚有所考慮。

「只在開除黨籍的決定公佈後，張國燾才又派人將他寫明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兩信同時送到，在二十二日的信上說：『連日因寓所未就緒，故不曾致函諸兄，昨晚即寫好一信，擬今晨派人送來，突聞開除黨籍的決定之公佈，深使我痛心。……：千祈我們間應維持冷靜而光明之政治討論，萬一決定不能改變時，亦希彼此維持最好友誼。』由此可見，此次中央開除張國燾的黨籍首先由於他不能遵守一個共產黨員應當遵守的起碼的黨的紀律，由於擅自離開工作而至自動脫離黨。」（註一八）

五月二日，張國燾針對陳紹禹等三人的公開信，在漢口掃蕩報發表了「張國燾敬告國人書」（參閱

附錄三），副題爲「並與中共同人商榷抗戰建國諸問題」，書中批評中共之下列錯誤：

第一，對中國革命性質與動力「沒有深切的了解」，「經常以急進的主觀之幻想，代替中國社會發展之客觀規律」，「更錯誤的不了解革命客觀形勢，基此而採取諸多錯誤政策」，「貿然將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勉強地予以聯系」，「處處以階級利益抹殺民族利益。」

第二，「中共初認三民主義爲反動思想體系，而認國民黨只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階級政黨，繼又認國民黨爲法西斯主義之分派，國民政府爲親日賣國政府。」

第三，「就共黨本身組織上，它久已退出產業區域，走向偏遠地帶，失其應有之羣衆基礎，它已起了質的變化，已經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以農民佔多數的小資產階級集團，不斷的在進行軍事陰謀與暴動。」

第四，中共之所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爲的是「保存實力，保存邊區政府與某些游擊區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圖發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日合作不過爲達到此目的之宣傳手段。」

根據以上分析，張國燾建議中共「真誠擁護蔣先生領導的建國運動」，「使八路軍國軍化」，邊區政府「應即還政中央，以昭大信於天下」，並「從事實踐中央之一加以外交政策。」至於張國燾本人與毛澤東之分歧和爭執以及中共對彼之各項指摘攻擊，張國燾在書中一一加以辯正，而其結論，則希望中共同人「糾正中共現在一般政策之錯誤，在國家民族至上之原則下，努力抗戰建國！」

張國燾脫離中共事件，當時引起全國輿論的重視，除各報紛紛發表消息與訪問張國燾之記載外，各

種期刊亦撰文評論，對中共諸多指責與批評，其中具有代表性者有下列各文：

- (一)「張國燾去矣」(曉江作)——「抗戰嚮導」第五期。
- (二)「關於張國燾問題」(黃國光作)——「民意週刊」第二十期。
- (三)「中共要人張國燾的面面說」(記者撰)——「血路週刊」第十四期。
- (四)「由共產黨的內閣說到張國燾脫黨」(家禾田作)——「抗戰嚮導」第七期。
- (五)「中國共產黨爲什麼開除張國燾？」(宋子元作)——「青年前線」第九期。
- (六)「讀了張國燾敬告國人書」(薛達泉作)——「國魂週刊」第九期。
- (七)「張國燾脫黨問題之我觀」(徐詠平作)——「民心」第八期。
- (八)「讀張國燾告國人書後」(黃恩沛作)——「血汗週刊」九卷二十二期。
- (九)「讀張國燾敬告國人書後」(張滌非作)——「抗戰嚮導」第八期。

由張國燾事件而掀起的輿論顯然是對中共極端不利的，於是中共的「解放」期刊開始反擊，登載了洛甫的文章，題爲「讀了『張國燾敬告國人書』之後」，對張國燾作了鋒利的攻擊，認爲張國燾是「混在中國共產黨內的投機份子與破壞者」，他的敬告國人書則是一篇「自首書」，「希望全國抗日的朋友們，不要上張國燾挑撥離間的當，中他花言巧語的奸計。」(註一九)

同時，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對張國燾問題亦作出了如下的決定：

「主席團批准中國共產黨開除前中央委員張國燾之黨籍，他背叛了共產主義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

事業，能將自己出賣給中華民族的敵人。主席團深信張國燾的背叛行爲，不僅在中共隊伍中，而且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切忠實的擁護者中，都會遇到完全唾棄與蔑視。」（註二〇）

當時張國燾是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選出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其餘中國籍執行委員爲陳紹禹、毛澤東、周恩來），共產國際主席團只是批准中共中央開除張國燾的黨籍，而對於他的國際執委却隻字未提，這不能不令人詫異！

張國燾脫離中共時的職務是；共產國際執委，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在過去，則是中共始創人之一，歷屆（除第三屆外）的中央委員，在黨內聲望極高，尤其對於紅四方面軍影響更大，一九三七年曾因鬥爭張國燾而爆發「抗大」的計劃暴動事件，今天他公開脫離黨，對於共黨共軍的影響如何是可想而知的。因此，中共中央爲了預防事變的發生，乃在黨內和軍中展開了全面的反對張國燾的教育運動，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了「粉碎張國燾反革命活動報告大綱」（參閱附錄四），作爲教育幹部的資料。雖然如此，但受張國燾影響的中共幹部，還是緊跟張國燾的道路，紛紛設法逃離共區，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前紅四方面軍第九軍軍長何畏，前紅四方面軍三十三軍參謀長朱德崇，先後脫離共黨逃到抗日後方來了。

註一五：陳紹禹「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一九三八年五月，漢口中國出版社出版。

註六：鄭魯「中國國民黨史略」二〇二—二〇五頁，一九五一年六月台北初版，商務印書館印行。

註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四冊八二、九〇、九一頁，一九三九年四月延安解放社出版。

註八：同上書第七五—七六頁。

註九：陶希聖「記獨秀」——「傳記文學」第五卷第四期，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台北傳記文學雜誌社出版。

註一〇：「解放」第二十四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延安解放社出版。

註一一：「解放」第二十九期（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出版）、「解放」第三十期（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出版）。

註一二：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漢口「大公報」。

註一三：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漢口「掃蕩報」。

註一四：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漢口「新華日報」（中共中央機關報）。

註一五：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漢口「正報」。

註一六：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至二十四日漢口「新華日報」。

註一七：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二日漢口「掃蕩報」。

註一八：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漢口「新華日報」。

註一九：延安「解放」第四十二期，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註二〇：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一九三八年七月號，譯載於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五日「解放」第五十四期。

附錄一：中共中央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書

蔣先生轉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全體代表同志們！

當大敵當前河山破碎之時，我炎黃子孫——首先是我國共兩黨同志，能毅然親密攜手共禦外侮；在前線共同流血犧牲，奮勇殺敵，在後方共同艱苦奮鬥，努力救國；這不僅證實我中華民族的偉大，而且預示我中華民族的復興。當目前寇敵深入和第二期抗戰積極進行之際，加緊鞏固和擴大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是鞏固和擴大國共

及其他一切抗日黨派的合作，加強政府與民衆間的互助，已成爲國共兩黨同志和全體愛國同胞的一致熱望。

貴黨適於此時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想對於如何改進貴黨本身工作，如何加強國內的團結，以及如何發揚民意，以便爭取抗戰勝利和完成救國建國大計等問題，當有所討論；敝黨謹以兄弟之誼，對上述各問題向貴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提供所見，以資參考：

(一)關於鞏固和擴大各黨派的抗日救國的團結問題——只許一黨合法存在，同時不承認其他黨派合法並存的辦法，既爲事實所不許；取消現在一切黨派而合併爲一黨組織的辦法，亦爲事實所不能；解決此問題的唯一正確辦法，在於遵照中山先生的精神，建立一種包含各黨派共同參加的某種形式的民族革命聯盟，即由各黨派各團體擬定一統一戰線綱領作爲各方宣傳共同遵守的方針；同時，由各方代表組成一由上而下的（即中央與地方）統一戰線組織，以規劃抗日救國的大計和調整各黨派各團體的關係；而參加此聯盟之各黨派，仍保存其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統一戰線綱領的內容，敝黨願與貴黨及各方代表共同商討和擬定，其發表方式，或由各黨各派各團體共同簽名發表，或由貴黨，或由蔣先生名義發表，然後由各黨派各團體宣言擁護和遵守，均無不可。統一戰線組織形成的方式，或採取各黨各團體選派代表組織各級組織的方式，或恢復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方式，或擬定其他的辦法和方式，只要與團結抗戰有利，敝黨均願與諸同志共同計議和執行。

(二)關於健全民意機關問題——爲增強政府與人民間的互信互助，爲增加民衆和政府抗戰救國的效能，健全民意機關的設立，已經成爲刻不容緩的常務之急。民意機關的形式，或爲更擴大的國防參議會，或爲國民大會，或爲其他形式，均無不可；最主要地，在於此機關要員能包括抗日各黨派各軍隊各有威信的羣衆團體代表，即包括眞能代表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公意的人才；同時，此機關要員有不僅建議和備政府諮詢的作用，而且能有商討國是和謀劃內政外交的權力。

(三)關於動員和組織民衆問題——被壓迫民族的民族自衛戰爭的勝利，不僅需要政府和軍隊的最大努力，而且需要廣大民衆的全體動員和積極參加，這是古今中外再三考驗過的眞理。我國對日抗戰雖已繼續八個月之久，但民衆動員和組織的不够，已爲前方將士和全體同胞所痛切感到的弱點。

貴黨爲中國第一大政黨，在政府和軍隊中，均居於領導地位，對於抗戰中這一最大嚴重的弱點，當能積極設法加以補救。關於此問題，敝黨敬向貴黨提議：將工農軍商學各界，根據其職業地位而組成各種職業聯合團體，即將已有組織的羣衆團體，加以健全和充實；將還無組織的民衆，組織在各種羣衆團體以內去。同時，根據地域原則，在各地方組織統一的各界羣衆團體的領導機關，在全國範圍內，成立統一的全國性的領導機關。青年、婦女、文化界等，應根據其切身利益和特殊需要而組織成各種統一的羣衆團體，以便真正實行「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以便真正達到全國人民物力財力總動員的目的。當然，所有羣衆團體及其領導機關，均應向政府機關登記，並接受政府及黨部的領導。敝黨願盡力贊助貴黨在抗日救國大前提下，造成統一的羣衆運動和統一的羣衆組織。

以上各項提議，敬請貴黨中央委員會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代表列入貴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提案，作爲研究和討論的參考。此外，敝黨擬派代表團列席貴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同時，並預請貴黨選派代表團將來出席敝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示兩黨兄弟般友愛與團結。貴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當能大有裨益於全國精神團結，和爭取抗戰勝利的保障。敝黨中央委員會謹代表敝黨全體同志預祝貴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在抗日救國事業中的偉大成功。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三八年三月一日

（錄自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九日延安解放社出版「解放」第三十六期）

附錄二：中共中央關於大量發展黨員的決定

中共中央鑒予目前黨的力量尙在政治影響之後，甚至許多重要區域，尙無黨的組織，因此決定大量發展黨員，成爲黨目前迫切與嚴重之任務，具體辦法決定：

（一）打破黨內在發展黨員中有關門主義之傾向，反對將黨的注意力尙限在恢復與審查舊的關係和舊的狹窄圈子之內。

(二) 向黨內外廣泛宣傳，共產黨的力量愈強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愈鞏固，抗戰的力量愈增加，抗戰的勝利愈有把握。

(三) 發展的注意力，放在吸收抗戰中新的積極份子（如積極的工人雇農，城市鄉村中左傾知識份子及左傾軍官），與擴大黨的無產階級基礎之上。

(四) 特別注意在戰區以及在在前線上吸收新黨員，建立強大的黨的組織，在後方無黨的組織區域，當地黨部應有計劃與迅速地重新建立與發展。

(五) 新黨員必須經過支部一定黨員介紹，及一定黨部之審查與批准。

(六) 新黨員候補期暫時重新規定：工人雇農無候補期，貧農手工業者一個月，左傾知識份子、小職員下級官佐三個月，其他成份半年，惟在特殊情形下，得減縮之。

(七) 嚴防漢奸、托派份子、陰謀派、投機家混入黨內。

(八) 在日寇佔領之主要商業區，及黨的活動須極端秘密等處，吸收新黨員以不妨礙建立精幹的極端秘密組織為原則。

(九) 對新黨員施以初步馬列主義，與黨的建設的教育，並施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教育，使新黨員能正確執行黨的政策，以爭取抗戰勝利之目的。

(十) 發展黨員，成為每一個黨員及各級黨部經常重要工作之一，進行經常的考查與推動。

(錄自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編印之專冊)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

附錄三：張國燾敬告國人書並與中共同人商權抗戰建國諸問題

抗戰發生，國步艱難。有識之士，僉認救亡圖存，惟有舉國一致，精誠無間，抗戰到底，始克有濟；而達到此目的之最重要條件，端賴民族意識之高度發揚，犧牲精神之百倍提高。本人於四月初自廣施到達西安時，適得讀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認為深合國家民族迫切需要，而其籲請全國人士共同奮鬥之至誠，亦復溢於言

表·尤深感動。因即離陝來漢，冀與此間中共中央負責諸君詳爲商討，期於抗戰建國大業，更作進一步之最善努力。不意商討未竟，即受中共中央開除黨籍之處分，並造作種種謠言（如加本人以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表示不信任，對中國革命表示絕望，並進行破壞抗日團結等不經之詞），當即就本人政治意見，簡略有所聲明，其要點有四：

（一）本人所具抗戰到底之堅強決心，和抗戰必勝之堅強信心，對於中國抗戰建國之光明前途，並無絲毫失望，本人更願貢獻一切，爲國家民族效力。

（二）當此國家民族危急存亡關頭，本人認定國家民族高於一切。

（三）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之必需，中國國民黨爲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蔣先生爲全國唯一之最高領袖，此三點中共中央亦不否認；中共中央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自是中共中央的進步，本人亦表贊成，但深覺如此還是不夠，因而主張中共中央對於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應即爲更懇切之響應，以達更進一步之精神團結和增強抗戰建國力量之目的。

（四）本人曾本上列主張，用至誠態度，與中共中央諸君初步商討，未蒙採納，今後仍望中共諸同人，對於本人上列主張，深切考慮。

以上之簡略申明，本人自信對於當前政治需要，尙無不合之處；乃近見武漢中共負責人公表函件，對於本人主張與行動，續有詆誹，綜其所述，無非蔑棄眞理，偏執己見，甚至不惜虛構事實，顛倒是非，以遂其抹殺政治商討，維護局部利益之私圖。如此，足徵中共負責諸君，對於近代政黨黨員應具之自尊心，未甚重視，政治道德，亦鮮顧及，此本人深爲惋惜者也。

當此抗戰建國之嚴重關頭，本人深信每一政治戰士，在國家民族至上之原則下，均有放棄過去一切成見，端正其政治趨向之必要。並應全國上下精誠團結，努力完成復興民族之大業。據此觀點，願就本人與中共間政治上分歧之點及因此而引起之爭論，略陳梗概，邦人君子與中共諸君幸垂察焉。

關於中共政治路線之全般檢討，因範圍過廣，此處暫勿深論；僅就目前整個民族迫切需要之抗戰建國基本觀點，加

以考察。本人確切相信中共政策錯誤之發生及其過程，實非偶然，而且這一錯誤過程，直到今日，還未停止，這是本人不敢苟同的主要所在。

中共的政治路線，向來是環繞着一個錯誤軸心而轉動。這個錯誤軸心的構成，可從下列諸點，加以簡略說明。

第一、中國原是一個經濟落後的與被帝國主義侵略的國家，散漫的農業為組成國民經濟的骨幹，純民族工業的比重，頗為低下。因此革命的任務，對內是剷除封建殘餘，改正土地關係，完成國家的統一；對外是廢除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之經濟特權與政治特權，爭取領土主權之完整，與政治上經濟上之完全獨立自主；這是國民革命的主要內容。關於這一點，在中山先生與越飛君的聯合宣言上說得最清楚：「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此項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的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要最急之問題，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與完全國家的獨立之獲得」。概括言之，中國革命的性質是全民性的國民革命，任務是內求統一，外求獨立。而就革命動力言，城市市民與鄉村中小地主及自耕農都佔極大數量，這些階層對外積極反對侵略，對內並不代表妨礙統一之封建勢力，所以除去封建的舊勢力而外，廣大國民羣衆都是這一革命的積極參加者和擁護者。中國共產黨雖亦見到這些基本問題，而並沒有深切的瞭解，因此，經常以急進的主觀上之幻想，代替中國社會發展之客觀條件；機械地了解民主革命的陣容，只有循着蘇聯十月革命的唯一途徑。更錯誤的是不瞭解革命客觀形勢，藉此而採用諸多錯誤政策，客觀上對於可能參加的廣大革命力量，竟予以過當的摧折，直至「九一八」民族危機之嚴重性明顯呈現時，仍是如此，而在今天，亦未曾表裏一致地改正過來。

復次，中國國民黨領導之對內統一運動，其目的原為反對封建割據，亦係形成全民對外之先決條件，應當確認其為進步的革命步驟。中共昧於此義，貿然將階級鬥爭和民族解放，勉強地予以聯系，並強調階級鬥爭愈深入，民族解放愈迫近成功之說，處處以階級利益抹殺民族利益。這一切與國民革命不能調和的基本觀點，在理論與事實兩方面，均已確證其誤。

其二，以上是說明中共對於國民革命理論的錯誤見解，基於此種見解，於是對於中國國民黨之認識，亦極不正確。

中共初則認三民主義爲反動思想體系，而認國民黨只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階級政黨，繼又認國民黨爲法西斯主義之分派。國民政府爲親日賣國政府；但就三民主義的本質而言，就國民黨的組成成分而言，就國民政府及蔣先生之過去政策而言，此諸估計顯非事實。中國國民黨實繼中國革命史上之優良傳統，它推翻滿清專制政府，創立中華民國，北伐後逐漸完成統一中國的任務，迄今尙擔負着神聖抗戰建國的重任。卽以此次抗戰而論，舉國上下，一致奮起，爲中國歷史上所僅見，將士犧牲者爲數在五十萬人以上，尤復再接再厲，此諸明顯事實，無論何人，均不得不認此爲蔣先生領導成功之明證，國民黨革命精神發揚之實例。尤有進者，蔣先生爲舉國一致所公認之最高領袖，當此國本飄搖千鈞一髮之際，挺身肩負此民族興亡之重責，忠誠謀國，中外同欽，凡我國人均不應藉口某些枝節問題，吹毛求疵，別謀發展，以快私圖。所以那些認爲國民黨具有兩面性，在目前抗戰是革命的，抗戰勝利後是不革命的謬誤觀點，不僅否認由抗戰勝利而展開之革命光輝，而且對於正在進展中的抗戰建國之偉大工作，亦必然予以嚴重損害，此則可以斷言者。

第三，中共對於中國革命之錯誤判斷，對於三民主義、國民黨及其領袖之固執成見，於是形成其一般策略路線的連串錯誤，中共本身組織之缺陷與退化，亦隨此錯誤路線而愈益充分暴露出來。

中共策略路線錯誤之具體表現，卽爲不顧革命所需的客觀條件而爭取領導權的鬥爭。自民國十六年以來，中共更提出蘇維埃政權口號，採取以鄉村包圍城市的暴動政策，爭取所謂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十年以來，現已證明，所謂蘇維埃口號完全與民族利益背道而馳。就共產黨本身組織言，它久已退出產業區域，走向偏遠地帶，失其應有之羣衆基礎，它已起了質的變化，已經不是什麼無產階級的政黨，而是以農民佔多數的小資產階級的集團，不斷的在進行軍事陰謀與暴動，以從事持久的阻撓內求統一與外抗強敵的鬥爭。

第四，抗戰發動以後，全民族之迫切要求爲精誠團結，一致抗日，中共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形式上改編紅軍，取消蘇維埃政權，停止土地革命，表示服從中央政令。但實際上仍然因循其固有錯誤思想與派別成見，嚴格維護其小組織之利益，因而減弱現階段抗戰建國的神聖工作。自中共牢不可破的成見看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爲兩個以上不同政治團體的暫時聯合，此政治團體乃基於其社會基礎之不同而所代表之階級利益亦異。「國民黨是代表地主資本家的政

黨，共產黨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兩者間之利害畢竟是不能調和的，這裏便隱隱着過去歷史重複的根源。吾人近來習聞的中共宣傳，有所謂「共同領導，共同負責，共同發展，共同綱領」等說話，仍不免是一種爭取領導權之陳舊思想，毫無放大眼光以維護國家民族利益爲己任之氣魄。保存實力，保持邊區政府與某些游擊區域的特殊地位，以徐圖發展，乃其真正目的所在，抗日合作不過爲達到此目的之宣傳手段。據中共之意見，所謂民族統一戰線，諸凡與其意見相左之抗日份子皆放在統一戰線之外，而一切打倒；所謂合作，凡中央政府管轄之地皆任其作謬誤宣傳，而陝北邊區則視爲外人租界，封鎖尤嚴，如斯作法，豈以爲人盡可欺耶？竊意中共諸君如果承認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與目前民族危機的嚴重，統一意志抗戰建國之萬分必要，則應毅然決然放棄這些成見與作法，開誠佈公，與國人相見，亡羊補牢，猶未爲晚。

根據上面的分析，本人站在抗戰建國的基本觀點上，願作下列提議，希望中共同人予以善意考慮：

第一，中共同人只有在確認國家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之原則下，真誠擁護蔣先生領導的抗戰建國運動，毫無保留地實行三民主義，務必言行合一，不再作與此相違反的宣傳和組織；基此立場，中共同人應自動破除除門戶之見，泯滅界限，與國民黨黨員同在蔣先生領導之下攜手前進！

第二，無論在任何情況之下，國家政權和軍隊應完全統一。第八路軍奮勇殺敵，深爲國人所贊許，但望中共同人能根本破除「抗日聯軍」之成見，使八路軍國軍化，如此一面可增強抗戰建國力量，減少一切不必要之顧慮，一面於彼此融化之過程中，互相交換經驗，則今後裨益抗戰實力，當非淺鮮。邊區既不可當作中共之根據地，也不應形成特殊區域，更不宜自定法律，深閉固拒，排除異己，效法軍閥割據；總之，邊區政府現已無存在之必要，應即還政中央，以昭大信於天下。在中共所領導之游擊區域，亦應秉命中央，充分發揮其抗戰作用。

第三，一致站在國家民族的立場上，從事實踐中央之外交政策。

本人與中共歷史關係甚深，由於近二十年之經驗教訓，愈使我深刻地理解中共政策之不當，尤其是抗戰發生以來，國家民族危如累卵，更不願躬觀此錯誤政策之繼續存在。猶憶民國二十四年夏，毛澤東領導之一方面軍與本人所領導之

四方面軍在川西會合時，當時曾發生不同意見，毛澤東估計長征是勝利，主張應北進出陝西，形成川陝甘根據地，重建所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本人彼時估計長征是失敗，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前途早成過去，吾人應在川西和西康地域或甘肅西北部之甘、涼、肅一帶，首先求得與中央軍之休戰，再圖舉國一致抗日方針之實現。因為主張未能一致，遂致形成中共之分裂。是年十二月間，由於共產國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之決定，遂使此種爭論漸次減少，終於形成一、二、四方面軍在陝北的會合。

本人到達陝北時，恰是西安事變前十天。西安事變是由於中共「抗日反蔣」之宣傳主張而來，其實質則係軍事陰謀，本人事先並未與聞。西安事變發生後，延安方面中央負責諸人均不免有情感衝動之主張，當時特別衝動者，另有人在，事實昭然，當可覆按。嗣後決定採取和平方針，本人與中共其他負責人均一致贊成。而且基於此項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使本人與毛澤東等的意見接近起來，這是一貫的事實。於此可見中共公表文件所謂本人當時堅決主張內戰方針之說，完全是別有企圖之造謠。在這期間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本人曾在原則上表示完全贊成，但認為更須徹底執行，方能挽救民族於危亡，因而認中共彼時所執行者仍感不夠。

由於統一戰線方針，致使本人與毛澤東等的意見接近起來，又因為毛澤東等對於此一政策之執行，仍係深懷成見，貌合神離之作法，致使本人深為不滿。特別是抗戰發動後，毛澤東等所保持的獨立自主，別立門戶，不以國家民族為重之精神，引起本人與毛澤東等之間許多爭執，故此毅然離開延安，來到武漢，這完全是基於共赴國難之堅強信念，光明正大之舉動，中共同人原無所用其疑慮。乃中共負責人不加深察，對於本人此次參加抗戰建國之積極行動，妄肆攻擊，橫加誣蔑，充分發揮其非政治的偏狹自私的陰謀煽陷的宣傳，企圖對內壓制中共黨內之自我批評，對外敵視一切擁護中央領導，努力參加抗戰建國之份子。凡此一切，均可視為中共對於團結抗戰缺乏誠意之表示。至於其劫持本人之種種非法企圖，原屬陳、周、秦等少數人之無理舉動，識者自有公論，不足深辯。

總之，本人自弱冠以來，目擊國勢凌夷，奮起救國，不計其他，獻身革命，垂二十年。對於中共政策之形成，未能及時糾正，自然亦負有某些連帶責任。然生平言論行動，素為國人共見共聞，此次舉動，純出愛國至誠。為愛護中共同

人，更爲愛護中國革命起見，本人亦誠披瀝所抱之見解，深願社會人士予以明察，更願中共同人本自我批評之精神，棄文過飾非之謬習，憬然自悟，糾正中共現行一般政策之錯誤，在國家民族至上之原則下，努力抗戰建國，庶中國革命大業，迅速底於成，此不僅個人之幸，抑全體民族之福也。

（錄自一九三八年五月二日漢口「掃蕩報」）

附錄四：粉碎張國燾反革命活動報告大綱

一、張國燾路線的歷史發展實質及其必然崩潰，張國燾又是老機會主義者和小組織者。

我們不否認自有黨以來，就有張國燾這個人，同時還須指出這個所謂「老者」，却始終是在錯誤的泥坑裏過活；雖然他爲著保持他的地位，有時在黨的布爾塞維克勝利下，承認錯誤，寫申明書，但他從來也沒有了解錯誤和澈底改正錯誤，所以，可能時，狐狸尾巴便又現出來，他的錯誤是一貫的。

（一）一九二二年到二四年，初則犯左傾關門主義，反對國共合作，繼而一九二七年又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與陳獨秀同流合污；爲造成大革命失敗嚴重錯誤的機會主義領導者之一。

（二）一九二八年黨六大會後，在莫斯科參加反黨反國際的右派小組織，並且此一小組織與托派互相勾結，進行阻礙反托派鬥爭的活動。

（三）一九三一年回國，派赴鄂豫皖邊區工作，又犯了許多嚴重錯誤（如青年運動、肅反與建立地方黨的問題），一九三三年反四次圍剿失敗，過高估計中央軍力量，張惶失措，退往川陝，開始了右傾機會主義消極退却逃跑路線。

(四)一九三五年秋，原一、四方面軍會合時，張國燾估計政治上革命已失敗，主張採取完全消極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自動南下，破壞紅軍的統一，復以武力威逼中央改組，被拒後，乃擅自成立偽中央，破壞黨的統一和紀律，其反黨反中央的機會主義路線達到登峯造極的罪惡。

(五)一九三五年冬，接到中央十二月決議，表示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懷疑，繼續錯誤路線。

(六)一九三六年秋，原四、二方面軍會合，張國燾更企圖以強制和欺騙，使二方面軍同情他的機會主義路線，共同反對中央，並企圖以武力併吞二方面軍為己有。

(七)最後受環境限制和領導者的監督，在四方面軍多數幹部和戰士的要求下，不得不到陝北與中央會合，但仍不接受軍事委員會的指示，而先令西路軍過河，使西路軍遭到嚴重空前的失敗；國燾路線到此也完全破產。

(八)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張國燾表示不堅定，反之，却極力主張殺死蔣委員長，重行挑起內戰。

二、張國燾反黨反中央、軍閥主義、土匪行為、右傾機會主義退

却逃跑路線的實質。

(一)在莫斯科時成立右派小組織，勾結托派，一九三五年成立偽中央，是反黨反中央反國際的錯誤。

(二)素來忽視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勝利中的決定作用，因而：

(1)忽視甚至破壞地方黨的組織（不信任地方黨，逮捕地方工作同志，把地方黨作為供給倉庫和招待所，紅軍指揮者隨意打擊地方黨的工作同志）。

(2)破壞紅軍中政治委員制度和建立軍隊中政治工作和黨的工作（政治委員成為指揮官的姨太太，政治部不進行政治工作，反而變為供給部勤務，軍中不建立黨細胞，政治工作人員時被侮辱）。

(3)軍權高於黨權，並極力在軍中創造個人系統，大有國黨即黨、黨即國黨之勢，他的軍隊不聽中央調遣，一直發展到以武力威逼中央改組，公開在軍隊中進行反黨反中央的工作。

(4)成立偽中央，分裂黨的統一，破壞黨的紀律。

(三)以家長制代替黨的民主集中制，他以無原則的派別觀念團結和提拔幹部，個人威信高於黨的威信，並以懲辦與恐嚇代替布爾塞維克的思想鬥爭黨內教育與自我批評。

(四)以非階級的反羣衆路線的恐怖政策代替肅反政策，甚至以肅反手段代替黨的思想鬥爭。

(五)分裂紅軍（擅自率領原四方面軍南下），企圖併吞二方面軍，忽視紅軍的自覺的紀律，隨意打擊殺戮，實行燒殺政策，以武力威逼民衆，不組織與教育羣衆。

(六)阻礙蘇維埃政策的實行，如土地政策、經濟政策，蘇維埃代表制和民主都沒有確實執行，以大民族主義代替列寧的民族政策，忽視黨在羣衆中的領導，這都是反黨反國際的路線。

(七)張國燾由於在政治上估計中國革命已完全失敗，革命形勢已處在兩個革命高潮之間的低落時期，否認革命高潮之到來，由此對紅軍突圍表示悲觀失望，對全國人民的抗日民族運動不信任，並且否認紅軍集結西北，建立抗日根據地，成爲抗日民族革命運動中主力之一和領導作用，反而主張向西部荒原作無限的退却，在無人煙之崑崙山頂建立根據地，這是張國燾右傾機會主義逃跑路線的實質。

(八)脫離民衆利益，反黨反中央、軍閥主義、土匪行爲的國燾路線，必然在黨的布爾塞維克勝利下崩潰和破產。悲觀失望、張惶失措，無限止的機會主義逃跑路線，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戰勝利沒有信心的張國燾，必然要脫離革命隊伍，進行反統一戰線反革命的活動。

三、張國燾錯誤的社會根源及其影響

(一)國黨路線，是農民的狹隘的流氓無產階級的破壞性，和中國封建軍閥的意識在無產階級政黨內的反映，張國燾不但以無產階級的馬列主義和組織力量領導農民羣衆，提高流氓無產階級的政治水平，戰勝軍閥意識，反而拒絕了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

這種非無產階級意識的反映，如不能在鬥爭中克服過來，而繼續發展，就必然要走到代表反動勢力的道路而脫離革命隊伍，進行反革命的活動。

(二)國黨路線，造成了中國革命史上空前未有的罪惡與影響。

(1)阻礙革命行動更更快的好轉，因其分裂紅軍，阻礙了抗日根據地的卽早建立，損失了紅軍實力，這樣方便日寇的進攻，延緩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更快建立起來。

(2)破壞紅軍模範紀律，忽視羣衆利益，破壞黨和紅軍在民衆間的威信，這樣更方便於漢奸托派進行挑撥離間的反革命活動，阻礙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及早鞏固擴大。

(三)對開除張國燾黨籍應有的認識：

(1)張國燾被開除黨籍，絕不是偶然的奇怪的事，這是他一貫的機會主義錯誤發展的必然結果，正如列寧同志曾警告托洛茨基一樣：你如不能了解錯誤，澈底糾正錯誤，則你終有一天脫離革命隊伍。

(2)張國燾離開黨，離開在十年堅苦鬥爭中，保存了革命力量、團結了自己的隊伍，擴大了自己影響，成爲今日民族革命中主要的發動力，民族統一戰線的提倡者堅持者組織者鞏固者，對中國民族革命勝利有決定作用的黨，必然對革命悲觀失望，必須企圖破壞民族統一戰線，進行破壞抗日的反革命活動。

(3)張國燾之脫離黨，必然使他的聲譽更加降低而破產，全國同胞在自己的經驗中，已認識了共產黨是中國民族和民衆解放中最堅決奮鬥的政黨，張國燾被黨開除，會使他過去隱藏的假面具完全暴露而遭人唾棄。

(4)黨開除張國燾，將階級異己份子開除，不僅不會削弱我們的力量，而且相反的，使全黨更鞏固團結，更認清張國燾反革命的罪惡，了解黨的正確路線及爲黨的統一團結而鬥爭。

(5) 黨過去未開除張國燾的黨籍，實由於黨一向對幹部愛惜教育的至誠，屢次糾正其錯誤，經長期艱苦的教育，而張國燾仍執迷不悟，竟至擅自離開工作，申請脫離黨，黨才執行鐵的紀律，開除他的黨籍。

四、揭發張國燾的反動言論

- (一) 張國燾企圖以過去黨的策略和口號，來破壞國共合作共赴國難的偉大事業，以便利於日寇進攻。
- (二) 企圖將民族利益和中共利益分開，用挑撥離間的慣技，破壞國內團結，減弱抗戰力量。
- (三) 企圖取消統一戰線，取消中共，重行挑起內戰，實現日寇以華制華的毒計。
- (四) 鼓吹英意協定，希望四強協定成功，分離反侵略陣線，助長侵略國氣焰，並希望孤立世界和平柱石的蘇聯。

五、經驗教訓和任務

(一) 經驗教訓：

- (1) 又一次指出：不論民族革命與社會革命，沒有無產階級先鋒與馬列主義的領導，必然不能得到澈底的勝利
- (國燾路線是農民狹隘性流氓無產階級封建軍閥意識的反映)。
- (2) 左傾右傾同樣是錯誤的，可以互相轉移的，都是危害黨的正確路線執行的。
- (3) 派別小組織，必然在布爾塞維克的勝利下崩潰。
- (4) 又一次指明：不能了解錯誤，糾正錯誤，必然會脫離革命隊伍。
- (5) 堅持反托派的鬥爭，是鞏固民族統一戰線、爭取抗日勝利的鎖鑰。

(二) 任務：

- (1) 學習馬列主義武裝自己的頭腦。
- (2) 深刻的研究了解黨的正確策略和路線。
- (3) 同各種不正確的觀念意識作無情鬥爭。
- (4) 爲肅清國黨路線的殘餘而鬥爭。
- (5) 鞏固布爾塞維克的團結一致。

中共中央宣傳部
（錄自中共中央宣傳部編發的「報告大綱」抄件）

中共中央宣傳部

五月二十日（一九三八年）

第三十一章 六中全會

一、國民參政會與中共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國民黨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舉國擁護的抗戰建國綱領，這一綱領規定「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全國力量，集中全國之思慮與識見，以利國策之決定與推行。」關於這一綱領之規定與推行，鄒魯先生曾有如下記述：

「抗戰建國綱領關於政治方面的規定，最主要者為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和加速完成地方自治。這兩件事不僅為抗戰所必需，同時亦為建國所必需，因為這是發展民治，實施憲政的不可缺少的條件，而發展民治、實施憲政又為本黨的基本目標。數年以來，政府依據綱領的指示，承繼戰前訓政時期工作的成績，對於這兩項工作，加緊推進。關於建立民意機關方面，二十七年夏，政府即着手組織國民參政會及各省市臨時參議會。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名額初為一百五十人，產生方法，初則均為推薦遴選，三十一年三月十六日將組織條例再度修改後，名額增至二百四十人，產生方法一部亦改為由省市臨時參議會選舉。至其職權，依參政會組織條例，為以下數項：（一）政府對內對外之重要方針，於實施前，應提交國民參政會議決；（二）得提出建議案於政府；（三）聽取施政報告，暨向政府提出詢問案；（四）得組織調查委員會，調查政府委托考察事宜，前項調查結果，將提政府核辦。國民參政會休會期間，設置國民參

政會駐會委員會，其任務爲：（一）聽取政府各種報告；（二）促進業經成立決議案之實施，并隨時考察其實施之狀況；（三）在不違反大會決議案之範圍內得隨時執行本會建議權暨調查權。」（註一）

中共對於國民黨的臨全大會極爲重視，曾經發出致臨全大會信，信中建議三項，第二項就是「關於健全民意機關問題」。三月間，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同樣提出了「關於建立健全民意機關問題」。可見中共雖曾表明「我們現在并不要求參加國民政府」，但對參加民意機關則是積極的。

抗戰期間，國民黨對於各黨各派採取團結禦侮，一視同仁的寬大政策，因而新設置的國民參政會，也網羅了各黨各派的代表爲參政員。一九三八年六月十六日，國民黨中央通過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名單，其中就選任中共之毛澤東、陳紹禹、秦邦憲、林祖涵、吳玉章、董必武、鄧穎超七人爲參政員。中共方面當然樂於接受，并於參政會第一次大會前夕，即七月五日，以毛澤東等七個參政員名義，發表「我們對於國民參政會的意見」，意見書說：

「國民參政會將於日內開會。我們七個中國共產黨員被選任爲參政員，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已正式決定我們七人接受政府聘請加入國民參政會。因此，許多新聞記者、參政會同人，各地共產黨同志及各方友好紛紛垂詢我們對於國民參政會的意見，特共同發表如左之申明。

「在目前抗戰劇烈的環境中，國民參政會之召開，顯然表示着我國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個進步，顯然表示着我國各黨派、各民族、各階層、各地域的團結統一的一個進展。雖然在其產生的方法上，在其職業的規定上，國民參政會還不是盡如人意的全權的人民代表機關，但是，并不因此而失掉國民

參政會在今天的作用與意義——進一步團結全國各種力量爲抗戰救國而努力的作用，企圖使全國政治生活走向真正民主化的初步開端的意義。所以我們——共產黨人除繼續地努力於促進普選的、全權的人民代表機關在將來能以建立外，將以最積極、最熱忱、最誠懇的態度去參加國民參政會的工作，同時并認爲積極的參加國民參政會的工作，也就是增強保衛武漢及第三期抗戰力量的一部分重要工作，也就是促成人民全權代表機關在將來建立的一部分基礎。我們代表着中國共產黨參加國民參政會，誠懇地願意在參政會內與國民黨和其他各黨派以及無黨派關係的國民參政員同志們親密的攜手和共同的努力，以期能友好和睦地商討和決定一切有利於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具體辦法與實施方案，以便能夠有效地打擊與戰勝日寇，并奠定使中華民國走向獨立、自由、幸福的新國家的基礎。」（註二）

國民參政會第一次大會於七月六日在武漢舉行，七月十五日閉幕，會期十天。中共參政員除毛澤東外，都出席了此次會議。會中，陳紹禹顯得非常活躍，領銜向大會提出「擁護國民政府實施抗戰建國綱領」議案，并向大會加以說明稱：

「本席以共產黨員資格提出擁護國民政府實施抗戰建國議案，同時，連署的人達六十七人之多，其中包括參加參政會的各黨各派和無黨無派的知名之士和領導人物，突破本會一切議案連署人數量和範圍的紀錄；而這一提案又深得全體參政員同志的擁護，這就是在實際上證明：參政會工作的結果，中華民族力量的團結，不僅一點不會減弱，而且更加強固；國民黨與共產黨之間不僅不會增加磨擦或引起分裂，而且更加親密團結，更加友愛合作……。」

「本席等在提案第一條上面，便明白寫着『擁護國民政府及其依據民國二十七年四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所採取的抗戰期間的對內對外重要施政方針』。……此外本席等在提案中并號召全國軍民，應在蔣委員長領導下，積極幫助政府，為實現全部抗戰建國綱領而努力奮鬥。本席等認為雖然國民政府的工作還有許多不能令人滿意之點，但最近一年以來國民政府及其對內對外之基本施政方針是值得擁護的。什麼是國民政府最近一年的對內對外基本施政方針呢？對內是使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的民族力量均為抗日救國而團結；對外是實行對日抗戰。這種對內對外的重要施政方針，我想每個參政員，每個中國同胞，都是擁護的……。」

「我們擁護國民黨的抗戰建國綱領作為國民政府在抗戰時期對內對外基本施政方針，絕不會牽涉到其他黨派的綱領問題。……我可以正式代表中國共產黨說：我們中國共產黨真誠擁護抗戰建國綱領，認為其基本方針與本黨在抗戰時期的政策方針是共同的，并願努力幫助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實施抗戰建國綱領，但同時，中國共產黨絲毫不掩飾的說，中國共產黨還有它自己的整個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綱領。」

（註三）
會後，中共參政員林祖涵（伯渠）撰寫「國民參政會之觀感」一文，在「解放」期刊上發表，他盛讚參政會的成就說：

「最近閉幕的國民參政會是近年來一個空前的盛會，也是民國以來中國政治史上最光輝的一頁。……這確是一個不平凡的，無論在國內、國外都引起了重大影響的大會……。」

「在大會中，政府對參政員作了各部門的工作報告。這是在以前政府所召集的大會中所少有的，也可以說是中國政治上的一個大進步……。」

關於參政會的收穫，林祖涵寫道：

「一、發揮精神團結的精神：……在會場中，大家都熱烈地、忠實地服從抗戰的利益，捐棄成見，來發表意見和商討國事……。」

二、樹立民主政治基礎：在大會閉幕時，蔣委員長在演講中曾強調民主政治，說到要把中國建立成一個民主的國家。大會通過建立各級的民意機關……。

三、加強鞏固軍事力量：在軍事方面，最重要的收穫是規定了抗戰到底的國策……。

四、推進改善內政建設：大會的許多提案都是關於內政建設的。無疑的，這對於今後國內政治的推進與改善有着很大的影響……。

五、確定今後外交方針：……大會確定了在爭取與國時堅持和平陣線的立場、促進英、美、法、蘇等國的邦交……。

六、大會宣言的內容：……它向全世界堅持明確地表示中國是為領土、主權、自衛、人道、和平而戰，而且今後將繼續的抗戰到底……。」

最後，林伯渠的結論說：

「在中國歷史上，也有過民意機關，尤其是在民國初年，議會政治曾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發生過波浪

。但我們可以說，自民國二年以來，國民政府所召集的各種所謂『民意機關』都是不健全的，沒有一個能夠和這次的國民參政會比擬，這個大會，在中國樹立民主政治的過程中，開闢了新的紀元，成爲建設民主共和國的基石，也是創造民族獨立、民權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國的一個途徑。」（註四）

抗戰以來，毛澤東曾經一再批評國民黨的抗戰爲單純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批評國民黨統制和鎮壓民衆，批評國民黨一黨專政，政治上不民主不進步，甚至批評國民黨準備投降日本等等。現在從中共參政員的「意見」、「說明」、「觀感」對照看來，毛澤東的批評豈不是造謠虛構嗎？

原來，中共之所以積極參加國民參政會以及頌揚其成就，是執行「中共中央關於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的，這個草案規定：「共產黨在沒有公開參政以前，參加全國國民大會之類的商討民主憲法和救國方針的代議機關，在原則上是許可的。因此共產黨應力爭自己的黨員當選到大會中去，利用國民大會的講台，宣傳共產黨的主張，用以達到動員人民和組織人民在共產黨周圍，推動統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註五）這樣看來，中共所以積極參加國民參政會工作，還是爲其一黨一派的私利着眼，而不是爲抗戰救國爲整個國家民族打算的。

二、中共參加政府問題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寇攻陷南京，轉向江北推進，企圖打通津浦線。一九三八年三月下旬至四月六日，國軍在台兒莊大捷，殲滅日軍三萬餘人。但仍未能阻止敵軍進犯。五月十九日，國軍自動放棄徐

州，敵軍遂沿隴海路西犯，六月五日，國軍放棄開封，至此，敵軍乃轉移兵力，沿長江西進，圖進犯武漢。六月十三日敵陷安慶，二十六日攻佔湖口，七月二十三日入據九江，武漢遂處於日軍威脅之下。

當日寇沿長江西進期間，中共駐漢負責人陳紹禹、周恩來、秦博古，在「新華日報」發表「我們對於保衛武漢與第三期抗戰問題底意見」長文。文前有作者附誌稱：

「自徐州我軍撤退以來，共產黨各級組織紛紛徵詢我們對於保衛武漢和第三期抗戰各問題的意見；同時，許多憂心國事和從事救亡工作的朋友，也時常以此類問題函詢或面詢我們的意見，因特同撰此文，不僅作爲我們對於共產黨各級組織同志們的答復，而且希望提供政府當局和各界人士作爲研究和決定這種當前迫切問題時的參考材料。」

文中首先回答「能不能保衛武漢呢」？我們堅決地回答說：「能！」接着便提出保衛武漢應採取的辦法（包括軍事、政治、經濟方面的意見），及對於第三期抗戰的軍事、政治、經濟、政策與社會生活各項問題的一般意見；最後認爲「解決一切問題的中心樞紐」是人才問題，因而建議：「泯除使用人才問題中的黨派門戶成見，」「消除使用人員中的私人親故關係。」「在政府和軍隊中均居領導地位的國民黨，固然擁有許多才智有爲的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人才，但抗戰建國的大業，需要全國各方面人才共同的努力，因此，我們希望國民黨放膽地根據抗戰需要和工作性能，從國民黨內的積極份子中，從共產黨及其他抗日黨派中，從無黨無派的羣衆團體和知名人士中，從日益發育增長的各種勇敢有爲的先進青年當中，盡量吸收參加各種工作的人才，分配他們以一定部門的工作。」

「有些人時常拿『陰謀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造謠，來作反對引用共產黨員及其他方面人才的藉口，……我們願再一次說明共產黨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態度。中國共產黨對於堅決抗戰的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抱絕對真誠擁護的態度……我們共產黨員要求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分配我們和其他方面人士一部分抗戰建國的工作，斷不是什麼『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陰謀』，而恰是真誠擁護和幫助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去達到抗戰建國勝利的光明磊落態度的表現……」

「此外，當共產黨員要求政府給我們更多可能去參加各種抗戰工作時，一部分別有用心分子却造出『共產黨員想升官發財』這類無聊的謠言……爲的打破惡意者的造謠和不明真相者的誤會，我們可以代表所有共產黨員說：我們不管担任政府給予我們的任何部分工作，我們願意仍然領受我們在共產黨內工作時一樣數目的薪水（即每月除極簡單的衣食住外，領二元至十元的零用費……）」（註六）。以後，何凱豐也以「保衛武漢中動員民衆的幾個問題」爲題在「新華日報」發表專論，他建議武漢一百餘萬人民動員起來，保衛武漢（註七）。

七月六日，周恩來再次發表「論保衛武漢及其發展前途」一文，其結論說：

「保衛武漢的有利條件是有的，但還不足，且時機緊迫，急切需要政府與人民一致的改正弱點，爭取勝利，才能够生長出保衛武漢的勝利的條件。」

「保衛武漢具體的方案，最中心的是：動員一切兵力、人力、物力，爭取保衛武漢的直接勝利，爭取變敵人後方爲前線的外線勝利，同時，爭取一切時機建立新軍，以便繼續戰鬥和準備最後決定勝負的

戰鬥。

「只有堅守武漢，才能保衛武漢。只有以保衛武漢的口號和決心來動員一切，來堅強和擴大抗戰力量，才能爭取不斷勝利，才能使抗戰持久，使抗戰前途爭取到最後的勝利。」（註八）

可是，到了十月，周恩來的論點又變了，他在漢口「新華日報」十月七日、八日、九日連續發表「論目前抗戰形勢」的社論說：「在目前形勢下，我們堅決保衛武漢愈久愈好的主張，要求從各方面配合的戰鬥中生長出長期保衛武漢的力量，以便能夠過渡到戰略相持的第二階段。但同時指出武漢的得失，決不能解釋為能否長期抗戰的關鍵，而發生新的悲觀動搖的心理，或孤注一擲倖勝倖得的企圖……」

「因此，保衛武漢的戰鬥，固然愈久愈好，但決不能在長期保衛武漢的條件尚未具備的今天，想作孤注一擲的倖倖的嘗試。這不僅對於保衛武漢并無大的幫助，而且對於繼續長期抗戰是有害的，是不利於轉入相持局面之過渡階段的。」（註九）

顯然的，中共駐武漢負責人，對於保衛武漢的觀點前後是不符的。最初，過份強調武漢的重要，過份強調保衛武漢，主張動員百餘萬人為保衛武漢而戰，等於主張死守武漢；後來，當敵騎深入，武漢緊急之際，却又一變而為強調不可作孤注一擲的嘗試，似乎是一變而為要放棄武漢了。其實當時最高統帥的決策是「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目的，而不在於一城一地之得失和爭奪，當時蔣委員長曾說：

「現在戰局關鍵，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據守，最要緊的是一方面選擇有利地區以擊破敵人主力，一

方面在其他地區，以及敵軍後方，盡量消耗敵人的力量。凡我軍放棄的地點，皆所以減少無益之犧牲，避開敵人的企圖，同時逼迫敵人入於我方自動選擇之決戰地域，予以打擊。長期抗戰，此為最大要著。今後戰局，即將轉入山地與湖沼地帶，天時地利，均於我為有利，我之所利，即敵之所害也。」（註一〇）

這裏值得研究的是陳紹禹、周恩來、秦邦憲所提「解決一切問題的中心樞紐」的人才問題，中共要求政府吸收共產黨人參加工作，并聲明共產黨人參加政府工作，既非「陰謀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又非「想升官發財」，而且參加政府工作後，仍然願意領取共產黨員的低薪待遇。中共的這些要求，顯然牽涉到中共是否參加政府的原則問題。

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關於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曾經規定：

「（一）今天抗戰的形勢，急需要有一個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府，才能有利於領導抗日民族革命戰爭，戰勝日本帝國主義。共產黨準備參加這樣的政府，即直接公開担负政府的行政責任，并在其中起積極作用，然而今天還沒有這樣的政府。今天有的，還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

（二）只有將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轉變為全民的統一戰線的政府的時候，即在今天的國民政府（甲）接受本黨所提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的基本內容，依據此內容，發佈施政綱領時；（乙）在實際行動上已經開始表示實施這一綱領的誠意和努力，并在這方面獲得相當成績時；（丙）容許共產黨組織的合法存在，保證共產黨動員羣衆、組織羣衆和教育羣衆的自由時，中共才能去參加。

(三)在黨中央沒有決定參加中央政府以前，共產黨員一般地不得參加地方政府，並不得參加中央的及地方的一切附屬於政府行政機關的行政會議及委員會。因為這種參加，徒然模糊共產黨人的面目，延長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對於推動統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是有害無利的。」（註一一）

根據這一決定，陳紹禹、張聞天、毛澤東曾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和一九三八年二月先後聲明：「我們現在並不要求參加國民政府」。

既然有此規定和聲明，既然指責政府為「國民黨一黨專政」和「國民黨的獨裁統治」，何以為了保護武漢的「人才問題」，便急急需要國民政府吸收共產黨人參加政府各部門工作？如此，豈不是「徒然模糊共產黨人的面目，延長國民黨的獨裁統治」？

也許中共會這樣解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與中共的十大綱領是相同的，因而中共參加政府的條件成熟了！但是，在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還沒有通過以前（該綱領係於四月一日通過），即一九三八年二月，周恩來便參加政府工作，而成爲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了，這又作何解釋呢？何況在周恩來任政治部副部長的命令發表之次日（即二月二日），毛澤東還聲明中共不參加國民政府呢！當然，中共也許會以「決定草案」第七條作爲周恩來出任副部長的依據，第七條規定：「在紅軍改名爲國民革命軍，紅色政權機關改爲特區政府之後，它們的代表可以拿自己已經取得的合法地位，參加到一切有利於抗日救國的軍事的和羣衆的機關中去。」（註一二）周恩來既非八路軍軍官，又非特區政府的官員，只能以「它們的代表」來解釋了。

其實，當時中共參加政府工作是採取秘密與公開兩種方式的，一種是秘密滲透的方式，即中共黨員不以共產黨黨員身份出現，而偽裝為一般抗日份子參加政府工作，正如中共中央組織部的指示一樣：「共產黨員應該以抗日積極份子的面目參加到政府與軍隊中去，并取得其中的領導地位。」（註一三）另一種則是公開的以共產黨黨員的面目參加政府工作，如周恩來出任政治部副部長就是一例。這兩種方式以秘密滲透方式最起破壞作用，因其係以奪取領導權為目的；但公開方式同樣可以擴大共黨的影響和力量，周恩來在政治部的活動就是最好的事例。據「國軍政工史稿」載稱：

「二十七年一月，第六部與軍委會政訓處及訓練總監部國民軍訓處，合併改組為軍事委員會政治部。」

「二月一日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正式成立，以陳誠為部長，周恩來，黃琪翔為副部長。

「周恩來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後，共產黨徒及其同路人得以乘機滲入活動，發展組織，進行新的陰謀……宣傳機構中的文化藝術工作者，多為共黨份子及其同路人，而藝術宣傳，又最易發生宣傳的效果，第三廳廳長郭沫若（其後為文化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處長田漢（其後為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兼組長），胡愈之，科長洪深（其後為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及文化工作委員會沈雁冰、舒舍予、姚蓬子、張志讓等，均為共黨的有力同情者，而科長杜國庠（其後為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馮乃超及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胡風等，則均係共黨的中堅份子。其在中央，先後以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文化工作委員會為活動據點，其在各級，則以演劇宣傳隊，電影放映隊，政治隊等為活動處所，其在政

工單位中，亦間有潛伏的共黨份子，但無顯著的活動。

「共黨滲入政工的工作方式，避免正面的宣傳，採取側面、影射、諷刺等，而其內容，則以打擊本黨及政府的聲譽和威信爲主旨，以宣傳共黨的優點爲能事，希圖使民衆及士兵對本黨和政府發生厭惡心理，無形中同情共黨，而爲其欺騙利用，至其對組織方面的發展，亦係祕密進行，不敢暴露。

「郭沫若所領導之宣傳文化工作，乃共黨從國軍政工機構中攫取合法職權，佔領文化地盤，繼左翼作家聯盟之後，擴大知識份子與政府的對立，藉以展開其對政府進一步的文化統戰。」（註一四）
從上列的記述，就可以瞭解：中共何以積極要求參加政府工作之原因所在了。

三、「國民黨有光明的前途」

正當武漢軍事吃緊關頭，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據說「到會的中央委員三十八人，另有全國各地許多領導幹部參加會議。這是自一九三四年一月江西根據地五中全會以來相隔了差不多五個年頭的一次中央全會，也是多少年來最盛大的一次中央全會。」（註一五）據毛澤東說：「本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準備在本年召集的，因爲戰爭緊張的原故，不得不把七大推遲到明年，而當前時局向我們提出了許多的問題，必須作明確的解決，以便爭取抗戰的勝利，所以召集了這次擴大的中央全會。」（註一六）

據羅邁的傳達報告說：「六中全會在延安開了四十天，它有很大的歷史上的意義。」（註一七）

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六中全會作了「論新階段」的長篇報告。他首先說到「五中全會到六中全會」的情形：「五年以來，我們黨經歷了許多重大的事變，最大與最主要的是：由國內各黨派各階級互相對立的局面轉到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由國內戰爭轉到了抗日戰爭。」

毛澤東在分析抗日戰爭形成的過程時說道：

「由於國共兩黨雙方政策的轉變，由於 蔣○○先生的領導，由於全國軍民的擁護，由於其他集團與其他黨派的協力，就使得日本帝國主義滅亡全中國的侵略步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全民族的反抗。去年七月七日的蘆溝橋事變發生之後，全中國就在民族領袖與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的統一領導之下，發出了神聖的正義的砲聲，全中國形成了一個空前的抗日大團結……………」

毛澤東報告「抗戰十五個月的總結」，一再引用 蔣委員長的意見作爲他論斷的根據，他說：

「蔣委員長在去年雙十節即明白指出『此次抗戰，非一年半載可了，必經非常之困苦與艱難始可獲得最後勝利。』……………所有這些都指出：抗日戰爭是長期的，不是短期的，戰略方針是持久戰，不是速決戰……………」。

「蔣委員長早已明白宣示：『戰爭既起，惟有拼全民族之生命，犧牲到底，再無中途停頓妥協之理。』（去年七月廬山談話）『此次抗戰爲國民革命過程中所必經，爲被侵略民族對侵略者爭取獨立生存之戰爭，與通常交戰國勢均力敵者大異其趣。故憑藉不在武器與軍備，而在強毅不屈之革命精神與堅強不拔之民族意識。』（去年十二月告國民書）……………悲觀論者或亡國論者……………已經證明是完全錯

的了。

「中國國民黨在其抗戰建國綱領中明白指出：『欲求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固有賴於本黨同志之努力，必須全國人民戮力同心共同負擔。』……這些都是完全正確的，十五個月經驗已經證明了。」

「同志們！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力求團結與進步——這就是十五個月抗戰的基本教訓，也就是今後抗戰的總方針。」

關於「抗日民族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毛澤東特別強調「國民黨有光明的前途」，他說：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以國共兩黨為基礎的，而兩黨中以國民黨為第一大黨，抗戰的發動與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國民黨有它光榮的歷史，主要的是推翻滿清，建立民國，反對袁世凱，建立過聯俄、聯共、工農政策，舉行了民國十五年的大革命，今天又在領導着偉大的抗日戰爭。它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先生蔣○○先生前後兩個偉大的領袖，有廣大忠忱愛國的黨員，所有這些，都是國人不可忽視的，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發展的結果。」

「抗日戰爭的進行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於領導與基幹的地位。十五個月來，全國各個抗日黨派都有進步，國民黨的進步也是顯著的。它召集了臨時代表大會，發佈了抗戰建國綱領，召集了國民參政會，開始組織了三民主義青年團，承認了各黨各派合法存在與共同抗日建國，實行了某

共合作，擁護全國團結，反對敵人所施任何不利於蔣委員長，國民政府，國共合作與全國團結的行爲，反對任何的漢奸政府統治中國。

「號召全國嚴重注意敵人、漢奸、親日派在我們內部的挑撥離間，製造不滿，製造分歧，鼓動磨擦之陰謀鬼計。務使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響……。」

「所有前述各項緊急任務，有待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各黨派推動全民族，在蔣委員長統一領導下，堅決的實行起來，而欲達到此目的，非發展統一戰線中各個黨派的組織力量不可。……沒有問題，統一戰線以國共兩黨爲基礎，而兩黨中又以國民黨爲主幹，我們承認這個事實。因此，我們是堅決擁護蔣委員長及其領導下之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的，并號召全國一致擁護……。」（註一八）

四、「長期合作」問題

毛澤東在報告中，關於「長期戰爭與長期合作」問題說道：

「由於抗日戰爭是長期的，整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也能够且必須是長期的，其中主要的兩個黨——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合作，也能够且必須是長期的，這是一切政策的出發點。……戰爭中的合作，將決定著戰爭後也能够合作，這不是沒有根據的預斷。」

「三民主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但是……共產黨員對三民主義應取何種態度？……」

「一切共產黨員，毫無疑義，應該依照自己的一貫的革命總方針，自己的決議與宣言，同中國國民黨與全國其他黨派，全國廣大人民一道，誠心誠意的實行三民主義。誰要不是忠實於三民主義的信奉與實行，誰就是口是心非，表裏不一，誰就不是一個忠實的馬克斯主義者。……因此，共產黨員應該如像他們研究共產主義一樣，好好研究三民主義……，為打退日本帝國主義，建設三民主義新中國而鬥爭。」

關於「長期合作的組織形式」，毛澤東繼續說道：

「由於中國政治經濟及各黨派的歷史特點，今天看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可能有下述三種組織形式：

「第一種，國民黨本身變為民族聯盟，各黨派加入國民黨而又保存其獨立性，但與第一次國共合作不同。如果國民黨同意共產黨員加入，我們將取何種態度呢？首先是贊成這種辦法的，因為這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好的一種組織形式，有利於抗日建國。不但共產黨，任何其他抗日黨派都可加入國民黨，只要國民黨同意，我們是決不反對的。如果這樣做，那我們可以實行同民國十三年合作不相同的辦法，即第一，所有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都是公開的，將加入黨員之名單提交國民黨領導機關。第二，不招收任何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有要求加入的，勸他們顧全大局，不要加入。第三，如果我們的青年黨員得到國民黨同意，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話，也是一樣，不組秘密黨團，不收非共產黨員加入黨。用這種辦法，可以大家相安，有利無害。這是第一種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

「第二種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就是各黨共同組織民族聯盟，擁護蔣○○先生作這個聯盟的最高領導，各黨以平等形式互派代表組織中央以至地方的各級共同委員會，爲著執行共同綱領處理共同事務而努力。這也是一種很好的形式，我們也是贊成的。這種形式，我們很早就提議了，可惜還沒有實行。」

「第三種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就是現在的辦法，沒有成文，不要固定，遇事協商，解決兩黨有關之問題。但這種形式太不密切，許多問題不能恰當的及時的得到解決。例如許多大政方針之推行，下級磨擦問題之調整，都因沒有一種固定組織，使它延緩下去，所以這種辦法對於長期合作是不利的。然而如果第一第二兩種辦法不行，這種辦法暫時也得仍之。」

關於「長期合作中的互助互讓政策」，毛澤東說：

「共產黨員又必須有互助互讓的精神，必須有尊重友黨及和友黨同志用謙和商量態度解決問題的精神，一切有友黨同志的地方，都應和他們商量解決有關事項，不應獨斷。沒有這種精神，就不能鞏固統一團結，所謂爲國爲民事業，戰勝日寇建立新中國目的，也就達不到。」

有關建立民主共和國問題，毛澤東解釋道：

「建立一個什麼國呢？一句話答復：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

「我們所謂民主共和國就是三民主義共和國，它的性質是三民主義的。按照孫中山先生的說法，就是一個『求國際地位平等，求政治地位平等，求經濟地位平等』的國家……我們所謂民主共和國，就是這樣一種國家，就是真正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不是蘇維埃，也不是社會主義。」

毛澤東在解釋「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時說道：「對於我們，失敗主義是罪惡，全力援助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是天職，是責無旁貸，不能有一點消極性。理由是：只有爲着保衛祖國而戰，才能出全民族於水火，只有全民族的解放才能有無產階級與勞動人民的解放，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實施。」

「堅持統一戰線與堅持黨的獨立性」問題，毛澤東持這樣的態度，他說：

「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才能勝敵，并是長期的堅持，這是確定了的方針，但同時，必須保持加入統一戰線中的任何黨派在思想上政治上與組織上的獨立性，不論國民黨也好，共產黨也好，其他黨派也好，都是一樣。……沒有問題，統一戰線中，獨立性不能超過統一性，而是服從統一性，統一戰線中的統一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對的東西。不這樣做，就不算堅持統一戰線，就要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

「階級鬥爭與民族鬥爭的關係也是一樣。抗日戰爭中，一切服從抗日利益是總原則，階級鬥爭必須服從於民族鬥爭的利益與要求，而決不應是相違背。」

關於過去的黨內鬥爭，毛澤東作如下的檢討：

「五中全會以前，我們黨反對了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與李立三的左傾機會主義。由於這兩次黨內鬥爭的勝利，使黨獲得了偉大的進步。五中全會以後，又有過兩次有歷史意義的黨內鬥爭，這就是邊疆會議與開除張國燾。」

由於遵義會議糾正了在反五次圍剿鬥爭中所犯的左傾機會主義性質的嚴重的原則錯誤，團結了黨與紅軍，使得中央與紅軍主力勝利地完成了長征，轉到了抗日的前進陣地，執行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政策。由於巴西會議與延安會議（反張國燾路線錯誤是從巴西開始而在延安完成的）反對了張國燾的右傾機會主義，使得全部紅軍會合一處，全黨更加團結起來，進行了英勇的抗日鬥爭。這兩種機會主義錯誤，都是在國內戰爭中產生的，它們的特點是戰爭中的錯誤。

「這兩次黨內鬥爭所得的教訓在什麼地方呢？在於：（一）由於不認識中國革命戰爭中的特點而產生的，表現於反五次圍剿鬥爭中的嚴重的原則錯誤，包含著不顧主客觀條件的『左』的急性病傾向，這種傾向極端不利於革命戰爭，同時也不利於任何革命運動。要指出：當時的這種錯誤并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執行當時總路線所犯的戰爭策略與戰爭方式上的嚴重的原則錯誤。（二）張國燾的機會主義，則是革命戰爭中的右傾機會主義，其內容是他的退却路線，軍閥主義與反黨行為的綜合。只有克服了它，才能使得本質很好而且作了長期英勇鬥爭的紅軍第四方面軍尤其是它廣大的幹部與黨員，從張國燾機會主義統制之下解放出來，轉到中央的正確路線之下。（三）中央蘇區時期的偉大的組織工作，不論軍事建設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衆工作也好，黨的建設也好，是有大的成績的，沒有這種組織工作與前線的英勇戰鬥相配合，要支持當時的殘酷的鬥爭是不可能的。」

對於「當前兩條戰線鬥爭」，毛澤東認爲：「在今後新的抗戰形勢中，政治上反對右的悲觀主義，將是頭等重要的。但同時，反對『左』的急性病，也仍然要注意。在統一戰線問題上，黨的組織與民衆組

織問題上，則須繼續反對「左」的關門主義傾向，以便實現長期合作，發展黨與發展民衆運動。但同時，無條件的合作，無條件的發展，這種右傾機會主義傾向也要注意，否則也就要妨礙合作，妨礙發展，而變爲投降主義的合作與無原則的發展了。」（註一九）

五、六中全會決議

中共六中全會，顯然是以毛澤東的「論新階段」報告作爲討論與決議的根據，因而全會決議的觀點與毛澤東的報告是完全一致的。不過，據項英的傳達報告說，六中全會的主要內容是：（甲）接受共產國際對於中國的指示；（乙）總結抗戰十五個月的經驗；（丙）對目前抗戰形勢及將來發展前途的估計與如何達到最後勝利的問題；（丁）青年問題的探討與決定；（戊）對於七次代表大會的討論。關於共產國際對中共指示的內容，項英傳達「六中全會的總結和精神」時說道：

「（一）對中國共產黨中央路線的估計，認爲中央的路線是完全正確的。中央過去曾由全國蘇維埃化的政策轉到統一戰線的政策……：國際批准了黨中央的路線和在這時期內的一切政策，這種批准，實在有很大的意義，因爲我黨在成立以來的十七年歷史中，在路線上從來沒有獲得共產國際現在這種百分之百肯定的批准的。我還記得，中共黨曾開過六次大會，國際指示向來總是說在基本上對中共的路線是同意的，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在基本上雖是同意，但在基本以外還有些地方是錯誤的，然而這次肯定的說完全同意，這不但使中共中央，同時也使全黨同志對黨正確的路線的信心增加……。」

(二)國際批准了開除張國燾的黨籍，認爲是他自己已脫離了和叛變了無產階級，這對於黨對於中國抗戰也是有重大的意義的……。

(三)共產國際對於中國目前怎樣來爭取抗戰的最後勝利，也給了不少的指示，六中全會也是完全同意和接受這些指示。」(註二〇)

六中全會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與毛澤東的報告和討論，通過了下列決議和函電：

- 一、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決議案(參閱附錄一)。
- 二、關於召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見附錄二)。
- 三、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機構的決定(見附錄三)。
- 四、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與紀律的決定(見附錄四)。
- 五、致蔣委員長電(見附錄五)。
- 六、告全國同胞、全體將士和國共兩黨同志書。
- 七、致東北義勇軍及全體同胞電。
- 八、致八路軍新四軍電。
- 九、致日本共產黨電。
- 一〇、致各國共產黨電。
- 一一、致西班牙共產黨中央電(註二一)。

在組織上，除改選政治局外，并通過「大赦令」，即五中全會以來，特別在反張國燾路線鬥爭中，所有受過黨的處分的黨員幹部，一律撤消其所受處分，以示黨的寬大和全黨的團結（註二二）。

中共六中全會所有決議書告文電之最大特點，就是以擁護蔣委員長爲中心。這種做法，似乎是爲著一個最大的目的，即要求蔣委員長允許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恢復孫中山先生時代的容共政策。羅邁在陝北公學傳達六中全會決議時甚至說：「三民主義青年團，其綱領是好的，但組織上比較差一點，它禁止另一黨派之青年參加，我們希望它能改變團章，吸收團體與個別團員，發揮民主政治，提高警覺性。中共在六中全會，曾提出青年共黨正式加入其團體，已蒙蔣總裁允許……。」（註二三）

當然，羅邁的傳達并非事實，其中經過，蔣總統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說得很明白，即在六中全會之初，中共中央先派周恩來攜帶毛澤東呈蔣委員長親筆信（參閱附錄六），離延返漢，向蔣委員長提出容共建議。蔣總統寫道：

「九月間，中共所謂『中央六次全會』在延安開會。周恩來不待會畢，即攜毛澤東函到武漢來見我。其中說道：

『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爲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於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

『同人認爲此時期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爲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之進攻，準備我之反攻之目的。』

『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卽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兇頑，終必失敗，而我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逐頑寇，而使自己確立於東亞。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毛澤東這封親筆手書的措詞，開口是『兩黨長期合作』，閉口是『中華民族統一團結』，完全不是共黨素來的口吻，反使我發生疑慮。而且他所謂『長期合作』，另有其實質的要求。周恩來這時向我們本黨建議四點：（一）是停止兩黨的鬥爭；（二）是共產黨員可以加入國民黨，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三）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組織，其全體份子一律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四）以上參加者均保持其共產黨籍。於是我知道這是中共企圖第二次大規模滲透本黨的陰謀。我們依據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慘痛經驗，是不要再上當的了。然而我仍相信，中共面對著民族抗戰所激發的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以及全體民衆心理與輿論壓迫之下，他自不能不信守其諾言，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爲抗戰來努力。」（註二四）

六、所謂王明路線

六中全會以後的第十四年，即一九五二年，北平出版「毛澤東選集」時，忽然在二卷中刊載了一篇「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註釋中并說明：「這是毛澤東同志在黨的第六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所作的結論的一部份。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是當時毛澤東同志與陳紹禹同志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上意見分歧的突出問題之一。」（註二五）毛澤東認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是不對的」，他分析道：

「國民黨是當權的黨，它至今不許有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劉少奇同志說的很對，如果所謂『一切經過』就是經過蔣○○和閻錫山，那只是片面的服從，無所謂『經過統一戰線』。在敵後，只有根據國民黨已經許可的東西（例如『抗戰建國綱領』），獨立自主地去做，無法『一切通過』。或者估計國民黨可能許可的，先斬後奏。例如設置行政專員，派兵去山東之類，先『通過』則行不通。聽說法國共產黨曾經提出過這個口號，那大概是因為法國有了各黨的共同委員會，而對於共同決定的綱領，社會黨方面不願照做，依然幹他們自己的，故共產黨有提此口號以限制社會黨之必要，并不是提此口號以束縛自己。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導各黨聽它一黨的命令。我們提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麼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

，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在現時，有些應該先得國民黨同意，例如將三個師的番號擴編爲三個軍番號，這叫做先奏後斬。有些則造成既成事實再告訴它，例如發展二十餘萬軍隊，這叫做先斬後奏。有些則暫時斬而不奏，估計它現時不會同意，例如召集邊區議會之類。有些是暫時不斬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礙大局的事情。總之，我們一定不要破壞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脚，因此不應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口號。『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如果解釋爲『一切服從』蔣○○和閻錫山，那也是錯誤的。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註二六）

如果說：毛澤東在六中全會的結論中確曾批評陳紹禹的錯誤，那也僅僅限於「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這一點；可是，後來中共中央及其御用史家却把這一點擴大爲陳紹禹整個投降主義的錯誤了。胡華主編的「中國革命史講義」就曾這樣寫道：

「王明同志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發言以及在『挽救時局的關鍵』等文中，提出了一系列和正確意見相對立的右傾觀點，并在自己負責的長江局的工作中加以運用：

「第一、犯右傾錯誤的同志，抹殺統一戰線中的階級區別，反對以左中右來劃分抗戰營壘，只主張『以抗日或降日爲分野』，滿足於所謂『凡抗日者皆吾友』的抽象觀念，而對蔣○○集團既抗日又準備降日，既聯共又反共的反革命兩面態度不去作具體分析。他們過份地估計了蔣○○國民黨的轉變，甚至抹煞國共兩黨階級本質的區別，把國共兩黨都認爲是『中國一大部分優秀進步青年的總匯』，把蔣○○稱

爲『不朽的民族英雄』。同時，又從教條主義出發，否認國民黨中有法西斯勢力的存在。這樣就抹煞了抗日戰爭中以共產黨爲代表的人民路線和以國民黨爲代表的反人民路線的根本區別。所以右傾的意見實際上是保護了蔣○○國民黨的頑固勢力。

「第二、他們否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主張『一切經過統一戰線』，處處強調統一，事事強調徵得蔣○○和國民黨政府的同意。對於在某種條件下所必須採取的獨立自主的工作方式表示懷疑和反對，例如，對晉察冀邊區政府的成立，不是認爲對抗戰和統一戰線有利而是認爲有害，這種唯恐『刺激』國民黨的心理，實際上就是遷就國民黨，而犧牲了共產黨的獨立性。他們光強調團結，忽視了鬥爭，否認以鬥爭求團結的革命方針，害怕在黨內著重提出反對階級投降主義的問題。所以右傾的意見實際上是向國民黨的反動政策讓步。

「第三、他們在統一戰線工作上既然犯了投降主義的錯誤，那末在抗日戰爭及其戰略指導問題上必然也犯同樣性質錯誤。一方面，他們對於中國戰爭的長期性缺乏足夠的估計，輕視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游擊戰爭，忽視敵後根據地在抗日戰爭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誇大城市和國民黨軍隊的作用，把抗戰勝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國民黨軍隊的『正規戰』上，幻想依靠國民黨軍隊來求得速勝。王明同志在武漢工作期間，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做上層工作和大城市的合法運動上，對於黨中央關於動員幹部、工人、學生及其他革命分子下鄉組織人民武裝、發展游擊戰爭、建立抗日根據地的指示置若罔聞。如果說對於戰爭關心，那也只是關心以國民黨軍爲主體的正規戰，只熱心於幫助國民黨策劃『保衛武漢』事宜。同

時在軍事上，也是強調一切統一，所謂『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實際上，這乃是要使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合併於國民黨軍隊，任令蔣○○去併吞，完全適合於蔣○○後來所謂『軍令政令統一』的反革命要求。

「第四、犯右傾錯誤的同志對抗日戰爭在中國革命中的地位及前途也作了完全歪曲的觀察。他們不把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路線看做是民主革命階段上部分的戰略轉變，而斷定為根本的戰略轉變。因而，不認為抗日戰爭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發展過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認為似乎是附加的；不認為是一個前進的運動，而看做是一個後退的運動，即後退到某種意義的舊民主主義。他們把爭取民主和堅持抗戰對立起來，把民族解放和人民的解放對立起來，或機械地分開。并由此設想抗日戰爭勝利後是蔣○○的天下，而不是共產黨和人民的天下。

「最後，第五，王明等同志在組織紀律上也犯了嚴重自由主義的右傾錯誤。他們漠視黨內思想鬥爭和批評與自我批評，提倡黨內的自由主義，風頭主義。他們不尊重黨中央的統一領導，不經中央同意擅自發表很多錯誤意見的宣言、決議和文章，堅持執行自己機會主義的路線。他們發展黨員不注意階級路線，對黨的敵人及暗害分子喪失警惕。

「他們的這種錯誤思想和行爲，在一九三八年由王明同志在武漢負責的黨的工作中，和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變』以前項英同志在新四軍的工作中，曾發生影響，因而妨礙了當時長江流域人民抗日戰爭的發展，并造成了『皖南事變』中新四軍部隊的失敗。」（註二七）

直到「文化大革命」的今天，毛共還是根據上列論點，一再指斥當時王明犯了投降主義的錯誤，并以曾經執行王明路線爲藉口，大批整肅毛澤東當年的「戰友」。然而，在事實上，毛澤東的「論新階段」恰好發揚光大了王明路線，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那能望其項背？

七、毛澤東的統戰陰謀

誠然，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陳紹禹確曾提出「目前抗戰形勢及任務」報告提綱（參閱「陳紹禹與毛澤東之矛盾和鬥爭」附錄一），在提綱中也確曾強調「一切爲著抗日統一戰線，一切經過抗戰統一戰線」；當時這一提綱，係針對毛澤東的「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與任務」提綱的左傾錯誤觀點提出的，毛澤東隨即打消了自己的錯誤提綱，轉而支持陳紹禹的意見，因而陳紹禹的提綱就成爲中共中央的政策方針。

如果細閱毛澤東在六中全會的報告，就不難了解毛澤東的「論新階段」，實際就是陳紹禹提綱的延伸與發展，其基本論點并無距離，而且在關鍵問題上，較陳紹禹的提綱更遷就國民黨，因此，難免使人懷疑：六中全會毛澤東曾否批評王明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的觀點，從十餘年後才公佈的毛澤東的結論看來，這種批評是劉少奇提出的，不過，這一批評似乎也僅僅是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因爲毛澤東在「論新階段」的報告中就會強調「現在我們黨內，無論在政治路線上，戰略方針上，時局估計與任務提出上，中央委員會與全黨，意見都是一致的。」可見六中全會並沒有像「中國革命史講義」所說「批判了

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思想」，更沒有像「毛澤東選集」第二卷所說「基本上克服了這種右的偏向」。恰相反，所謂王明的「右的偏向」，在「論新階段」中更加發揚光大了。

如果把中共史家批評王明的投降主義做標準，來衡量毛澤東的「論新階段」，那就不難瞭解，當時毛澤東與陳紹禹的觀點基本上是一致的：

(一)中共御用史家批評陳紹禹反對以左中右來劃分抗戰營壘；可是，毛澤東在「論新階段」報告中，同樣光是強調團結合作，強調互助互讓，強調照顧全局照顧多數，更強調鞏固擴大統一戰線，並沒有強調過鬥爭，更不敢再提統戰營壘中左中右集團了。

(二)中共史家指責陳紹禹過份估計蔣○○和國民黨的轉變；可是毛澤東的報告則是有過之無不及，比如毛澤東說：「抗日的發動與堅持，離開國民黨是不能設想的。」「抗日戰爭的進行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組成中，國民黨居於領導與基幹的地位。……國民黨的進步也是顯著的，他召集了臨時代表大會……等等，都是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件。」接著毛澤東批評不少的人，不應該「對於國民黨存在著一種不正確的觀察。」因為毛澤東認為「今天是國民黨歷史上第三次變為革命民族聯盟的時機」，「國民參政會的召集與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都表示了把它自身變為抗日建國的民族聯盟之開始。」

(三)中共史家批評陳紹禹不該把國民黨稱為「優秀青年的總匯」，不該把蔣委員長稱為「不朽的民族英雄」；可是毛澤東却進一步高呼「國民黨有光榮歷史」，「有廣大忠忱的愛國黨員」，「國民黨有

光明前途」，「蔣○○先生的統一領導」，「在民族領袖與最高統帥蔣委員長統一領導之下」，「蔣委員長早已明白宣示」，「有孫中山先生蔣○○先生前後兩個偉大的領袖」，「全體一致誠心誠意的擁護蔣委員長」，「務使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的威信不受任何影響」，「全力援助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是天職，是責無旁貸」，致蔣委員長電更稱「謹以至誠向我國英明領袖致崇高的敬意！」等等。

(四)中共史家指責陳紹禹只是遷就國民黨并反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可是毛澤東在「論新階段」報告中，却進一步遷就國民黨，他強調「國共長期合作」，「共同建國」，主張共產黨員公開參加國民黨并交名單給國民黨領導機關，不在國民黨內招收黨員和組織祕密黨團等等，其遷就國民黨程度不僅超過陳紹禹，而且遠勝於陳獨秀；遠在國民黨容共時期，一九二六年五月，國民黨通過整理黨務案，責成中共交出參加國民黨之共黨黨員全部名冊，當時陳獨秀還敢拒絕交出，而現在毛澤東却主動聲明要先交名單了。至於所謂獨立自主問題，毛澤東同樣強調統一，他說「統一戰線中，獨立性不能超過統一性，而是服從統一性的」，而且在互助互讓政策下，他警告共黨黨員「不要獨斷」，要和友黨「商量解決有關事項」。

(五)中共史家同時責備陳紹禹不該在軍事上強調統一強調「軍令政令之統一」；可是毛澤東在他的報告中却強調在蔣委員長統一領導下對日抗戰，在「告全國同胞、全體將士和國共兩黨同志書」中，更號召「全國所有武裝隊伍，都應在蔣委員長統一指揮下，服從命令，遵守紀律，進行持久抗戰」。何況遠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中國共產黨致國民黨書」及一九三七年九月「中共共赴國難宣言」就承諾了「

軍令政令之統一」，而且共軍也就是在這一承諾下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的。

(二)中共史家還批評陳紹禹錯認抗戰勝利後是蔣○○的天下；可是毛澤東在報告中却明白指出：「誰要是不忠實於三民主義的信奉與實行，誰就是口是心非，表裏不一，誰就不是一個忠實的馬列主義者。」抗戰勝利後「建立一個什麼國呢？一句話答覆：建立一個三民主義共和國。……就是真正三民主義的中華民國。不是蘇維埃，也不是社會主義。」

如果以中共史家筆下的投降主義，來評論毛澤東這些遷就國民黨的論點，那麼，非常明顯的，這是一套投降的總路線，是王明投降主義進一步的發展。但是，在此必須進一步認識，從王明的投降主義到毛澤東的投降路線，其本質絕非真誠向國民黨投降，而是當時中共整套的統戰陰謀，所有甜言蜜語都是爲的請求蔣委員長准許中共加入國民黨，以實現其第二次大規模滲透顛覆國民黨的陰謀；終因蔣委員長的「不再上當」，而使毛澤東的陰謀落空，這一落空，就使毛澤東當時歌頌國民黨和蔣委員長的「論新階段」與呈蔣委員長的親筆書差於見人，無顏再列入「毛澤東選集」了。

八、毛澤東的代罪羔羊

六中全會三十年後的今天，在毛澤東的「文化大革命」中，再度清算陳紹禹的投降主義，同時把投降主義者和走資派三反份子、國民黨特務、叛徒、內奸等等併列，一起加以清算批鬥和整肅，其中被指爲投降主義者的大有其人，主要的是朱德、彭德懷、劉少奇、鄧小平、彭真、羅瑞卿、楊尚昆等人。雖

然劉少奇在六中全會曾經批評陳紹禹的「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且因此而被毛澤東稱許為「劉少奇同志說的很對」，現在也同樣被斥為王明路線的擁護者與執行者了。

毛共的報刊，首先攻擊朱德：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戰報」第六期以「大軍閥大野心家朱德的滔天大罪」為題，列舉朱德五大罪狀，其中第二項就是「積極支持和推行王明的投降主義路線」，「戰報」寫道：

「抗日戰爭時期，朱德是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積極支持者、忠實執行者。他極力主張『一切服從統一戰線』……。」

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紅軍改編八路軍。朱德對蔣○○的封官感恩戴德。他在打給蔣○○的電報中說：「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委任令開，特派朱德為國民革命第八路軍總指揮……朱德等願竭力致誠，擁護蔣委員長，追隨全國友軍之後，效命疆場。」

「一九三七年八月，在『洛川會議』上，毛澤東提出獨立自主的游擊戰的正確戰略方針。會後，朱德、彭德懷違背『洛川會議』的決議，堅持錯誤路線，不發展游擊戰，堅持所謂『運動游擊戰』，要在敵人向太原進攻時，企圖把八路軍集中起來，配合國民黨與日軍決戰，取得『晉北決戰』的『勝利』。

「朱德和王明一樣，要全國人民和軍隊『統一』於蔣○○、國民黨，反對毛澤東提出的黨在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他說：『在我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合四萬萬五千萬人之心為一心，堅持抗戰局面，爭取最後勝利。』」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他在『八路軍抗戰的一周年』中說：『軍隊與軍隊之間，政府（按：指國民黨政府。下同。）與軍隊之間，政府軍隊與人民之間，必須弄得三位一體，儘管彼此意見不一，然而在抗日大前提下必須求得一致……必須要求人民和軍隊信任政府，尊重政府職權。』朱德妄圖把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把人民的武裝，也就是人民的一切，都交給蔣○○。」（註二八）

其次是整肅彭眞：

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東方紅」發表清算彭眞一文，其中涉及六中全會前後執行王明路線一段說：

「一九三八年，抗日戰爭時期，彭眞執行了王明的投降路線。一九三八年四月，彭眞在晉察冀邊區黨代表會上叫嚷『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通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原則。』陰謀把我黨我軍統一到蔣○○手裏。劉少奇很稱讚彭眞，同年七月，劉少奇給彭眞的信中進一步出謀劃策說：『國民黨和閻錫山至今不承認統一戰線，因此在宣傳上或文件上以少說不說統一戰線爲好。』彭眞果然應用三民主義及閻錫山的反動語句。兩人一唱一和，賣命地推銷和發展了王明路線。」（註二九）

再次是清算劉少奇：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井岡山」報刊載了一篇「劉少奇的反革命歷史」說：

「劉少奇及其黨羽羅瑞卿、楊尚昆一伙喊什麼『統一戰線高於一切，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對國民黨不分左中右』等等謬言狂語，取消我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取消對國民

黨反動派的鬥爭。

「劉少奇在北方局黨校作了『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問題』的報告……他說『三民主義國民黨是一面具有大作用的旗幟，孫中山蔣○○兩個國民黨的領袖，也同樣是旗幟。如被革命者拿到手裏，就是革命的旗幟……』，『因此反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時候，并不一定要反對國民黨。如果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叛變革命，國民黨并不一定叛變革命。』他還說什麼『汪（精衛）是降日反共，蔣（○○）是抗日反共，前者毫無革命性，後者却不同。』……」（註三〇）

一九六七年八月，「紅旗」雜誌編輯部、「人民日報」編輯部聯合撰寫「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一文，其中指責劉少奇說：

「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發表以後，他又跳出來，直接攻擊毛澤東，同『新民主主義論』大唱反調。他竟然吹捧蔣○○是『革命的旗幟』；還說『我以為中國革命能在國民黨三民主義這面旗幟下進行，至少是民主革命這一段，要比用其他的旗子順利的多』。他惡狠狠地說：『我們爲什麼不說是實行三民主義，而硬要另搞一套呢？』（一九四二年十月十日『中國革命的戰略與策略問題』）這個老機會主義者，在這裏，赤裸裸地暴露出他反對革命、出賣革命的叛徒嘴臉」。 （註三一）

所有這些對朱德、彭真、劉少奇等人的指責，如果和毛澤東「論新階段」的觀點比較起來，其右傾、遷就、投降國民黨的程度，也不過是小巫見大巫而已。事實上，朱德等人的論點是根據當時中共中央的決策而來的，也就是根據前期王明的提綱，後期毛澤東的「論新階段」而來的。如果說朱德、彭真、

劉少奇等人是投降主義者，那麼，毛澤東就是當時投降國民黨的「偉大舵手」了。現在據此而清算整肅劉少奇、彭真等人，爲什麼不追根溯源首先清算毛澤東呢？

當然，在毛派黨徒和毛澤東自己看來，「偉大舵手」是不會錯誤的，是永遠正確的，「論新階段」如果有錯誤，那只好由劉少奇這批代罪羔羊來承受了。

九、黨的總路線之爭論

關於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一九三二年一月）以來，中共黨的總路線是否正確的問題，在中共中央內部有過多次的爭論，一九三五年一月遵義會議，劉少奇第一個懷疑總路線的正確性，曾要求加以檢討。一九三五年六月，兩河口會議，張國燾認爲江西反五次圍剿的失敗，不單是軍事路線的錯誤，而是黨的總路線錯誤的結果。一五三七年五月，蘇區匪黨代表大會，劉少奇再度批評過去黨在白區工作的錯誤路線。所有這些批評和檢討，都被毛澤東和國際派加以否定了。這次六中全會，毛澤東同樣認爲反五次圍剿所犯的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執行當時總路線所犯的戰爭策略與戰爭方式上的嚴重的原則錯誤。」（按：遵義會議決議則稱之爲軍事路線的錯誤）

六屆六中全會當時，毛澤東所以還不敢判定六屆四中全會及其中央的總路線爲錯誤路線，而且以江西蘇區時期的工作成績來維護黨的總路線的正確性，主要原因在於：第一、共產國際還沒有解散。共產國際一直認定六屆四中全會爲中國黨布爾塞維克化的開始，而其規定的路線則爲國際路線，四中全會及

其中央亦以執行國際路線爲標榜；如果批判此爲錯誤路線，無異是「兒子打老子」，當時以「兒子黨」自居的毛澤東，自然不敢觸怒「老子黨」了。第二、由共產國際所支持的國際派幹部，在中共黨內仍然佔有重要的力量，而且這批以陳紹禹、秦邦憲、張聞天爲首腦的國際派，就是藉四中全會和共產國際的支持起家的，毛澤東如果貿然和國際派對立，無異自陷孤立，因此，當時毛澤東的策略是利用他們又逐漸孤立他們，到條件成熟時，才給予致命的打擊，這是毛澤東玩弄權謀的高明之處，而爲國際派所不及的。

直到毛澤東把國際派打倒，共產國際亦已解散之後，一九四五年四月召開六屆七中全會，在毛澤東和劉少奇的合作下，通過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才判定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之前，黨的總路線是第三次左傾機會主義的錯誤路線，陳紹禹、秦邦憲也被宣判爲左傾教條主義者了。

註一：鄭魯「中國國民黨史略」二〇五頁，一九四五年三月重慶初版，一九五一年六月台北初版，商務印書館發行。按鄭魯廣東大埔人，字海濱，廣東法政學校畢業，早歲加入同盟會，隨國父孫中山先生護法，任大總統特派員，嗣任國府委員及國立中山大學校長，著有「環遊三十九國記」、「回顧錄」、「中國國民黨史稿」及「中國國民黨史略」，被譽爲國民黨黨史權威。

註二：毛澤東、陳紹禹等七人「我們對於國民參政會的意見」，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六冊一一五頁，一九三九年四月延安解放社出版。

註三：「陳紹禹同志關於『擁護國民政府實施抗戰建國綱領』的說明」，載一九三八年八月八日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解放」第四十八期。

註四：林祖涵（伯渠）「國民參政會之觀感」，見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日「解放」第四十九期。

註五：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關於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載「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三八九頁，即「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一文之「註釋」五。

註六：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五日陳紹禹、周恩來、秦博古「我們對於保衛武漢與第三期抗戰問題底意見」，「解放」第四十五期，一九三八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註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六冊三〇—三六頁。

註八：同上書一〇—一九頁。

註九：同上書六一—六七頁。

註一〇：蔣委員長「論抗戰前途」一九三八年六月九日在武昌與外籍記者談話，載「蔣總統集」第二冊二二—二六頁。

註一一：同「註五」。

註一二：同「註五」。

註一三：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抗戰中地方工作的原則指示」（見「洛川會議」附錄一）。

註一四：國防部總政治部編印「國軍政工史稿」中冊六八三—六八六頁，一九六〇年台北出版。

註一五：胡華主編「中國革命史講義」第三八二頁，一九六二年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註一六：毛澤東「論新階段」（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在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的報告），載「解放」五十七期，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延安出版。

註一七：羅邁「中共六中全會概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日，羅邁在「陝北公學」之報告紀錄。

註一八：同「註一六」。

註一九：同「註一六」。「論新階段」主要內容並未列入「毛澤東選集」，僅將「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

「一小部分選入，但也已刪改得面目全非。其中有幾點刪改必須指出：（一）「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一節，刪改了「全力援助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是天職，是責無旁貸，在這裏不能有一點消極性」。（二）「堅持統一戰線與堅持黨的獨立性」一節刪除了「沒有問題，統一戰線中獨立性不能超過統一性，而是服從統一性」。（三）「我們黨已經從兩條戰線鬥爭中鞏固與壯大起來」一節，在「這兩次黨內鬥爭所得的教訓在什麼地方呢？在於（一）……同時也不利於任何革命運動」之下，刪除了「要指出：當時的這種錯誤，並非黨的總路線的錯誤，而是執行當時總路線所犯的戰爭策略與戰爭方式上的嚴重的原則錯誤」。「查「論新階段」共有八大部分，列入「毛選」二卷的僅為八分之一。作者所引用版本除「解放」五十七期（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專輯）外，並對照「中共六中全會文獻」（一九三九年一月新華日報館印行），兩者一致，並無出入，足見大加刪改的是「毛選」二卷。

註二〇：項英「中共六中全會的總結與精神」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在積極份子會上的報告紀錄。

註二一：「解放」五十七期及「中共六中全會文獻」。

註二二：陳然先生所提供之資料。六中全會後，中共中央派葉劍英向中共湘、贛兩省委傳達六中全會決議，葉約陳然（陳時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晤於長沙，僱艇游湘江在舟中詳談六中全會經過。

註二三：同「註一七」。

註二四：蔣總統「蘇俄在中國」八八—八九頁。

註二五：「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二六頁。

註二六：同上書五二七—五二八頁。

註二七：胡華主編「中國革命史講義」三八〇—三八二頁。

註二八：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北平出版的「戰報」第六期，該報係由「鬥爭彭（真）、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反革命修正主義集團籌備處」所主辦的報刊。

註二九：見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九日「東方紅」，該刊爲「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北京礦院」所出版。

註三〇：李菁玉「劉少奇的反革命歷史」，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井岡山」報，該報爲「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所主辦。

註三一：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一九六七年十三期五頁，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七日出版。

附錄一：抗日民族自衛戰爭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展的新階段

（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中全會根據毛澤東同志報告通過的決議）

中共擴大的六次中央全會聽了毛澤東同志關於中央政治局自五中全會到六中全會之間的工作以及關於目前抗戰形勢及中華民族當前緊急任務的報告以後，完全同意政治局在這一時期的政治路線和具體工作。同時一致指出黨在這時期的進步與成績。黨在政治局領導，全黨同志努力，和全國軍民擁護之下，在極艱難複雜的條件之下，順利的完成了有歷史意義的政策轉變——從國內各黨派各階級各軍隊各政權對立的局面，轉變到提出和建立以國共合作爲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關於報告中所提出的對於抗戰基本趨勢的分析，對於目前抗戰形勢的估計和中華民族當前緊急任務，以及其他事項，擴大的六中全會完全同意。同時擴大的六中全會一致指出下列諸項，以爲全黨同志努力奮鬥的準繩：

一、中華民族十六個月抗戰的基本總結

日本法西斯軍閥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起武裝侵佔我東北四省之後，去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以來，更實行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來進攻我國北部、中部及南部各省。其目的是企圖滅亡我中華民族，吞併我整個國家。我偉大的中華民族，在蔣委員長長的領導下，由於國民黨國民政府對日實行民族抗戰政策的結果，由於共產黨爲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

長期的堅持奮鬥，由於全國軍民奮起抗敵，已經掀起了偉大的英勇的民族自衛戰爭。十六個月來的抗戰，是我中華民族發展中的偉大歷史事件，造成了我中華民族空前未有的團結和進步；長期受外敵壓迫的民族抬起頭來了，分裂的國家政權統一起來了，對立的黨派攜手合作了，互相鬥爭過的軍隊變成統一的國民革命軍了，國家政治制度開始走向民主化了，窮苦的民衆大批的起來參加民族解放運動了，在敵人後方空前規模的游擊戰爭發動起來了，中華民族的英勇奮鬥已為全世界所同情所欽佩了。在抗戰烈火中，舊的阻礙進步的和分裂國家的屏障是在破壞着，團結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為一個統一力量的過程和民族自強的新生命是在生長着。

十六個月的抗戰，雖因敵我力量的懸殊，損失了許多的大城市與鐵路，犧牲了數十萬的英勇戰士，全國人民遭受了莫大的災難。然而我們打破了日寇的速戰速決的計劃，消耗了敵人數十萬兵力和數十萬萬經費，增加了敵寇內外的困難，博得了全世界先進人類的對敵譴責和對我同情。十六個月抗戰的經驗證明：中華民族有抵抗外寇的不可戰勝的偉大力量。然而求得速勝是不可能的，抗日戰爭是艱苦的持久戰。這是因為，敵是帝國主義國家，具有比較發達的工業和軍事技術。但敵為小國，人少兵少；其進行的戰爭是野蠻的侵略戰爭，違反本國人民利益，遭受世界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法西斯統治是在死亡的道路上下發展。我是半殖民地國家，工業與軍事技術比較落後。但我為大國，人多兵多，地大物博；其進行的抗戰是進步的民族自衛戰爭，合於全民族利益和受到國際的同情與援助，在抗戰中的中國是在解放、自強的道路向上發展。因此敵在長期戰爭中將愈戰愈難，愈戰愈弱，一直到最後失敗。我在長期抗戰中將轉弱為強，轉敗為勝，一直到最後勝利。這個過程將表現在持久戰的三個階段：在敵方為進攻——相持——退却，在我方為防禦——相持——反攻。在第一階段中，我國的統一團結與進步建立起持久戰的必要基礎。但因敵我力量的懸殊，使我不能不在正面採取運動防禦的戰略，在敵後則發展廣泛的游擊戰爭，使敵人戰線延長，兵力分散與消耗。這樣堅持的結果，將迫使敵人停止其戰略上的進攻，而使戰爭進入到敵我相持的階段。在我力量準備完畢時，我將配合日寇的更加困難與國際的有利條件，實行反攻，以達到驅逐日寇出中國的最後勝利。戰爭的長期性，要求我中華民族長期的艱苦奮鬥，要求我國共兩黨和一切抗日黨派長期的親密合作。用一切努力、團結和組織我四萬萬五千萬人民成爲一個統一的力量，這是保證抗日持

久戰獲得最後勝利的條件。

二、目前抗戰形勢的特點

目前的抗戰，正處在抗日持久戰第一階段轉到第二階段的過渡時期，這一過渡時期與將來相持階段的基本特點就是：一方面我國的困難增多，另一方面我國更加團結與更加進步。武漢廣州相繼不保，大工商業的喪失，主要鐵路的被佔領，國家政權與作戰陣地在地域上的被分割，主要海道的被割斷與外援的暫時減少，以及財政經濟交通的困難，軍火供給的不易，這些都是目前抗戰形勢及將來相持階段中的困難現象。同時，日寇正在計劃成立全國的偽政權，並加強其挑撥中國內部的陰謀，而漢奸親日分子正在利用這些困難加緊其投降妥協的活動。由於這些困難，可能在一部份人中產生悲觀失望的情緒。由於這些困難，抗戰營壘中可能產生意見分歧甚至某些份子的動搖與局部叛變。這些都是目前與今後抗戰中的嚴重問題，我們必須看到這一方面。然而我們同時又必須估計到中國的更加團結，更加進步與日本困難的同時增多。蔣委員長與全國人民的不動搖的堅決抗戰，國共合作及民族統一戰線的進步，國共兩黨數量上的發展與其政治影響的擴大，全國人民對日仇恨與同生死共患難的團結，中國還保有廣大的完整地區（西北、西南）作為抗戰的總後方，而在敵後方則廣泛的游擊戰爭與抗日根據地正在強大着，英勇的中國軍隊積蓄了豐富的抗戰經驗並正在鞏固其戰鬥力，全國政治制度正在逐步的民主化（尤其在敵後方抗日根據地中），廣大民眾正在發動與組織起來。同時，日本因戰線延長將更感兵力不足與分散，離開海岸鐵路大河的山地戰鬥，將給日寇以更大的困難，敵後方廣泛的游擊戰爭的發展，將陷敵軍於到處受擊，忙於應付，消耗疲憊的境地。日本在華南的行動，勢將引起美日、英日、法日關係的更加尖銳化。日本堅持侵略與中國堅持抗戰的結果，將使日本人民處在長期戰爭的威脅中，而日益增長其反戰反法西斯運動。所有上述一切，都是我中華民族堅持抗戰克服困難的客觀有利條件。而堅持抗戰克服困難的中心關鍵，就在於進一步團結我全民族，鞏固我國共合作，堅定我抗戰信心，增長我新生力量，以進行長期的艱苦的百折不撓的民族自衛戰爭。誠能如此

，在目前，停止敵之進攻，在將來，實行我之反攻，無疑是能夠實現的。

三、全中華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

根據上述的抗戰總結與抗戰形勢的估計，全中華民族的基本任務應該是：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以便克服困難，增加力量，停止敵之進攻，實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後驅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光榮勝利。在此基本原則下，全中華民族的當前緊急具體任務則應該是：

- (一) 高度的發揚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堅決抗戰到底，克服悲觀失望情緒，反對妥協投降。
- (二) 誠心誠意的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擁護國共兩黨及一切抗日黨派的親密合作，反對一切分裂企圖，反對任何漢奸傀儡政府。
- (三) 提高主力軍的戰鬥力，擴大原有的軍隊，創造更多的新軍，改進軍隊的政治工作與技術裝備和訓練，保衛西南西北，停止敵之進攻。
- (四) 擴大發展敵後方的游擊戰爭，建立和鞏固更多的抗日根據地，縮小敵之佔領地區，並配合主力軍作戰。
- (五) 提高軍事技術，建立必要的軍火工廠，準備反攻實力。
- (六) 實行集中領導下的民主政治，改善政治機構，密切政府與人民的聯繫，發揮抗日政權的最大效能。
- (七) 擴大民衆運動和發展民衆團體（工、農、商、學、文化界、婦女、青年、兒童各種組織），動員廣大民衆積極參加抗日戰爭。
- (八) 爲激發民衆的抗戰熱忱和生產熱忱，實行相當必要的民生改善。
- (九) 實行新的戰時財政經濟政策，增加收入，節省支出，克服抗戰中的財政經濟困難。
- (十) 實行國防教育政策，使教育爲民族自衛戰爭服務。

(十一)集中一切力量，反對日本法西斯軍閥侵略者，加強國外宣傳，力爭國外援助，實現對日制裁，使日寇斷絕外國軍火和軍事原料的供給，使我國能夠得到友邦的軍火、軍事原料、醫藥材料、技術人員及財政的幫助。

(十二)建立中日兩國與朝鮮、台灣等人民的反對侵略戰爭的統一戰線，共同進行反對日本法西斯軍閥的鬥爭。

(十三)團結中華各民族（漢、滿、蒙、回、藏、苗、獠、夷、番等）為統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圖存。

(十四)厲行鋤奸（漢奸、敵探、托洛茨基份子等）運動，鞏固抗戰的前線和後方。

(十五)發展國共兩黨及一切抗日黨派，強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支持長期抗戰。

上述各項，實為克服困難，增加力量，停止敵之進攻與準備我之反攻的必要的具體任務，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相信，由於這些任務的執行，中國轉弱為強轉敗為勝之目的就一定能夠達到。

四、國共長期合作，保證抗戰建國大業的勝利，為三民主義的新

中國而奮鬥

為了完成中華民族的當前緊急任務，為了順利進行抗日持久戰，就必需國共兩黨長期合作。國共兩黨合作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是抗戰建國大業完成與勝利的保證。因此，建立國共兩黨的長期合作，不僅是國共兩黨同志的熱望而且是我全中國人民和一切中國朋友的希望。抗戰建國是長期的事業，抗戰時期的合作，造成戰後合作的基石。強敵的存在，三民主義之成為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兩黨十餘年來的相互關係所給兩黨黨員及全國人民的深刻教訓，全國軍民對於兩黨長期合作的切望以及為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而奮鬥的共同目標，所有這一切，就使兩黨長期合作的事業，具有堅定的科學基礎和理論根據，因此就能夠由希望變成事實。為此目的，擴大的六中全會正式決定：不在國民黨中及其軍隊中建立共產黨的祕密組織。再一次正式宣言：中國共產黨對於擁護三民主義，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的誠心誠意。再一次懇切的責成所有的中國共產黨員，以互助互讓和同生死共患難的精神，以尊重合作中各政黨獨立性的立場

，以謙和互敬互商的工作態度，去親近國民黨同志和一切抗日黨派的同志。這不僅是爲了減免國共兩黨間的磨擦，不僅是爲了改善和加強兩黨合作的關係，而且是爲了達到兩黨長期合作的目的。擴大的六中全會謹向國民黨總裁蔣先生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宣稱：中國共產黨認爲國共兩黨合作的最好的組織形式是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並將加入國民黨與青年團的共產黨員的名單交給國民黨領導機關，並且不在國民黨及青年團中進行徵收共產黨員的活動。第二種形式則是由兩黨組織各級的共同委員會來進行兩黨合作的事宜。六中全會認爲兩黨合作組織形式的適當解決，對於親密兩黨關係保證兩黨長期合作有極重大的意義。

由於國共長期合作的實現與持久抗戰的勝利，將產生一個獨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義新中華民國。中國的內部環境（以各黨派各階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力量取得抗戰勝利和建國成功）和國際的條件，都指明在這一歷史階段中既不會是所謂「一黨專政」的國家制度的建立，也不會是蘇維埃或社會主義國家制度的出現，而將是一個新式的民主共和國，即三民主義的新中華民國。這一新中華民國的建立，是在長期艱苦抗戰中去打下基礎和在抗戰勝利後去發揚光大的。抗戰建國綱領的公佈，國民參政會的召集，省市參政會召集的實現，各抗日黨派合法權利的取得，人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權利的逐漸實現，陝甘寧邊區、晉冀察邊區及敵後方抗日根據地中民主之實施，民生之改善，一切，都是抗戰以來國家制度走向民主化道路的具體證明，爭取抗戰勝利的過程，將與實現民主，改善民生的過程相因相成。中華民族抗戰勝利，實現民族獨立的時候，一定就是新式的民主共和國奠定其基礎的時候。這一新的三民主義新中華民國的建立，將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上的空前進步，將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中起着光前裕後的偉大作用。

五、民族自衛戰爭中的中國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先進的兒女，以滿腔的熱忱和無限英勇參加反抗日寇保衛祖國的事業，是真正無產

階級先鋒隊和國際主義戰士應有的態度和必需的工作。共產黨員必須在民族自衛戰爭和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的偉大鬥爭中，起模範戰士的作用。共產黨員的崗位，首先應該是在最能打擊日寇的地方——前線和敵後方。共產黨員應該成爲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模範戰士。根據一切服從抗戰利益，一切爲着抗戰勝利，一切爲着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高於一切的原則立場，共產黨員對友黨友軍應該採取精誠團結和互助互讓的態度，對執行三民主義及抗戰建國綱領應該採取最誠懇最積極的立場。共產黨員應該根據民權主義的精神，在政治上組織上尊重各黨派的獨立性，應該成爲尊重國民黨和各抗日黨派的獨立性的模範；同時，應該堅持保證共產黨本身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共產黨員在八路軍、新四軍及其他武裝隊伍中，應該成爲智勇善戰，執行命令，服從紀律，建立優良的官兵一體、軍民一體與爭取敵軍的政治工作的模範。關於這一點，全會特別指出八路軍、新四軍中的共產黨員，全體指揮員，政治工作人員及戰鬥員，在抗戰中已經起了極光榮的作用，以後應該更加發揚這種作用。共產黨員在行政工作中，應該成爲廉潔奉公，不貪污，不腐化的模範。在民衆運動中，應該成爲不僅教育羣衆而且向羣衆學習，不包辦，不獨斷，與他人友誼的民主合作的模範。在對待一切非共產黨員的態度上，應該是真誠和尊重合作的模範。因此，廣大的發展共產黨的組織，使之成爲全中國的廣大羣衆性的布爾塞維克的政黨，不僅是共產黨和工人階級本身的迫切任務，而且是中華民族的共同事業。爲了保證共產黨員能在抗戰建國大業中起其應有的作用，爲了使共產黨廣大發展成爲能擔當建國大業中一部份光榮任務的偉大力量，必須大批培養和提拔有胆有識能作能爲的黨員幹部和非黨員幹部，並且最適當的使用、教育和愛護這些幹部，必須加緊認真地提高全黨理論的水平，自上而下的一致地努力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學會靈活的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國際經驗應用到中國每一個實際鬥爭中來研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研究中國歷史，提高工農幹部和一般黨員的文化水平，更加改進「新華日報」、「解放」、「羣衆」等的內容，大量設立各級培養幹部的學校、訓練班等。必須建立和加強能獨立工作的地方黨部，培養在黨、政、軍、民各種工作中有聲望有信仰的領導人材。同時，必須正確地開展兩條戰線上的鬥爭，去反對危害黨、危害統一戰線，危害抗戰事業的「左」右不正確的傾向，目前左傾關門主義分子的危險，在於他們不瞭解在現時條件之下解放中國人民的唯一道路，就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尤其是建立國共兩黨的長期合作；同時，在於他們不認識抗戰形勢而產生的左的急性病，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危險，在於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中，犧牲黨的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把無產階級爲了反對共同敵人而與其他階級建立抗日的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曲解成爲使無產階級及其政黨成爲資產階級的尾巴；同時，他們在困難前面失望，而發生對抗戰形勢及前途的悲觀主義。站在右傾機會主義的立場和採取兩面派手腕，進行反黨反中央鬥爭的張國燾，現在成了公開背叛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共產主義事業的叛徒和逃兵。政治局代表中央宣佈開除張國燾的黨籍，是絕對正確的。六中全會完全同意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決定中開除張國燾黨籍問題的意見，即是：「張國燾的背叛行爲，不僅在中共隊伍中，而且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一切忠實的擁護者中，都會遇到完全的唾棄與蔑視。」當然，各級黨部對於在實際工作中因不了解和無經驗而犯錯誤的同志們，應當加以耐心的說服和細心的教育，亂加同志以「左」右傾機會主義帽子的錯誤，必須嚴格的糾正。同時應當澈底肅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兇惡敵人——思想上的及工作中的公式主義、教條主義與機械主義。最後，六中全會特別喚起全黨提高革命警惕性，以銳敏的注意力去嚴防日寇及其走狗——托洛茨基分子及一切漢奸和反共的分子們在共產黨內部所進行的各種挑撥離間和破壞危害的陰謀詭計，以布爾塞維克應具的黨性來揭發和反對一切公開的和暗藏的（採取兩面派方法的）反黨的和危害黨的份子。每個共產黨員應該愛護黨和黨的團結統一有如生命，認真實行黨的民主集中制——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中央是全黨最高的領導，用以嚴格黨的紀律，使黨及其各級領導機關達到在政治上和組織上團結的如像一個人一樣的程度。六中全會提醒全黨同志注意：共產黨的團結統一，首先是中央及各級領導機關，尤其是八路軍、新四軍中黨的領導幹部，和各中央局及省委的團結和統一，是保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向前鞏固和擴大的最基本前提，同時也就是爭取中華民族抗戰勝利和實現建國大業的最重要條件。

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中全會指出：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不僅是中華民族的死敵，而且是日本人民的仇敵，同時又是全世界愛護和平的先進人類的公敵。因此「中華民族的解放戰爭是世界無產階級與全體先進人類反對野蠻的法西斯暴力的總鬥爭中最重要的組成部份。」（見共產國際執委主席團決定）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堅決相信：具有五千年文化歷史，

擁有四萬萬五千萬人口的我偉大中華民族，在全民族團結，國共長期合作的條件下，在日本人民反戰反法西斯運動的配合條件下，在全世界愛護和平的民族國家與所有先進人類的同情與援助條件下，一定能够克服困難，在持久的艱苦的奮鬥中，進行反對日寇的勝利的民族自衛戰爭，驅逐日寇出中國，建立獨立自由幸福光明的三民主義的新中國。光明的前途已見曙光，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中華民族的。

（錄自延安解放社出版「解放」第五十七期，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

附錄二：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關於召集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

決議

（一）擴大的六中全會認為在不久的將來召集黨的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全中華民族進行長期持久的民族自衛戰爭，爭取對日抗戰最後勝利，以謀求中國獨立自由解放的神聖事業上，對於鞏固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全民團結國共長期合作的事業上，對於黨的工作更進步與發展上，均有嚴重的歷史意義。因此，六中全會批准中央政治局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關於召集黨的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並同意準備委員會向全會提出的報告。

（二）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中心任務：是在討論和規定在堅持抗戰，堅持持久戰，堅持鞏固和擴大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總方針下，動員全民族的一切生動力量，團結起來，克服當前的困難，進行偉大的抗日戰爭，爭取和保證抗日戰爭最後的勝利。大會要以中國共產黨的統一與團結為全民族團結的模範，它的一切工作要實事求是的解答今天克服困難爭取抗戰最後勝利的一切主要問題。

(三)擴大的六中全會向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建議如下的主要議事日程：

(1)團結全民族一切生動力量，爭取全中國人民對日抗戰的最後勝利。

(2)動員工人階級積極參加對日抗戰的工作。

(3)在新條件下黨的建設問題。

(4)改選黨的中央領導機關。

(四)具體的加緊完成準備召開全國代表大會的一切必要工作，在較短時期內召集之。

(五)各地參加大會代表的名額，依各地黨員的數量、質量，和各地在抗日戰爭中作用的重要性分配之。代表的產生，除了某些因環境關係不能進行民主選舉的地區外，須盡可能作到用民主方法選舉代表。

(六)各地代表由各地省的或區的代表大會選出。八路軍新四軍的代表，由師的黨代表大會或支隊黨代表大會選出。在特殊條件下，不能召集上述代表會議時，由各地中央局或軍隊的政治部按照實際情況酌定辦法。

(七)地方黨部的選舉方法由各地最高黨部決定。

(八)各地黨部應迅速即向全黨黨員解釋七次大會的重大意義，動員全黨在堅決執行六中全會決議的實際行動中，努力從政治上、組織上、技術上進行大會的準備工作，保證大會的成功。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通過

(錄自「解放」第五十七期)

附錄三：擴大的中共中央第六次全會關於各級黨委暫行組織 機構的決定

爲了適應目前戰時環境與黨的工作，黨的各級組織機構，必須加強和有所改變，茲特決定如下：

一、在敵人後方各級黨委所擔負的工作區域，應依照敵情、地形及戰略關係與行政區分，重新劃分，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區黨委決定，報告上級黨委批准。

二、在敵人後方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之下，得設下列各級黨的委員會。

(一)區黨委員會(簡稱區黨委)。

(二)地方黨委員會(簡稱地方黨委或地委)。

(三)縣黨委員會(簡稱縣委)。

(四)市黨委員會(簡稱市委)。

(五)分區黨委員會(簡稱區委或分區委)。

(六)支部委員會(簡稱支委或支部)。

必要時在支部委員會之下得設支部委員會(簡稱支部)。

爲了開展附近地區黨的組織，可設立臨時的中心縣委，或中心區委及中心支部等。

三、各級黨委所指導之下級組織，以不超過八個單位爲適宜。

四、區委以上各級黨的委員會之下，得分下列各部辦事：

(一)組織部——管理組織的發展，黨員登記，幹部的考察，徵調和分配及徵收黨費等。

(二)宣傳部——管理對外宣傳，對內教育，及黨員所指導的報紙，學校，訓練班等。

(三)戰時動員部——動員武裝人民武裝部隊參加抗戰等。

(四)民運部——管理工人、農民、青年、婦女、兒童各種民衆運動及民衆團體中黨員的工作，在民運部內得組織工人、農民、青年、婦女等委員會。

織工人、農民、青年、婦女等委員會。

(五)統一戰線部——管理對友黨聯絡及各機關中之黨員的工作。

(六)秘書處——管理文書、庶務、會計等事。

在祕書處及各部之下，得視事務之繁簡，分爲各科辦事，設科長科員若干人。

上列各部，在我軍後方之各地黨委，得依情況變通辦理。

五、由各中央局決定，在區黨委之下，得設監察委員會，監察委員會的職權如下：

(一)監察各種黨的機關，黨的幹部及黨員的工作，與對於黨的章程決議之正確執行。

(二)審查黨的各種機關之賬目。

(三)管理審查並決定對於違犯黨章黨紀之黨員的處分，或取消其處分。

(四)審查並決定所有要求恢復黨籍或重新入黨者之黨籍。

(五)監察黨員關於破壞革命道德的行爲。

區黨委下之監察委員會的委員，須有三年以上的黨籍，但得兼職。

六、監察委員會的決定，一般須經過當地黨委會之批准。上級監察委員會有權改變或取消下級監察委員會之決定。

七、支部委員會之下，不設各部，須由各委員分掌組織，宣傳、民運，統一戰線、戰爭動員等工作，必要時得組織各種專門工作委員會。

八、各級黨委的各工作部門，對於下級黨委的各該部門，均得指導其工作，但關於各種重要問題之指示，應經由各該級黨委員會行使之。

九、各級黨委爲了便於處理組織性質及執行性質的日常工作，得由委員會全體會議推舉各級委員會的書記及常務委員數人組織常委。

十、各級黨的委員會及常委的會議，可以分爲兩種：一是經常會議，只有各該級黨委正式委員有權利參加；二是擴大會議，討論各種更帶一般性質的問題和事項，除開各該級黨的正式委員參加外，候補委員及其他有關係的工作人員，亦可吸收其列席，並有發言權。

十一、各級黨委各工作部門的會議，亦可分爲擴大的與經常的兩種。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通過

(錄自中共中央黨內刊物「共產黨人」第一期，一九三九年九月延安出版)

附錄四：擴大的中共中央第六次全會關於各級黨部工作規則

與紀律的決定

一、凡各地黨部已經取得合法的地位，並能召集黨部大會，黨的代表會者，應依照黨章召集各級代表大會及黨員大會，並在各級代表會或黨員大會上選舉各該黨的領導機關——黨的委員會。有監察委員會之黨委，監察委員會亦須由代表會選舉。

二、各級黨的委員會的候選人名單。凡到會代表或到會黨員，各該級黨的原來的委員會及上級黨委，均有權提出。但須經大會主席團彙齊並審查清楚之後，再向代表會或黨員大會提出。

三、選舉的方法須以候選人個別的提交會議分次舉手表決之，並須付反表決。

四、各級代表會或黨員大會選出之黨的委員會須報告上級黨委批准，上級黨委在必要時並有權指定或取消下級黨的委員會之委員。

五、各級黨委下的重要工作人員及參加各武裝部隊、各機關、各羣衆團體領導機關負責的黨員，須經過各該級黨的委員會的決定和批准。他們並須完全執行各該級黨的委員會的決定。

六、各級黨的委員會的常委，須完全執行各該級黨的委員會的決定。

七、各級黨委的重要文件、決議，須經多數委員或常委之同意，才能發表。各級黨委負責人的重要文章及談話，在可能時須經其他委員同意後發表。

八、各級黨的委員會、代表會及黨員大會所通過的決定文件，凡未經決定發表者，除向上級黨委報告外，各委員、各代表及到會的黨員，均不得向會外任何人洩露。

九、各級黨的委員會的決定須向下級黨委及黨員傳達者，其傳達的事項與內容須經委員會決定，並須指定一定的負責人來傳達或用文字傳達。

十、各級黨的委員會的委員，代表會的代表，除在各該委員會或代表會內部及上級黨委控訴外，不得在黨內黨外對任何人發表與該委員會或該代表會之決定相違反的意見，亦不得有任何相違反的行動。

十一、各級黨的委員會的委員，代表會的代表，須無條件的執行該委員會或代表會的決定。

十二、各地同級黨委相互之間在不妨礙祕密工作範圍內，得互通情報，並得互相提出建議（盡可能經過上級黨委傳達），但不得有指導關係，並不得有違反上級黨委決議指令之建議或情報。

十三、各級黨的委員會的委員，代表會的代表，如果發生錯誤，除在該委員會或該代表會批評並向上級黨委報告外，凡未經上級黨委、該委員會或該代表會決定要在黨內及黨外公開批評時，各委員、各代表不得在口頭上、報紙上、文件上向黨內外任何人洩露。

十四、凡黨員對各級黨委，黨員負責人與上級黨委在政治問題與工作問題上有不同意見，經過討論後不服者，得向上級黨委申訴，並得越級直接向中央及黨內最高負責人申訴。但在上級黨委沒有指令改變前，仍須服從原來的決定，並不得在黨內黨外有任何反對組織，反對上級黨委的言論行動。

十五、凡黨員受各級組織的處分不服，要求取消或改變處分者，得按級向上級黨委控告，直到中央，但不得在黨內外有任何反對組織的言論行動。

十六、各級黨委如果接有黨員及下級黨委的控訴書要求向上級黨委轉達者，各級黨委必須轉達。

十七、凡黨員對於黨的負責人及黨在羣衆中的領袖有意見與批評時，除開負責的向相當的組織黨的負責人提出必要的批評外，不得隨便在同志中及羣衆中任意批評他們的長短、錯誤和缺點。

十八、各級黨的委員會的委員，如有破壞紀律或犯有重大錯誤時，該委員會或代表會得依其程度之大小，決議處分，但必須報告上級黨委批准，如有監察委員會者，須經監察委員會審查決定。

十九、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黨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領導，是黨在組織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則。各級黨的委員會的委員必須無條件的執行，成爲一切黨員與幹部的模範。

二十、各級黨的委員會爲了了解下面的情況，便利於工作上的指導起見，上級黨委得向下級黨委派遣巡視員，傳達上級黨委的意見，考察下面的情形報告上級黨委，巡視員對於下級黨委有意見時，應該向下級黨委建議，由下級黨委決定執行與否，巡視員沒有決定與強制下級黨委執行的權力。但在特殊情形之下由上級黨委委託，授巡視員以此項特權者除外。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六日通過

（錄自「共產黨人」第一期）

附錄五：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中全會致蔣委員長電

蔣委員長介石先生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諸先生勛鑒：

先生於國家危急之際，堅決領導全國軍民進行持久抗戰，並獲得了全民族的團結統一，給了日寇以巨大打擊，奠定了最終戰勝敵人復興民族之基礎。敝黨擴大的六中全會謹以至誠向我國英明領袖致崇高的敬意！

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於會期中得聆 先生告全國國民書，對於漢口、廣州撤退後之抗戰形勢及我國堅持抗戰取得最後勝利之方針，昭示無遺，給了悲觀妥協論者以嚴重打擊，增強了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敝黨同人完全同意並表示熱烈的擁護。

中共同人深信，我國目前正處於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相持的過渡時期，雖困難猶多，但過去十六個月的抗戰已經造

成我國空前的進步和成績，我全國人民必能在 先生的堅強領導之下，在國共兩黨及一切抗日黨派的持久協力之下，堅持抗戰，鞏固和擴大全民族的團結與統一，在軍事、政治、民運各方面，採取進一步之設施和改革，期以最大之努力動員全國一切生動力量，增強抗戰實力，停止敵之進攻，從艱苦的相持階段中準備新的力量，改變敵我形勢，實行反攻，驅除日寇。我們相信偉大的中華民族曾經歷過艱巨鬥爭的磨鍊，定能舉國一致，精誠團結，渡過抗戰難關，爭取最後勝利。

中共中央一本過去主張，願以至誠擁護我民族領袖，擁護三民主義；並在三民主義和抗戰建國綱領的政治基礎上，實成全體共產黨員，本互助互讓、同生死、共患難之精神和互敬互商之工作辦法，親密兩黨間的關係，鞏固兩黨的長期合作，團結全民族，以爭取抗戰最後勝利和三民主義的民主共和國之實現。

最後，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以關懷民族命運之熱忱，敬祝 先生健康，並向國民黨中央各同志致民族解放之敬禮！

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中全會 十一月五日

（錄自「解放」五十七期）

附錄六：毛澤東呈 蔣委員長長函

介石先生勳鑒。恩來諸同志回延安，稱述先生盛德，欽佩無既。先生領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人無不崇拜。十五個月之抗戰，愈挫愈奮，再接再勵，雖頑寇尚未戢其兇鋒，然勝利之期基，業已奠定，前途之光明，希望無窮。此次敵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一新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更加困難，然一方面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實行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在此過程中，敵人必利用歐洲事變與吾國弱點，策動各種不利於吾國統一團結之破壞陰謀。因此

同人認爲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爲重要，唯有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統一領導之下，嚴防與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人之進攻，準備戰爭反攻之目的。因武漢緊張，故欲恩來同志不待會議完畢，即行返漢，晉謁先生，商承一切。未盡之意，概託恩來面陳。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即長期團結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戰爭，敵雖兇頑，終必失敗，而我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驅除頑寇，而使自己雄立於東亞。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專此布臆，敬祝健康，並致民族革命之禮。

毛澤東謹啓 民國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錄自「共匪禍國史料彙編」第三冊，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一九六四年十月出版原書註明係總統府機要室存檔文件）

第三十二章 武漢撤守後之中共

一、張君勱規勸毛澤東

日寇於一九三八年六月，分兵西犯武漢，經國軍四個月之奮戰，予敵重創後，我方遂於十月二十五日自動放棄武漢，最高統帥部亦移設重慶；從此，重慶便成爲戰時首都和對日抗戰的指揮中心。

廣州、武漢失守前後，（廣州先於十月二十一日淪陷），日寇再度作謀和試探，日本首相近衛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發表所謂「中日兩國調整關係之基本政策」聲明，提出「更生中國」，「日」、「滿」、「支」三國應立於同等之立場上，協力於「東亞新秩序」之建設」等等。蔣委員長當於同月二十六日出席中央黨部總理紀念週，以「揭發敵國陰謀闡明抗戰國策」爲題發表訓詞，對近衛聲明之陰謀一一加以痛斥，并綜合剖析稱：

「綜觀近衛的這個聲明，我們可以斷言，日本真正之所欲，乃在整個吞併我國家，與根本消滅我民族，而決不在所謂中日合作或經濟提攜等等的形式……。」

「事勢已經明白顯露到這個地步，如果我們還要想在虎領之下，苟求餘生，想以和平妥協的方法，求得獨立平等的生存，那就無異於癡人說夢，精神一經屈服，就將萬劫沉淪，鎖鍊一經套上，百世不得解脫。」

因此，蔣委員長接著堅定地聲稱：

「世界上豈有七千萬人口的民族，而可以消滅一個有五千年歷史，四萬萬五千萬人民，一千二百餘萬方公里土地大國？豈有一個有主義的革命政府，而可以輕易受人威脅，以至於放棄其革命救國的使命。」（註一）

可是，在國民黨內部，曾任國民黨副總裁及國防最高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的汪精衛，却因武漢失守與近衛的誘降而變節投敵，他於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逃離重慶，十二月二十九日在河內發表艷電，主張接受近衛聲明，中止抗戰，對日求和。一九四〇年三月，南京偽政權成立，汪精衛粉墨登場，成爲日寇的傀儡。

汪精衛叛國投敵後，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舉行臨時會議，決定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并撤免其一切職務。

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一日，國民黨於重慶召開五屆五中全會，蔣委員長以「以事實證明敵國必敗及我國必勝」爲題，發表演講稱：

「這一次全體會議舉行於第二期抗戰開始的時候，意義是非常重大，任務也特別艱鉅。我最近屢次指出，我們抗戰，應該分爲兩大階段，自從廣州失守，武漢退出以前，是第一期，武漢退出以後是第二期。……所以這次全會是我們轉守爲攻，轉敗爲勝，以我們的努力，來決定與衰存亡的一個大關鍵。」

對於妥協謀和謬論，蔣委員長一再加以斥責，同時對於堅持抗戰與爭取勝利也表示了堅定的信心，他說：

「我們目前如果妄想妥協，希求僥倖和平，就無異自投羅網，自取滅亡。須知敵國前首相近衛上月二十二日發表的所謂調整國交的談話，實在是誘降的文告，而不是講和的條件，如果依此而講和平，老實說就是降服，我們中國國民有志節，有廉恥，有前途，抗戰一年有半，犧牲儘管重大，力量愈戰愈強，凡是我們中華民族黃帝的子孫，爲要對得起我們的祖宗父母，對得起後代，對得起自身，對得起無數爲抗戰犧牲的先烈，就決無甘心降服的人。」

「我們今天唯有全力決戰，以必死之心來抗戰，戰到達到目的之日爲止。要知道降是生中求死，決無倖生之望，戰則死中求生，且有必生之道。」（註二）

這些，國民黨及蔣委員長於廣州武漢失守後堅持二期抗戰的態度，駁斥近衛的聲明，開除汪精衛黨籍以及召開五中全會之一系列措施，獲得國人的高度評價和熱烈擁護；在這一情勢下，中國共產黨也不能不表示支持和擁護：

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出版的「解放」六十、六十一期合刊，第一篇全文轉載「蔣委員長痛斥近衛聲明」，並發表「擁護蔣委員長，打倒漢奸汪精衛！」的時評。一月十五日下午四時，延安舉行各界民衆抗日討汪大會，陳紹禹以「舊陰謀的新花樣」爲題發表討汪演講。他以蔣委員長痛斥近衛聲明爲根據，駁斥汪精衛叛國電及其漢奸行爲。其中特別強調反共問題，陳紹禹說：

「最近以來，在好些地方加緊了反共、反八路軍、反新四軍、反陝甘寧邊區的宣傳和活動，增加了國共兩黨同志間的磨擦，很明顯地其中有一部分是與日寇和汪精衛的策動有歷史淵源或呼應的關係。……他們反共，就等於擁汪，爲什麼？因爲汪精衛執行日寇『以華制華』政策的主要方法是強調反共，因爲共產黨是日寇漢奸最怕最恨的力量。你反共，你就幫助了日寇和漢奸汪精衛。」

「講到這裏，我也要附帶地質問一下幾位國社黨的黨員，首先我要問張君勱。爲什麼？因爲他的行動與汪精衛關係太密切了……在汪精衛逃走的不久以前，又發生了一封所謂致毛澤東先生的公開信，信內的內容不外是反共、反八路軍、反陝甘寧邊區，與汪精衛以後（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通電中）所講的反共內容沒有兩樣。」（註三）

接着，洛甫發表「共同防共即是滅亡中國」專論，大肆攻擊「防共」論，并以張君勱作爲攻擊的主要對象，洛甫甚至說：「對於張君勱一流人，我們應該要求他們公開表示他們對於堅持抗戰國策的態度，……并在實際行動上表示他們對於民族國家的忠誠，以洗刷他們在政治生命上的罪惡。」（註四）

另一方面，當國民黨於重慶舉行五屆五中全會時，中共中央於一月二十四日發出「致國民黨蔣總裁暨五中全會電」（參閱附錄一），以表示其擁護蔣討汪之意，故其電文內稱：「伏讀蔣委員長十月三十日告國民書，十二月二十六日駁斥近衛演說，名言至論，舉國同欽。乃汪精衛自絕國人，逃奔就敵，高張親日反共之旗，實行背黨叛國之計，貴黨中央開除其黨籍，撤消其職務，辭嚴義正，千古不磨……」

不過，如果細加分析，就不難了解：中共在反對近衛聲明與討汪論調中，特別強調的只是近衛與汪逆之「共同防共」一點，陳紹禹甚至說「反共就等於擁汪」；究其原因，是由於抗戰過程中，共黨之陝甘寧邊區不僅形同封建割據，而且不斷製造事件，蠶食隣縣，擅自擴張；共黨之八路軍新四軍亦開始在華北華中襲擊國軍，攻佔國軍之敵後根據地，屠殺國民黨工作人員，製造國共兩黨之磨擦；因而引起國人之憤激與指摘，輿論界掀起抗日防共之論調。在此一情勢下，中共遂以日汪之「共同防共」作爲盾牌，以阻塞國人之攻擊，繼續其破壞軍令政令統一之陰謀。

當時國社黨領袖張君勛有鑒於此，乃以毛澤東之「論新階段」爲題材，在「再生」第十期（國社黨機關刊物）發表致毛澤東的一封信（見附錄二），對中共作善意之規勸，不料，此函觸怒了中共，紛紛爲文反擊，并乘汪逆叛國投敵，誣指張君勛爲汪精衛之同黨，欲以亂加叛國漢奸帽子的手法，嚇阻其他黨派對中共的規勸與批判。

由此可見，不管中共致國民黨五中全會電說得如何懇切動聽，也不管延安之討汪大會開得如何慷慨激昂，但中共之一切作爲，其罔顧國家民族利益，完全爲黨派私利打算，已經是非常清楚的了。

二、中共中央之新部署

武漢棄守之後，中共中央根據戰局變化作了組織上的新部署，其在我大後方的黨的機構與指揮系統，亦隨之有若干變更，情況如次：

(一)由於戰局變化，原設在武漢的中共中央長江局、八路軍駐漢辦事處及「新華日報」亦隨政府遷往重慶。事實上，中共長江局主要負責人，早於一九三八年九月間即遷延安，出席六中全會，以後是由延安到重慶的。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共中央決定撤消長江局名稱，改長江局為中共中央南方局，并以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為掩護，設於重慶紅崖嘴山坡上。南方局由陳紹禹等十人組成，其分工如左：

書 記

陳紹禹

組織部長

秦邦憲

宣傳部長

何克全

統戰部長

周恩來

軍事部長

葉劍英

社會部長

李克農（派駐桂林工作）

婦女部長

鄧穎超

委員

董必武（協助統戰工作）

委員

林伯渠（協助統戰工作）

委員

廖承志（派駐香港工作）

長江局原負責整個大後方中共黨的工作，改成南方局後，縮小了它的指揮範圍，長江下游及長江之北的河南等地改由中共中央東南局和中原局負責。南方局的指揮地區僅包括四川、西康、貴州、雲南、

鄂西、湖南、江西、廣西、廣東、香港、上海等地。（註五）

（二）以項英爲首的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原隸屬於長江局，武漢失守後，改設於重慶之南方局已感鞭長莫及，無法繼續指揮，中共中央乃改升東南分局爲東南局，由中共中央直接指揮。東南局指揮範圍，以新四軍活動區域爲中心，包括江蘇、安徽、浙江、福建等省，并以新四軍軍部爲掩護，設於皖南涇縣，其組織分工爲：（註六）

書記

項英

組織部長

曾山

宣傳部長

郭潛

軍事部長

陳毅

婦女部長

李堅貞

青年部長

陳丕顯

（三）武漢棄守後，以河南爲中心之中共地方組織，亦脫離南方局之領導，於一九三九年四月，另成立中共中央中原局，派劉少奇爲書記，朱理治爲副書記，羅炳輝、彭雪楓等爲委員，以加強中原地區工作之領導，在劉少奇未到職前，由朱理治負責（按：劉少奇於是年九月，始到達中原局），其分工如下：

書記

劉少奇

副書記

朱理治

兼組織部長 朱理治

友軍工作部長 小項

青年部長 吳祖貽

祕書長 郭啓卜

中原局設於河南確山縣之竹溝鎮，以新四軍第四支隊第八團留守處名義爲掩護。中原局之下，設有七個區黨委：

(1)鄂西北區黨委：書記王翰，組織部長張敬超，宣傳部長曹秋秋，統戰部長張執一。

(2)鄂中區黨委：書記錢瑛，組織部長楊學誠，軍事部長兼統戰部長陶鑄。

(3)鄂豫皖邊區黨委：書記郭樹勳，組織部長鄭位三，宣傳部長何偉。

(4)鄂豫邊區黨委：書記向明（後任書記爲任質彬），組織部長陳少敏（註七），委員遙正平、文敏生、張裕生、駱仁恩、劉子厚。

(5)豫西區黨委：書記劉子久，組織部長兼統戰部長王紹棠，宣傳部長郭曉棠，婦女部長趙景雲，祕書長王吉人。

(6)豫西南區黨委：負責人王闡西。

(7)蘇魯豫邊區黨委：書記吳芝圃，後由彭雪楓接任。（註八）

(四)此時，中共在我抗日大後方的活動，已由武漢轉移到重慶爲其指揮中心。新華日報遷渝後繼續

出刊，仍由潘梓年負責，幕後則由南方局宣傳部長何克全指揮。青年工作方面，中共增派喬木（非胡喬木而為北方喬木）到渝策劃指揮。統戰工作方面，派徐冰以周恩來祕書名義駐上清寺曾家岩五十號周恩來公館，加強聯系與活動。同時，中共之掩護機構，即散處各地之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通訊處，亦加強統戰工作、友軍工作和情報活動，當時各地之辦事處通訊處情況如左：

(1) 十八集團軍駐渝辦事處，改由錢之光任辦事處主任。

(2) 增設十八集團軍駐桂林通訊處，派李克農任通訊處主任。

(3) 在貴陽設十八集團軍聯絡站，由鄧止戈負責。

(4) 加強十八集團軍駐長沙通訊處工作，派徐特立返湘，加強統戰活動。

(5) 新四軍駐贛辦事處，原由涂振農負責，涂調返延安後，改由黃道任處長，陳家康任祕書，南昌危急後，辦事處移吉安，後又移上饒，改由郭潛任處長，并加強根據地之佈置，以應戰局之轉變。

(6) 新四軍駐平江通訊處，以涂正坤為主任。中共江西省委所屬之湘鄂贛邊特委，即以該處為掩護；南昌失守後，該特委接奉省委指示，加強武裝羣衆工作，準備開展湘鄂贛邊之游擊戰爭。

(7) 加強新四軍第四支隊第八團留守處工作（該處設於河南確山縣之竹溝鎮），增強其武力，以掩護黨的機構和發展游擊戰爭。該處由王國華為主任，王盛榮任政委，徐去非為政治部主任，劉貫一任參謀長。

此外，在若干地區，如成都等地，則以新華日報辦事處或新華社記者聯絡處作爲中共活動的掩護機構。對文教界的聯絡，大都以生活書店、新知書店，或各種救亡團體與報刊，或學校作爲活動據點，以籠絡左傾文人及共黨之同路人。

(五)在領導與聯絡上，中共南方局與大後方中共各省委之間，佈置有交通網，設有專任交通，經常轉發文件、指示和經費，重要地區并設有無線電台，經常聯絡通報，如八路軍桂林通訊處，新四軍駐贛辦事處，八路軍長沙通訊處均架設公開電台，閩粵贛邊省委則於閩粵邊山上架設秘密電台與重慶南方局總台通報聯絡。這些電台通報的內容，主要是中共中央與南方局之機密指示或組織、人事問題，此外，從國民黨方面獲得的機密情報，也由電台不斷轉發各單位，其中從重慶、桂林所偵悉的情報最多；事實上，李克農當時在桂林就是以指揮西南地區情報工作和友軍工作（即策反國軍工作）爲中心，桂林通訊處不過是一個掩護機構而已。（註九）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爲毛澤東與江青的結婚問題，據陳然先生說，大概是在武漢撤守之後，東南局忽然接到了毛澤東的來電，電文是解釋他與江青的結婚問題，大意說他與賀子珍離婚與江青結婚，既合於以前蘇維埃中央政府的婚姻法，又合於現在國民政府的婚姻法，也就是說合於離婚結婚自由和一夫一妻制的原則，盼各高級幹部不必誤會并向各級幹部解釋云云。這份電報一到，當即引起項英大罵「毛澤東喜新棄舊，下流無恥，竟把同患難共艱苦的賀子珍丟了，而和一個下賤戲子結婚，這樣缺德的人，怎能領導全黨？真不知史達林從那一點看上了他，要他做我們黨的領袖？」

不久，周恩來南來，陳然曾以毛、江結婚，各級反映不佳情況告周，并詢問何以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不予勸告？周答稱：中央負責同志均反對毛、賀離異與毛、江結婚，事前曾多次勸告，且曾開會討論，集體予以規勸，可是，毛澤東同志過於堅持己見，且以此係個人私生活為理由，拒絕大家的勸告，在此情況下，中央只好就賀、江間之若干問題作一決定了事。

當時返回中共中央工作的涂振農，於兩年後南來時，曾對陳然說：毛澤東同志也太不成話了，自從和江青結婚後，精神體力大不如前，中央開會時，在會議席上要喝白乾酒來提精神才能支持開會，這樣下去，如何得了？再者，以前我和陳少敏離婚，大家就左說右說，大驚小怪，把我們一起調返延安，現在毛澤東同志和賀子珍離婚就說是合乎什麼婚姻法，好像理所當然，這如何能使人服氣？（註一〇）

三、周恩來東南之行

一九三九年三月上旬，周恩來從重慶東行至江西，當時南昌雖然是在日軍的威脅下，他還是來到新四軍南昌辦事處（辦事處設於高陸巷），他就在這裏以政治部副部長身份為掩護，接見了大批有共黨黨籍的國軍軍官，大部份為第二十集團軍商震部的營長團長；這些人是中共潛伏在國軍中進行策反工作的幹部，一連三天，國軍軍官川流不息到辦事處接受周恩來的指示，這是周恩來南來任務之一，也是中共當時所謂友軍工作。

接著周恩來由南昌到吉安，與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晤談，進行其所謂上層統戰聯絡工作。同時在旅邸

中接見了法共「人道報」女記者西蒙，西蒙是法共份子，她到江西採訪戰地新聞，她向周恩來建議：中共應擴大國外的宣傳工作，「人道報」願在歐洲盡力支持，盼中共多供給資料。周恩來同意她的建議，並介紹她與各地八路軍新四軍辦事處及新華社新華日報記者聯系，要她從這些機構中蒐集宣傳資料。

三月中旬，周恩來由吉安到達上饒，寓居上饒東湖旅社，旋至三戰區拜會顧祝同司令長官，洽談有關新四軍的後勤補給與作戰地區等問題，會晤後，還寫了一封類似備忘錄的信給顧司令長官。

這次周恩來東南之行，對外揚言是要返原籍紹興省親，其實，最主要的是代表中共中央與東南局書記兼新四軍副軍長項英晤面，解決若干重要問題；當他到達南昌後，便與新四軍電訊總台聯絡，商洽會晤的時間地點。當時周恩來對陳然說，他不便到皖南新四軍軍部去，最好請項英到上饒或金華晤談，最後決定待周省親完畢，由浙返贛時，項英到浙江蘭谿與周晤面。

周恩來在上饒停留期間，新四軍派來兩部大型軍車，周遂乘該車赴浙，先到金華，住大東旅社，後轉浙西，與浙江黃紹雄主席同遊天目，然後東行返原籍紹興，遲至四月初，始返抵金華，改寓金華旅行社。

周在金華停留近一週，除應酬與講演外，主要是等待項英到達蘭谿晤談，同時秘密約見中共浙江省委書記劉英，指導浙江中共工作；先前周到江西時，亦曾檢查與指示中共江西省委的工作。周恩來與劉英晤談後，即以經贛返渝為名離開金華，實際上是在返程途中在蘭谿與項英會談，解決新四軍與東南局的若干問題，據當時與周恩來同行的陳然稱，周恩來向項英傳達和商談如下的各個問題：

第一，傳達六中全會後中共中央之若干決定。緣因中共六中全會，一般記載說是舉行於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但其實際開會日期爲四十天，即九月廿八日開幕，至十一月六日始結束。項英出席了這次會議，但因不能久離新四軍，故他於聽完毛澤東「論新階段」報告後，不待會畢，即離延返皖，以後之若干具體決定，項英并不瞭解。周恩來雖亦提前離會，但在重慶南方局成立時，陳紹禹等已作詳細傳達；此次周恩來又將若干問題轉達給項英。

第三，傳達中共中央關於新四軍作戰方針的決定。規定新四軍要積極向東向北發展，即新四軍江南部隊，於茅山根據地建立之後，一面向東即向海邊推進，一面準備渡江向蘇中蘇北發展，并應放手發動敵後的羣衆武裝鬥爭；新四軍江北部隊即第四支隊，則須加強領導，成立江北指揮部，并應積極向東推進，無論如何要越過津浦路東，與北上之江南支隊和由山東南下之八路軍聯接，創造華中根據地，使與華北根據地聯成一片，控制華中廣大地區。

第三，商洽三個中央局之指揮範圍與協調聯系問題。即南方局、東南局及即將成立之中原局間之指揮地區之劃分，如江西、浙江、江蘇、福建、閩粵贛邊之中共組織，可由南方局指導，亦可由東南局指揮；協商結果，決定江蘇省委、江西省委、閩粵贛邊省委由南方局領導，浙江、福建兩省委歸東南局指揮。江北方面，待中原局成立後，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及其部隊，東南局得委托中原局就近協調指導。蘇中與蘇皖邊黨的組織暫由新四軍挺進部隊之政治部就近領導，俟將來發展再作具體劃分。

第四，決定東南局與江西省委之人事調動問題。緣因江西省委書記黃道，要求調離江西；協商結果

，決定東南局宣傳部長郭潛調返江西，接黃道再度出任江西省委書記，黃道調任東南局宣傳部長（按：後來黃道於赴東南局途中患病，死於江西鉛山）；關於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亦改派郭潛以新四軍參議名義出任處長。

周恩來與項英商談過程中，項英曾提出若干困難與疑問，尤以新四軍之作戰方針問題，項英說六中全會的決議是強調國共團結，強調互助互讓精神，而國府軍委會指定新四軍之作戰區域爲沿長江東下至江陰，江北則以淮南路沿線爲範圍，如果自行渡江北上，向蘇中蘇北推進，必將與國民黨部隊衝突，增加磨擦，便利日寇，此不僅違背國府軍委會命令且亦與我黨六中全會精神不符，何況反共分子正可乘機攻擊我黨，其後果是否應加考慮。周恩來答復說，這是中央的決定，東南局和新四軍必須堅決執行，江南支隊無論如何下半年必須渡江北上，至於後果問題，到時再行應付。至於反共分子，隨時都在造謠攻擊我黨，那是不必顧慮了。其次關於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問題，項英亦曾以粗野的口氣提出詢問，周恩來在笑答中加以解釋并盼項英轉向各級幹部解釋誤會云。

周恩來與項英商談後，始離浙經贛返渝，繼續其統戰活動。（註一一）

四、平江事件始末

周恩來南行之初，南昌尚未淪陷，但當他於四月十日左右由浙至贛返渝時，南昌已於三月二十四日爲日軍攻佔，在此緊張戰局下，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給中共江西省委如下的緊急指示：應作最

壞的打算，即預計在日軍進一步深入情況下作緊急的工作部署，江西省委應即集中力量，以武裝羣衆，準備游擊戰爭，建立根據地爲一切工作之中心。周恩來進一步具體指出：在日軍佔領之武漢、南昌及將被攻佔之長沙間之三角地帶爲範圍，亦即武長路之東，南潯路之西，浙贛路之北，長江以南之廣闊地帶，也就是過去湘鄂贛邊老蘇區爲中心，并以幕阜山脈爲基地，積極動員武裝羣衆，準備游擊戰爭，創建新的根據地。

在我抗日大後方，江西由於歷史關係，該省各個山區曾是蘇維埃紅軍的老巢，因而中共組織力量，較強於其他各省，確有能力來執行周恩來的指示。南昌淪陷後，新四軍辦事處遷至吉安，中共江西省委仍以辦事處爲掩護在吉安指揮活動。省委之下，設有贛西南、贛東北、湘贛邊、湘鄂贛邊四個特委，各特委之下，普設各縣縣委、區委和支部。江西若干學校、文化界、抗日後援會、政府機關潛伏有共黨份子及其同路人，如上高縣長黃賢度是中共人員，吉安行政督察專員李林爲共黨的同路人。軍隊方面，除二十七集團軍楊森部，尤其二十集團軍商震部潛伏有中共策反人員外，江西的保安團隊亦爲中共所滲透。在山區，除已編入新四軍之部隊外，中共還保存了若干武裝力量和山區根據地，其一爲湘鄂贛邊區，其二爲湘贛邊區，前者位於湖南之平江、瀏陽、湖北之通山、通城，江西之武寧、修水、銅鼓、萬載之間，即幕阜山脈，後者位於江西之安福、蓮花、湖南之茶陵、攸縣之間，即武功山脈，這些叢山峻嶺的山區農民，生活貧困不堪，最易爲共黨誘惑收買，盲目爲共黨驅使，中共之便衣武裝人員便分股潛伏在這些山區活動。

根據周恩來的指示，中共江西省委決定以湘鄂贛邊和湘贛邊兩個山區，作為戰局惡化時的游擊根據地，而首先在接近戰區的湘鄂贛邊武裝羣衆，擴充便衣武裝力量，準備成立游擊部隊。在平江，且有新四軍通訊處，可作為武裝羣衆的掩護機構。湘鄂贛與湘贛邊兩特委，遂在這一決策下，從四月下旬起便展開了積極的行動。五月間，中共江西省委在吉安召開會議，作了進一步的決定：爲了執行上級指示和加強領導這一鬥爭，省委機關儘速遷往湘鄂贛邊，并先派省委組織部長曾金聲前往佈置一切。不料，當曾金聲在新四軍平江通訊處積極佈置時，就發生了平江事件，曾亦於事件中遇害，這樣，省委機關的搬遷問題也就延擱下來了（註一二）

所謂平江事件，即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二日，二十七集團軍楊森所部，於平江嘉義鎮與新四軍平江通訊處衛隊發生武裝衝突，在衝突中槍殺了中共江西省委組織部長曾金聲，省委統戰部長兼中共湘鄂贛邊特委書記涂正坤（對外名義爲新四軍平江通訊處主任），省委社會部長兼特委組織部長羅梓銘，特委秘書長吳淵等六人；據說這些人在當地「招集土匪」、「運兵拐逃」，（註一三）當楊部進入通訊處檢查時便發生槍戰事件，曾金聲、涂正坤等人就在槍戰中被擊斃。其實，平江事件的發生并不是偶然的，其根源可歸納爲如下三點：

第一，中共在平江一帶四出活動，積極武裝羣衆，準備游擊戰爭，同時在國軍中亦佈置滲透工作，策反國軍配合游擊，這些突出的活動，被國軍視作「招集土匪」、「運兵拐逃」，因而發生檢查行動乃至直接的武裝衝突。

第二，由於中共之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北華中各地四出襲擊國軍，屠殺國民黨人員，引起國軍與國民黨人士的憤激，因而在南方，若干國軍下級軍官抓住中共之非法行爲，乘機報復，以圖洩憤。

第三，國軍第二十七集團軍少數部隊進駐平江嘉義鎮，原欲動員民衆協助國軍，以抵抗日寇之進攻，但遭受該鎮若干民衆的反對，緣因該地民衆深受中共之宣傳煽動，對國軍反感至深，國軍下級軍官因而遷怒於中共幹部，在衝突中就地槍殺中共幹部。

關於這一點，事後，原在平江通訊處工作的中共幹部徐敏，在「憶平江慘案」一文中也承認說：

「每天，我們通訊處門口，出出進進的鄉親們總是川流不息。羣衆把希望都寄託在共產黨身上。他們紛紛派代表來反映國民黨軍隊對老百姓的蹂躪，述說自己的憂慮，表示抗日的決心。要求起來反抗國民黨軍隊。」（註一四）

可見，當時嘉義鎮的民衆，在共黨煽動下，不僅不協助國軍抗日，反而要中共領導他們起來反抗國民黨軍隊，這樣就引起了雙方尖銳的衝突，而爆發了平江事件。

平江事件發生後，中共江西省委原定在湘鄂贛邊建立根據地發動游擊戰爭的計劃被打破了，同時特委組織也被打散。於是江西省委乃採取下列措施：

（一）將平江事件經過電告南方局及中共中央，建議向國民黨當局提出嚴重抗議，要求懲辦兇手，撫卹死者并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二）指定黃耀南、李輝、駱奇勳三人組織新的湘鄂贛邊特委，以黃爲書記，李負組織，駱任宣傳。

新特委應即處理平江事件之善後問題，安定黨內情緒，繼續領導工作，除加強幕阜山北之鄂東南工作外，特委機關可南移至銅鼓、萬載、瀏陽間之山區，以策安全并保持與省委之聯系。

(三)電告東南局與新四軍項英同志，并建議新四軍駐贛辦事處，迅即由吉安移往上饒，與三戰區長官司令部保持聯系，避免與九戰區國軍部隊及江西省政當局之公開磨擦。

(四)省委機關迅即準備分散工作分頭領導，省委書記及省委統戰部、祕書處隨新四軍辦事處遷往上饒，負責總的領導工作。省委軍事部、社會部由顏國華率領，即日遷入湘贛邊山區，會同湘贛邊特委組織便衣武裝，建立祕密根據地，以備環境惡化時省委遷入此一山區。省委組織、宣傳、民運各部門即刻轉入地下，分散在吉安、泰和、遂川、贛州工作。另指定贛西南特委書記黃路平在贛州佈置省委祕密機關，以備省委書記、省委統戰部、省委祕書處由上饒辦事處祕密遷來贛州。

(五)加強交通聯絡工作，所有陸上交通，即刻佈置雙線來往，新佈置之交通線應絕對祕密并有安全掩護。贛江沿線即刻佈置水上交通，購買帆船及加強船上運輸工人工作，建立船上交通站，必要時，重要會議應移至船上舉行。

(六)省委電台隨辦事處移往上饒。另電南方局撥發電台、手搖機及報務、譯電人員，運入湘贛邊山區，在山上建立祕密電台，與重慶南方局保持雙重空中聯絡。

(七)嚴令各特委各縣委，所有黨的組織與活動，即刻全部轉入絕對祕密之地下活動，任何違反黨的祕密工作規條與祕密技術的行爲，均應受到紀律的制裁。各級黨部必須立即加強對黨員之祕密工作教育

及氣節教育，以應付環境之惡化。

(八)所有已經暴露之黨員幹部，即刻轉入地下潛伏，按其志願迅速派往東南局、新四軍或重慶南方局另行分配工作，或赴延安受訓，其不願離開江西者，送入湘贛邊山區根據地工作，以避免損失(註一五)。

平江事件發生後，周恩來在延安發表談話，其中關於政府當局對平江事件之處置問題，作了如下說明：

「政府當局之處置如何，我們現在尚不知道，但已知者爲最高當局確曾有令查究此事，何總長、陳兼長官亦曾電告此事。惟據楊森總司令兩次復電經何、陳兩先生轉復我者，其內容前後不符，顯係其屬下蒙蔽真相，不敢據實上陳，而以招集土匪或運兵拐逃爲辭，血口噴人，殊爲遺憾！不過楊總司令尙知此事屬於部下妄爲，已將連長撤職，雖尚不足抵其應得之罪，但較之薛長官佳午策電所稱適當處置，顯有很大不同，……：想最高當局，本大公無私之懷，必能平反此案。」(註一六)

八月一日，延安舉行追悼平江事件死難烈士大會，毛澤東以「用國法制裁反動份子」爲題發表演說稱：「今天我們一致表示：反對這樣的事(按：指平江事件)，我們要求蔣委員長，要求國民政府林主席，要執行保護革命同志、抗日同志的法律，要全國統一於抗戰，統一於團結，統一於進步。如果法律不靈，再不統一，全國人民就要繼續起來要求，一定要使法律有靈，統一實現，鎮壓壞蛋，鎮壓搗亂分子，鎮壓反動派、投降派，以後不准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註一七)

可是，在當時，由於中共在陝北，八路軍新四軍在華北華中，不斷製造事件，其規模之大，千百倍於平江事件，國共兩黨之糾紛磨擦正日趨尖銳，所以蔣委員長於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召見周恩來、葉劍英時，對共黨問題曾作如下之指示：

「一、關於共黨問題之癥結，目前不在陝北幾個縣，而在共黨應有根本的進一步之真誠，服從中央命令，執行國家法令，為全國革命之模範，而不自居於整個國家體制之外，造成特殊關係，為一般封建者所藉口。

二、余為全國革命領袖，完全以理智的及持平的態度處理國事，絕不偏聽任何人，或某一人之報告而有所偏倚。余之權衡一切，完全以國家民族整個利益為前提，余為革命計，決不能有所遷就或姑息。

三、共黨為求解決問題，輒先造成特殊事實，以強迫的態度對余，余為革命領袖，一切皆當本革命立場，持平處理，自不許有此種態度加諸余也。

四、欲求目前各地糾紛之適當解決，必須共黨首先真誠恪守中央命令，執行國家法令，使事態平復，如此，余決不致有虧待共黨也。

五、余對事對人，向以仁愛為本，對共黨亦無不如此。凡余對共黨之指示，乃至責備，皆所以愛護共黨，絕對有利於共黨，所以始終希望共黨為革命的模範，而不為其他封建者所藉口。

六、吾人今後一切實施與行動，皆應合乎國家之統一與獨立為唯一原則，如國家不能統一，便決不能謀獨立，故吾人之求統一，實為整個國家民族之利益着想，此種利益自亦為共黨所共有也。

以上各點，均望大家深思而熟慮之。」（註一八）

周恩來於接受蔣委員長此一指示後，於六月十八日離渝返延（註一九），向中共中央報告和請示。同時，由於平江事件以及各地糾紛迭起，中共中央南方局於七月下旬發出緊急通告，嚴令大後方的共黨組織和幹部迅即轉入地下，繼續滲透活動，通告電文如左：

「萬萬火急：鑒於日寇對我抗戰營壘的分化政策，汪精衛賣國賊及其仍然混在抗戰隊伍中的信徒的反共陰謀，以及防止我們活動的通令，與其放任頑固份子對我們的放肆進攻等，使得我們各地組織遭受摧殘破壞者有之，我們的活動受着無理的壓迫者有之，我們的黨員羣衆遇到各種排斥驅逐非法逮捕監禁與暗殺者有之，此種不幸事件，倒行逆施之政策，在下層更爲嚴重，有許多地方愈演愈烈。爲了鞏固我們的組織，保證我們的經常活動，避免日寇漢奸及頑固份子反共陰謀之得逞，以利抗戰建國偉大事業順利進行起見，中共南方局認爲必須堅決改變我們的組織形式和工作方法，因此決定：

一、現在各地黨的組織應該從半公開組織形式轉到基本上是地下黨（祕密）的形式，及與此相適應的工作方法。

二、各地公開做統一戰線的工作同志，在可能條件下仍繼續其原來之活動，但應時時提防陰謀家的謀害，他們應與祕密的組織分開，原則上不參加祕密組織的日常工作和會議，而與相當的領導機關的負責同志發生個別聯系。

三、各地方組織，尤其在惡劣環境之下工作的組織，不許舉行黨員大會及各級委員會的擴大會議等

，實行集中的領導方法，縮小機關工作人員，將多餘的工作人員調到下層工作，各委員會原來人數太多時，不宜經常在一地，可輪流出去幫助和加強對下層的領導。

四、已經暴露的和被人驅逐的幹部和黨員，必須迅速從原來工作的地方調走，縱使工作一時受到損失，亦應痛下決心。

五、建立完全秘密的接頭、會議、通訊等機關，嚴禁無工作直接關係的同志出入這些機關，改以完全秘密的個別聯系接頭的方式，加強對他們的工作領導，提高其責任心，應視這一工作是極負責任的黨的工作。

六、在最近時期中，組織工作的重心，應放在鞏固和改造黨的組織上面，在黨員數量相當鉅大的地方，應以考查、整理、鞏固組織及以新的工作方法和精神教育黨員爲其主要工作，儘可少發展黨員。

七、一切組織和每個黨員應絕對遵守最近中共南方局所發的祕密工作通知，并責成各級組織部，經常監督實施，違反祕密工作原則的組織與黨員，必須受到處罰，直到把整個組織解散（重新改組）和開除黨員出黨。

八、加強祕密教育，在黨校訓練班及對黨員訓練，應增加祕密工作一課；在祕密領導機關中的幹部的審查與新幹部的提拔，亦須注意到他們遵守祕密原則的習慣和藝術，以定取捨。

九、各級幹部儘可能職業化，至少應在社會上獲得一定的合法地位，以掩護自己的工作。

十、同志被捕後，不許輕易承認自己是黨員，應以抗戰份子和一般公民的資格來替自己辯護，利用

家庭和社會關係來營救，不要希望由組織上去保釋，在萬不得已時須承認自己爲黨員時，祇承認自己一人，絕不能暴露任何黨的秘密和組織情況，絕不能供出其他同志，否則即爲叛黨行爲，應受嚴厲處分開除黨籍。」（註二〇）

從此，中共在我抗日大後方，雖仍有其公開的統戰與宣傳活動，但其黨的組織與工作，則完全轉入爲祕密滲透與陰謀破壞了。

五、抗戰兩週年紀念與中共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爲抗戰兩週年紀念，蔣委員長發表告全國軍民書指出：

「敵人自從蘆溝橋事變起，到去年七月七日侵入我們國土，它總共進展了一千八百公里，但從去年

七月七日到今天，這一年之中，祇是進展了三百一十公里，在一樣的時間之內，它還加上了幾倍的兵員，而其所得的戰果，反要比前一年減低了幾倍，那麼他兵力的疲憊衰退到如何程度，就不待我多所證引，而可明白了。這亦就可以證明我們的勝利到來是更接近了。」

此時，由於日寇漢奸處於困難情勢下，乃倡導所謂和平運動，對於此一和平運動陰謀，蔣委員長在書中更明白指出：

「老實說：這些漢奸的所謂和平運動，實在是亡國運動，如果敵人和漢奸得遂其毒陰，那麼『東亞新秩序』建立之日，就是我中華民國滅亡奴隸地位確立之時，東亞協同體成功之日，就是中國實行歸併

於日本之時。在敵國已宣佈『東亞新秩序』狂論以後，很明顯的他對我們中國除了要整個滅亡成爲他的奴隸以外，再沒有和平的餘地了。我們對敵人今天只有勝利，只有完全達成我們抗戰的目的，除此以外，亦絕沒有其他第二條可走的道路，否則，中途投降，就是『漢奸的和平』。換句話說，便是奴隸的和平、滅亡的和平，除非存心出賣整個中國的漢奸，決沒有人再來否認這一個事實。」

「我們要用血肉的代價，貫徹抗戰到底，來洗雪漢奸們替我們民族所加添的恥上加恥的恥辱，不知道『漢賊不兩立』之大義的，不能算是黃帝的子孫。」（註二一）

蔣委員長雖已在文告中明白指斥「和平運動」的陰謀和表明堅持抗戰的決心。可是，在當時，中共却有不同的居心和不同的看法。中共中央亦曾發表「爲抗戰兩週年紀念對時局宣言」（參閱附錄三），在宣言中，中共強調「國內投降妥協份子，則散佈謠言，煽惑人心」，「他們暗藏於抗戰陣營之中，乘間抵隙，便利私圖，呼朋引類，奮其魔力。」同時把中共製造的國共磨擦責任，歸罪於「國內投降妥協份子」，說他們「造作事端，挑撥感情，以離間國共兩黨之團結」。且進一步妄稱：「凡此所爲，或直接受命於日寇，或間接而被其利用，一言蔽之，以分裂達投降之目的而已。」因此，中共宣言提出：

「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

「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

「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後倒退！」

毛澤東在「解放」七七紀念特輯中，以「當前時局的最大危機」爲題，發表抗戰兩週年紀念論文，

他說抗戰陣營中現有主戰派和主和派之爭，主和派認爲「和則存，戰則亡」，於是「所謂主和派，就不得不進行其欺騙宣傳，而第一就是反共，……企圖逐漸造成輿論，達其主和即投降之目的。」因此，毛澤東說：「我們共產黨人公開宣稱：我們是始終站在主戰派方面的，我們是擁護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歷次公開宣告的抗戰國策的。我們堅決反對那些所謂主和派。」（註二二）

在「解放」紀念特輯中，除毛澤東外，其餘中共領導人員亦紛紛發表紀念專文，計有：朱德「我們一定要勝利」，王明「堅持抗戰國策克服投降危險」，周恩來「抗戰兩年」，洛甫「反對投降妥協堅持抗戰到底」，博古「抗戰兩週年紀念獻詞」，王稼祥「目前抗戰的政略與戰略的中心問題」，劉少奇「鞏固團結粉碎敵人的陰謀」，鄧發「堅持團結才能獲得最後勝利」（註二三）。這些文章的論點與中共中央爲抗戰兩週年紀念對時局宣言并無二致，而以攻擊所謂投降妥協份子爲中心。

然則中共口口聲聲所攻擊的所謂主和派或所謂投降妥協份子究竟是誰呢？當時中共並沒有指名道姓，毛澤東也祇是把那些「反共」人士稱之爲「張精衛」、「李精衛」，誣之爲與汪精衛「唱雙簧」、「裝紅白臉」的準漢奸；直到次年（一九四〇）十一月七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所發的祕密指示，才在共黨黨內指明：「目前最危險的，是以何應欽爲首的親日派集團，全黨應從口頭上揭穿何應欽的罪狀，僅僅暫時避免文字上提出何應欽的名字。」（註二四）其實，八年抗戰，何應欽將軍既未主和親日，亦未投降妥協，僅僅在維持軍令統一與整飭軍紀方面，曾阻礙共軍違令亂紀，稱兵作叛，也正因爲如此，當時便被中共目爲主和親日的準漢奸。

可是，十三年後，中共當時所稱的主和派，又由何應欽移嫁給蔣委員長了。當毛澤東出版「毛選」時，除把「當前時局的最大危機」題目改爲「反對投降活動」并把內容加以刪改外，還在文末註釋稱：「毛澤東同志這裏所說的『中國主和派即投降派的整套觀點，整套做法，整套陰謀』，就是指蔣○○的觀點、做法和陰謀。當時汪精衛是公開投降派的主要頭目，蔣○○則是暗藏在抗日陣線內部的投降派的主要頭目，也即是毛澤東同志所說的『暗藏的汪精衛』，或『張精衛、李精衛』。」（註二五）顯然，這是公開的誣職，因爲任何人都知道，領導和堅持八年抗戰并取得抗戰勝利的正是蔣委員長，在抗戰兩週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中，蔣委員長更明白宣示了堅持抗戰和反對「和平運動」的決心，甚至毛澤東本人當時在「當前時局的最大危機」一文中，也公開宣稱：「我們是擁護蔣委員長與國民政府歷次公開宣告的抗戰國策的」，直到十三年後，出版「毛選」時，才把上述擁護蔣委員長一節刪除，爲的便於誣職蔣委員長爲主和派。

由此可見，中共和毛澤東不僅一直在竄改史實，歪曲歷史，而且爲了黨派利益，爲了神化毛匪，可以極盡其造謠污蔑的能事，隨時把漢奸準漢奸的帽子加諸任何人，所謂只問目的不擇手段，正是中共欺騙宣傳的伎倆。

以後抗戰的史實證明，蔣委員長在告全國軍民書中的分析是正確的，即倡導和平運動的是日寇漢奸，在抗戰陣營中除已投敵的汪精衛等人外，并無所謂主和派。當時中共之所以虛構捏造危言聳聽者，其作用顯然在於：

第一，分化抗戰陣營。以前毛澤東把抗戰陣線劃分為左、中、右集團，現在則又把它分為主戰與主和兩派，同時把中共自己描述為最積極的主戰派，藉以欺騙和爭取民衆的支持；另一方面則把國民黨若干人員誣指爲主和派，藉此削弱國民黨領導抗戰的威望，同時加以分化，即孤立與打擊其一部分，逼迫其另一部份，使之爲共黨役使，這就是中共「既聯合又鬥爭」的統戰陰謀。

第二，掩飾破壞統一團結的罪行。抗戰兩年來，陝甘寧邊區政府不斷侵襲鄰縣，擴張疆土，八路軍新四軍在敵後專事對付國軍，破壞統一團結；西北與華北華中行政當局與軍事首長，控訴中共罪行的電告文件罪證如雪片飛來，輿論界爲之震驚，紛紛對中共指責與批評。當時毛澤東宣稱這些文件證據是「假消息，假報告，假文件，假決議」（註二六），根據這類假證據所作的指責批評，就是反共，反共就是分裂團結，準備投降，所以毛澤東接着說：「投降是主要危險，反共即準備投降」（註二七）。這樣，既推卸了中共破壞統一團結的罪行，又把指責中共的人士當作漢奸來攻擊，使之三緘其口，讓中共可以肆無忌憚的爲所欲爲。顯然，這又是中共顛倒是非武斷宣傳的一貫伎倆。

註一：「蔣總統集」第一冊一〇八三——一〇八九頁。

註二：同上書一〇九〇——一〇九三頁。

註三：陳紹禹「舊陰謀的新花樣」，「解放」六十二期，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延安解放社出版。

註四：洛甫「共同防共即是滅亡中國」，「解放」六十三、四期，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六日。

註五：陳然及涂振農所提供之資料，涂由東南分局調返延安後，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工作。

註六：陳然所提供之資料。

註七：陳少敏原任東南分局婦女部長，因與涂振農離婚調返延安，一九三九年調至河南，由中原局分配工作。

註八：小項提供之資料，其時小項任中原局友軍工作部長。

註九：陳然所提供之資料，其時陳然與李克農保持經常接觸，故瞭解頗多。

註一〇：陳然所提供之資料。

註一一：周恩來南行資料，為陳然所提供，其時陳然與周恩來同行。

註一二：陳然提供之資料。其時陳由中共中央東南局調返江西，再度出任中共江西省委書記。

註一三：「周恩來同志關於平江慘案的談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八冊三五——三七頁，一九四〇年七月延安解放社出版。

另據中央調查統計局編印之「抗戰三年來之中國共產黨」一書載稱：「二十七集團軍一三四師有士兵數名被涂正坤等人拐逃，師長楊幹才即派一余連長率槍兵四名，前往該通訊處檢查，不意涂等糾眾拒絕，因此發生衝突，當時逃兵乘機衝出，雙方互有傷亡，而涂正坤等身中流彈，亦當場斃命。」

註一四：徐敏「憶平江慘案」，「紅旗飄飄」第九集第三〇頁，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五八年九月出版。

註一五：陳然所提供之資料。

註一六：同「註一三」。

註一七：毛澤東「用國法制裁反動份子」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八冊三三頁。查毛澤東此一演說列入「毛選」第二卷（五六五頁）時，題目改爲「必須制裁反動派」，內容亦經刪改，作者所引用的是未經刪改之原文。

註一八：「蔣委員長召見周恩來葉劍英對共黨問題指示要點」，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下午七時三十分於重慶官邸。見「共匪禍國史料彙編」第三冊六一—三頁，并註明「錄自總統府機要室存檔」。

註一九：同「註一三」。

註二〇：摘自「中共南方局與東江黨緊急通告」抄件。原件註明：「不許翻印，只許縣委或特委負責人看」。

註二一：「蔣總統集」第二冊二一〇〇頁。

再二二：毛澤東「當前時局的最大危機」，「解放」第七十五、六期，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出版。

註二三：「七七紀念特輯」，「解放」第七十五、六期。

註二四：中共中央書記處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七日「關於反對投降分裂挽救時局危機的指示」抄件。

註二五：「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六三頁。按：作者所引用的是當時延安出版的「解放」期刊第七十五、六期，

即未經竄改之原文。

註二六：同「註二二」。

註二七：同「註二二」。

附錄一：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致國民黨蔣總裁暨五中

全會電

重慶中國國民黨總裁蔣先生暨五中全會諸先生大鑒：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謹向中國國民黨五中全會致民族革命之敬禮。蓋自一年半以來由於堅持抗戰國策與全國英勇奮鬥，已使日寇之進攻大受打擊，國際之同情日益增長，中國之勝利奠定始基，犧牲雖大，效果已彰，循此奮進，定能達抗戰必勝建國必成之目的。武漢放棄廣州不守之後，抗戰正向新階段發展，日寇乃於軍事進攻外，加重其分化中國內部之陰謀。吾人對策，唯有全國更進一步的精神團結，鞏固與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擁護蔣委員長，堅持抗戰到底，實行新的戰時政治、軍事、財政、經濟、黨務、民運、文化諸政

策，以便增加力量，渡過難關，對抗敵人陰謀，消滅漢奸毒計，停止敵之進攻，準備我之反攻，救國之道，端在於此。伏讀蔣委員長十月三十日告國民書，十二月二十六日駁斥近衛演說，名言至論，舉國同欽。乃汪逆精衛自絕國人，逃奔就敵，高張親日反共之旗，實行背黨叛國之計，貴黨中央開除其黨籍，撤消其職務，辭嚴義正，千古不磨。適於此時貴黨五中全會開會於重慶，同人深信，必能總結過去之經驗，昭示今後之方針，嚴整抗戰陣容，密切軍民聯系，刷新政治，發展民運，以慰全國國民如飢如渴之望，以固國共兩黨長期合作之基。同人深信，抗戰高於一切，團結必能勝敵，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乃與團結全國團結抗日各黨派，實現民族解放之偉大事業，絲毫不可分離。抗戰雖為一艱難過程，團結則為無堅不摧無敵不克之利器。同心斷金之義，同舟風雨之思，知諸先生必有同情也，肅電致賀，敬頌勳祺。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叩敬（二十四日）

（錄自延安解放社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出版之「解放」第六十二期）

附錄二：國社黨張君勳致毛澤東一封公開信

澤東先生惠鑒：頃讀先生六中全會報告書，判析抗戰情勢，至為詳盡，且抱定長期作戰政策，決心尤為堅定，佩仰無已。竊以為戰事勝敗，為民族之存亡，非獨一黨一派之利害。彼日人先以兵力佔吾領土，繼則組織偽政府以代之。夫政府者，行使國家最高權力者也，此而可以由敵代為指定，何異乎中國之為未成年而須由監護人代行使其職權；澈底言之，不啻彼自居於上國，而以中國為被保護國，此而可以容忍，則更有何事不可容忍。故我以為中華民國應繼續作戰而不可以言和者，以其視吾國為可由彼處置之一片土地，而不視為平等獨立之國家故也。日人所提條件，有時出於近衛，有時出於板垣，要不外二端：一曰國民政府改組，二曰與偽政府合流。意即在反對蔣先生，此兩條果有人起而接受之者，則國民政府不成其為國民政府，降而與漢奸為伍矣。日人既已提此二條，其心目中已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更有何和議之可言！在我更何從而有所妥協之可能！惟其然也，今後之國策，除國內團結以圖作戰之持久外，別無他途，雖然，

國內之團結如何而後可以永保，不能不唯先生與所率之共產黨是望矣。第一、號為近代國家，以統一為特徵，尤貴乎軍權之統一、英、美、俄、法等，何嘗一國以內而有兩種軍隊？誠以軍隊之教練與任命，必須出於一源，而後行動乃能一致。而先生文中曾有下列語句「國共兩黨都有軍隊，這是特殊歷史造成的結果，不是缺點而是優點。由於有兩黨的軍隊，使得抗日戰爭中兩黨克盡分工合作的最善責任。互相觀摩激勵的好處，也更多了」。依吾人所見，軍隊應屬於國家，不可使軍隊與特殊主義發生聯繫，如以資本主義灌輸於軍隊中，則彼等遇國內之信託社會主義者將起而壓迫之；反是者如以社會主義灌輸於軍隊中，則彼等遇國內之資本主義者將起而推翻之。可見軍隊惟有屬於國家，不可屬於一黨。目前之中央軍不可目為黨軍，且信奉三民主義，未見有何特殊之政治路線，希望將來走上隸於國家之途徑，當不甚遠。先生所率之軍隊名曰國民革命軍，更望毅然首倡以八路軍之訓練任命與指揮，完全託之蔣先生手中。此所以增進全國之團結而利於抗戰之持久者一也。第二、各國之黨政，從無有佔領一特區以行特殊政策者；以一國之內惟有一種法律，一種行政系統，乃能成爲現代國家，其稍有特殊化者則如阿爾蘭之於英，以其本爲被壓迫者乃爭取獨立以得之者也。其次爲少數民族，如昔日德意志民族之處於捷克國中。今吾國號爲統一，先生等亦以擁護國民政府自號於國中，而今則特區之內，儼然自成一天地，自立官制，自立稅制，自立學校。若國中凡組織政黨者，皆起而効法先生等之所爲，則中國將分爲若干政黨之若干行政區，而國家非返於封建割據之局不止矣。先生等與其同志以打倒割據相號召，更望取消特區之制，以增進全國之團結而利於抗戰之持久者二也。復次，所欲與公言者，則爲共產黨之理論。共產黨之特點與其所以異於它黨者，在其階級性，在其認定以階級鬥爭爲奪取政權之出路。公等昔年所以特注意於無產者，且標土地革命之說者，即在於此；此馬克思之學說，而列寧從而實現之者也。乃公等社會革命工作正在進行中，忽而有「九一八」之巨變。於是先生等悟階級鬥爭之不適於中國，轉而標出民族戰爭之說，此種轉變，誠爲國家之大幸，應表而出之者也。然民族鬥爭云者，以全體爲主體，不應更有階級之成見，至於三民主義，本以「民族」爲出發點，與馬克思之視階級爲歷史支配者迥乎不同。而先生之報告，乃有下列之語：「誰要是不忠實於三民主義的信奉與實行，誰就是口是心非，表裏不一，誰就不是一個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自此段文字觀之。似乎信奉三民主義者，即是忠實的馬克思主義信徒，二者之間

，可以畫一個等號。此種說法，不獨使國人對於三民主義之內容，更加糊塗，即對馬克思主義，亦令人有迷離惘恍之感。此種名辭之意義擴張，在先生文字中之後段如「愛國主義就是國際主義在民族革命戰爭中的實施」云，亦事同一律。竊以爲目前階段中，先生等既努力於對外民族戰爭，不如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使國人思想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途，而不必出以灰色與掩飾之辭。誠能如是，國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國家爲出發點，而其接近也自易矣。此所以促進全國之團結而利於抗戰之持久者三也。抑吾人所以爲此言者，皆根據近代立國之常軌而言，必如此而後抗戰乃勝，建國乃成，諒高明定能鑒察。蓋國家遭此大難，其存其亡，間不容髮，內部多一分誠意，即抗戰增一分實力。如公所謂動員民衆與政治民主化云云，非各方誠信既孚，決無實現之望。苟在 蔣先生領導之下，而別有一黨焉，自有黨軍，自有特區，自標馬克思主義，則先生所提出之「長期合作方式之民族聯盟」如何而有實現之可能乎？目前之障礙，既在此三點，應謀所以消除之，乃能達於真正之團結。吾輩既存心於禦外敵保祖國，而念念不忘者爲國家至上之一義，則何必沾沾於一黨一派之利益而不肯拋棄之乎？吾人讀先生報告以光明前途屬於國中各黨，因此不敢自安緘默，聊奉本先生所謂「互相規過是友朋間美德」之語，而竭誠言之，倘蒙採納，則精誠團結更進於今日，而一切鼓起民衆以共趨一的之效自見矣。非然者，仍今日之舊狀而不變，則精力之消耗於猜疑與磨擦中者，不知幾何？而天下後世必以抗戰之失敗歸罪於今日之黨爭是斷然矣。先生等近年愛民族愛國家之心爲有目所共睹，若能更進一步而圖之，豈獨抗戰之幸，中華民族萬年不拔之基，亦在是矣。專此敬祝 爲國努力！

（錄自國社黨機關刊物「再生」第十期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出版）

張君勳謹啓十二月十日

附錄三：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為抗戰兩週年紀念對時

局宣言

親愛的同胞們！英勇的將士們！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謹以無限之熱忱與興奮，紀念偉大神聖之民族抗戰的兩週年！

兩年來，我前方數百萬將士，以熱血頭顱抵抗暴寇，忠勇奮發，勞苦備嘗，當此抗戰兩週年之日，中共中央謹向蔣委員長及我保衛國土之忠勇將士，致崇高的敬禮。

兩年來，我數萬萬民衆及海外僑胞，萬衆一心，精誠團結，努力生產，協助軍隊，輸財輸力，支援前線；而在淪陷區域之同胞，雖身陷水深火熱之中，仍羣起抗敵，奮鬥不懈；中共中央謹向我全國同胞及海外僑胞致親切的敬意。

兩年來，在火線上，在敵機下，在敵人暴行中，萬千壯士，英勇捐軀，老弱婦孺，慘遭蹂躪，中共中央謹向我民族英烈致沉痛的哀悼，謹向英烈之遺族致親切的慰問！

兩年來，世界各國人士，或則主持公理，仗義執言，或則慷慨輸將，助我抗戰，或則抵貨拒運，制裁暴寇；中共中央謹向同情及援助我之友邦人士致敬佩的謝意！

同胞們！將士們！

民族解放戰爭的兩年，對於中華民族是奮發的，進步的，光明的兩年。偉大的民族戰爭，摧毀着千百年遺留下來的阻礙我民族前進與發展的許多阻礙，鍛鍊了全民族的精誠團結、進步統一，發揚了忠勇奮發威武不屈的精神，喚起了全世界的同情和景仰，粉碎了日寇速戰速決的狂妄企圖，奠定了繼續抗戰爭取最後勝利之始基，開創了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的遠景。

強盜侵略戰爭的兩年，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是黑暗的、困難與危機日益增長的兩年。兩年戰爭的結果，日本帝國主義者被迫地進入了心所不諳力所不及的長期戰爭中，差不多一百萬萬元的戰費，近百萬的傷亡，換來了廣大遼闊的戰區，處處遭受打擊的戰線，迫近危機的經濟狀況，孤立失助的國際地位，厭戰反戰日益蓬勃的民情，日寇正在這種國力消竭危機四伏的窮途上邁進。

兩年抗戰的結果，已經最鮮明的顯示了：只要堅持抗戰到底，鞏固團結統一，不畏困難，不懼險阻，力求進步，奮

門勿懈，那末，最後勝利一定屬於中華民族的，而最後勝利的時機，也一天天地更加接近了。

正因爲這樣，日寇在其速戰速決的戰略失敗之後，採取了速和速結的政略。近半年來，日寇在軍事上集其主力於一掃蕩上游擊區，對沿海各地作海盜式的襲擊，而在前線上的部隊只能保持相機進取的姿態，日寇侵略之現階段已側重於政治上誘降的陰謀來滅亡中國了，那狡詐無賴的近衛聲明，不過是這種陰謀的公開暴露。雖是這種聲明，僅獲得少數民族敗類的無恥響應，而爲全國人民偉大壯烈的巨吼所反對，然自此以後，日寇却更積極施行其政治上誘降的活動，它一方面利用喪失勝利信心，陰懷貳志的國內投降妥協份子，另一方面利用國際間對法西斯侵略者慣於妥協的反動力量，企圖以此來達到它降服中國的目的。

在日寇策動下，漢奸汪精衛之流，公然匍伏敵前，粉墨登場，爲和平之狂吠，作賣國之搨客。而國內投降妥協份子，則散佈謠言，煽惑人心，故意製造日寇可能放棄其滅亡中國之野心的夢囈，製造我軍力不足，財力不足與民心厭戰的胡說，散佈國際調解應予接受的空氣，散佈不亡於敵即亡於共的謬論。跡其種種論調與行動，無非是替日寇之誘降滅華爲內應，替漢奸之叛國親敵作聲援。蓋日寇視中國之進步與團結爲滅亡中國之最大障礙，乃不得不千方百計摧毀中國的進步，破裂中國的團結，而這些國內投降妥協份子，則起而應之，如捧綸音，蠢蠢欲動。他們暗藏於抗戰陣營之中，乘間抵隙，便利私圖，呼朋引類，奮其魔力。對抗戰之各種進步主張與措施，或消極怠工，或破壞搗亂。對一切進步的力量與團結，則肆意摧折，不遺餘力。對赤忱爲國忠貞正義之士，則視爲仇讎，排擊不休。對現代科學的進步思想與文化，則目爲洪水猛獸，毀之惟恐不力，去之惟恐不盡。對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與陝甘寧邊區，則更是他們造謠污蔑、攻擊陷害的對象，視之爲眼中釘，明攻暗毀，無所不用其極。對國家民族前途所賴的青年，則束縛其思想，桎梏其行動。而尤重要者，就是盡力分裂國內團結，製造糾紛，鼓動磨擦，挑撥內鬩。其所用手段，則爲偽造三民主義，以破壞革命的三民主義；加緊陰謀活動，以分裂國民黨；偽造情報，散佈流言，以破壞共產黨；造作事端，挑撥感情，以離間國共兩黨之團結，並引起國內各黨、各派、各界、各軍之間的嫌隙與裂痕。凡此所爲，或直接受命於日寇，或間接而被其利用，一言蔽之，以分裂達投降之目的而已。蓋不僅因爲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陝甘寧邊區乃堅持抗戰，堅持統一戰線

的重要力量，亦且因為國共團結乃民族統一戰線的骨幹，三民主義乃民族統一戰線的政治基礎，如不分裂這個團結，破壞這個基礎，就不能造成其投降乞和的條件，陰賊險狠，愈出愈奇，國人不能不深加注意了。

至於國際反動力量，那末雖然我國的抗戰獲得了世界各國人民先進人士的同情與援助，但是在帝國主義的反動營壘中却存在着鴿蚌相爭，漁翁得利的私利主義者，存在着想以中華民族為犧牲而與侵略者妥協的陰謀家，這些份子隨時準備重演慕尼黑罪行的而以中華民族為宰割之對象。此種現象現時雖尚未表面化，但暗中策動，漸見積極，稍不注意，便有被其牽入圈套之可能。

凡此所述，一則日寇政治誘降的惡毒陰謀，二則中國投降妥協分子之投降與分裂的罪惡活動，三則國際東方慕尼黑暗中醞釀；三者匯合，便造成今日抗戰形勢中的兩種最大危險，則中途妥協與內部分裂的危險。這就是今日政治形勢中的重要特點，可能的趨向。認清這個特點，克服這個趨向，才能使抗戰獲得勝利而避免悲慘的命運。

同胞們！將士們！

今日而與日寇言和平，就是屈膝投降；中途妥協，就是亡國滅種。日寇誘降中國的甜言蜜語，不過是滅亡中國吞併中國的釣餌。投降妥協份子的挑撥離間，分裂團結，防共反共，製造內亂，無非是出賣民族國家投降屈膝的實際準備。東方慕尼黑即令與西方慕尼黑有形式上之不同，而其實質亦將毫無二致。

同胞們！將士們！

我們以熱血頭顱所換來的抗戰的光輝成果，能讓投降妥協份子的罪惡活動所毀滅所斷送嗎？我們用全民族的努力所締結所公認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能讓投降妥協份子所破壞所分裂嗎？我們千百萬先烈的鮮血，能讓他白白的流去嗎？我們願意受日寇甜言蜜語的釣餌，而置國家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地嗎？我們願意作國際投機交易場上任人宰割的羔羊嗎？不，決不！

同胞們！將士們！

我們要：

堅持抗戰到底——反對中途妥協！

鞏固國內團結——反對內部分裂！

力求全國進步——反對向後倒退！

我們要繼續抗戰，抗戰到把日寇驅逐至鴨綠江的對岸！

我們要鞏固團結，團結得如鋼鐵一般的強固

我們要向前進步，進步到三民主義新中國的建立！

我們要反對投降妥協份子的罪惡活動！

我們要反對國際反動派的東方慕尼黑陰謀！

同胞們！將士們！

堅持抗戰，動員一切人力、財力、物力，展開全民族的全面抗戰，鞏固國內團結，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力求進步，澈底實行三民主義，建立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堅持反對投降，反對分裂，反對倒退，這就是全中華民族繼續努力的總方向。

同胞們！將士們！奮鬥吧！我們要勝利，我們無論如何要勝利，我們就一定能勝利！

擁護蔣委員長，擁護國民政府，抗戰到底！

擁護三民主義，擁護國共合作，精誠團結！

抗戰勝利萬歲！

中華民族解放萬歲！

（錄自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解放」第七十五、六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七日

第三十三章 陝甘寧邊區

一、邊區割據根源

抗戰爆發後，國共和平共存開始，中共雖然把陝甘寧邊蘇區，改爲國民政府特區，成立陝甘寧邊區政府，並由中共要角林伯渠、張國燾分任邊區政府正副主席（註一），可是，邊區的政制政策與政府迥然不同，除名義變更外，仍然保持蘇區時代的一切，邊區內部事務，國民政府無法過問，正如張浩所說：「蘇維埃暫時取銷，改爲特區政府，而實質的本性是未變的。」（註二）張國燾脫離共黨後也指責邊區政府說：「而陝北邊區則視爲外人租界，封鎖尤嚴。」（註三）這樣，邊區便成爲一個特殊區域，無怪當時國內輿論指責邊區爲新的軍閥割據與封建割據，國社黨領袖張君勱規勸毛澤東時也率直指稱：「各國之政黨，從無有佔領一特區以行特殊政策者，以一國之內惟有一種法律，一種行政系統，乃能成爲現代國家，……今吾國號爲統一，先生等亦以擁護國民政府自號於國中，而今則特區之內，儼然自成一天地，自立官制，自立稅制，自立學校。若國中凡組織政黨者，皆起而效法先生等之所爲，則中國將分爲若干政黨之若干行政區，而國家非返於封建割據之局不止矣。」（註四）

割據局面是封建時代的產物，軍閥割據則是民國以來，國家未能統一，各地軍人自立爲王的現象。中共效法封建割據與軍閥割據，乃根據其對中國社會政治現狀分析而來，中共認爲中國係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會，這種社會的中央政府，無法在實質上統一中國，必然形成各地軍閥的地方割據與內戰；同時，中國經濟發展不平衡，交通不發達，地理上大山連綿，山河交錯；農村封建剝削造成農民貧困與要求土地革命；在此一情勢下，可利用軍閥戰爭時機，利用政治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政治統治力量薄弱地區，軍閥割據交錯邊區，省與省交界地區及農民貧困的山區，建立根據地，造成局部割據局面，爭取一省數省革命的首先勝利。

中共這種割據思想，淵源於共產國際代表與共產國際傳授而來：遠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國民黨清黨後，形成國民黨武漢左派政權時期，共產國際代表鮑羅廷（M. M. Borodin）就主張到西北建立根據地，不過，當時被指斥為錯誤的「西北學說」；其實毛澤東後來逃竄至陝北，建立陝甘寧邊蘇區，正是鮑羅廷「西北學說」的衣鉢。一九二八年七月，在莫斯科共產國際直接指揮下召開的中共六大會，所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正式確定了中共的割據思想和路線，決議寫道：

「發展蘇維埃的根據地，奪取新的區域，鞏固新的區域，這種區域是要成爲更大的發展的基礎的。」「反動的統治在各區域鞏固的程度是不平衡的，因此，在總的新的新高潮之下，是革命先在一省或幾省重要省區之內勝利。」（註五）

決議案所指的蘇維埃根據地及一省數省首先勝利，就是中共邊區割據的根據和路線。

在這一決議指導下，中共的蘇維埃運動，在中南各地建立了七個蘇維埃的邊區割據。一九二八年十月，毛澤東還在井崗山時期，認爲所以能形成「湘贛邊界的割據」，是由於下列原因：

第一、「因為有了白色政權的長期的分裂和戰爭，便給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的共產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

第二、「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够長期存在的地方……而是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兩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工農兵士羣衆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所以廣州產生過三天的城市民衆政權，而海陸豐、湘東、湘西、湘贛邊界、湖北的黃安等地都有過農民的割據。」

第三、「小地方民衆政權之能否長期存在，則決定於全國革命形勢是否向前發展這一個條件。」

第四、「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

第五、「共產黨組織的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註六）

因而毛澤東對於這種割據抱着很大的希望，他說：「以寧岡爲中心的湘贛邊界工農武裝割據，其意義決不限於邊界數縣，這種割據在湘鄂贛三省工農暴動奪取三省政權的過程中是有很大的意義的。」（註七）

中共和毛澤東素來稱道中國歷史上的流寇爲農民戰爭，毛澤東當時的邊界割據與流寇行爲并無不同，與土匪佔山爲王的割據亦無二致，事實上紅軍的竄擾和掠奪，卽所謂游擊戰爭，就是土匪流寇的行爲，因而在紅軍中長期存在着流寇思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毛澤東就承認這種事實，他說：「由於紅軍中游民成份佔了很大的數量和全國特別是南方各省有廣大游民羣衆的存在，就在紅軍中產生了流寇主義的政治思想……故肅清流寇思想實爲紅軍黨內思想鬥爭的一個重要目標。應當認識，歷史上黃巢、李

闖式的流寇主義，已爲今日的環境所不許可。」（註八）

毛澤東反對流寇主義的主要方法就是建立根據地，即實行邊區的武裝割據，他認爲流寇之所以失敗，就是不重視邊區的割據，即不去建立鞏固的根據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澤東在「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寫道：「歷史上存在過許多流寇主義的農民戰爭，都沒有成功。在交通和技術進步的今日而企圖用流寇主義獲得勝利，更是毫無根據的幻想。然而流寇主義在今天的破產農民中還是存在的，他們的意識反映到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的頭腦中，就成了不要或不重視根據地的思想。因此，從游擊戰爭的領導者們的頭腦中驅除流寇主義，是確定建立根據地的前提。」（註九）

事實上，武裝割據及根據地思想也是流寇主義的一種，因爲土匪流寇都有根據地，毛澤東也承認這一點，他說井崗山「爲自來土匪、散軍窟宅之所，現在作了我們的根據地。」（註一〇）也就是說，當時井崗山是土匪土霸王、袁文才的山寨，毛澤東率殘部到了井崗山和這些土匪合流，才把這一土匪老巢更名爲「根據地」。抗日時期，毛澤東又說：「歷史上所謂『海盜』和『水寇』，曾演過無數的武劇，紅軍時代的洪湖游擊戰爭支持了數年之久，都是河湖港汊地帶能够發展游擊戰爭并建立根據地的證據。」（註一一）這又說明連海盜、水寇都有根據地，賀龍的洪湖游擊戰爭正是抄襲海盜、水寇的割據「武劇」。

中共和毛澤東雖然在口頭上一再反對流寇主義，但在實際行動上則是道地的流寇行爲，當時共軍的游擊和流竄，就是標準的流寇主義；因而井崗山的邊界割據不到一年半便失敗了，贛南的割據也僅僅維

持四年而放棄，開始了二萬五千里的長途流竄，其他如鄂豫皖邊區、湘鄂西邊區、川陝邊區的割據均先後慘敗，這就說明，這種土匪流寇式的封建割據或軍閥割據，其結果必歸失敗；中共最後殘存的陝北邊區割據，如非日寇侵略，必將同遭失敗，那是可以斷言的。

二、邊區共黨歷史

中共在陝北邊區的割據，是與邊區共黨歷史息息相關的。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高崗，在陝甘寧邊區黨高幹會上，曾發表題爲「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的演講，在這一爲期兩天（十七、十八兩日）的講演中。敘述了中共在陝西的發展經過，他說：

「陝西自一九二二年及二三年起，即已開始共產主義運動，當時由旅京旅滬陝西學生中最早的共產黨員和少共（S Y）團員，把共產主義思想散佈於陝西青年學生及文化界，先後在渭華交界之赤水職業學校，華縣咸林中學，三原渭北中學，西安一中及二中，綏德四師，榆林六中等校建立了黨和團的支部……黨內已湧現了當時知名的優秀政治活動家，如西安之魏野疇同志及陝北之李子洲同志等。

「大革命時期，陝西革命運動曾有很大的發展。一九二六年秋馮、于（按：指馮玉祥、于右任）入陝與西安解圍（西安被劉鎮華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圍起直至十月國民軍入陝始解圍），是陝西大革命高潮的標誌。當時北洋軍閥在陝西的支派劉鎮華、吳心田的勢力被驅逐了，代之以馮、于國民軍的勢力，馮、于在當時是代表國民黨進步勢力一方面的。因此，陝西由反動局面轉入革命局面，成爲西北以至整個北

方革命的中心，所謂『南有廣州，北有西安』，就是指當時陝西革命運動的發展，是可以與廣州相比擬的……。

「黨積極的參加了國民軍的政治工作，選派了若干幹部黨員到國民軍中去擔任政治工作，劉伯堅、鄧小平、李林、劉志丹等同志，都是當時參加國民軍政治工作者。同時西安創辦了政治保衛部及中山軍事政治學校，由共產黨員史可軒担任部長及校長……。」

「黨的組織於此時有大的發展，并在領導上也統一起來了。一九二七年春，開了全省黨代表大會，成立了陝甘區委，統一了陝北與關中黨的組織及領導。出版了黨報『西北人民』，黨員數量由數百人發展到數千人……。」

「總結大革命發展階段時，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但從另一方面來檢查，又是有缺點的。主要的缺點是：第一、黨在與國民黨統一戰線中有右的傾向，這就是以當時省委書記耿炳光爲代表的『只有團結沒有鬥爭』的機會主義思想……。」

「大革命失敗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曾在黨的工作方向上發生分歧……一部份黨員主張黨的方向應由城市轉入鄉村，應拿起槍桿子來進行武裝鬥爭，就是說，黨的方向應以鄉村與武裝爲主，劉志丹同志就是這一主張的代表，他爲這個問題曾和當時陝北特委書記楊國棟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但有不少的黨員，特別是當時的領導機關……他們在思想上是以城市與非武裝的祕密工作爲主的，這就一方面使黨不能聚集更大的力量於武裝活動方面，另一方面在當時無保障的脫離羣衆的祕密工作之下，使黨的

組織不斷的遭受破壞，一直到一九三三年黨的組織的大破壞……。

「這個時期，黨雖然確定了要進行武裝鬥爭……但如何進行武裝鬥爭，許多同志還是沒有經驗的。自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至一九三〇年，黨曾領導了許多次的武裝起義，著名的有清澗兵暴、渭華兵暴和柤邑農民暴動。清澗兵暴是一九二七年九月在唐樹、謝子長等同志領導下發動的。清澗李象九旅（當時李亦爲黨員）兵暴，暴動由清澗開始，南下進攻延長、宜川、韓城等縣，結果失敗……。渭華暴動是一九二八年四月，在劉志丹、唐樹等同志領導下發動的許全忠旅的暴動（當時許亦爲黨員，其基礎就是史可軒同志領導的中山學院學生及政治保衛隊隊員，後歸李虎臣編旅），發生於潼關、渭南、華縣一帶，暴動後建立了工農革命軍并發動了渭華廣大羣衆參加暴動，堅持了一個半月之久，最後在優勢敵人的圍攻中失敗了……。柤邑暴動是渭華暴動之後不久由許才昇同志領導的柤邑農民暴動，暴動的農民攻下了縣城并組織了蘇維埃政府……結果在地主豪紳以牢籠計誘殺了許才昇同志後就失敗了……。

「然而當時陝甘黨的領導機關，並沒有很好的認識到這些經過多次失敗所得來的教訓，相反的却執行了極『左』的立三路線。立三路線以杜衡爲首於一九三〇年秋組織行動委員會，毫無根據的要在關中陝北和甘肅建立三個軍，並提出於是年十月革命節召開陝西蘇區第一次代表大會的計劃。到處空喊暴動，甚至在西安市內也要號召暴動（當時西安只有二三十個黨員和數十個所謂赤色羣衆）。這些計劃有的因爲受到下級黨員的抵抗沒有實現，有的因黨根本沒有根據無從實現，所以沒有看到什麼暴動出現，反而使黨的組織受到很大的破壞。四中全會後黨開始糾正立三路線的錯誤……在這種情況下就使得黨內

滋長了一種右的傾向。這一傾向當時是以張文華、張資平等爲代表的，後來這一右傾思想又爲黃子文利用來一貫的進行反黨活動。……但這一右傾立刻受到打擊，一九三一年四月的省委全體會議堅決與這一右的傾向進行了鬥爭，開除了張資平、張文華等的黨籍，確定了游擊戰爭的方向，並於同年十月正式決定成立反帝同盟軍。」（註一二）

接着高崗敘述了反帝同盟軍的活動（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杜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與紅二十六軍的失敗（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三年七月），恢復紅二十六軍繼續展開陝甘游擊運動與反右傾鬥爭（一九三三年八月至一九三四年三月），郭洪濤「左」傾機會主義與反郭鬥爭（一九三四年三月至一九三五年五月）朱理治「左」傾機會主義與反朱鬥爭（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十月），以及肅反事件等等（詳「統一戰線」一章之第一、三、九節），最後，高崗作了如下的結論：

「從反帝同盟軍成立後整個創造紅軍與蘇區的時期，包括三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劉志丹同志爲代表的正確路線，另一條是以黃子文、黃子祥等爲代表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第三條則是從杜衡到朱、郭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這三條路線鬥爭中，與右傾的鬥爭，時間甚短，範圍較小，其危害也較輕；因爲這種右傾機會主義很快的爲黨克服了，並且已經做了結論。但與『左』傾的鬥爭就不同了，與『左』傾的鬥爭時間很長，範圍很大，其危害也極嚴重，並且至今還沒有做結論。所以現在我們應着重的來清算『左』傾機會主義。」（註一三）

三、邊區政府的演變

陝北共產黨從組織反帝同盟軍開始，雖然經過多年的游擊和竄擾，但共軍的力量一直是薄弱的，游擊部隊最盛時期不過三千餘人，號稱紅二十六軍，有時則打出二十六和二十七兩個軍的番號，藉以壯大聲勢。一九三五年九月，徐海東的紅二十五軍竄抵陝北，與陝北紅軍合編爲紅十五軍團時，據徐海東說才有七千餘人。同年十月，彭德懷、毛澤東的陝甘游擊支隊逃抵陝北時，亦僅殘存戰鬥部隊二千人，當時陝北共軍合計不過一萬人。直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張國燾所率紅四方面軍一萬人與賀龍之二方面軍二千人竄抵陝北後，整個紅軍部隊才有二萬二千人。

由於共軍兵力薄弱，一九三五年以瓦窰堡爲中心侷促於邊遠荒區。一九三六年二月，一度進擾晉西，五月即鎩羽而回。六月瓦窰堡爲國軍攻佔，乃西逃保安喘息。十月配合紅二、四方面軍北上，西窰寧夏受挫，遂又折返保安，準備分散游擊。當時設非西安事變，影響進剿國軍，則共軍之覆滅，已指日可待。

在國軍連續進剿與共軍不斷流竄情勢下，中共的陝甘寧邊蘇區，實際上就是共軍的流竄與游擊的區域，這種區域是流動的不固定的，有時範圍稍大，有時則縮小爲若干山區，如保安時期，所謂陝北蘇區僅殘存保安、安塞之一部及神木、府谷東南之一部，直到西安事變，共軍始乘機向外擴張，一九三七年一月且進駐延安，從此把國民政府所派各縣縣長驅逐出境，至年底佔有十五縣，一九三八年擴張爲十八

縣，一九四〇年佔有二十三縣，至一九四一年竟擴大爲二十六縣。一九四一年七月出版的「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關於邊區轄地有如下的記述：

「陝甘寧邊區轄有原陝西省屬的延安、安塞、保安、安定、靖邊、定邊、甘泉、鄜縣、延川、延長、綏德、米脂、清澗、吳堡、葭縣、神木、府谷、柁邑、淳化；甘肅省屬的慶陽、合水、鎮原、環縣、正寧、寧縣；寧夏省屬的鹽池等地。東靠黃河，北起長城，西接六盤山脈，南臨涇水……。」

「邊區轄地，是由內戰時蘇維埃區演化而來。邊區各縣，有的沒有全縣都建立過蘇維埃，有的雖建立過蘇維埃，却沒有鞏固，時進時退……。」（註一四）

其實邊區各縣，最大部份都沒有建立過蘇維埃政府，僅僅是當時共軍的流竄區域，即所謂「時進時退」的游擊地區；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所謂邊區係由「蘇維埃區演化而來」，同時又是侵佔擴張而來。其演變經過如左：

（一）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正當中共偏促保安時期，發出了「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書中鄭重聲明：「我們宣佈：在全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建立之時，蘇區即可成爲民主共和國的一個組成部份，蘇區代表參加國會，并在蘇區實行民主制度。」（註一五）這是蘇區演變的開始。

（二）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寫道：「因此，中國共產黨宣佈積極贊助民主共和國運動，並且宣佈民主共和國在全中國建立，依據普選權的國會實行召集之時，蘇維埃區域即將成爲它的一個組成部份，蘇區人民將選派代表參加國會，并

將在蘇區內完成同樣的民主制度。」（註一六）這是取消蘇維埃的先聲，也是蘇區演變的又一步。

（三）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七日，「中國共產黨中央給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電」宣佈：「蘇維埃政府改名爲中華民國特區政府」，「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註一七）這是取消蘇維埃的保證，也是蘇區演變的結果。

（四）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發表「共赴國難宣言」，宣言中鄭重宣告：「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註一八）這樣所謂蘇維埃和蘇區便成爲歷史名詞了。

「抗日戰爭爆發後不久（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就正式宣佈成立了。」（註一九）

四、邊區共黨大會

邊區政府成立後，名義上隸屬於國民政府，但因它是由蘇維埃政府演變而來，且依然是在中共絕對控制之下，以致國民政府無法過問，因而邊區的一切措施也不同于各省地方政府，形成了一個特殊區域和特殊的政權。

在這個特殊區域裏，邊區共黨成爲最高的統治者。不過，據高崗說，就在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邊區黨依然控制在郭洪濤的手裏，郭任陝北省委書記兼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以致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

安舉行的蘇區黨代表大會，高崗等人也被排斥於會議之外，直到一九三八春，郭洪濤調離陝北後，邊區黨才由高崗掌握，高崗出任邊區黨委書記。

據高崗說：一九三七年五月，邊區黨曾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邊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提出了『轉變與創立特區爲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範區域』的口號，這就是邊區共產黨的總方針。」（註二〇）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二月十日，邊區共黨召開了第二次代表大會，邊區黨委書記高崗在大會上作了關於陝甘寧邊區工作的總結報告，題爲「抗戰新階段中陝甘寧邊區的任務」，他在第一節「邊區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與共產黨保衛邊區的任務」中，強調了邊區的合法性和對前方工作的支援，他說道：

「由於日寇大舉進攻中國，由於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的正確，由於全國人民的要求與國民黨國策的轉變，遠在抗戰開始時，黨中央的代表就同蔣委員長商定，將陝甘寧蘇區改爲特別行政區，管轄二十三個縣，並直接歸國民政府行政院領導，并在二十六年冬季，經國民政府行政院正式通過了。

「從邊區抽調了數千百個有工作經驗的幹部到前線去。這些幹部，或者屬於黨的工作的，屬於軍事工作的，屬於政治工作的，屬於民運工作的，供給了前線的需要。

「經過八路軍，經過邊區派出的幹部，經過友黨友軍的以及其他各界的先進人士，把邊區游擊戰戰爭的、政府工作的、民衆運動的、文化教育的、經濟建設的經驗，傳播到戰區與後方，而對於變敵人後方爲前線，在敵後方堅持游擊戰爭和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偉大事業，給了很大的幫助。」（註二一）

高崗報告的第二節爲「進一步的鞏固邊區與提高邊區」，認爲邊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以後的兩年半以來，邊區的「民主政權更加鞏固了」，「抗日武裝部隊的戰鬥力是更加提高了」，「文化教育，主要的是小學教育比以前有了很大的發展」，以及「民衆抗戰動員的成績」等等，「我們已經可以作出結論，這就是：第一次代表大會交給我們的『使邊區成爲抗日的、民主的、模範根據地』的任務，由於黨、政、軍、民的努力，同時也由於中外許多先進團體和先進人士對我們的幫助，我們已經大體上把這個任務實現了。」

接着高崗提出了邊區黨的六大任務：

「一、進一步的鞏固我們的抗日部隊，使八路軍留守兵團提高到更加正規化的兵團，使保安部隊提高到正規兵團，使警衛部隊成爲政治上、軍事上堅強的部隊。」

二、鞏固邊區的民主政治，爭取全國憲政的實施。

三、進一步發展邊區經濟事業，並使之有利於廣大人民。

四、大大的加強文化教育工作。

五、進一步加強羣衆工作，鞏固羣衆組織。

六、加強鋤奸保衛工作，澈底肅清敵探奸細。」（註二二）

高崗報告的第三節，提出「進一步鞏固邊區黨」的任務，他說：

「在第一次代表大會到現在的兩年半內，邊區黨的建設，同樣有了很大的成績……以下的事實

，表現黨在兩年半以來重大的進步：

- 一、黨員的數量比以前增加了，黨的組織也增加了。
 - 二、大部份黨員，黨的幹部，黨的組織，從統一戰線鬥爭中鍛鍊出來了。
 - 三、洗刷了一批自首份子、投機份子、腐化份子與墮落份子。
 - 四、提拔了一批新幹部，提高了一部份老幹部。
 - 五、發揚了黨內民主，改善了黨的組織制度與組織生活。
 - 六、黨比以前更加團結，更加鞏固了。
 - 七、黨在羣衆中的威信大大提高了。
- 這一切，說明邊區的黨是更加布爾塞維克化了。

「然而，我們還要看到以下的情形……：

邊區內部商業資本和富農經濟的發展及其所引起的階級關係的變化，反映到黨內，開始發生着資本主義思想。小部份黨員和個別幹部開始發生着階級地位的蛻化，同時，資產階級營壘中的投降份子與反共份子，正在有組織有計劃的企圖混進我們黨內來，破壞我們的黨。

雖然一部份黨員一部份幹部，在文化上、理論水平上，較之過去是提高了，但是大部份的黨員、大部份的幹部，在這方面的進步還不够得很……：

「爲此，在我的報告中，須要提出如下的任務，作爲進一步鞏固邊區黨的基本方針：

一、繼續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審查黨員的成份，堅持黨內無產階級的布爾塞維克的純潔性。繼續揭露和洗刷暗藏在黨內的壞份子和奸細。應當及時的克服黨內開始生長着的資本主義的思想，同時對於在階級地位上開始發生蛻化的黨員和幹部，應當加緊教育他們，並在組織上分別採取謹慎的妥當處置。

二、提拔新幹部，提高老幹部，正確的團結新老幹部，適當的配合新老幹部的長處與克服彼此的短處。要採取必要的辦法，使縣級以上的領導機關及其他重要環節中，在最近時期內，對於實際工作有充分經驗的人和馬列主義理論有相當基礎的人，加以調劑和配合，這從黨的目前狀況說來，有重大的意義。

三、開展黨內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提高黨內切實執行黨的決議的統一的紀律，同樣是進一步鞏固黨的重要條件之一。

四、最後，而最重要的，是在全力提高黨員尤其幹部的馬列主義理論的水平，這是提高黨與鞏固黨的主要關鍵……」（註二三）

邊區共黨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了下列十項決議：

- 一、大會的總決議。
- 二、關於擁護和擴大八路軍的決議。
- 三、關於發展邊區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決議。

四、關於邊區徵收農業稅與商業稅的決議。

五、關於發展邊區教育提高邊區文化的決議。

六、關於開展衛生保健工作決議。

七、關於深入鄉村工作的決議。

八、關於審查黨的成份的決議（見附錄一）。

九、關於黨內幹部教育問題的決議。

十、關於開除蔡子偉、鮑立道、艾印三黨籍的決議。

大會同時發出「致中共中央賀電」、「致八路軍新四軍電」、「告全邊區民衆書」，以及「告邊區

全體黨員書」。（註二四）

至於陝甘寧邊區黨委委員，計有：高崗、張邦英、王若飛、高自立、曹力如、張慕堯、徐特立、劉景範、周揚、周興、劉錫五、王觀瀾、王世泰、毛齊華、雷經天、高望山、周月琴等人，其分工如下：

書 記 高 崗

組 織 部 長 張 邦 英

宣 傳 部 長 王 若 飛

統 戰 部 長 高 自 立

社 會 部 長 周 興

民運部長 王觀瀾

婦女部長 周月琴

青年部長 高望山

邊區黨委委員，從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次大會，至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次大會近三年期間，有不少的變動，如宣傳部長王若飛，在邊區工作兩年之後，於一九三九年他調。一九四一年一月新四軍事變後，中共中央設於各地之代表機關——各中央局及中央分局又有變動，在西北，則以陝甘寧邊區黨委爲基礎，設立中共中央西北局，其管轄範圍，除陝甘寧邊區外，中陝西省委，綏遠省委，甘肅工作委員會，寧夏工作委員會均歸西北局指揮，高崗亦由邊區黨委書記調升爲西北局書記。（註二五）

五、邊區參議會

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規定：中央設立國民參政會，各省則設立參議會；在這一規定下，中共統治的陝甘寧邊區，也在表面上與各省看齊，成立邊區參議會。可是，這一參議會的選舉，完全由中共控制和包辦，所產生的議員，也全部爲共黨黨員，與各省的參議會迥然不同，沒有其他黨派與社會人士參加，沒有民主政治的氣息，完全是共黨標榜民主的御用機構。

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一日，邊區政府曾頒佈議員選舉條例，同年冬選出了邊區議員，邊區參議會即由各地選出之議員複選一九七人及另聘十二人組成。其名單如下：

(一)延安市 高述先、姚安吉、李富春、高郎亭、高敏珍。

(二)延安縣 崔曙光、白如冰、賀斌、劉秉溫、王丕年、史正崗、胡起林、史俊英、曹惠德、

楊茂慶、王慶清、李興旺。

(三)甘泉縣 張曉初、曹仲權、王生海、李正榮。

(四)淳耀縣 習仲勛、封正保、彭德懷、王克仁、王子安、金鳳翔、李尙勤。

(五)曲子縣 遂月喜、馬文瑞、鄭志興、李建堂、劉伯承、裴明登、梁鈞、曹菊如、閻紅彥、

林伯渠、陶吉祥、張明輝、蘇耀亮、馬錫五。

(六)華池縣 李丕福、徐錫林、楊鳳鳴、李樹林、李興臬、趙騰光、劉景範、王忠鳴。

(七)鹽池縣 雷經天、王若飛、高自立、閻志尊、尙佐漢。

(八)延川縣 羅瑞卿、羅成德、李英勇、楊正喬、馬萬里、徐清、白棟材、常德義、李占江、

黃聚俊、劉志南、張青山、王花斌、花鳳英、郝玉良、馬學德、李其銳、王鼎勛、
劉志厚、王勝義。

(九)延長縣 白彥臣、崔維才、譚生成、譚生彬、薛占財、高克林、李景林。

(十)新正縣 郭正廷、郝明珠、霍維德、田仲陽、郭存信、李科、張化明、左懷玉、張如洲。

(十一)志丹縣 吳代峯、呂振球、曹力如、王士海、楊春春、周玉潔、趙玉文、李生枝、王耀華

(十二)神府縣 張季山、喬鍾靈、楊和亨、毛鳳翔、卻林英、武開章、賈懷光、王兆栢、馮開選、李旺懷。

(十三)安定縣 王朝璧、李鶴林、薛蘭斌、楊子玉、白卓武、李仲茲、李子原、南懷禮、路子良、郝寶民。

(十四)定邊縣 洛甫、高崗、莫文驊、周揚、毛齊華、王子宜、惠慶祺、王錫恩、曹占雲、韓月相、何其成。

(十五)新寧縣 毛澤東、王秉神、李積成、趙正富、郭秉坤、張自修、楊伯倫。

(十六)固林縣 趙正興、李育茲、馮蘭英、蕭勁光、趙振邦、白治民。

(十七)靖邊縣 馬明芳、賀龍、崔田夫、周興、高朗山、王治邦、呼自祿、雷思俊、侯殖民、王志福、賈蘭思、陳致中、謝文海、賈遵連、任仲彪。

(十八)環縣 劉瀾濤、李景膺、王觀瀾、王世泰、高百祥、趙耀光、劉昌漢、楊玉亭、陳聚奎。

(十九)安塞縣 林彪、賀晉年、白清江、馬龍彪、王懷義、曹九德、石子珍、高如山、劉子義、薛耀華。

上列名單，尚有赤水等縣參議員十八人及邊區政府聘請之參議員十二人未列在內。(註二六)
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在延安開幕，共計到參議員一四六人，選舉李富春

、林伯渠、高崗、高自立、霍維德、馬錫五、王子宜、曹力如、雷經天、劉景範、馬豫章、高敏珍、封正保、湯生斌、劉秉溫、周揚、毛齊華、周興、馬文瑞、陳伯達、喬鍾靈、王世泰、路子良、韓月相等二十五人爲會議主席團。

會議提前選舉高崗爲邊區參議會正議長，張邦英爲副議長。并組織大會祕書處，以曹力如爲大會祕書長。

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對參議會作了邊區政府的工作報告，會議通過了對政府工作報告的決議，通過了十二件提案及邊區地方各種單行法規。

參議會選舉林伯渠爲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高自立爲副主席，周興、王世泰、周揚、曹力如、劉景範、閻紅彥、雷經天、霍維德、馬錫五、王兆相、賀晉年、李子厚、喬鍾靈等爲邊區政府委員，雷經天爲高等法院院長。毛齊華、崔田夫、陳伯達、周長安、路子良、王觀瀾、高述先等爲參議會常駐委員。

會議期間，中共中央負責人毛澤東、王明、洛甫、康生、陳雲、王稼祥等均曾蒞會講演，會議至二月四日晚閉幕。（註二七）

林伯渠所作「陝甘寧邊區政府對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的工作報告」，透露了邊區如下的幾項事實：

（一）邊區人口將近有二百萬人。邊區可耕的面積，以延安等十八縣統計，共有四千萬畝，但已耕面積僅有九百萬畝，尚有廣大地面可供開發。

(二)邊區自衛軍有二十二萬四千三百二十五人，少年先鋒隊已有二萬八千零八十七人。兩年來動員自衛軍、少先隊八千餘名加入了抗戰部隊。

(三)邊區識字的人，平均起來只佔人口百分之一，亦即文盲佔百分之九十九。

(四)「目前邊區統計有七百個以上的鋤奸委員會，將達九千個的鋤奸小組，包含十萬多的鋤奸組員。」(註二八)

這種鋤奸組織，就是中共政權系統的特務機構，以十餘萬的特務人員監視和控制不足一百九十萬的民衆，在這種特務網與肅反恐怖威脅下，如謂邊區民衆尚有民主權利，尚可自由選舉參議員，那是無法理解的。正因為如此，所以謝覺哉說：「在不久以前，有不少邊區工作人員說：『民衆不要民主』，『民衆不了解民主』，『邊區民主還不是這麼一回事？』」。(註二九)，這就說明不是民衆不要民主，而是在共黨控制下和特務脅迫下，民衆不敢要民主，以免因要民主而招來殺身之禍。

謝覺哉進一步指出：「第一屆邊區各級參議會，雖然是普選，但非黨員和富有階級當選的很少，少得幾乎看不見。都是黨員，都是執行黨的決定，沒有異議，更說不上爭議，因此大家覺得議會可有可無。兩年來邊區各級參議會的不能按期開會及改選，這也是原因之一。」

「第一屆參議會聘了十位非黨的地方紳士，我們把他當傀儡，他們也自認爲傀儡，沒有什麼實際意義。」(註三〇)

從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副議長謝覺哉所說的一切，就可以清楚認識邊區的所謂民主是怎麼一回事了。

到了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延安又召開了邊區第二屆議會。參議會召開前半年，亦即準備改選參議員期間，中共中央西北局（發佈施政綱領時，為適應邊區關係，改用中共陝甘寧邊區中央局名義）於五月一日，發佈了「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並發出「關於發佈新的施政綱領的決定」。這一綱領除包含中共政策的若干轉變外，最主要的是強調三三制政權，施政綱領第五條寫道：

「本黨願與各黨各派及一切羣衆團體進行選舉聯盟，並在候選名單中確定共產黨員只佔三分之一，以便各黨各派及無黨無派人士均能參加邊區民意機關之活動與邊區行政之管理，在共產黨員被選為某一行政機關之主管人員時，應保證該機關之職員有三分之二為黨外人士充任，共產黨員應與這些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辦。」（註三一）

施政綱領發佈半年之後，舉行了邊區第二屆參議會，會議經過情形，中共中央在「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的經驗教訓」（參閱附錄二）電訊中寫道：

「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開幕，二十一日閉幕，共開會十六天。到會議員二百一十七人，其中共產黨員一百二十三人，國民黨救國會派一人，居住邊區的東方民族（日、韓、印度、荷印）及蒙、回、藏民族代表十人，其他非黨人士六十二人。議員由直接民選的一百八十三人（每八千公民選一人），由政府聘請的三十六人。地主士紳在這屆的議會中有相當大的數量，約佔全體議員人士五分之一。」

「大會主要議程為三年來政府工作報告，通過接受中共西北局提出的五一施政綱領，通過四十二年

度政府預算和關口稅收原則決議，通過許多重要法令如保障人權財產條例，土地租佃條例，債務條例，婚姻條例，各級參議會選舉條例，統一動員條例等；此外又通過各種提案三百八十餘件。最後選出議會正副議長（按：議長仍爲高崗、副議長爲謝覺哉）及常駐委員九人，共產黨員只佔三個，政府委員十八人，共產黨員只佔六個，真正保證非黨人士在民意機關及行政機關均佔三分之一。

六、邊區政府與三三制

陝甘寧邊區政府於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成立，經國民政府認可的負責人爲主席林伯渠，副主席張國燾。當時林伯渠忙於統戰活動，長駐西安，兼任八路軍駐陝辦事處主任，因而由張國燾代理主席，實際負責工作。

一九三九年一月邊區第一屆參議會，改選邊區政府，改選後之邊區政府及其各地負責人名單如左：

陝甘寧邊區政府

主席

林伯渠

副主席

高自立

委員

曹力如、周揚、劉景範、王世泰、雷經天、馬錫五、喬鍾靈、李子厚、周興、閻紅彥、霍維德、王兆相、賀晉年。

祕書長

曹力如

民政廳長

高自立

副廳長

艾楚南

財政廳長

張慕堯

教育廳長

周揚

建設廳長

劉景範

保安處長

周興

審計處長

曹力如

糧食局長

曹勝祥

邊區銀行經理

曹菊如

邊區醫院院長

歐陽鏡

邊區高等法院院長

雷經天

保安司令部司令

高崗

陝北分區專員公署

專員 王震

綏德縣

縣長 李鶴年

清澗縣

縣長 黃江

吳堡縣

縣長 張驊圖

關中分區專員公署

專員

霍維德

淳耀縣

縣長

郭存信（將淳化、耀縣之一部劃為淳耀縣）

赤水縣

縣長

王振熹（將枸邑及郿縣各一部劃為赤水縣）

新寧縣

縣長

屈繼君（將寧縣之一部劃為新寧縣）

新正縣

縣長

霍維德（將正寧縣一個半區劃為新正縣）

三邊分區專員公署

專員

王子宜

定邊縣

縣長

張曉初

靖邊縣

縣長

王治邦

新城縣

縣長

陳光亞

新安縣

縣長

薛堯華

赤環縣

縣長

費春圃

慶環分區專員公署

專員

馬錫五

環縣

縣長

楊玉亭

曲子縣

縣長

馬錫五（將環縣曲子鎮附近地區劃為曲子縣）

華池縣

縣長

徐錫林（將合水之東華池等地劃為華池縣）

隴東分區專員公署

專員

王維舟

慶陽縣

縣長

朱開銓（將慶陽縣驛馬關以北之地劃爲慶陽縣）

合水縣

縣長

高朗亭

鎮北縣

縣長

馮治國（將鎮原之馬渠、孟壩及固原之三岔等地劃爲鎮北縣）

邊區政府直屬縣市

神府縣

縣長

喬鍾靈

延安縣

縣長

劉秉溫

安塞縣

縣長

石子珍

保安縣

縣長

趙光祖

延川縣

縣長

常德義

延長縣

縣長

譚生彬

甘泉縣

縣長

羅思溫

安定縣

縣長

薛蘭斌

固臨縣

縣長

趙建國（將宜川之五六兩區劃爲固臨縣）

鄜縣

縣長

羅成德

延安市

市長

李景林

延長市

市長 李俊邦（註三二）

中共爲拱衛邊區，在延安設立十八集團軍後方留守處，以蕭勁光爲主任，并陸續從前線抽調一二〇師之三五九旅王震部及一二九師三八五旅王維舟部返邊區，組成留守兵團，加強防衛力量；另在邊區編組警備部隊與保安隊。警備部隊之番號與主官人員如左：

警備第一團 團長 賀晉年

警備第二團 團長 甘維漢

警備第三團 團長 閻紅彥

警備第四團 團長 陳光瑞

警備第五團 團長 白子文

警備第六團 團長 王兆相

警備第七團 團長 袁淵

此外爲劃分警備區域，設有如下之警備分區：

延安衛戍司令部 司令 滕代遠

綏米葭吳清警備司令部 司令 王震

鄜甘警備司令部 司令 文年生

副司令 陳光瑞

三邊警備司令部

司令 賀晉年

慶環警備司令部

司令 王世泰

神府葭河防司令部

司令 楊文謨（註三三）

邊區第二屆參議會改選邊區政府時，是依照當時中共所強調建立的三三制政權而改組的。所謂三三制政權，早在一九四〇年三月六日，毛澤東爲中共中央所寫的指示「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就曾這樣指出：

「根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權的原則，在人員分配上，應規定爲共產黨員佔三分之一，非黨的左派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間派佔三分之一。」

「必須保證共產黨員在政權中佔領導地位，因此，必須使三分之一的共產黨員具有優越的條件……。」

「必須使黨外進步分子佔三分之一，因爲他們聯系著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我們這樣做，對於爭取小資產階級將有很大的影響。」

「給中間派以三分之一的地位，目的在於爭取中等資產階級和開明紳士……。」（註三四）

邊區第二屆參議會開會時，毛澤東再度強調爭取中間階級和實行三三制政策的意義（參閱附錄二），甚至說：「我們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三三制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現在應在

參議會中好好實行起來。」

因此，在邊區第二屆參議會期間，邊區中共人員會使用一切辦法去打破黨外人士的疑懼，勉強吸收若干黨外人士參加議會和政權。然而細加分析，三三制依然是中共標榜民主的幌子，黨外人員不過是被利用的工具而已，因為第一，「必須保證共產黨員在政權中佔領導地位」，這種「保證」可用政權中共黨團（或稱黨組）控制的辦法，也可用共黨武力或特務脅迫的辦法來達到「佔領導地位」的目的，黨外人士在這種情勢下，除服從聽命之外，別無他途可走。第二，所謂三分之一的「左派進步分子」，當然是共黨的同路人，所剩三分之一的「中間派」，只能跟隨多數，被共黨牽著鼻子走，為共黨奴役賣命。第三，以後的事實證明，中共的政權由三三制轉變為人民民主專政，再演變為無產階級專政，所謂「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三三制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永遠不變的，顯然是一套欺騙黨外人士的謊言。

所以在邊區實行三三制五個月後，林伯渠在第二屆參議會常駐委員會上，所作五個月（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四月）的工作報告，就承認了如下的事實，他說：「有些地方三三制還不好得很！有些縣區鄉政府和參議會，其他黨派和無黨無派的人士，還佔著極少數，有的還幾乎是清一色，而某些機關裏雖然形式上實行了三三制，但是有少數幹部，還有把持包辦的現象。」（註三五）

七、邊區的擴張與糾紛

由於邊區政府積極向外擴張，蠶食鄰縣，遂與邊區周圍引起不斷糾紛。當時邊區政府擴張的手法，

大體係以武力進駐各縣，製造事件，收繳保安隊槍枝，驅逐國民政府與國民黨之黨政人員，然後派出中共之黨政人員接管縣政，於是該縣或該區便併入邊區政府管轄範圍了。

據「陝甘寧邊區實況」載稱：「雙十二事變解決時，中共盤據地區僅延安、安塞、保安、安定等縣之一隅，旋乘機擴張，自稱邊區爲十三縣，二十八年秋，以武力攻略隴東，二十九年春又佔綏德區各屬，然後復提出保衛邊區二十三縣之完整口號，是以，邊區已由三數縣之一隅，擴張爲十三縣，復由十三縣擴張爲二十三縣。二十三縣總面積合計爲六十四萬八千九百八十里。」（註三六）

由於邊區擴張而引起之糾紛，較大者有如下各件：

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爆發柤邑事件：該縣駐有八路軍獨立第一營，該營於五月二十三日函告縣政府略稱：有十八集團軍第一一五師留守處探買陳應通，於柤邑縣甘峪村被人以槍擊斃，要求縣府調查處理。同日乘縣城東南廟會，八路軍派員登台演講稱：「最近柤邑縣城內，發現多數托匪漢奸，對八路軍肆意攻擊，另發現暗殺團二百餘人，意圖殺盡八路軍，我們一定要打倒這些漢奸」云云。旋即在張洪鎮一帶捕去王某等四人，指爲土匪，其中三人解往延安後槍決。在城內捕去杜某一人，指爲托匪漢奸，六月間被埋於看花宮。二十五日八路軍再派代表持函至縣府，指明陳應通係被縣保安隊分隊長郭景汾派兵所刺殺，隨即派兵進攻縣府，駐守北、東、南各城門樓之八路軍獨立營，亦協同攻擊縣府，縣府人員及保安團隊乃退守碉堡待援，八路軍遂乘機攻入縣府及其他黨政機關，大肆掠劫。延至三十一日，國軍援兵馳救，八路軍始退離縣城。（註三七）

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九日發生酈縣事件：酈縣原駐有八路軍特務團，分踞城廂各地，一九三九年八月，該縣之永平、榆林橋兩區聯保主任爲共軍逐走，并藉口「民衆要求」，侵佔爲邊區疆界。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共軍藉口共黨區委委員劉忠被打傷，向大義、阜財、加興各區進攻，拘捕保安分隊長王子玉，保安隊長韓振江，入晚包圍縣府，擄走縣長蔣隆珽，保安團隊全被繳械，縣府公私財物亦被搶劫一空，酈縣全縣遂落入共軍之手，被俘之蔣縣長遲至四月，始於繳納「罰款」七千元後獲釋。（註三八）

一九四〇年二月爆發綏德事件：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共由河西調一二〇師王震部四個團回駐綏德，旋以「破壞統一戰線」、「製造磨擦」爲藉口，要求天水行營及陝西省政府撤辦專員何紹南，并提請行政院委王震接充該區專員。二區專員何紹南因共黨之攻擊辭去專員職務，省府乃決定以包介山接替，何當於二月二十一日返綏辦理交代，共黨遂發動武裝游行示威，聲言「捉拿犯官」何紹南，專署方面，當即戒備，雙方進入備戰狀態。同時林伯渠、蕭勁光又電天水行營及陝西省府，反對包介山接任二區專員，堅決要求以王震充任。二月二十六日即捕去綏德義合鎮聯保主任武啓友，保長平侯、馬德麟，并槍殺保安第七團團部副官劉成祥。二十七日又將吳堡宋家川、綏德義合鎮、安定棗林坪三處保安隊包圍繳械。二十九日專員包介山率保安第三第十兩中隊撤離綏德，沿途遭王震部六次襲擊，保安隊被擊潰；前任專員何紹南亦率隊撤離，同遭截擊，三月一日始退至榆林鎮川堡。綏德遂被共軍佔領，劃入邊區範圍，并自行委任王震爲該區行政專員。（註三九）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七日侵佔吳堡：共軍於二月二十七日將吳堡宋家川保安隊包圍繳械後即將吳堡縣黨政人員全部逐出，佔領吳堡并劃入邊區範圍。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八日攻佔安定：二月二十八日共軍向安定進擊，該縣保安隊奮起抵抗，終以衆寡懸殊，忍痛退出。惟縣屬老君洞地方民衆及哥老會，以平日憤恨共黨壓迫，自動集合武裝二千餘人，抗擊共軍，激戰兩晝夜，亦以彈盡援絕，退出縣境，該縣遂爲共黨全部佔有。

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八日佔領清澗：八路軍營長鍾善聲，以哨兵被擊傷爲藉口，於二月二十八日夜二時半，率部包圍縣政府，擄去縣長李鵬飛，繳去長短槍二百二十枝，保安第七團第八中隊自清澗奉命返綏，途中亦遭襲擊，損失慘重。

一九四〇年三月五日攻佔延川：共軍旋又於三月五日上午十二時包圍延川縣政府，保安隊兩班被繳械，縣長被扣，縣府財物印信被搶一空。（註四〇）

此外尚發生隴東事件：緣八路軍駐隴東部爲一二九師三八五旅王維舟部及歸該旅指揮之警備第七團袁淵部，該部分駐慶陽、鎮原、寧縣、合水各地後，卽不時襲擊各縣保安隊，進而擴張地盤。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駐寧縣共軍警七團羅營，藉口該縣直溝村抓烟民案，向保安隊開槍，并圍攻縣府，雙方激戰至十六日，羅營始不支退去。

駐合水、華池之警七團汪營，於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日，干涉區署傳戒烟民，綁架區長、校長及區署人員，并繳去保安隊槍二十枝。十一日晚復將縣府及保安隊包圍開槍射擊，保安隊傷亡二十四人，縣府

會計馬世俊、收發王祥波、縣黨部幹事柳春榮、第一區區長張志誠、社訓教官潘桂藩、保甲督導員蔣震寰等十八名均受重傷，縣署被攻佔後，搶掠一空，並於十五日予以焚燬。十七日又將縣府翟縣長等十八人綁架至慶陽，囚於田家城三八五旅旅部，從此，合水全被共軍侵佔，納入邊區政府範圍。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共軍三八五旅七七〇團王營，向鎮原縣府及保安隊包圍攻擊。雙方激戰，相持至十六日王營始退去。十五日駐慶陽共軍三八五旅派隊將縣府（時設慶陽西峯鎮）駐慶陽辦事處主任捕去，二十日將辦事處劉副主任、書記及區署職員、梁巡官與防空哨兵十一人綁去，並將辦事處與區署洗劫一空。（註四一）

八、邊區栽種鴉片真相

中共控制的各邊區，其所作所爲，國人所最不能寬恕者，厥爲種植鴉片，荼毒人民。緣禁絕鴉片爲國民政府之政策，抗戰期間，我抗日大後方查禁烟毒尤嚴，鴉片之種植運銷業已絕跡；惟在日軍佔領地區，亦即汪偽漢奸統治區域，則公開種植經營與吸食鴉片，今陝甘寧邊區與華北華中之所謂敵後邊區，中共竟仿效日偽漢奸，鼓勵種植與運銷鴉片，其爲國人所譴責，乃屬理所當然。

當時中共之各邊區，其所以鼓勵種植與經營鴉片之目的，在於增加財政收入，「淮太西縣煙土稅收與管理暫行辦法」（參閱附錄三）則稱之爲「加強對敵經濟鬥爭，減輕人民負擔，管理烟土出口，爭取必需品的收入」。

管理辦法中規定「設立烟土總行，統一管理烟土行之經營與稅收事宜」，辦法中對烟土之買賣與徵稅，積極予以鼓勵，規定烟土行戶「介紹成交，可按買賣各給三分紅利」，「可按代收烟土稅總收入百分之十作為酬金」。至於烟土之買賣，僅須領取許可證即屬合法。在此一獎勵下，中共之敵後各邊區與日汪統治區域無異，即罌粟遍地，烟行林立，其為害之大，實不可言喻。

陝甘寧邊區雖鄰接國民政府統治區域，惟中共仍悍然罔顧國法，栽種鴉片，經營烟毒，詳細情形，當時之「西安晚報」曾有如下報導：

一、「栽種的區域——中共種烟區域甚廣，以晉北及陝北各縣為最普遍，為欲掩蔽耳目，所種之地，多在距離交通大道較遠之偏僻處，尤其對我方接近之地區尚未敢種。總計已種之縣份，在晉北方面有河曲、保德、偏關、神池、寧武、五寨、平魯、朔縣、崞嵐等九縣。河保區神、寧、五、平、朔、崞等縣，誣稱中央命令種植罌粟（即鴉片），並對其在大青山一帶及敵區運回之種子，亦誣為中央所發給；初時尚避開交通大道，佯作種棉之宣傳，以掩人耳目，繼則不顧一切，明目張膽，隨處播種，在平、朔、神、寧之山地一帶，凡園地營地，悉令播種，否則由公家勒租，在河、保、偏、崞等縣，均遍地種植，在河曲附近縣城之南北園與焦委城、樓子營等各村莊，亦悍然不顧，廣為種植。甚至將已下種之麥地，亦重行耕種罌粟。在陝北方面，已種之地區有十八縣，經調查確實者，可述如下：（一）葭縣：三月間，中共駐葭決死四縱隊，派兵至倍子鎮及亞水坑鎮，租民地與人民夥種鴉片，經我縣府派祕書王天一實地查勘，如南區沿黃河一帶，正在下種。木頭峪發現烟苗十餘畝，蝟峪、荷葉坪附近亦有種者。（二）靖邊：

中共在靖邊所佔領之地區以內，共有烟田三千六百餘畝，恐我方制止，特派大批保安隊警備部隊保護播種，偽靖邊縣政府曾派人運來罌粟籽四馱，約二石餘，在楊橋畔、張家畔東五十里一帶播種。(二)橫山：在橫山所屬八岔把、免灘、楊田、台紅、通界及洞口一帶大種鴉片，並派八路軍某部康團參謀劉榮負責指導。(四)安定：偽安定縣政府最近通令，除靠近我方邊界之地區如喇峪岔區、南溝岔區、李家岔區不許種烟外，其餘各地，均須廣為栽種，沈家灣、薛家渠一帶所種尤多，并向民衆徵收羊糞、肥料，一般愚民均栽種。(五)此外偽邊區各縣中尚有米脂、綏德、吳堡、清澗(營畔村一帶)、保安、安塞、延川、延長、延安、宜川、龍泉(臨鎮川一帶)、鄜縣、宜君(馬欄鎮一帶)、耀縣(柳林一帶)等，均有種烟確報。

二、「種籽的來源——其種籽，由中共從山西購買運陝分發，每村指定一人承攬，向偽政府負責，借給居民播種，每戶可得種籽二兩，有不够者，則到其他地區偷購。又靖邊偽縣政府，為搜取鴉片種籽計，令人民以烟籽一升，抵繳救國公債米五升，聞已徵到數斗，連同山西運到，約六石餘，分發人民，廣為栽種。至延安方面，二月間亦已由山西運到烟籽一批，並將老弱殘廢之士兵，組織種烟工作隊，每隊六十名，從事種植。另據延安偽第十八兵站之工作人員稱：該兵站所轄之烏鎮方面，曾派人下鄉收買烟籽，每升一百元，運往延安分發各地栽種。

三、「掩飾的技倆——中共於栽種鴉片所作之宣傳，約有如下數點：(一)偽稱中央停發各軍抗日餉項，前方將士無法抗日，故下種大烟。(二)偽稱中共中央華北局為解釋種烟一事，曾經製發傳單，其所據

之理由爲：(1)抗戰期間，不能斷絕鴉片，年來邊區鴉片，多係由敵區輸入，現金及法幣流出者甚多，故須在邊區自種。(2)中央對邊區財政不予接濟，抗日經費至感困難，故須種烟，以增加邊區政府收入。(3)人民經濟困難，種烟一次，在二年以內，所有一切虧空，即可彌補。葭縣中共放種鴉片後，我張縣長即出示禁止，并派秘書王天一去南鄉，實地查剷烟苗，在木頭峪村發現烟苗十餘畝，當即召集民衆，勸導剷除，中共密由喇峪鎮調來步兵一營，乃將王天一扣留辱罵，經紳士苗樂山勸解，始行釋放，現該軍仍留當地，保護烟苗。

四、一抽稅的比率——中共爲鼓勵邊區人民種烟起見，僞邊區政府，近下令邊區內今春栽種鴉片，其徵稅法規定在平原地帶，水田烟收十分之五，旱田烟收十分之四，山區地帶水田烟收十分之八，旱田烟收十分之七。晉西北方面，在河、保、偏一帶，係地戶四成，公家六成，惟種籽及所有人工等，均須由地戶負擔，并有對地戶所得四成烟土，均令買成銀幣，而公家又以僞農票將銀幣換回之。

五、一販運的路線——邊區保運商民鴉片，係由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主持，每月繳邊區財政廳包運所一百二十萬元，每兩烟土收保運費九十元，而財政廳弊端，每兩烟土收登記費七十五元，過境稅二十元。其運輸線有二：(一)由邊區運至宜川韓城；(二)由邊區運至耀縣柳林。去年十二月間，僞邊區政府即由延安運來大批烟土，交由鄜縣士紳趙某發售，已納稅者每兩售八十元，未納稅者每兩七十元，企圖設法偷運我方推銷。中共爲掩護鴉片之收割，一面拒絕中央所派禁烟委員入邊區視察，一面又製造謠言，謂中央將以武力進入邊區，實行剷除烟苗，藉此爲煽動之資料，動員武力，保衛邊區。賀龍

所部一二〇師，近自晉西北紛紛調回陝北鄜縣甘泉一帶，保護收烟，近爲企圖遮掩耳目計，將交通大道兩旁烟苗剷除，但將各山頭出入之路口加以封鎖，以便在山溝間種收鴉片。去年九月間，中共由山西磧口、臨縣運至米脂鴉片甚多，每百兩取運費六百元，均用武裝保送，并於綏德成立官膏公售所，以故烟禁大開，每兩貼稅票八元，即可暢行。又隴東寧縣孟壩鎮，近由合水運到大烟一千兩，即在孟壩鎮設立烟膏店一所，公開出售，每兩定價二百五十元，并藉脚伕運鹽之便，偷運至我方銷售。

「以上五者，均係本社通訊員報告之事實，有根有據，至爲確鑿，本社敢對全國同胞負法律上之責任，決無誣枉情事，倘中共否認此等確鑿之事實，本社願請全國同胞向中共當局建議：

(一) 允許後方民衆團體組織烟毒考查團，前往陝北偽邊區各地視察，不得故意阻止。

(二) 保障烟毒考查人員生命之安全，不得設計加以陷害。

「目前正值鴉片結果時期，諺謂：『心中非冷病，那怕吃西瓜』，其果能允許後方同胞派人前往視察，而視察結果，又無栽種事跡，則本社自願賠償其名譽損失，受國家法律之制裁，惟全國同胞共鑒之。」(註四二)

在輿論的催促下，國民政府對邊區之種植與運銷鴉片，自不能不採取措施，乃於一九四三年四月，準備派內政部陝豫甘寧綏烟毒檢查團赴陝北實地調查，先由陝西省政府於四月九日電知十八集團軍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不料蕭勁光竟於二十一日復電拒絕，原電稱：「查邊區烟毒，早經禁絕，去歲曾有一時，由鄰區措運鴉片過境，邊區政府爲嚴密防堵起見，特於本年二月成立禁烟督察處，頒佈辦法，厲行

查禁。尊處實無派人前來之必要。近據報鄰近邊區各省罌粟遍地，影響民耕，敬請貴府多派員查禁爲荷。陝西省政府接電後，當即電復解釋稱：「查內政部陝豫甘寧綏區烟毒檢查團，并非由本府組織，乃中央派來西北各省普遍檢查，并非專查貴軍駐在地方，仍請尊重中央命令辦理，俟該團第二組人員到達時，飭屬協助保護，以利工作。至來電謂鄰近邊區各省，罌粟遍地，影響民耕一節，查本省所屬各縣，禁種早告完成，現值春烟出青時期，又已訂定辦法，通飭各縣普遍勘查。陝北之府谷、神木、耀縣、宜君等縣，本府并已遴派委員前往督導查禁，迄未發現偷種烟苗情事，未審所指係在何地？除先電達內政部陝豫甘寧綏烟毒檢查團第二組查照外，仍請迅即電復，以便轉知起程爲荷。」孰料蕭勁光態度固執，仍悍然復電拒絕檢查，電文稱：「查邊區烟毒，早經禁絕。去歲曾有由鄰區運烟過境者，邊府爲嚴格取締計，特於本年二月成立禁烟督察處，頒法查禁，嚴予執行。貴團派員檢查，勁光當表歡迎。惟邊區境內檢查之責，應由邊區自負。貴團如專派大員，恐係徒勞。抗戰人力，自宜用儉，是否之處，尙祈鑒諒。」（註四三）

在中共的堅拒下，政府的烟毒檢查團自然無法成行，不過，從此亦可瞭解陝北堅拒檢查之原因所在了。

註 一：「蘇俄在中國」第八十三頁載稱：「陝甘寧邊區政府山林祖涵與張國燾分任正副主席」。

註 二：一九三七年張浩（林毓英）在「抗大」之講稿「中共黨的策略路線」。

註 三：「張國燾敬告國人書」，一九三八年五月二日漢口「掃蕩報」。

註四：國社黨張君勳致毛澤東的一封信，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再生」第十期。

註五：「中共六大會政治決議案」，「中國問題指南」第二冊。

註六、七：毛澤東「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麼能夠存在？」，「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五一、五二、五四頁。

註八：毛澤東「關於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九七頁。

註九：毛澤東「抗日游擊戰爭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四〇九頁。

註一〇：毛澤東「井崗山的鬥爭」，「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七〇頁。

註一一：同註九，「毛澤東選集」第二卷四一一頁。

註一二：高崗「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檢討」第二一一二頁。

註一三：同上書第三九一四〇頁。

註一四：「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二十八年—三十年）」第七七八頁，一九四一年七月邊區政府祕書處發行。

註一五—一七：「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一冊。

註一八：「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二冊。

註一九：「抗日戰爭時期解放區概況」第六一七頁，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註二〇—二三：「抗戰新階段中陝甘寧邊區的任務」（邊區共產黨書記高崗同志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在邊區共產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關於陝甘寧邊區工作的總結報告），「解放」第九十五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延安解放社出版。

日延安解放社出版。

註二四：「中國共產黨陝甘寧邊區第二次代表大會文件彙輯」，「解放」第九十五期。

註二五：陳然轉據涂振農所提供之資料。

註二六：華統編「陝甘寧邊區全貌」第一七一—一八頁，一九四〇年重慶出版。

註二七、二八：「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特刊」，「解放」六十八期，一九三九年四月四日延安出版。

註二九、三〇：謝覺哉「邊區政權工作經驗的點滴」，載「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附錄，第二二二、二二六—二二八頁。

註三一：「陝甘寧邊區施政綱領」，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五日「解放」第一二八期。

註三二：「陝甘寧邊區實況」第八〇—八六頁，中國國民黨中央調查統計局編。

註三三：「陝甘寧邊區全貌」第一—八頁。

註三四：毛澤東「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七三六頁。

註三五：延安中共中央致各地黨部通電，載「中共文電彙輯」第五輯。

註三六：「陝甘寧邊區實況」第八九—九〇頁。

註三七：取材於「陝甘寧邊區全貌」第一三七—一四四頁。

註三八：「陝甘寧邊區實況」第二五一—二五九頁。

註三九：「陝甘寧邊區全貌」第一四六—一四七頁。

註四〇：同上書第一四七頁。

註四一：「陝甘寧邊區實況」第二六五—二七〇頁。

註四二：摘錄自「中共栽種鴉片的真相」，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十日「西安晚報」。

註四三：三電電文均引自「罌粟遍地的陝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之油印本。

附錄一：關於審查黨的成份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陝甘寧邊區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

一、審查黨的成份的堅決方針

一、爲着鞏固黨，必須詳細的審查黨的成份，清洗混入黨內的異己份子（地主、富農、商人）、投機份子以敵探奸細，但是這種的審查不應當成爲普遍的清黨運動」。這是中央關於鞏固黨的決定所指示的方針，今後邊區各級黨部和全體黨員必須澈底的執行黨中央這一正確決定。繼續的堅決的肅清存留在黨內的壞份子。每個黨員應有高度的警覺性和責任心，爲肅清黨內的壞份子而鬥爭，爲保持黨的無產階級純潔性而鬥爭！

二、審查黨的成份必須嚴格的慎重的處理

資本主義思想（個人發財的思想）在黨內的影響，是黨在新的環境中產生的新問題，我們必須深刻的認識這種新的現象給予黨的危殆的嚴重性。對於隱蔽黨內的壞份子（叛變自首份子、地主、富農、商人、投機份子及受資本主義思想毒害最深不可救藥的份子），嚴格的執行黨的紀律。對於這些人應該分別的一個一個的加以審查，將那些真正不配當黨員的人，堅決的洗刷出黨，以教育黨員和羣衆，是絕對必要的、正確的。對於黨內因邊區經濟發展改變了階級成份的黨員幹部，必須慎重處理，不要隨便亂戴「資本主義思想」的大帽子，致引起黨內恐慌。對於參加黨已久而工作積極的黨員，雖是由地主富農出身的成份亦不能加以異視。同時，我們在審查過程中，要謹防敵人的挑撥離間，陰謀破壞。至於某些個別的黨員幹部，因成份改變而發生錯誤的思想行動，主要的應採取教育方式，進行黨內嚴重的思想鬥爭，迅速糾正他們的行爲。

三、審查黨的成份的具體辦法

甲、審查黨的成份必須與深入的檢查工作配合起來。提倡幹部以身作則的自我批評精神，澈底發揚黨內民主；加強黨務委員會工作，健全黨的各級領導機關，舉行民主的改選，保證黨的各級領導機關掌握在經過考驗的幹部之手中。

乙、目前中農爲邊區黨的主要成份，應重新規定審查成份的標準。確定成份必須具體確實。爲防止資本主義思想在黨內的生長，必須加強黨內馬列主義教育，禁止黨員收回土地或者做私人發財和人剝削人的事情。

丙、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審查配合起來。在審查中如發現有應開除黨籍或予以適當處罰者，必須經過一定組織，一定手續。由下級黨部提出具體意見，經各縣委、各分委負責審查，得到邊區黨委的批准。在開除或處罰黨員時，應通知他本人參加會議。如被處罰者本人不服，可以向上級黨部申訴。

丁、某些幹部因經濟地位變動，工作情緒低落者，必須進行教育并予以適當的處理。

四、審查黨的成份應注意羣衆的意見

黨必須深入羣衆，依靠廣大羣衆，在羣衆鬥爭中審查黨員幹部的思想行動。黨員幹部爲羣衆所不滿所反對者，黨必須檢查其工作，進行黨內思想鬥爭，毫不姑息的執行黨的紀律，予以適當處置。大膽的提拔爲羣衆所擁護所心悅誠服的黨員幹部，因爲黨的利益和羣衆利益完全是一致的。在審查黨的成份鬥爭中，必須吸收羣衆在鬥爭中的積極份子入黨，培養黨在廣大羣衆中的深厚基礎。

（錄自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三十日「解放」第九十五期）

附錄二：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的經驗教訓

（一九四二年一月八日中共中央發給各地黨部全字第二十六第二十七號密電）

一、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於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六日開幕，二十一日閉幕，共開會十六天。到會議員二百一十七人，其中共產黨員一百二十三人，國民黨救國會派一人，居住邊區的東方民族（日、韓、印度、荷印）及蒙、回、藏民

族代表十人，其他非黨人士六十二人。議員由直接民選的一百八十三人（每八千公民選一人），由政府聘請的三十六人。地主士紳在這屆議會中有相當大的數量，約佔全體議員人數五分之一。

大會的主要議程爲三年來政府工作報告，通過接受中共西北局提出的五一施政綱領，通過四十二年度政府預算和關稅收原則決議，通過許多重要法令，如保障人權財產條例，土地租佃條例，債務條例，婚姻條例，各級參議會選舉條例，統一動員條例等；此外又通過各種提案三百八十餘件。最後選出議會正副議長及常駐委員九人，共產黨員只佔三個，政府委員十八人，共產黨員只佔六個，真正保證非黨人士在民意機關及行政機關均佔三分之二。

二、這屆參議會，從其議員的成份與整個會議的精神，完全不同於三年前第一屆參議會，第一屆參議會完全是由黨包辦，臨時聘請八個非黨人士參加；而本屆參議會是召集在我黨三三制政策提出與五一施政綱領頒佈之後，是要切實執行下述政策，進一步去團結邊區各階層人民，並促進全國民主政治與團結抗戰，正如毛澤東同志在這次參議會開幕演講中所說：

「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都是佔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中間階級的利益，如果中間階級不得其所，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

「共產黨提出的三三制政策及其他各項政策，都是爲着團結一切抗日人民，顧及一切階級而特別是顧及中間階級的。共產黨提出的三三制政策，是使各界人士都有說話機會，都有事做的政策。共產黨人必須傾聽黨外人士意見，給別人以說話機會，別人說得對的，我們應該歡迎，應跟別人學習，別人說得不對，也應讓說話人說完，然後慢慢加以解釋。

「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

「共產黨員應站在民衆之中，而決不應站在民衆之上。」

「我們這個同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三三制原則是固定不移的，是永遠不變的，現在應在參議會中好好實行起來。」

這就是本屆參議會工作的方向。

三、這屆參議會使邊區的黨經過了一次很大的民主學習，在爭取中間力量，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與實行三三制政策上獲得極大的經驗與成績，表現在如下的事實：

第一，爭取中間力量的成功。邊區是經過土地革命的區域，地主農民間成見較深。這次到會的非黨人士，絕大多數是各縣知名士紳，他們的當選，主要是由於黨的工作佈置，其未被選上者，則以聘請來調劑；他們之願意來延，又是由於五一施政綱領之影響及邊區政府在參議會開會前曾殷勤招待，請各縣士紳來延參觀，改變他們對我疑懼的觀念。而此次開參議會時，又給予周到的供應，但在他們初到時，多數疑懼是請客作用，裝飾門面，十分顧忌不敢說話；存在他們心中想解答的問題是我們能否言行一致，上下一致，公平斷案，公平負擔，保障他們的人權財權；他們特別憂慮將來如果國共分裂時，我們是否仍要打土豪分田地。及至聽了毛澤東同志的開幕詞，給他們以光明偉大的印象，西北局又反復的指示參議會的黨員要誠懇的與非黨人士接近，鼓勵非黨人士對各種問題多發表意見，於是他們許多意見才敢吐露出來。同時政府主席林老虛懷若谷請求非黨人士盡量批評的表示，西北局書記高崗同志在解釋五一施政綱領時，負責聲明：我們始終堅持國共合作，即令一部份反共頑固份子要分裂，仍堅持與其餘不願分裂者合作，并鞏固與多階層的團結，保障地主農民現在的土地所有權。最後，在選舉結果共產黨人超過三分之一，自請退出，而以非黨人士補上，保證非黨人士佔三分之二，在此三分之二的非黨人士中，多數是中間分子，一切這些，都使非黨人士大為感動。七十八歲的老人李丹生（參議員）在開幕時代表全體參議員說話，稱贊我們誠能感人，并希望我們「說到做到。以信義昭示天下，則天下都是你們的」。這次參議會的成功，同時在全國發生極大影響，這是不用多說的。

第二，是實行三三制的成功。由於這屆參議會有將近三分之二的非黨人士，而常駐委員會和政府委員又完全實行三三制，給非黨人士以能在政府中說話做事的機會，使邊區內部各階層人士對我觀感改變，促進了內部團結，并且能吸收許多非黨的很好人才參加政府工作（如李鼎銘、柳添）；特別因為議會和政府有了許多黨外人士參加，可以反映許多黨外有益的意見和更加清楚暴露我們各方面的弱點，比如新任副主席李鼎銘，即提精兵簡政提高政府信譽案，正切中邊區政府機關龐大頭重腳輕及個別幹部違反紀紀破壞政策現象，這個提案對於今後改進政府工作是幫助很大的。又因為議會

和政府中既有許多非黨人士，使我們在政府中的共產黨員，不能再黨政不分一意孤行把持包辦，必須耐心的去和非黨人士商量，必須更慎重其事的處理問題。我們的工作不僅有黨內的自我批評，而且有黨外人士的批評，這種內外夾攻，使政權中黨員質量更加提高，使政府本身工作更加進步。現在證明如果這次參議會中非黨人士真正佔三分之二，我黨對議會的領導，不靠自己人數的多，而靠自己工作質量，則我們所得的經驗與成績將要更大，甚至容許少數頑固份子參加，也是利多害少。

四、雖然這次參議會的結果很好，但正如高崗同志所說，我們並不是一開始就對實行三三制、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有極明澈的認識，一切工作都充分向着這個方向準備，而是在中央直接幫助之下及實際工作過程中的經驗，不斷改進自己的缺點，才得到上述的成績。從這次參議會中所暴露我們的主要弱點如下：

首先，是極大多數黨員幹部，在思想及工作習慣上仍保持過去黨政不分把持包辦的精神，把這次參議會隨隨便便的看如過去一切黨所包辦的政府或民衆團體會議一樣，亦即把參議會看成和黨內會議一樣。

其次，因對會議的一切準備工作均不充分，對整個會議的進行缺少緊張嚴肅的精神，如在選擇上未事先保證三分之二的黨外人士當選，黨員又多不注意選舉，在提案上未能集中在幾個中心問題上佈置展開討論，以致提案多而亂，浪費時間精力，在各種報告及決議等文件的準備上亦極爲倉促，不能作得很好。

其三，極多數黨員均未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處處表示……（按：原件電碼不明）……使非黨人士感到如上課時在聽訓。

其四，在黨內已表現有部分黨員與幹部……（電碼不明）……在議會中的發言及提案，可以不過問黨團，可以不服從黨的決定，可以不顧及黨在羣衆中的影響，可以把黨內爭論不同的意見公開提在議會上，可以公開反對黨的決定，開會時可以自由遲到或不到，還不如非黨人士遵守會議規則和重視這個會議。

其五，這次參議會黨團書記，是由公開工作繁劇的同志負責，而沒有由不負公開職務的主要同志負責，因此，不能專門冷靜的準備領導全部議會的工作，不能發……（電碼不明）全會的一切動向，迅速處理；加以一般黨員長期習慣於

黨政不分的一套作法，長期自由主義未加糾正，同時全黨對於這種民主制度民主作風的認識與熟練都還很少經驗，如何開會，如何討論，如何表決，如何選舉，審查委員會的工作應如何進行，這一切都不懂，全用黨內一套，這些都是使這次黨團工作沒有做好的原因。

（錄自「中共文電彙輯」第一輯）

附錄三：淮太西縣烟土稅徵收與管理暫行辦法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

日頒佈

（作者按：「淮太西」縣係河南之淮陽、太康、西華三縣之一部劃編而成，隸屬於冀魯豫邊區第六專區，該專區又稱水東專區，因地處新黃河以東。本辦法第七條所稱水東辦事處，即指此而言。）

一、爲了加強對敵經濟鬥爭，減輕人民負擔，管制煙土出口，爭取必需品的收入，特根據冀魯豫邊區政府稅收原則暨本縣實際情況制定本辦法。

二、於本縣中心集市設立煙土總行，統一管理煙土行之經營與稅收事宜。

1. 進行煙土經營之行戶（以下簡稱行戶），須按期向煙土總行呈請登記交納營業稅，領取營業許可證，在煙土總行監督與管理下進行營業。

2. 煙土總行將根據實際情形在其他集市設置分行或集市管理員，分別負責各集市煙土稅收與營業管理事宜。

3. 煙土總行得根據集市交易情形，規定一定行戶額數，超過規定額數時，由縣政府在呈請行戶中指定之，其餘可作爲候補行戶。

4. 合法經營之煙土行戶，可取得下列收入：

（1）介紹成交，可按買賣各給三分紅利。

(2) 可按代收煙土稅總收入百分之十作為酬金。

5. 總行得考核各行戶營業收稅及執行法令之情形，予以適當獎懲，必要時并可撤消其營業權限，由其他候補行戶遞補之。

三、買賣煙土之商民必須將稅款向總行或合法營業之行戶進行交納，方准出口。

1. 購買煙土人須首先向煙土總行或其代辦機關舉行登記，并取得許可證始得購買煙土。

2. 購買煙土後，即由經手交貨之行戶收納煙土稅後始准出口。

3. 不經買賣，而係直接出口之煙土，應先到納稅機關繳納稅款領取稅單，始准出口。

四、稅率：

1. 煙土稅率暫定征收按售價百分之十五徵收之。

2. 購買煙土人如以銀元黃金購煙土者，按百分之五征收，但祇准在總行或其指定機關換兌。

五、罰則：

1. 煙土行戶買賣煙土後，低報煙土價格因而漏稅者，查獲後，除補稅納款外，處以應繳稅款二倍之罰金

2. 購買煙土人，於購貨後，實行走私漏稅者，查獲後除補稅外，另處相當於納稅額二倍之罰金。不經買賣關係走私漏稅者，其處罰適用於購貨走私辦法。

3. 通過非法行戶（即未領取營業許可證之行戶）買賣煙土，查獲後，賣主處相當於煙土售價十分之一的罰金，買主除照章納稅外，處相當於煙土售價十分之四的罰金，非法行戶，依據情節輕重，處五千元到兩萬元的罰金。

4. 不經煙土行戶，私人買賣煙土者，查獲後賣主處相當於煙土售價十分之一的罰金，買主除照章補稅外，處相當於煙土售價十分之五的罰金。

六、提成：

1. 緝私人員及脫離生產之其他工作人員，查獲漏稅或私行買賣煙土者，應按所得罰金百分之十獎勵查獲人；但

每人每次不超過一千元。

2. 商民行戶羣衆發現有漏稅或私行買賣煙土事項者，有向煙土總行報告之權，因報告而查獲者，以所得罰金百分之二十作為提獎。

3. 處罰權限屬於縣政府或煙土總行，其他任何機關團體個人不得自行處罰。

七、本辦法經水東辦事處批准後公佈施行。

（錄自中共印發之油印原件）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中文叢書系列第60冊

中共史論 第三冊

著者：郭

發行者：張

京華

育倫

出版者：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臺北市木柵區萬壽路六四號

郵政劃撥：〇〇〇三〇四三六一（六線）

印刷者：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中和市中正路八〇〇號

初版：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九月

增訂版：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六月

三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六月

四版：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六月

四版二刷：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六月

平裝本：全套四冊

實售新台幣八〇〇元

（郵資另加）

